

版權信息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by James C. Scott  
 Copyrightⓒ 1976 by Yale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10-2013-31號

書  名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人文系列）

作  者　【美國】詹姆斯·C.斯科特

譯  者　程立顯 劉建

責任編輯　劉金源

出版發行　譯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2839-3

關注我們的微博： @譯林出版社

關注我們的微信：yilinpress

意見反饋：@你好小巴魚

目录

[前言 3](#_Toc69225891)

[導論 7](#_Toc69225892)

[第一章 生存倫理的經濟學與社會學 11](#_Toc69225893)

[“安全第一”[28]：生存經濟學 11](#_Toc69225894)

[生存倫理的社會學 15](#_Toc69225895)

[農民社會中的風險分配 16](#_Toc69225896)

[生存作為道義承諾 17](#_Toc69225897)

[第二章 農民的選擇和價值標準中的生存保障 19](#_Toc69225898)

[風險與社會分層 19](#_Toc69225899)

[鄉村的風險保障 20](#_Toc69225900)

[租佃與分成租佃的風險 21](#_Toc69225901)

[風險和政府 24](#_Toc69225902)

[第三章 風險分配與殖民地變革 27](#_Toc69225903)

[市場取向的不穩定性 27](#_Toc69225904)

[鄉村保護的弱化 28](#_Toc69225905)

[輔助生存資源的喪失 28](#_Toc69225906)

[農村階級關系的惡化 29](#_Toc69225907)

[土地所有制的變革與世界經濟 37](#_Toc69225908)

[第四章 作為勒索者的政府 40](#_Toc69225909)

[緬甸 42](#_Toc69225910)

[越南 44](#_Toc69225911)

[第五章 經濟蕭條導致的起義 48](#_Toc69225912)

[交趾支那：“紅色恐怖”[295] 52](#_Toc69225913)

[義安與河靜的蘇維埃 54](#_Toc69225914)

[起義過程 60](#_Toc69225915)

[下緬甸——沙耶山起義 61](#_Toc69225916)

[第六章 剝削的分析意義：互惠與生存的公正 65](#_Toc69225917)

[剝削的標準 65](#_Toc69225918)

[剝削——一個道德難題 68](#_Toc69225919)

[互惠與交換的平衡 68](#_Toc69225920)

[生存——基本的社會權利 71](#_Toc69225921)

[傳統與穩定交換的打破 72](#_Toc69225922)

[社會分層、義務和權利 73](#_Toc69225923)

[第七章 反叛、幸存和鎮壓 78](#_Toc69225924)

[反叛的結構性背景 78](#_Toc69225925)

[反叛與農民的社會結構 80](#_Toc69225926)

[不反叛，自助，或潰散 81](#_Toc69225927)

[不反叛：鎮壓和“錯覺”問題 87](#_Toc69225928)

[譯后感言 109](#_Toc69225929)

[注釋 111](#_Toc69225930)

# 前言

這項關于農民政治活動和反叛基礎的研究，開始于托尼的一個比喻，他說“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這項研究把農民家庭的關鍵問題——安全生存問題置于研究農民政治活動的中心，我認為它也確實是個中心問題。我想揭示如何用農民對饑荒的恐懼來解釋農民社會的許多奇特的技術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安排。

把生存作為目的的農民，在規避經濟災難而不愿冒險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這一事實對于認識剝削問題有著巨大意義。基于這一原則，有可能推斷出什么樣的租佃和稅收制度會對農民生活產生決定性影響。關鍵問題不是精英階層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余財富，而是他們的穩定收入以誰的犧牲為代價。本書根據緬甸南部和越南農業社會的歷史發展檢驗了這一理論。農業的商品化和官僚國家的發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制度，逐漸破壞了農民收入的穩定性，引起了猛烈的抵抗。本書對此類反抗的兩個突出事件——緬甸的沙耶山起義和越南的義—靜蘇維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

通觀全書，我極力強調生存規則的道德涵義。于是，剝削和反叛問題就不僅僅是食物和收入問題，而且是農民的社會公正觀念、權利義務觀念和互惠觀念問題。

自校對本書最后一稿之后，我偶然讀到了不少關于第三世界農業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以及關于反叛運動的檔案材料。這些都會加強我的論點，也會加入一些細微的差別。特別遺憾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未能讀到基思·格里芬的《土地制度變革的政治經濟學》和杰弗里·佩奇的《土地革命》這兩書。

讀者將會注意到，對農民道義經濟的研究，始于經濟學領域，但必須終止于對農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圖指明——特別是在論述“錯覺”問題時——此種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線，但我自己在這里也不過是抓住了皮毛。但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更為深入地探討道德異議和反抗在農民的“小傳統”內的文化基礎。

本書于1973年到1974年間完成初稿。那時，我幸運地得到了全國科學基金會的資助，并有幸陪同路易斯·斯科特去巴黎，她遷居巴黎從事19世紀藝術的研究。我利用在巴黎的一年時間，廣泛地閱讀了被泛泛地稱為歷史學中的年鑒學派的著作，特別是馬克·布洛克和伊曼紐爾·勒·羅伊·拉杜里的著作，以及羅伯特·曼德魯和R.C.科布論大眾心態（mentalités populaires）的著作。在本書中可以看到這些著作的某種精神，盡管我不愿意自稱是他們團體的成員而玷污他們的學派。我不定期參加了由尼科斯·普蘭茨和阿蘭·圖雷納組織的關于學校教育實踐的高級研討會，深受啟發，隨之極大地提高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贊賞程度。喬治·孔多米納也歡迎我每周參加他的令人興奮的東南亞問題專家研討會。同在我之前的許多學者一樣，我得益于麥迪遜人文科學圖書館的設備和學術氛圍，非常感激那里的全體工作人員。在那里，我同塞拉菲娜·薩科夫、埃茲雷·敘雷曼和亞納·巴爾貝等學者結下的學術友誼，給孤苦寫作中的我帶來了難得的歡樂。巴黎的海外檔案館和倫敦的印度公務圖書館，為我在本書中關于越南和緬甸的個案研究提供了資料，我要感謝那里的全體工作人員。

倘若不是1973年春從亞洲學會的東南亞發展顧問組得到半年的研究獎金，使我有機會整理醞釀已久的思想，我就不會進入寫作狀態。

我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上的幫助，真是難以盡述。而且，據我所知，我的許多默默無言的合作者愿意繼續做無名英雄。然而，我要感謝詹姆斯·羅馬塞特、小巴林頓·穆爾和西德爾·西爾弗曼，他們的著作幫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沒有加伊·帕拉迪塞·凱利、薩姆·波普金、本·柯克弗里埃特和亞歷克斯·伍德塞德的批評幫助，那么，本書無疑要在事實和分析兩方面出現更多的錯誤。關于順從和錯覺這個無論如何都有出錯危險的話題，我拒絕了羅納德·赫林、托馬斯·博塞特、查理·惠特莫爾和邁克爾·萊瑟森的許多批評。他們對我的論點的抨擊，幫助我進一步鞏固了論點，雖然他們對我沒有全然拋棄自己的觀點會感到遺憾。我用來鞏固觀點的部分材料來自杰出的荷蘭學者W.F.沃特海姆的著作，我汲取了他的許多價值觀念和學術觀點。

在本書正式出版前的所有批評者中間，克利福德·格爾茨、邁克爾·阿代斯和耶魯大學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讀者，提出了最尖銳深刻的意見。根據他們仔細閱讀之后的意見，我重新思考和系統闡述了許多論據。雖然我肯定不能解決他們所提出的所有問題，但不論最后成書的質量如何，本書能達到目前這個程度都是同他們的詳細評論分不開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土地使用權研究中心，作為主要負責我在農民研究方面的教育的機構，十分友好地為我提供了暑期研究資助，使我有可能根據許多有益的批評意見重寫文稿。

我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同事們，特別是唐·埃默森、默里·埃德爾曼和F.海沃德，給了我多方面的鼓勵，確實難以盡述。尤為重要的是，愛德華·弗里德曼——我同他一道開設了有關農民的政治活動和革命的課程——在學術的非神秘化、關于馬克思以及農民問題等方面給了我許多教益，使我難以報答。我只能希望本書不辜負他的友誼和指導。

詹妮·米特納切特為我做了許多工作，不限于打文稿，還修復了由于我早年忽視語法和拼字比賽會而造成的許多文字硬傷。

說到這里，按照標準前言的慣例，該是作者為書中的錯誤和自己的固執包攬全部責任、免除他人責任的時候了。但我不一定想這么做。無論成敗，當我為寫作成果而高興的時候，顯而易見的是，我從如此之多的學者那里學到了如此之多的東西，他們和我共同參與了這一事業。如果事實表明我行進在錯誤的軌道上，那么，我懷疑許多學者同我一起錯乘了同一列火車！

順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都有自己的學術興趣和其他愛好，因而他們同本書實際上毫無關系。當我開始研究和寫作的時候，他們并不特別地理解或予以幫助，而是盡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家庭生活的許多樂趣。但愿永遠如此。

J.C.S.

1976年5月26日

于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 導論

有些地區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1]](#_1_179)

這是托尼對1931年中國農村狀況的描述，但他沒有把這一生動描述推延至20世紀初位于印度支那的上緬甸[[2]](#_2_174)、東京[[3]](#_3_169)和安南，或者東爪哇、中爪哇地區的農民狀況。這些地方也是如此，小片土地、古老的耕作技藝、變幻莫測的氣候以及國家強征的徭役、貢金、貢品，每個村頭都可見到饑餓的幽靈，有時還發生饑荒。

東南亞地區一部分農民特有的生態小環境使他們面臨極其嚴重的生存危機。上緬甸的干旱地帶，始終受制于老天爺的不可預測的降雨量。英國人征服下緬甸不久，上緬甸的這一地區遭受了1856—1857年的特大饑荒。“雨水奇缺，田地里水稻枯萎，……人們死去。他們死狀凄慘，有的在田地里啃著樹皮時死去；有的在馬路上四處尋找食物時死去；有的死在家中。”[[4]](#_4_167)在泰國東北的安南和其他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大多數成年人都經歷過——并且至今記憶猶新——不止一次的大荒年：體弱者、年幼者死掉了，剩下的人不得不吃耕畜、吃稻種，不得不靠通常用來喂耕畜的麩糠草料活命。

然而，1944—1945年越南北方農民所遭受的大饑荒，其嚴重程度使得20世紀這一地區的其他生存危機倒顯得小多了。在最好的年景里，東京的可耕地也只能勉強養活當地人口。但是，日本人及其維希同盟，把許多稻田改種黃麻和其他軍用農作物。1943年10月收獲季節之后，占領軍真正地武裝清洗了鄉村，沒收了大量谷物。1944年5月到9月的一連串臺風，摧毀了堤壩，淹沒了東京的許多稻田，毀滅了10月份的收成。于是，一場準饑荒變成了完全的大饑荒。連小米、馬鈴薯和米糠都吃光了，剩下的只有馬鈴薯葉、芭蕉根、青草和樹皮。設法種了點馬鈴薯的人也許會發現，它們已經在夜間被人扒出來吃掉了。1944年10月和1945年春收之前，發生了大饑荒，多達200萬的越南人餓死了。[[5]](#_5_159)

大多數東南亞人的生存危機和饑荒的規模一直都比較小：局部的旱澇，導致大批耕畜死亡的瘟疫，收獲季節毀壞糧食的風災雨災，或者是毀壞莊稼的鳥、鼠和毛虱。食物匱乏也許僅限于這樣的家庭：其土地不是太高太干就是太低太濕，其主要勞力在插秧或收獲季節病倒了，其子女太多而土地太少。即便收成充裕，外部人的索取——地租和稅收——也會使糧食不足。

如果說30年代的大蕭條給整個一代美國人的恐懼感、價值觀和習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那么，我們能夠想像出周期性的食物危機對季風氣候下的亞洲稻農的恐懼感、價值觀和習慣所產生的影響嗎？

在大多數前資本主義的農業社會里，對食物短缺的恐懼，產生了“生存倫理”——這種說法可能比較恰當。這種東南亞農民同19世紀法國、俄國、意大利共有的道德，是生活在邊緣地帶的結果。糟糕的收成不僅意味著食物短缺；而且，為了吃飯而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嚴重依賴他人的羞辱感，或者是變賣土地耕畜而減少來年收獲足夠食物的機會。農民家庭的問題，說白了，就是要生產足夠的大米以養家糊口，要買一些鹽、布等必需品，還要滿足外部人的不可減少的索取。一個家庭能生產多少大米，部分地取決于運區；但種子的品種、種植技術和耕作時間的地方傳統，是經歷了幾百年的試驗和挫折才形成的，使得在特定環境下能有最穩定、最可靠的產量。這些都是由農民發展起來的技術安排，用以消除“使人陷入滅頂之災的細浪”。還有許多社會安排也服務于同樣的目的。互惠模式、強制性捐助、公用土地、分攤出工等等都有助于彌補家庭資源的欠缺；否則，這種資源欠缺就會使他們跌入生存線之下。這些技術和社會安排已確認的價值，大概恰恰使得農民在來自首府城市的、幫助他們的農學家和社會工作者面前，表現出布萊希特式的固執。

下文論述的目的，就是要把生存倫理置于分析農民的政治活動的中心。論述本身始自于我對30年代大蕭條時期席卷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幾次大規模農民反叛的持久研究。對其中的兩次起義，即緬甸的沙耶山起義和越南中部的被稱為“義（安）—（河）靜蘇維埃”的起義，我要作詳細分析。

從東南亞殖民地史的角度看，這些反叛活動以及其他類似活動可以被視為歷史上的附帶現象，盡管對于在反叛戰斗中死去的人們來說，這些活動決不是小事一樁。兩次起義最終都被鎮壓了，兩者都未能實現農民的任何目標，兩者都被認為是政治戲劇的次要情節——這場政治戲劇越來越受民族主義者和殖民者之間的斗爭所主導。從另一層更深遠的歷史意義上看，這些活動是邊緣性的。在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權化和商品化世界上，他們尋求封閉的、自治的農民烏托邦。它們或多或少屬于自發起義，打著農民地方主義的一切招牌。在農民地方主義的世界里，世俗民族主義的大部隊是殖民地國家的惟一有效的反對力量。同其他向后看的農民運動或工匠運動一起，兩次起義是——用霍布斯鮑姆的話來說——“難免的犧牲品”。[[6]](#_6_153)

然而，從另一種觀點看來，我們可以從將近半個世紀前被打敗的反叛者那里學到許多東西。如果我們理解激起他們不顧一切冒險的義憤的話，就能掌握我稱之為他們的道義經濟的東西：他們的經濟公正觀念及其對剝削的實用性定義——在他們看來，對他們的產品的哪些索要是難以忍受的，哪些索要是不可以忍受的。由于他們的道義經濟在其他地方的農民中也有代表性——我能夠證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對農民政治活動的道德規范根源有更為充分的理解。進一步說，如果我們懂得殖民地時代的中央經濟和政治的轉變系統地違背了農民的社會平等觀，我們就會認識到作為“低等階級”[[7]](#_7_151)的階級何以比無產階級更為經常地舉起反叛和革命的旗幟。

這里要做個必要的說明。我的研究主要的不是分析農民革命的原因，這項任務已經由B.穆爾和E.R.沃爾夫很好地完成了。[[8]](#_8_151)通過研究農民的道義經濟，我們可以知道使他們憤怒的是什么，而在其他情況相同時，什么東西會引起爆炸性局勢。但是，如果說對剝削的憤怒足以激起反叛的話，那么，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不僅僅是第三世界國家）就都會燃起反叛之火。認識到自己受剝削的農民是否確實造反，這取決于眾多相關因素——諸如同其他階級的聯盟，統治者的鎮壓能力和農民自身的社會組織，對此，我們這里一帶而過，不加討論。我要論述的是，在農民社會里當受害者認識到剝削的時候，剝削的性質如何；什么東西會形成社會的爆炸性形勢，而不討論社會爆炸本身。（我把自己限制在這一討論范圍內，不僅是出于對穆爾和沃爾夫研究革命的杰出成果的尊重，以及對學術分工的認識；而且因為在我看來，比起革命戰爭來，沒有反叛的剝削是十分正常的事態。）在本書最后一章，我要說明在沒有反叛的情況下，對于受剝削的農民來說，悲劇性選擇是什么。

我賴以立論的基本思想是簡單的，但卻是有力的，它產生于大多數農民家庭的主要的經濟困境。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線的邊緣，受制于氣候的變幻莫測和別人的盤剝，農民家庭對于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收益最大化，幾乎沒有進行計算的機會。典型情況是，農民耕種者力圖避免的是可能毀滅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過冒險而獲得大成功、發橫財。用決策語言來說，他的行為是不冒風險的；他要盡量縮小最大損失的主觀概率。如果說把農民看做面向未來的熊彼特式的企業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的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權力最大化假設則沒有公平地對待他的政治行為。首先考慮可靠的生存需要，把它當做農民耕種者的基本目標，然后考察他同鄰居、精英階層和國家的關系，看他們是援助還是阻礙他滿足這一需要——這就要重新闡述許多問題。

這條“安全第一”原則，體現在前資本主義的農民秩序的許多技術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安排中。舉兩個例子，使用不止一類的種子以及在分散的條塊地上的歐洲式傳統耕作，就是為了避免過度風險的古典技術，而常常以減少平均回報為代價。一個村莊里的一大批社會安排，主要是為了確保住戶的最低限度收入。定期地根據需要重新分配的公有土地，或是歐洲村莊的公地，其功能全在于此。此外，前資本主義村莊內的社會壓力，也有某種再分配的功用：富裕農民要仁慈待人，主辦較多的開銷和較大的慶典，救助暫時窮困的親戚鄰居，慷慨地捐助當地的圣祠廟宇。正如M.利普頓所指出的：“許多看似古怪奇特的村莊活動，實際上具有隱蔽的保險功能。”[[9]](#_9_145)

上述社會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社會的特色。但人們很容易把這些安排浪漫化、理想化，這是個嚴重錯誤。它們并不意味著絕對平均主義。相反，它們僅僅意味著一切人都有權利依靠本村資源而活著，而這種活著的取得，常常要以喪失身份和自主性為代價。這類社會安排的功能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流言蜚語和妒忌的腐蝕力，靠人們的這一共識：被拋棄的窮人很可能成為富裕村民的真正和現實的威脅。然而，這些適度而關鍵的再分配機制，確實為村民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根據歷史的和社會學的證據，波拉尼認為，此類習俗在傳統社會中是相當普遍的，而且是傳統社會與市場經濟社會相區別的標志之一。他的結論是：“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沒有jiacu個人挨餓的威脅，使得原始社會比市場經濟更為人道，同時經濟的考慮也更少。”[[10]](#_10_143)

生存保險的提供并不局限于村莊內部，它還構建了同外部社會精英之關系中的道義經濟。正如E.沃爾夫所指出的那樣：

然而，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無論從長期看還是從短期看，社會平衡均取決于農民的剩余物資向統治者轉移的某種平衡，取決于為耕種者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分享公共組織內部的資源，依賴于同強有力的保護人的聯系，這些是農民為力求降低風險、加強生活穩定性而經常采取的措施，也得到政府的寬恕，甚至常常得到政府的支持。[[11]](#_11_139)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提高警覺，不能沖動地把這些安排理想化。當它們起作用（但不一定總有作用）的時候，它們也并不必然地是利他主義的結果。在地多人少的地方，生存保險實質上是留住勞動力的惟一辦法；在社會精英和國家所控制的強制手段十分有限的地方，對下層人員的需要表示出某種尊重是聰明的辦法。

雖然生存保障的愿望出自耕種者的需要——出自農民的經濟狀況，但人們在社會上感受到的是一種類型的道德權利和道德期待。B.穆爾抓住了對這些期待的標準理解：

這種［在共同體內分擔風險的］經驗提供了培育農民的習俗和道德標準的溫床，農民們正是用這些習俗和道德標準判斷自己和別人的行為。這些標準的實質是樸素的平等觀念，強調保障最低限量的土地［資源］對于實現基本的社會任務的公正性和必要性。這些標準通常具有某種宗教制裁力；而且，農民的道德良心不同于其他社會階級的道德良心，也是這些標準所強調的重點。[[12]](#_12_137)

違背這些標準，就會激起怨恨和抵抗——不但由于需要未被滿足，而且由于權利受到了侵犯。

這樣說來，生存倫理就是植根于農民社會的經濟實踐和社會交易之中的。作為道德原則，作為生存權利，我可以證明它是評價地主和政府盤剝農民剩余物的標準。基本問題是前者以后者的犧牲為代價去穩定自己的收益。既然佃戶寧愿盡量減小災難的概率而不是爭取最大的平均利潤，那么，在對租地使用權制度的評估方面，佃戶生存收益的穩定和保障就比其平均利潤或被地主取走的收獲量都更具決定性。為佃戶提供有保障的最低利潤的租地制度，比起那種從佃戶那里平均盤剝量較少、但忽視其基本消費需要的制度來，在佃戶的體驗中似乎剝削的程度較低。這一推理同樣地適用于政府的索要權。政府的征收量是固定不變的，不因農民在特定年份的支付能力的不同而不同。這一制度，比起因收益不同而不同的國庫負擔來說，很可能被認為剝削程度更厲害。農民的檢驗標準極可能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生存標準對待剝削的看法同僅僅基于被征收的剩余價值量的各種理論完全不同。后者在對國家征收方式分類方面可能有用，但我認為，生存標準比它們更可能成為農民經驗的現象學的適當指導。這是因為，生存問題最直接地關系到農民生活的根本需要和憂慮。

東南亞殖民地時代的兩次大轉變，逐漸完全破壞了以前的社會保險模式，違背了生存規則的道義經濟。這些轉變是：第一，沃爾夫所說的“特殊的文化系統，即北大西洋的資本主義”[[13]](#_13_133)的強制性；第二，在殖民者領導下的現代國家的相關發展。土地和勞動力（即自然和人力）之轉化為商品，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村民們越來越失去對土地的控制，耕種者逐漸失去對土地的使用收益權而變為承租人或農業工資勞動者，農業產品的價值越來越受非人格化的市場波動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東南亞發生的事情，正是馬克思在歐洲所看到的區域性情況的概括。“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14]](#_14_129)在下緬甸和湄公河三角洲的土地上，這些“新的自由人”面對著越來越苛刻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后者對農民收成的盤剝更大地隨市場的指向而不是隨土地承租人的需要而變化。在整個20世紀初期，隨著世界經濟蕭條的到來，一直在惡化的形勢，演變成了基于強制，同樣也基于市場的“你得益，我受損”的斗爭。農民盡其所能地抵抗，而一旦環境許可，便要進行反叛。

在這場戲劇中，政府和稀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扮演著同樣的角色。政府不僅使用法律強制機器以確保契約得到遵守、市場經濟得以維持，而且本身又是農民財富的盤剝者。政府的大部分管理職能在于為了稅收的目的而清點和統計臣民及其土地數量。政府財政顧問的推理同地主是一樣的：穩定的收益比波動的收益更為可取，因而固定的人頭稅和土地稅率比根據實際收入征稅更為可取。當發生經濟危機時，政府的關稅收入和其他可變性財源顯著減少，于是它便大大加重最為穩定的稅源——人頭稅。這種勒索進一步加重了本來就已經壓力不輕的農民的稅負，因而激起了抵抗和反叛。

從上述所有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出，這里談到的抵抗和反叛同歐洲早期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所激起的反抗，何其相似！[[15]](#_15_129)在歐洲，生存收入問題也是由于市場力量和政府的過度侵入而加劇的。R.C.科布通過對18世紀法國的民眾抗議的深入研究，認為只有根據食物供應問題、短缺的威脅及其政治意義，才能理解民眾抗議。

對供應不足的態度制約著對其他一切事物的大眾態度，例如對政府、農村、生命和死亡、不平等、剝奪、道德、驕傲、羞恥、自尊等等的態度。供應不足是一切大眾表達的中心論題。普通人并非生活在神話和莫名其妙的恐懼的世界上，因為供應不足和饑荒實際上是對其生存的最大的和惟一的威脅。[[16]](#_16_129)

盡管有驚人的相似，但對于殖民地人民來說，轉變的過程所帶來的傷害更大。一個原因是，在英國或法國花了300年才實現的轉變，在殖民地國家被縮短為僅僅幾十年的強迫過程。而且，在歐洲，正如波拉尼所雄辯地指出的那樣，將從完全的市場經濟中失去許多東西的本土勢力（有時包括君王，部分貴族，工匠，農民和工人），有時通過實行古老的道義經濟，可以阻止或至少限制市場力量的作用范圍。在德國和日本，強大的保守國家的創立，允許穆爾所說的“來自上層的革命”的發生，這種革命在經濟現代化的同時，使原有的社會結構盡可能多地不受損傷。結果，一方面為日后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打下了基礎；另一方面，對農民在短期內造成的傷害較輕。但在殖民地國家，想反對或限制市場經濟的全面影響的政治勢力，除了造反，沒有什么力量或完全沒有力量讓社會承認自己。

從上述觀點看來，在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轉變時期，農民問題就是保障最低限度收入的問題。[[17]](#_17_123)最低限度收入的確定當然有生理學方面的可靠根據，但也不能忽略其社會和文化的涵義。為了充分發揮自己作為鄉村社會成員的作用，每家人都需要達到一定水平的財力，以便履行必要的禮儀和社會義務，同時吃飽肚子、繼續耕作。倘若低于這一水平，那就不但有餓肚子的危險，還要遭受在社區內失去身份、地位的深遠危害，也許從此永遠陷入依賴性境地。

在某種意義上說，前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圍繞這一最低限度收入問題組織起來的，旨在最大程度地減少其成員由于有限的技術和變幻無常的自然條件而必然遭遇的風險。傳統形式的保護與被保護關系、互惠主義與再分配機制可以認為就是由此產生的。誠然，一旦發生集體性災難，裝備極差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難以為其成員提供生計；但它通過精心設計的社會交換體系，確實提供了家庭社會保險以應付“正常”的農業風險。

當然，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國家本身承擔起了通過逆向財政政策、失業補償、福利計劃、社會醫療和負所得稅等機制保障最低限度收入的責任。順便指出，這些保障措施的效果之一，就是使得個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更為合理了。

農民幾乎完全沒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費保障，與此同時，農業經濟的商品化又完全取消了各種傳統的社會保險——這是東南亞（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時期的特征。[[18]](#_18_121)殖民地政權完全不考慮市場波動對農民的打擊；相反，為了維持稅收數額，在經濟衰退中更加壓榨農民。結果出現了某種矛盾現象。一方面是迅速發展的出口經濟，當地地主、官員和放債人的巨額財產，有時還有人均收入的增長；另一方面，則是對農村的負債和貧困狀況以及對農民動亂的發展速度的高度關注。這同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出現的貧困狀況并無不同。[[19]](#_19_122)這種矛盾現象形成的原因，植根于居民中的較貧困部分在生存收入方面的新的不安全感。盡管平均工資率也許很高，但失業的可能性很大；盡管農民出售產品的平均價格也許很高，但價格劇烈波動；盡管稅收也許是適當的，但對于可變性極大的農民收入來說，這是一筆固定支出；盡管出口型經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但也集中了生產資源的所有權，同時侵蝕了古老的鄉村經濟中的平衡機制。

在貫穿這一時期的農民抗議的所有主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關生存準則的道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兩大主題是：第一，當地主、放債人或政府侵害了被認為是由文化界定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水準時，他們對農民收入的盤剝決不是合理的；第二，分配土地產品的方式，應當確保一切人都處于適當的生存地位。在以往的任何情況下——在傳統的社會實踐中——幾乎都有這種訴求，而我所論述的造反則被恰當地視為防御性反應。此類向后看的意圖，現已成為從分析農民運動中得出的定論。正如穆爾引證托尼的觀點所指出的：“農民激進分子會驚訝地聽說他正在破壞社會的基礎；他僅僅是想弄回長久以來公正地屬于自己的東西。”[[20]](#_20_120)而且，造反實質上是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的造反。除了在公有土地已經被地方名流占用了的地方，令人吃驚的是，對土地本身進行再分配的要求從未提出過。抗稅抗租的要求，是根據他們的消費情況提出來的；在好年景可以接受的稅租，在壞年景則不可接受。是剩下的數額少而不是被要走了多少（兩者確有明顯的聯系，但決不等同）促使農民進行反叛。

本書開頭一章，大膽地采用了經濟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有分析地描述了“生存倫理”對于農民經濟活動的意義，解釋并以實例證明了所謂決策的“安全第一”原則對于東南亞農民的適用性。

在第二章中，我力圖證明生存倫理不僅是農民經濟的特定產物，而且具有規范的或道德的意義。在鄉村互惠、社會選擇、租佃制度的偏好以及對稅收的態度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在這一基礎上，我努力把剝削性最大的租佃或稅收制度同生存安全的觀點區別開來，努力論證后者同農民價值觀的一致性。

第三、四、五章努力把上述論點應用于考察東南亞國家，特別是緬甸和越南的殖民地經濟和農民的政治活動中。第三章主要分析殖民地經濟的結構性變革如何縮小了許多農民的生存空間，同時使他們面臨生存危機的新的更大的風險。第四章以同樣的方法分析了殖民地政府對農民的財政盤剝的結果。第五章根據生存倫理準則和“安全第一”原則，考察了越南和緬甸的兩次較大規模的起義。

第六章更全面地努力把生存道德的政治經濟學運用于分析農民的政治生活（我認為，農民的社會公正概念可以從互惠主義規范和生存權利中引伸出來），并系統地闡述可操作的剝削概念，它提出兩個問題：什么是農民和精英階層之間的交換平衡？這種平衡對農民的生存安全有什么影響？

第七章談到農民反叛問題。首先討論當同剝削相聯系時則可能激起反叛的條件，由此不可避免地要考慮為什么反叛不是農民政治生活的獨特表達。除了進行反叛，還有別的選擇辦法嗎？最后，我們談到了“錯覺”這一古老問題：當國家政權使得反叛活動萬分危險時，我們何以知道農民是否覺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剝削？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觀察高壓統治的程度，特別是觀察農民文化的發展，它們能說明農民們是接受還是拒絕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土地制度的主要價值觀。

# 第一章 生存倫理的經濟學與社會學

以生存為目的的農民家庭經濟活動的特點在于：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農民家庭不僅是個生產單位，而且是個消費單位。根據家庭規模，它一開始就或多或少地有某種不可縮減的生存消費的需要；為了作為一個單位存在下去，它就必須滿足這一需要。以穩定可靠的方式滿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是農民綜合考慮種子、技術、耕作時間、輪作制等項選擇的主要標準。瀕臨生存邊緣的失敗者的代價，使得安全、可靠性優先于長遠的利潤。

農民經濟活動中的許多表面的異常現象源自這一事實：爭取最低限度生存的斗爭是在缺乏土地、資本和外部就業機會的背景下進行的。這種受限制的背景，常常促使農民不理睬那些書本上的標準的獲利措施——正如A.V.查耶諾夫在對俄國小地主的經典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21]](#_21_121)那些人口密集地區只能靠小塊土地維持生存的農民家庭，為了增加一點點產量，（如果沒有其他辦法的話）其勞動強度和時間都令人難以想像——好像是在精明的資本家的壓迫下干活。查耶諾夫把這種情況叫做“自我剝削”。當這種模式成為農民制度的特征時，如同東京和爪哇地區那樣，它就表現了C.格爾茨所說的“農業的衰退”。[[22]](#_22_121)附加勞動的邊際利潤低得可憐，但這對于缺乏資本和土地，又必須從自己的資源中擠出家庭食物的農民來說，卻無關緊要。由于勞動是農民所擁有的惟一的相對充足的生產要素，為了滿足生存需要，他可能不得不做那些利潤極低的消耗勞動的事情。這可能意味著轉換農作物或耕作技術（例如將撒播稻子變為插秧），或者在農閑季節從事小手藝、小買賣等活動，雖然所得甚少，實際上卻是剩余勞動力的惟一出路。[[23]](#_23_121)查耶諾夫指出，在家庭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農民家庭可用土地的減少，農民在一年中從事小手藝、小生意的時間則增加。在土地奇缺的諸如上緬甸、安南和東京等地區，小手藝和小生意有很強的傳統作用，爪哇則形成了小規模的農民市場模式，這些是同查耶諾夫指出的關系相一致的。[[24]](#_24_119)

保證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這個此時此地不可避免的行動方針，有時迫使農民以自己的未來作抵押。莊稼歉收可能迫使他們出售一些或全部稀缺的土地或耕畜。如遇大面積歉收，他們就驚恐地以極低的價格拋售。其結果可能既悲慘又荒謬：“舉例來說，眾所周知，在1921年伏爾加河下游地區的饑荒中，肉比面包還要便宜。”[[25]](#_25_117)

滿足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極端重要性，常常迫使農民不但為了得到點什么而變賣東西，而且要付出比資本主義投資標準所要求的高得多的價錢買地、租地。只要增加的土地能為家庭食品柜添加些什么，那些土地貧瘠、家庭人口多、勞力又無出路的農民，就常常愿意用高價買地，或者用查耶諾夫的話來說，付出“饑餓地租”。實際上，土地越少的家庭，它為添置一塊地愿意出的價錢就越高——這是一種會趕走資本主義農業的競爭過程，資本主義農業不能在這樣的條件下競爭。[[26]](#_26_117)

在50年前的查耶諾夫看來，農民經濟的特色使得古典經濟學關于合理行為的假說歸于無效。然而，今天，此類農民經濟可以較好地理解為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會作出預言的特例。[[27]](#_27_113)例如，把勞力繼續運用于酬報可憐的耕作或手工藝，是農民勞力的低機會成本（即沒有什么外部就業的可能性）和瀕臨生存線者的高邊際收益效用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運用自己的勞力，直到其邊際成果極少，甚至為零時為止，這還是有意義的。于是，微觀經濟學理論論證了查耶諾夫所看到的“自我剝削”。“饑餓地租”現象可用同樣方式作出解釋。家庭越大（吃飯的嘴越多，干活的手越多），任何附加土地的邊際產量就越高，因而家庭愿意付出的最高地租就越高。由于農民家庭的近乎零的機會成本及其掙得足夠生活費的需要，它將為很低的不確定的工資而勞動。

因此，“自我剝削”和“饑餓地租”之類假定的反常情況，是微觀經濟學理論所闡明的特例。在這些情況下，土地奇缺和毫無就業出路，共同迫使農民作出了悲慘的選擇，反過來又允許別人從自己的困境中謀取高額利潤。

## “安全第一”[[28]](#_28_113)：生存經濟學

每個季節都招致饑餓及其一切后果的農民，對于冒險行為持有不同于拼命賭博的投資者的觀點，是完全合理的。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區別的性質，我要對農民的回避風險行為作出明確的經濟學闡述。這一經濟學模型，對我們理解諸如投資于管井、改變耕作技術或種植高產稻等項新事物，具有很大的實際價值。了解農民是如何規劃自己的經濟生活以及如何確保穩定的生存條件，將幫助我們懂得對生存的關注如何把他們的大部分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聯結為一體。

如果我們從農民家庭的消費需要及其農作物的產量波動這一核心困境出發，圖1中所假設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圖中縱軸代表凈產量稻谷籮數，生存線確定為80稻谷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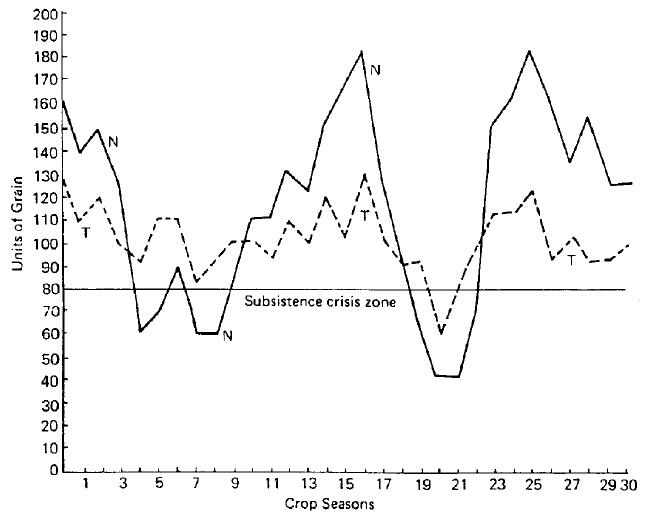


圖1 農作物產量與農民家庭的生存

讓我們假定T線代表30年間傳統種植的稻谷在特定地區的一塊有代表性的土地上所生產的稻谷凈產量。大幅度波動同那些具有灌溉條件或可靠降雨量地區的實際產量的變化情況是一致的。大多數農民耕作者也許都會對過去30年（如果不是更長時間的話）的產量有個大致的概念。然而，關于傳統種植農業的產量，值得注意的重要情況是它的可靠性。如圖所示，它只有一次降到了生存水準以下，雖然在多數時間內它徘徊于生存水準上下。從以往的經驗（假定它具有代表性）來推斷，在傳統農業中遭遇災難的風險為三十分之一。

這里使用的生存水平和災難水平的概念，綜合了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特征，需要加以詳盡的闡述。[[29]](#_29_111)最低的災難水平是客觀的，因為它表示的食物供應量十分接近于人在生理上的最低需要量，如若再減少，則必將導致營養不良或過早死亡。這里，人們可以首先考慮法國的印度支那地理學家給出的估計數字——每個成人每年需要的大米最低數量大約為300公斤。[[30]](#_30_109)除了動物性的生理需要之外，生存水平明顯地具有歷史性——最低限度標準同以往的生活經驗有某種關系。貧窮的泰國農民心目中的最低限度食物必需品，大概比北越或爪哇農民所認為的最低必需品，要稍微豐富些。認識到生存水平的歷史和文化因素之后，我們就會把收入的最低水準看做經驗上的死亡之點：一旦低于這一水準，就什么也救不活了，或者任何禮儀上的花費都要被徹底取消。然而，大多數東南亞地區的農民生活標準，一直維持在最基本狀態，以致歷史經驗差不多就是如何滿足傳統的一般性吃、穿、住需要和水稻種植最低成本。

當然，生存危機水平的確定，并不意味著其收成低于這一水平的農民家庭就要自動餓死。實際上，農民可以轉而靠草屬植物或塊根植物為生，家中的孩子可能被送往親戚家去，耕畜或土地也許被迫變賣，還可以舉家遷往別處。如果危機波及廣大地區，或者誰家連續二、三年歉收，那么也許就要真正地引起事關人命的生存問題了。生存危機水平——或許“危險帶”比“水平”更為準確——表示的是一個界限。處于該界限以下，在生存、安全、身份地位和家庭的社會內聚力等方面，就會有巨大的、痛苦的質的退化。[[31]](#_31_105)這是農民生活的“正常”赤貧與毫不夸張的“勉強糊口”的生存狀態之間的差異。[[32]](#_32_103)

假使社會現實確有大多數農民耕作者的生存危機水準，那么，他們遵循羅馬塞特所說的“安全第一”原則，就具有重大意義。[[33]](#_33_103)在選擇種子和耕作技術時，這一原則就意味著耕作者寧愿盡量減少災害的可能性也不去盡量增加平均利潤。[[34]](#_34_101)這一策略一般要排除帶有任何危及生存的巨大風險的選擇方案，盡管它們有可能產生較高的平均凈利潤。

大多數研究第三世界低收入農業的經濟學家，都以這樣那樣的形式注意到上述的回避風險原則。下面摘自關于生存農業經濟的主要著作的四段話，表達了同這一原則基本一致的觀點：

對于勉強生存的農民來說，可惡的風險會相當厲害，因為高于期望值的利潤也許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報所造成的嚴重損失。[[35]](#_35_99)

特殊的價值往往被附加到生存和現狀的維持上，而不是被附加到現狀的變革和改善上。……保守態度的經濟基礎……是同傳統農業變革相聯系的高風險，以及變革失敗可能造成的巨大損失。[[36]](#_36_99)

回避風險原則也被援引來解釋農民對維持生存的農作物而不是對專供銷售的農作物的偏好：

那些“人口過剩”國家的農民，沒有什么在生存水平以上冒險的余地。對他們說來，滿足于維持生存生產的較低利潤，而不選擇爭取專供銷售生產的較高也較多風險的利潤，是十分合乎理性的。[[37]](#_37_99)

然而，對這一決策原則的最為認真的系統論述，是由L.喬伊所作出的：

我們可以假定，農民們為了增加長遠的平均凈利潤而熱心于革新，取決于這一條件：在任何一年中減少凈利潤的風險不超過既定值。進一步說，我們可以假定，農民們自愿承受的風險的程度，在某種意義上說，同他們與自身的“生物學生存”的接近程度相關。……因此，我們得出這樣的假設：重視維護生存的農民可能抵制革新，因為革新意味著告別那種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減小大災難的風險的制度，而接受極大地增加了風險的制度。[[38]](#_38_96)

如圖1所示，即便使用最為穩定的傳統農業技術，每年也有一定的風險。過去一直使用這一技術的農民，一般不愿意改用雖然平均利潤可能高得多但實質上蘊含更大風險的技術。正如查耶諾夫所說，農民所尋求的是那些“將給他們帶來最高jiacu和最穩定的勞動報酬”的農作物和耕作技術。[[39]](#_39_92)如果“最高和最穩定”這對目標發生沖突，那么，處于生存邊緣的農民通常要選擇低風險的作物與技術。

圖1顯示了這種假設的對照，比較了技術N和技術T的使用情況。技術N（同作物、種子、耕作方式有關）比技術T有更高的平均利潤，而農民如果連續使用30年就會有更高的平均收入。但問題在于，使用技術N的農民很少能在五年中不受傷害地幸存下來，享受到豐收的喜悅。實際上，歉收年景可能意味著不得不出賣土地并背下高額債務；對于佃戶來說，歉收年景則意味著被收回承租地，從而有利于能夠付得起下一次耕作成本的新佃戶。技術N使一個家庭陷入生存危機的年份不是一年而是八年，其概率超過25%，而技術T的相應概率僅為不到4%。

我們假設的例子在農民選擇的現實生活中遠未消除。在努力運用“安全第一”原則分析菲律賓農民的技術選擇時，羅馬塞特闡述了關于風險和回報的四個有代表性的實例，比較了三種高產水稻和傳統耕作法。新種子的平均產量在每個實例中都多于老技術的兩倍，在一個實例中接近三倍。然而，問題在于，新種子對供水變化非常敏感，所以，特別是在依賴雨水的地區，每公頃產量會有較大波動。此外，所有的新稻種都需要有多得多的現金投入，以用于購買化肥，用于插秧和收獲季節雇用臨時工。老方法耕作的平均每公頃現金成本為100比索，而新方法耕作的現金投入量每公頃在320到435比索之間。[[40]](#_40_90)當年成糟糕時，這些固定成本對新品種的影響很大，因為這時僅僅抵消生產費用就要花掉大部分水稻產量。

羅馬塞特把每公頃產量相當于200比索現金確定為災難線，并把低于這一水準的概率在0.025以下確定為農民的愿望。他經過計算，認為在這些設想下，農民將會理智地選擇傳統農業技術，盡管其產量不高。關于農民選擇的這一理論，預測了呂宋島中部地區實際采用的高產水稻品種的生產模式。在可灌溉地區，可靠的供水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采用新品種的風險，因而這里的小農主比依賴雨水地區的農民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大得多。在依賴雨水地區，這一做法會招來災禍。

在決定是否種植專供銷售農作物的問題上，靠近生存邊緣的耕作者似乎同樣適用于上述檢驗標準。從為生存而生產到為銷售而生產的轉變，幾乎總要伴隨著風險的增加。一個成功的生存性農作物生產或多或少地保證了家庭的食物供應，而非食用的銷售性農作物的價值則取決于市場價格和消費必需品的價格。除了種植和收獲銷售性農作物的經常性的高成本問題之外，即使取得了豐收，豐收本身也不能確保家庭的食物供應。

此類轉變所含風險的程度和有關耕作者評估與承受風險的能力，是影響決定的有代表性的關鍵變量。從C.M.埃利奧特對東非引種棉花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風險因素是決定性的。[[41]](#_41_90)布干達人之所以樂意地改種棉花，是因為它不會擠掉他們的食用作物大蕉的生產，還因為這一地區可靠的降雨量意味著改種失敗的風險微不足道。然而，對于肯尼亞的盧奧河地區來說，風險起了阻止改種的作用。棉花種植對勞動力的需求直接影響到他們的主要食用作物玉米的勞動力需求，而雨量的變化使得棉花歉收的風險相當高。在生存風險方面的類似變化似乎可以解釋為什么可可的種植在加納和尼日利亞推廣很快，而在塞拉利昂則不行。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殖民地政府盡其所能地鼓勵售現農作物的種植，例如強征棚屋稅及其他稅種，以刺激對銷售性生產的需要。“但是，每當轉變中增加了實質性的風險時，如同肯尼亞之改種棉花、塞拉利昂之改種可可那樣，農業的發展證明是不可能的。”[[42]](#_42_84)

對農民的謹慎行為的特點的證明，到此為止，我們針對生存第一的耕作者的情況作了一些理論上的說明。然而，必須明白的是，農民家庭對風險的承受能力，隨著生產資源滿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緊張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對于以同樣方式在同樣大小的土地上耕作的兩個家庭來說，家庭越大，家庭情況就越不利，因為保持家庭運轉（家庭的生存危機水平）所需要的最低產量就越高。即使家庭中的富余人員能夠工作（由于減少了勞動的邊際利潤），情況也是如此；而對于那些非生產性的消費人口太多的大家庭來說，情況就更是這樣了。大部分家庭都有依賴程度最高的一段時期——在這個時期，家里孩子太小，不能勞動但要吃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處于這一時期的家庭，特別容易遭遇生存危機。

與此類似，假設家庭規模不變，那么，家庭耕作的土地越少，家庭境遇就明顯地越差。面臨有些偶爾發生的每英畝產量較低的情況，處于生存邊緣的小農主可能要破產，而有些多余土地的家庭則可以忍受得了。儲蓄也起著同樣的作用，為規避風險留下了保護性的余地。越是接近生存邊緣線——只要處于生存線之上——的家庭，對風險的耐受性越小，“安全第一”準則的合理性和約束力就越大。

“安全第一原則特別適用于‘已被河水淹到脖子’的處于生存邊緣的小農主和佃戶”這一說法，也道出了東南亞大多數農業人口的情況。對該地區農民經濟生活的研究，都這樣那樣地強調借以構建經濟決策的生存目標。P.古魯在他對印度支那耕作模式的里程碑式的研究中簡潔地闡明了這個問題：“東京和安南的農業并非指望經商牟利的經濟事業，而是一種僅限于自己養活自己的生存農業。”[[43]](#_43_84)新近對越南南方湄公河三角洲農業的研究，也強調了關注安全第一的典型的謹慎態度。“自然保守主義使得人們在自己把握較大、可預見性較強的與具有較大風險的兩種選擇方案之間，更喜歡前者。”[[44]](#_44_82)在這方面，L.漢克斯強調指出，泰國農民的實實在在的目標，就是到了年終歲尾時能家有存糧，并足以維持到來年收獲季節。而投資利潤、稻谷畝產量、勞動生產率等問題，則完全屬于次要的考慮事項。[[45]](#_45_82)安全第一規則的獨特表現，也見于共同的觀察中：如果賺錢牟利會打亂其已被證明為適當的既往一貫的生存方式的話，東南亞農民就不情愿干。[[46]](#_46_80)最后，安全生存的目標體現在生產過程中所面對的極其大量的選擇中：選擇種植食用作物而不是銷售作物，為了分散風險而樂于使用不同類型的種子，偏愛那些產量一般但穩定的作物品種。

M.莫爾曼對泰國北部村莊農民的農業生產的認真研究，提供了關注生存優先于賺取利潤的極有說服力的說明。[[47]](#_47_78)班平（Ban Ping）的村民之所以被作為極好的范例，就是因為他們作為耕者的生活，主要分為兩種水稻田的勞作：一種勞作旨在維持生存需要，另一種則表現了“受利潤支配的欲望”。

在村莊附近的大田里，只種用于維持生存的農作物。村民們喜歡的糯米被稱為“食用米”，每家都要在大田里種上糯米，其正常年產量用于滿足家庭每年的食用需要。大田里只采用傳統的犁耕技術，而這意味著每個家庭耕作的現金成本很低（只有212銖，而中央平原地區的耕作成本達1892銖）。

然而，在新開墾的田地里，許多村民則變成了自由自在的熊彼特式的企業家，“價格和利潤成了農作物選擇的主要標準”。[[48]](#_48_76)在這里，村民們種植所謂“銷售大米”，即不打算自己食用的非糯米品種。這種稻田遠離村莊，要使用拖拉機耕作，收割時要花錢雇人幫忙。因此，耕者要有相當多的資金投入，再靠到市場上銷售大米收回成本。

莫爾曼的研究的關鍵性發現是，盡管從多方面衡量，“銷售大米”的種植有多得多的利潤，但在大田里種植維持生存作物的優先性是不容置疑的。村民們只是在完成了生存耕作任務之后，才會在“銷售大米”田上下工夫。班平的農民沒有變得“商品化”，也就是光種“銷售大米”賣掉，然后買糯米吃——有一戶人家為了還債不得不這樣做了，被鄰居們認為是發了瘋。除非村民們確信自家有足夠的糯米吃，還能滿足習俗上的招待需要和宗教需要，他們就不會種植“銷售大米”。“然而，不論農民有多么宏大的企業家志向，他們的推理能力阻礙了威脅自身生存的商業農作物的種植。”[[49]](#_49_76)

按照東南亞的標準，泰國農民是比較富裕的。雖然如此，除非他們具有穩固的生存基礎，他們對于商業風險仍然十分恐懼。種植所謂“銷售大米”的田地，其潛在利潤很高，但發財的路上也布滿陷阱。產量很不穩定，需要現金雇用拖拉機和臨時工，法律權利必須得到保障，必須造馬車或借馬車運載谷物，最后，成功還極大地取決于陌生人——拖拉機手，何時耕地得看他的方便。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大田里的犁耕是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產量適度；其好處在于，它是一種低成本的、有基本保障的食物生產方式，幾十年來一直可靠地維持了村民們的生活。

安全第一原則并不意味著農民屈從于習慣：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風險也不敢承擔。當旱季作物、新種子、種植技術以及市場生產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確的、實質上的收益并且對生存安全沒有風險或風險不大時，人們會看到農民們是沖在前面的。然而，安全第一確實意味著，圍繞著日常的生存問題，有一個防御圈。在防御圈內，要避免的是潛伏著大災難的風險；在圈外，盛行的是資產階級的利潤計算。

此類分散風險的技術并非為農民所專有。接近于生存邊緣的漁民、小商人也要分散風險，以確保穩定的收入。例如，小商人總要發展一些穩定的顧客，給他們以小優惠，吸引其不斷光顧。[[50]](#_50_76)他要避免把所有貨物賣給一位顧客，喜歡這樣來分散風險。此類分散風險的辦法在以前曾是農民的窮苦工人那里也可以看到。為了對付失業的風險，他們可能從事幾項小職業，以盡量減少完全失業的危險。[[51]](#_51_76)

事實上，“資本主義商行并不常常選擇穩定和穩步增長，而是選擇利潤最大化”，這一說法是完全不確切的。鮑莫爾提出，公司的利潤最大化從屬于最小利潤或現金周轉的限制。[[52]](#_52_76)這一論斷的由來，十分類似于安全第一的準則之于耕作者的情況：“農民使自己的凈收入最大化受到的限制是，其可能性在收入低于確定的最低值的任何年份里都是很小的。”[[53]](#_53_74)資本主義商行實施大量的經營戰略，諸如從事多種經營以分散風險，同競爭者在價格和收益分配上取得一致，垂直地結成一體以確保供應，等等——所有這些并不必然地使其凈收入最大化。企業周期性的衰退和下降趨勢的幽靈對公司的影響，也許等同于莊稼歉收對農民的影響；它刺激人們重視有保障的、穩定的利潤而不是較大而不確定的利潤。無論對于商行還是對于農民來說，西蒙的“滿足”理論可能比利潤最大化更能有效地預測人們的行為。[[54]](#_54_74)

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并不是這樣的兩分法：一方面是恃強凌弱的資本主義冒險，另一方面是難以改變的農民的保守主義。注重生存問題的農民更確切地被視為在應付風險方面余地有限。他在生存邊緣上拼命勞作，一旦計算有誤，便要失去一切；他的有限的技術加上天氣的變幻無常，使得他比其他大多數生產者都面臨更大的難以避免的風險；可獲利的工作機會的相對匱乏使得他毫無經濟保障可言。如果說他對待危及生計之事的態度過于謹慎的話，那么，他的不情愿是有其合理基礎的。

綜上可見，我的關于生存經濟的觀點對那些處于普遍的生存困境中的耕作者很適用。對于那些收益很低、土地很少、人口較多、產量變化大又沒有什么其他工作機會的農民來說，生存第一的模式以及下面將要談到的社會模式，應當說是非常適用的。而對于那些收益較高、土地充足、人口較少、農作物產量可靠又有其他工作機會的農民來說，大概就不適用了。總之，它適用于貧困的農民和佃戶，而不適用于那些經常雇人勞動又有充裕的土地和存款的富裕農民。因此，要確定收益和保護物的上限（超過上限，風險就是更加合乎情理了）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的討論中也是不必要的。根據泰國人的例子（還有其他事例），我相信安全第一的行為模式不但是最窮農民的特征，而且是所謂中等農民的特征。[[55]](#_55_74)

安全第一原則的關鍵假設是，為了生存的常規活動產生著令人滿意的結果。否則會怎樣呢？那么，安全第一的基本原理就垮掉了。繼續進行常規活動總要帶來失敗，這就再次使得冒險變得有意義了；這樣的冒險是有利于生存的。[[56]](#_56_74)那些其生存方案由于氣候、土地短缺或地租上漲而失敗了的農民，盡其所能地要保持住自己的漂浮不定的地位——這可能意味著要改種用于銷售的農作物，背下新的債務和采用有風險的新稻種，甚至意味著要淪為盜匪。大量的農民革新行為都具有這種孤注一擲的特征。這種使得農民不能不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經濟背景同其常見的懷疑主義謹慎態度，具有同樣奇特的社會、政治涵義。[[57]](#_57_72)

## 生存倫理的社會學

稻農總會發現自己一直受反復無常的大自然的支配。在那些自己可以得到的技術中，他會選擇那些能把歉收的概率降至最低的常用技術。但是，由于種稻的賺頭不大，即便選用最好的技術，他還是很容易受到傷害。在供水有保障的地方，收成的變化不大但確有變化；在依賴雨水或易澇地區，風險是巨大的。

即便有了最精明的技術防范措施，農民家庭還是必須設法度過那些凈產量或收入低于基本需要的年頭。他們該怎么辦呢？有時候，他們可以把腰帶再勒緊些，比如一天只吃一頓飯，吃得再差一點。然而，農民勒緊腰帶的余地已經很小了，而且如果危機長期持續下去，這一辦法就不靈了。其次，在家庭層次上有許多生存方案，我們可以把它們歸類為“自救”。方案可能包括小買賣、小手藝、做掙錢的臨時工，甚至可以移居他鄉。[[58]](#_58_73)對于其凈產量（繳完地租和利息之后）低于生存標準的許多東南亞農民來說，這些“副業”已經成為全部生存方案中固定的、必要的組成部分。

最后，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網絡和機構，在農民生活陷入經濟危機時常常起到減震器的作用。一個人的男性親屬、朋友、村莊、有力的保護人，甚至包括政府（雖然較為罕見），都會幫助他度過疾病或莊稼歉收的難關。我們稍后將要更為詳細地考察這些生存方案的實施及其有效性。然而，就我們目前的考慮，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上述的每一個選擇方案越是可靠，它就越會成為難得的緊缺資源。自救或許是最為可靠的辦法，因為它不依賴于他人的援助；但由于同樣原因，它只能在一個人可以自己處理的事情上才有效果。男性親屬常常感到應該盡力幫助近親擺脫困境，但他們只能提供自己所掌握的那部分有限資源予以幫助。

當談到朋友間的互惠和村莊的幫助時，我們談的是社會單位，它們比男性親屬控制了更多的生存資源。它們依然是農民所熟悉的世界，共同的價值標準和社會調節相結合，加強了相互間的幫助。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從本村人那里得到的幫助，肯定不如從近親近鄰那里得到的幫助多而可靠。[[59]](#_59_72)

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紐帶，這一在東南亞農民中無處不在的社會保險形式，代表了在社會疏離，常常還有道德疏離方面邁出的又一大步，特別是當保護人不是村民的情況下。不論是土地所有者、小官員，還是商人，按照定義，保護人就是幫助其當事人的人。雖然當事人常常盡力鞏固這種道德意義上的友誼——因為他們的純粹的討價還價能力常常是最小的——但保護人的保護之可取，更多的是因為它的資源，而不是因為它的可靠性。[[60]](#_60_72)

最后一個社會單位——國家，奇異地適合這一組關系。國家之所以顯得特別，一是它盤剝農民而不是賜予人民，二是它同農民之間的社會距離，特別是在殖民地時代，表現得極其疏遠。[[61]](#_61_69)然而，傳統的國家（通過地區性糧倉、以實物付酬的公共工程的工作、災荒救助）和現代國家（通過雇傭、福利和救濟）都能幫助農民生存下去。然而，國家的援助，如果說總會有的話，也是很難靠得住的。

可靠性和資源的逆向關系表現在農民那里，一方面是讓境況略比他強的兄弟在困難中伸出援手；另一方面是國家能夠更加容易地幫助他，卻并不認為這是義不容辭。[[62]](#_62_70)假設能有什么選擇的話，農民們大概寧愿靠自己或依靠男性親屬和村民們的可靠幫助，以滿足自己的需要；但如果直接相關的團體不能給予足夠的保護，那么選擇就不是他們自己的事了。

同樣明顯的是，一旦農民依賴親屬或保護人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他就讓渡了對方對于自己的勞動和資源的索要權。當助其解困的親友遇到麻煩而他有可能幫助時，親友們可以指望得到同樣的幫助。事實上，親友們幫助他，正是因為有個心照不宣的關于互惠的共識；他們的幫助就像在銀行存款一樣，以便有朝一日需要幫助時能得到兌付。與此類似，在一個村里，村規會確保窮人有塊公地和食物，同時要求他付出勞動，如果村里的官員和名流需要的話。依賴強有力的保護人的當事人，會像忠誠的隨員一樣感激地服侍他，對他惟命是從。國家的索要權（稅收、徭役、兵役）擺出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農民是否把國家的索要看做是自己對所受服務（法律和制度？和平？宗教職能？）的回報，還是大有疑問的。

所有上述援助機制，在農民生活中都會產生雙重效用。在饑荒時期，它們是至關重要的社會保險，但也對農民的人力財力資源提出了索要——可能是威逼農民去滿足的這種盤剝。它們的貢獻及其盤剝農民資源的時機、大小和范圍是它們的合法性——它們在農民價值觀中的地位——的關鍵。而根據上文考察的生存倫理，我們可以很好地理解農民是如何評價這種說法及其貢獻的。

## 農民社會中的風險分配

安全第一的原則是農民生活中生態學依存性的邏輯結論，表明了生存安全比高平均收入更優先。這一重視安全的思想不僅有抽象的經濟意義，而且，正如我下面將要談到的，在農民社會中的大量的實際選擇、機制和價值中，這一原則都得到了表現。然而，在描述這些具體模式之前，有必要概括地說說生存倫理對于農民同其周圍機制的關系以及對于他們的公正平等觀念所具有的意義。

生存倫理為典型的農民看待同村人、土地所有者或官員對自己資源的不可避免的盤剝提供了基本觀點。最重要的一點是，它表明農民評價這些索要的標準，主要的不是根據它們的絕對水平，而是看它們使自己維持在生存危機水準之上的問題是更加難辦了還是容易解決了。它表明，好年景時占收成40%的地租很可能比極壞年景的20%的地租遭到的抵抗要小。農民的標準是“交夠了外部的索要之后還剩下多少——夠不夠維持自己的基本需要”，而不是索要本身的數量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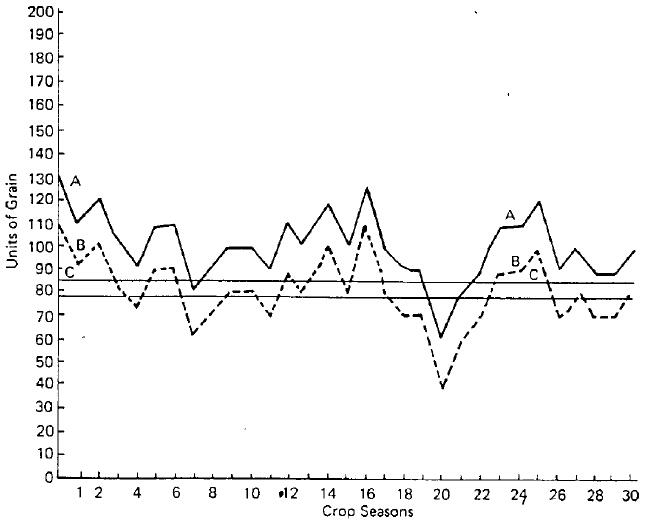


圖2 農作物產量與對農民收益的索要

我們還要不厭其詳地再來闡述這一明顯的道理。圖2顯示了外部對農民資源有理想和典型意義的索要。線A代表同圖1中一樣的假設的作物產量，而表示80稻谷單位的直線仍然指生存危機水準。線B和線C反映了對農民收入的兩種巨大不同的索要（如不同形式的地租或稅收）所產生的影響。線B表示持久不變的絕對的賦稅對農民生存資源的影響。年復一年地固定不變地從農民的凈產量中強要走20單位的大米，這對農民家庭資源造成的結果是：維持著產量曲線的形狀，但低了20單位。這給農民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供消費的凈余額不是一次而是13次降到生存危機線以下，其中曾連續4年（18—21）居于生存危機線以下。從性質上看，這種固定不變的強行索要使得農民家庭不可能維持其已經十分脆弱的地位，為了生存下去，不得已做一些痛苦的選擇（例如：賣地、遷移、反抗等）。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的風險仍然完全由耕作者承受，但已經達到了令人日益難以忍受的地步。與此相反，政府或地主則通過犧牲農民的利益而得到了穩定的收入。

線C代表了對農民資源固定索要的另一種情況。每年向農民索要后必須讓農民家庭的剩余額超過生存危機線5個單位。圖中有3次產量線降到85單位以下，這意味著要給予農民某種形式的實際補助，使之提升到85單位的水平。這樣，農民生活特征的質的變化大大減小了，因為決不會發生達到生存危機限度的情況。事實上，可以認為，農民可能確實喜歡C勝過喜歡不交租的情況，因為他寧愿多交出豐收的酬報以換取荒年有保障的生活補助。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的風險由政府或地主承受了；為了使農民家庭能剩下穩定不變的凈收入，政府或地主的收入是浮動的。

外部剝奪作為不可避免的生活內容，農民對它進行評價的關鍵因素，是看它增加還是減少了發生災難的機會。無論如何，這一評價方法同那種取決于精英階層強征農民剩余物的平均數額的方法不一定一致。在圖2的例子中，遵照可變的使農民得到穩定收入的索要標準（C）從農村榨取的全部財富，實際上大于采取固定征收額（B）的辦法。倘若以精英階層從農民處“拿走”的平均量作為剝削的標準，那么，有穩定作用的索要額（C）就是剝削性程度最大的。然而，假如農民始終面臨著生存危機，那么，有穩定作用的索要（雖然它可能導致被拿走的更多）引起的怨恨較小，激起的抵抗較輕，被感受到的剝削程度較低，因為它避免了農民最為恐懼的結局。

這里，我提出了一個同通常用法根本不同的剝削概念——它對剝削的定義似乎更加符合農民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主要問題。按照通常的剝削定義，人們總是問精英階層從農民那兒剝奪了多少，并且把被剝奪產品的比率作為評價剝削程度的尺度。這同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概念和人們的常識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我們希望評價剝削的尺度同農民的感覺相一致，上述定義就不太適當了。為了達到剝奪農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例如25%）的目的，精英階層可以有極為不同的方法。雖然農民對任何此類索要都會感到不滿，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剝削得最為嚴重的是那種最經常地威脅其生存要素的、最經常地使其面臨生存危機的索要。在農民詢問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問的是還剩下多少；他要問涉及農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為消費者的基本需要。

所以，對我論點的標準立場不會有任何誤解。我的分析實質上是現象學分析，這也應該是清楚明確的。雖然我也許從農民生活的物質基礎中得出了安全第一的邏輯結論，但我的分析的說服力最終依賴于這一論證：農民的價值標準和生活經驗反映了安全第一的邏輯結論。“農民關于相對公平的觀點主要地基于標準立場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剝削標準”，這一說法對我的論證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我也并不必然地如此主張。有人把農民對剝削的這一看法稱為一種“錯覺”。事實上，我的論點同這種觀點決不沖突。從一種最廣泛的綜合觀點看來，說到底，農民的需要得以產生的時代背景部分地是社會的安排；農民之所以需要安全，大概主要因為其土地已經被人弄走，而卑劣的高貴者控制了大多數的稀有價值。[[63]](#_63_70)倘若如此，與純演繹的剝削論相比，現象學方法至少有兩大優點。首先，當研究真實行為者的價值的時候，同在剝削理論和被剝削者的情感之間毫無概念聯系的抽象標準相比，它提供了較為可靠的導向。其次，行為者有自己的持久的道義經濟，用以繼續解釋自己的境遇。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研究此類真實價值有助于深化和闡明甚至是有點兒抽象的公正理論的道德基礎。

那么，正如農民所感受的那樣，剝削的方式很可能在世界上關系重大。那些傾向于提供內在的生存安全以及在這一意義上又能適應于農民的主要經濟困境的剝削類型，比起那些無視最低限度的農民生存標準的強行索要來，確實更“和善”一些，農民們感受也是如此。

這一論點還表明，在產量變動最大的地區，對農民資源的固定不變的索要通常要引起更大的痛苦。假設有個農民，有規律地每季收獲10籮稻谷，他可能對5籮的實物稅抱怨不已，但也決不會落入災難線以下。另一位農民的平均收獲量為10籮稻谷，但其收成的波動很大，交了5籮稅以后便常常跌入生存線以下。因此，在上緬甸的非灌溉區、泰國東北部或北安南地區，由固定租稅所造成的爆炸性潛在危險，比起產量穩定得多的地區來，可能要大得多。[[64]](#_64_70)

## 生存作為道義承諾

這里得出的農民觀念，同歷史上出現過的其他背景下的“窮人的道義經濟”是完全一致的。[[65]](#_65_70)在18到19世紀城鄉窮人的經常性抗議運動的中心，歐洲還沒有如此強烈的關于財產和土地占有平等的基本信念，而強調毫不過分的對于“生存權利”的索要。隨著生存權的日益受到威脅，這種索要也就變得日益自覺。[[66]](#_66_70)它的基本假定就是，不論窮人的公民能力和政治能力如何不行，他們都有生存的社會權利。因此，精英階層或國家對農民的索要，一旦侵害了農民的基本需要，便毫無公正可言了。這一觀念有許多表達形式，當然在適當之時也可有靈活的解釋，但它以各種借口提供了支持無數反叛和農民起義的道德義憤。正是“生存的法律權利”在法國革命中激勵了許多窮人；正是在“大眾稅收”的名義下，民眾沒收了糧食并以由民眾所決定的價格出售；這也發生在提出“雅各賓最高限價”之后，它把基本必需品的價格同工資水平聯系了起來。[[67]](#_67_68)在英國的“面包暴動”和招致不幸的斯品漢姆蘭救濟制度中，同樣可以看到這一觀念。[[68]](#_68_68)往低里說，精英階層不得侵犯窮人的生存儲備品；往高里說，精英階層有絕對的道德義務，為處于饑荒時期的臣民提供生計。[[69]](#_69_66)對于東南亞的農民來說，這種社會精神也提供了公平的標準，可用以評價精英階層的道德行為。

最后，對于那些處于生存邊緣的人們來說，不安全的貧困比僅僅貧困更加痛苦，更加具有爆炸性。把不安全同激進主義相聯系的研究，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明。在古巴、美國、英國和德國等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經濟不安全，特別是失業的經驗，早就使得工人傾向于富于戰斗性的政治活動。[[70]](#_70_66)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一下英、德兩國礦工抗議的歷史看到這一點。英國的礦工受到商業衰退周期的影響，又沒有事故保護，因而勞動成了“暴動談判”和破壞機器的騷亂之事。與此不同的是，德國的礦工是國家的雇員，盡管工資很低，但確保其醫療利益與就業安全的家長式規章制度成為他們的保護傘；因而為了得到幫助，恭敬溫順的請愿取代了抗議。[[71]](#_71_64)萊格特總結了這一領域的大多數研究成果，認為“在世界各地，易于遭受收入巨大波動之苦的職業團體，按照慣例一直把自己的生計寄托于左派政黨”。[[72]](#_72_64)這一證據，雖然很難說是結論性的，但是很有啟發意義。它說明，使那些接近生存邊緣的人們有穩定的實際收入，也許是比取得更高的平均收入更有影響力的目標；它還說明，不僅追問“農民的窮困情況怎樣”，而且追問“農民生活的不安全性怎樣”，這將使我們對農民的政治活動知道得更多。

# 第二章 農民的選擇和價值標準中的生存保障

我們已經看到，農民微薄的經濟利潤使他要選擇那些較為安全的技術，盡管這樣做會減少平均產量。從社會層面上看，農民原則上也力圖把自己的經濟風險盡量轉移給其他社會機構，寧愿以收益換取安全。

如果說生存保障在農民的選擇和價值標準中是比平均利潤最大化更為重要的原則，那么，這一事實在農民的一系列共同偏好中就會得到反映。在社會分層、鄉村互惠、租佃和稅收等四個重大領域，如果根據安全第一的考慮，來預測一下農民的共同偏好是什么的話，那么我將力圖證明，農民的實際偏好同預測的結果在實質上是一致的。因此，安全第一的概念有助于把那些可能顯得不正常的實際偏好聯結成一個整體性結構。我在這里所提出的證據主要取自于東南亞地區，但我認為，它在許多農民社會中都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 風險與社會分層

如果收入是選擇職業的重要原則，那么，根據平均收入排隊就足以得出人們的職業偏好表了。另一方面，如果生存安全是決定性因素，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在形成職業偏好方面，經濟安全度的提高同收入的增加同等重要。從東南亞人種史的文獻中可以看出，這種安全考慮可以闡明許多根據收入狀況解釋不清的職業偏好。

在農村窮困者中，傳統的社會等級通常是這樣的：小農主，佃農，雇工。當然，這些類別并非純粹和涇渭分明，因為自己擁有一些土地而又以佃農身份租種土地的耕作者以及自己擁有土地的雇工等都是常見現象。但是，在殖民地時代和當代大部分東南亞地區，這些職業偏好和社會地位的等級是客觀現實，盡管這些社會等級的收入狀況可能并且確實有大量交叉。例如，勉強夠格的小農主常常比那些承租大片土地的佃農還窮；同樣，勉強夠格的佃農常常比在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的雇工還窮。我認為，社會等級的這種相互滲透力——從收入狀況看甚至是一種奇怪現象——可以從衰落的社會地位所帶來的安全性急劇下降得到解釋。

小農主的主要優勢在于他們掌握著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同大多數佃農不同，他們維持生存不依賴于別人的意愿。盡管小農主某一季節的收成可能不及大規模承租土地的佃農，但他對自己所有的土地上的產品有可靠的占有權，因而一般說來更有生存保障。“擁有土地的價值就在于土地擁有者不會非自愿地喪失土地及其產品。”[[73]](#_73_64)因此，實際所有權的意義僅僅在于象征著對生存手段較有效的占有。在東京、上緬甸和爪哇的部分地區，有些租佃制形式通常十分安全，以至于法律權利的社會意義微乎其微。在租佃制安全系數不大的地方，所有權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74]](#_74_64)

在東南亞殖民地的商品化經濟中，對自己土地產品的有保障的支配權還有一個關鍵性的優勢——對糧食作物的直接消費使農民免受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此外，小農主或者以租地為生的佃農的生活，可能比在繁榮的市場條件下的工人更簡樸，但比他們更穩定。“同勞動力市場的不確定性相比，他更喜歡土地收入的長期穩定性”。[[75]](#_75_64)這一行為的智慧在處于大蕭條時期的東南亞農民那里表現得十分明顯——當時，那些曾經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越南、爪哇、緬甸和菲律賓的農民，不得不茫無所措地返回生存經濟之中。[[76]](#_76_64)

類似的對生存安全性的考慮，迫使農民通常寧愿選擇佃農的艱難生存方式，也不當掙工資的工人。佃農不僅完全避免了市場波動的影響，而且常常可以使用地主的資源——這些地主對佃農的生存較為關心，至少在租種地的莊稼收獲之前情況如此。由于租佃意味著遇到危機時有保護人給予幫助，處于危機邊緣的人看好租佃而不是平均利潤較高的薪資勞動，可能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在呂宋中部的部分地區，據塔克哈什所說，僅僅因為地主提供了經濟保險，農民便繼續充當耕種地主的小塊土地的佃農，盡管其收入比工資勞動者少得多。“只要保持佃農身份，他們就可以指望地主借給他們生活費。換句話說，佃農的最低生活水平得到了地主的擔保。”[[77]](#_77_64)J.安德森論述了中呂宋班詩蘭省的租佃制，說明了那里對于同樣條件的租佃制的偏好：

甚至在傳統的租佃制度下，……佃農比農業工人也稍微富裕些。……傳統制度下的佃農似乎為了補償性的安全保障，寧愿忍受不公平。倘若沒有足以補償安全方面損失的巨額收入，他們就不愿意放棄佃農的優越性。[[78]](#_78_62)

在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雖然租佃的穩定性不及班詩蘭省，但也常常包含這種寶貴的小實惠：

小佃農不比低賤的苦力富裕多少。他們所租種的土地只給他們帶來平均73皮阿斯特[[79]](#_79_60)或者占總產量48%的利潤。……但比起低賤苦力來，小佃農的最大優越性是：一旦需要，肯定能得到貸款。低賤苦力不能取得貸款者的信任，而佃農則具有由地主所擔保的貸款信用。……小佃農的生活雖然不比苦力好多少，但他得到較好的保護以應付可能遭遇的大災難。[[80]](#_80_58)

緬甸南部的殖民地官員，想解釋為什么在20世紀20年代勞動力市場價格持續偏高的情況下農民仍然熱衷于租佃，他們發現動因就在于容易得到地主的信貸。“由于可以借錢，人們力圖保護租佃制度。”[[81]](#_81_58)

占有土地優于租佃，而租佃優于臨時雇工。這是因為，盡管在收入方面這幾種類型的人互有交叉重疊，但在生存的可靠性方面，其中每一類型都代表了一次量的飛躍。因此，在農民看來，危機關頭的生存保障是比收入狀況更為靈敏的社會分層原則。此外，對佃農和農業工人的區分，主要在于土地使用權或勞動安全性的差異，以及土地所有者或雇主依據慣例提供社會保障的程度的不同。

印度的有地種姓和無地種姓之間的關系，也許是傳統上由于其內聚性而依賴于生存保障的勞動制度的典型例子。這種制度以每年支付固定的實物報酬的形式，對無地的被保護人——農民耕作者所提供的特定的種姓服務給予回報。這一制度的效果是，為生活在充滿風險的土地制度下的窮苦種姓提供最低生活水平的適當保障。正如S.愛潑斯坦所指出的：“賤民階層之所以樂于接受這種給予固定酬報的制度，是因為即使遇到災年它也給予安全保障。”[[82]](#_82_58)由于低級種姓所得酬報每年很少變化，因豐收而多得的利潤就幾乎全部歸于土地所有者階級了。然而，大災年頭之后，土地所有者也并不比他們的低級種姓依附者有更多的糧食。這種制度的剝削特征是明顯的，因為它建立在對土地的種姓壟斷權的基礎之上，并且把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滿足生存需要之外的剩余產品轉交給占統治地位的種姓。然而，這種制度的社會牢固性可以由這一事實得到解釋：除了特大荒年，它任何時候都為被支配種姓的生存危機提供安全保障。

在爪哇的農業工人中也存在同樣的社會選擇模式。V.科爾夫曾經談到，在諫義里附近的爪哇工人們不愿接受臨時計量報酬的工作，寧愿選擇某種形式的勞動契約，盡管它要求做更多的工作，因為他們“得到保證，會有較長的收割工作時間，或者將得到定量的稻谷；而對于計量報酬的收割者來說，工作時間及其應得的報酬都是不確定的。”[[83]](#_83_58)一般說來，按年或按季雇用并供應伙食的農業勞動，盡管報酬較少，但比發給日工資而不管伙食的勞動受歡迎；有傳統的危機援助的安全租佃比那種不講感情的地主的不穩定租佃更受歡迎。[[84]](#_84_58)正如歐洲鄉村的牧羊人、長期雇農或家庭傭人，皆因其具有相對的安全性而工資較低一樣[[85]](#_85_58)，生存保障也是東南亞農民所得的保險金。在存在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地方，人們甚至可以看到為了安全的連續性而犧牲獎勵工資的選擇取向，可見在安全與收入之間，人們更為注重安全，因而雇主能夠從這種生存倫理中充分地撈取經濟好處。

農民的生存保障的重要作用表明，從收入方面的被剝奪出發闡述農民的政治活動，可能不符合農民的實際情況。例如，生存保障的作用表明，那些境況惡化的農民當面臨失去以往的大部分安全保障的風險警戒線時，就要進行最劇烈的抵抗。此類風險警戒線之一，出現在一向自給自足的小農主失去了賴以較好地自我維持生計的土地之時。[[86]](#_86_58)他們失去了對生存手段的控制，又即將被迫淪為長期依賴他人的被保護人，自己的生存安全將取決于同那些有資源幫助自己的人們的關系。[[87]](#_87_57)當東南亞殖民地的人均占有土地狀況惡化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對土地的占有不足以維持生存，其結果可以稱之為“依賴性危機”，就是要在經濟不穩定的獨立性與較為有保障的依賴性這兩種境況之間進行痛苦選擇。[[88]](#_88_59)

第二個風險警戒線——它是那些資本主義農業發展強勁的地區（如下緬甸和交趾支那[[89]](#_89_58)）的更為突出的特征——出現在依賴關系中的生存保障崩潰之時。此時，擁有土地的權貴放棄了多少帶有封建性的最后的擔保責任，正是這種擔保使農民免受市場波動的全面影響。這時我們將會看到——并且在歷史上已經看到——猛烈的抵抗。一旦失去了有安全保障的租佃，失去了收獲前的貸款、壞年頭的較低地租和患病期間的幫助，農民就不僅要承擔起農作物產量波動的全部風險，而且要承擔起勞動力和商品市場的波動的全部風險。我們在后面將會看到，商品化農業和國家權力的增長之影響是穩步地降低生存保障方面的可依賴性，直至農民除了反抗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辦法。

## 鄉村的風險保障

如果說對最低限度保障的需要，是農民生活中的一個強大動因，那么，人們在滿足這種需要的農民社區里就能發現制度化的模式。事實上，在生存倫理有了社會表達方式的村子內部，在塑造人的日常行為的社會控制和互惠的模式里，這一動因是頭等重要的。把大量行為統一起來的原則似乎是：“在村民們所控制的資源允許的范圍內，將保證所有的村民家庭都得到起碼的生存條件。”在這一意義上的鄉村平等主義是保守的而不是激進的；它要求一切人都有住所，都能生存，而不是一切人完全平等。

這一生存倫理的社會力量，它對鄉村窮人的保護力量，因鄉村和地區的不同而不同。但從最后結果看來，在傳統的鄉村形式發展良好而且未受殖民主義破壞的地區，如東京、安南山區、爪哇和上緬甸，這一力量最為強大；而在像下緬甸和交趾支那這樣的新近的地開發區，這一力量則最為弱小。然而，這一不同是富有啟發性的，它說明正是在那些自治程度最高、內聚力最強的鄉村，生存保障最可靠。那么，農民們假使可以控制地方事務，他們便選擇創立這樣的制度——它通過向富裕村民提出某些要求，以確保弱者免遭破產和滅頂之災。

對鄉村生活的非正式社會保障的理解，是我們論證的關鍵所在。這是因為，由于得到地方輿論的支持，這些保障體現了公平合理的規范的生活模式。他們體現了農民對公平的社會關系的看法。這些保障使一切人的生存權利和風險共擔落到實處，因而將成為農民對政府和地主進行道德評價的標準。假使可以選擇，農民們便寧愿選擇租佃即依賴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地主（即保護人）保護其佃戶（被保護人），使之在荒年時免遭滅頂之災；他們較為喜歡在饑荒時期至少能給些補助的官員。理想的官場精英們，應當承擔起類似于鄉村共享共擔模式的保護責任。在農民可以實際地建構起同地主和同政府的關系時，我們將要看到，他的確是沿著這一選擇趨向推動這些關系的。

幾乎任何對于東南亞鄉村的研究，都要對這種為鄉村窮人的最低需要提供保障的非正式社會控制作出評論。[[90]](#_90_58)看起來，只是在富人們的資源被用來滿足寬泛界定的村民們的福利需要的范圍內，富人的地位才被認為是合法的。這方面的大多數研究，反復強調那些傾向于財富的再分配或賦予財富所有者特定義務的非正式社會控制。這些社會控制的平凡的甚至陳腐的特性同其重要地位不符。只要表現得慷慨大方，富裕村民就能免受流言蜚語的非議。他們被期待著主辦鋪張排場的婚禮慶典，以顯示其對親屬鄰人的寬厚仁愛，還要主辦地方宗教活動，還要接收超過平均家庭人口數的侍從和雇員。富人被要求做出的慷慨行為并非沒有補償。它有助于提高富人的日益增長的威望，在其周圍集聚起一批充滿感激之情的追隨者，從而使其在當地的社會地位合法化。[[91]](#_91_58)此外，它還相當于一筆社會公債，必要時便可兌換為財產與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鄉村的規范秩序對鄉村的富裕成員提出了一定的行為標準。在他們同其他村民的交易中，存在著特殊的互惠準則——人們的道德期待。富人們實際上是否實行這些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互惠要求是另外的問題，但無疑地存在著這樣的互惠要求。其規范性明顯地表現在它們被違反時所激起的反應之中。例如，在泰國鄉村，

有錢的農民就能對其他許多農民施加壓力。在“大人物—小人物”的關系中，有錢人是大人物。其他人為了借到錢，租到農具，為了得到貸款和耕地，都有求于他。一旦交易做成，債務人在這一年里就在許多方面受到了約束。但是，為富不仁會引起輕蔑和惡毒的流言蜚語，至多會在貧苦農民需要的時刻，得到一種象征性的尊敬。[[92]](#_92_58)

耍盡花招、貪圖便宜的富人，只能喪失自己在當地社會的聲譽和道德地位。弗思在對馬來人漁村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

這兩個特點［在財富上的小的和短暫的區別］，同責成富人必須實行的仁愛相結合，或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社會的貧窮者對富人們并無強烈的憤恨之情。……在產生怨恨和批評的地方，必定正是富人沒有表現出慷慨大度的時候，富人“沒有心肝”的時候；富人沒有做到對窮人的仁愛——在路旁蓋些避難所，建些教堂，或者慷慨地請客等等。[[93]](#_93_58)

在此類社會控制還頗有活力的殖民地地區，它們往往阻擋了村莊內部的尖銳的階級分裂。在東、中部爪哇，這就是那些“足夠公平”和“公平不夠”的村莊。在那里，拜占庭迷宮般復雜的土地關系、分成交谷租佃和勞動權利，直到最近，還往往為村民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地位，盡管一切人的福利水平都在下降。此類拉平壓力的應付危機的價值，在東京的遭受饑饉襲擊的鄉村十分明顯。[[94]](#_94_58)古魯報告那里的情況說，在整個地區，對饑餓的均等分配防止了任何人被餓死。[[95]](#_95_57)在其他地方，保障不是那么牢固，但一般地說，它幫助了“貧困家庭設法度過難關”。[[96]](#_96_57)

在公有社會傳統最為盛行的地方，最顯著的如東京、安南和爪哇，生存道德有時采取對于土地的鄉村權利形式。東京和安南的大約25%土地是公有地；在廣治和廣寧省，公有地占水稻田的50%以上。[[97]](#_97_57)有些公有地根據貧苦農民的需要進行分配。公有地的地租部分用來幫助窮人交稅，扶助不能耕作的孤兒寡母。在另一些地方，在本村內耕作荒地的權利、放牧權利、撿拾落穗的權利，以及“如果當地有貧困村民，就不雇用外來佃農和工人”的慣例，所有這些都服務于一個目的——使鄉村窮人得以勉強生存。[[98]](#_98_57)

鄉村的再分配是不均勻的，甚至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會出現平均主義烏托邦。我們可以設想，村里希望盡量減少義務的富人和從公有社會保障中得益最大的窮人之間總會存在某種緊張關系。窮人方面得到一個“地位”，而不是平等收入，同時一定會失去身份，這是他們的永久依賴性的后果。然而，這一模式確實體現了鄉村相互關系的最低道德要求。它通過大多數村民的支持或默許而發揮作用，而且，在正常情況下首先確保“最弱者的生存”。村莊所具有的作為一個村莊的道德穩固性，事實上最終基于其保護和養育村民的能力。只要村莊成員資格在緊急情況下是重要的，鄉村規范和習慣的“小傳統”就博得廣泛的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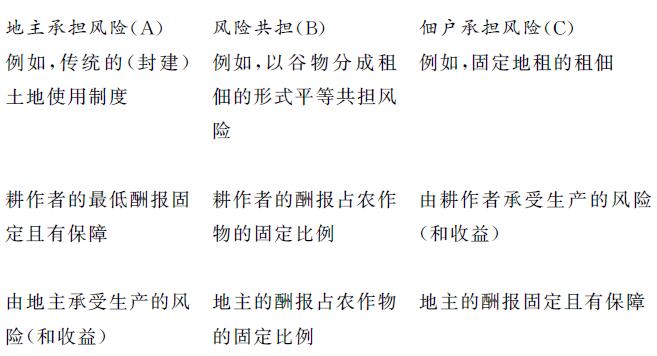
## 租佃與分成租佃的風險

實際上，東南亞的所有低洼地區，殖民主義所引進的資本主義的土地占有制形式，隨同人口的增長，共同促進了人數眾多的佃戶和分成租佃的佃農階層的形成，他們的生計因其同土地所有者的協議而定。對于這一階層的成員來說，鄉村共享和掙錢的臨時工勞動都是不重要的，其生存的安全與否主要來自他們的耕作活動所依據的土地使用制度。

鄉村再分配準則中所貫徹的同樣的道德標準，對生存安全的同樣強調，可以用做評價租佃契約的基礎。農民無疑會問：“這一制度能保障我的最基本的社會權利嗎？不論今年收成如何，它都能保障我的生活嗎？”在土地所有制能夠確保如此的情況下，雖然它索要較大份額的收成，我們也可以承認它至少有一點合法性。如果它連耕作者的最低限度的需要都不能保證，我們就會看到地主將失去從前也許擁有的任何合法性的道德承諾。

土地使用制度在地主和耕作者之間分配產量波動所帶來的風險的方式，可以排列成一個連續體。為了說明問題，表1把三種簡化的土地使用制度排列成了這樣的連續體，以描述土地使用制度使耕作者避免將毀滅自己的農作物損失的程度。在連續體的“A”端，由地主保護承租人或佃戶生存；而在“C”端，實際上是在任何情況下都由佃戶保證地主的收入。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民很自然地更喜歡能保障度過生存危機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耕種小塊土地、產量波動大、農民貧困以及沒有什么其他可供選擇的生存機會地方，這種偏好最為強烈；而在大面積租佃土地、產量穩定、農民富裕又有大量的外出打工機會極大地降低了破產可能性的地方，這種偏好則較弱。東南亞殖民地的租佃情況，非常接近于前一種情況。

表1 租佃制度中的風險分配[[99]](#_99_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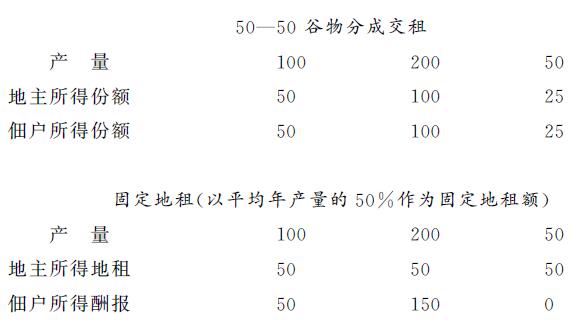
體現了生存保障的土地使用制度，其相對合理性來自這一事實：它把耕作者的需要作為對于收獲物的第一項合理訴求。此類安排保護了耕作者的生計，把農業風險轉移到了一般更有能力承擔風險的土地所有者的身上。當然，充分的生存保障超出了佃戶對農作物的優先要求權：倘若全部農作物不能滿足他的最低需要怎么辦？于是，生存保障便牽涉到幫助佃戶度過荒年的補助金問題。因此，完全的生存危機保險隱含著地主有滿足佃戶的最低限度福利需要的個人義務。“保護人”和“保護”這兩個術語的經典用法在這里是適用的，因為這種關系最終突出地主對于作為消費者的佃戶全家的責任，而不是不受個人關系影響的經濟交易。[[100]](#_100_57)這些服務的受益者常常不僅僅是佃戶；他通常是由個人服從和義務感同地主相連的“被保護人”。這種“保護人—被保護人”的契約因素，在東南亞的大多數傳統的租佃制度中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在19世紀末菲律賓的農場制度中或許表現得最為典型。[[101]](#_101_57)

根據安全第一原則，農民希望了解的關于租佃制度的頭一件事，就是年成不好時它能為自己做些什么。能防御大災難的傳統制度，會維持他的生活；對半分成的谷物交租制度就不一定能維持他的生活。雖然佃戶和地主平等地共擔產量波動的風險，但不能保證任何年份農作物產量的一半都能滿足農民的基本需要。

對于實際的租佃關系來說，“谷物分成”或“固定地租”的稱號常常不過是無關緊要的指導。例如，在菲律賓水稻種植中傳統的租佃制度，正常情況下是指對半分成的谷物交租。但在實踐中，在一些地區，“土地所有者，特別是中等的土地所有者，按照一種說法，在有能力時必須幫助佃戶。”[[102]](#_102_57)而在另一些地區，則沒有任何對佃戶的同情。關鍵是租佃關系的實質內容——真正的互惠模式——而不是它形式上的描述術語。谷物分成交租的農民，在收獲季節之前可以得到無息食物貸款，年成不好時可以得到多于正常年景的份額，生病時可以得到幫助，又享受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權，還可以得到地主的小恩小惠。所以，他們所具有的生存保險比人們預計的一般農作物分配所能給予的保險實質上更大。

根據生存第一的條件，交納現金或實物的固定地租是最沉重的負擔。農產量波動的幅度完全反映在佃戶的收入上。如果農作物絕收，谷物分成制便不要求交租；而固定地租制則要求絲毫不減地如數交租，哪怕是顆粒無收。表2所示的假想的簡單例子，闡明了在兩種制度下的好壞兩種年頭所發生的情況。在這個例子里，谷物分成交租的比例是對半分成，而固定地租的租額定為一般年頭的農產量的一半。讓我們假定一個農民家庭的最低生存需要是40籮大米。在一般年頭，兩種制度都使得佃戶得到50籮大米，稍微超出其基本需要。在豐收年頭，佃戶在兩種制度下都不錯，但在固定地租制度下他們會特別好。[[103]](#_103_57)然而，假定在固定地租制度下的產量落到90籮以下，并且由此造成的每一籮損失都是從佃戶的生存需要中擠出來的；那么，在壞年頭，當總產量只有50籮時，佃戶所剩下的便絕對是零了，同時他還必須把本來用以養家糊口的大米交給可能生活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固定地租一方面使得佃戶有機會取得最大的收益，同時也使他的安全保障變得最小了。這是一種毫不關心佃戶的基本需要的無情的地租索要權。[[104]](#_104_57)

表2 谷物分成交租和固定地租的農作物分配比較



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大部分東南亞低洼地區的農民判斷土地使用制度的公正與否，就是看它們所提供的生存條件的可靠程度如何。在越南，土地的測量單位“畝”（mau）的確定，不是以土地面積為準，而是以經常性的產量為準。這樣，東京的“畝”就比較小，因為那里的土地較為肥沃；而土壤貧瘠的安南的“畝”就比較大。越南人以生存狀況為單位來量度土地，非常類似于愛爾蘭人用“三頭牛的農場”這樣的話來說明謀生能力。[[105]](#_105_57)同樣，在租佃的安排方面，佃戶首先要問的是收獲物分配以后自己能得到多少大米，而不是地主可能拿走多少。對20世紀20年代下緬甸的租佃制度的研究表明，耕作者認為在土地肥沃或者自己可種較大耕地的地方，向土地所有者交納較高比例的份額是合理的。[[106]](#_106_57)在這兩種情況之下，土地所有者都可以得到較大份額，同時也給佃戶留下了足以維持生存的份額。而在土地貧瘠地區，由于生產成本很高，即使交納較小比例的地租，佃戶也會認為難以承受。當然，遇到荒年，他們還指望得到寬厚待遇。在越南的土地肥沃地區，地主也要收取較大份額的收成。[[107]](#_107_57)因此，不能說拿走一半收獲量的地主會被認為比拿走40%的地主多剝削了10%。相反的情況倒可能存在，因為剝削的主要標準始終是：交完地租、扣除生產成本之后，佃戶的打谷場上還能剩下多少？地主所得的份額和剩下來留給佃戶的東西之間，固然很難說沒有聯系，但我們不能從前者直接推斷出后者來。

在佃戶們具有足夠的討價還價能力的地方，谷物分成的條件往往接近于他們對自己所能承受的條件的看法。亨利的報告說，東京的習慣上的谷物分成條件，一旦威脅到谷物分成租佃者的生存資料，就會被放棄：“如遇歉收，地主就把全部收成歸于租種者。”[[108]](#_108_57)早期的分成采膠的做法，反映了對分成佃戶的生存要求的同樣的關注。在印度尼西亞的“bagi dua”（大致相當于“合伙人”或“對半分成”）制度下，若膠乳價格高，則采膠人之所得低于總收益的一半；若膠乳價格低，則采膠人之所得大大高于總收益的一半。[[109]](#_109_57)因此，業主承擔了大部分的市場風險，而采膠人的收入是固定的。一般說來，在地主和耕作者有親緣關系或同住一村時，或者在勞動力的短缺使得照顧佃戶愿望成為明智之舉的地方，佃戶更加可以依靠此類保護。一旦形勢不利于佃戶，他更可能抵制由谷物分成向固定地租租佃的轉變，反對取消從前自己在困難時期可以得到的那種特殊照顧。[[110]](#_110_53)

“地主—佃戶”關系中關注生存的重要性，在呂宋得到了突出的表現，那里的菲律賓政府最近力圖把水稻的分成租種者改為固定地租佃戶。[[111]](#_111_53)為了努力使這一轉換富有吸引力，地租被確定為轉換前的平均凈產量（減去種子、收割、脫粒、裝運、大米加工等費用之后）的四分之一。分成租種的地租一直是毛產量的一半，并且由地主和佃戶對半平均負擔生產成本。因此，在新制度下，在正常年景下，佃戶的收入大概可望比從前翻一番，而且，由于采用新品種，或許收入會更多。盡管就平均收入而言，新制度有希望帶來相當大的利益，但許多農民依然不愿意轉換租佃方式，其原因就在于租佃改革所固有的新的生存風險。首先，存在著歉收之后要交納固定地租的風險。

在分成租佃時，不論年成好壞，他交納收獲量的一定比例。而在固定地租租佃時，不論豐收歉收，他都必須交納同樣數量的地租；而且，這次收獲期交不了的地租，將像欠債一樣自然增長，下一個收獲期必須償還。[[112]](#_112_53)

佃戶的豐年狀況可能相當不錯，但新的租佃安排減少了給予他的災害防護。

第二，最重要的是，固定地租租佃常常意味著失去了由地主提供的對佃戶的生存安全至關重要的大量幫助。其中包括：地主對生產成本的負擔、低息生產貸款、食物貸款、患病期間的幫助，以及對于地主的財物如竹子、木頭和水的使用權，還有墾植山坡、種植蔬菜作物的權利。一方面，佃戶可以選擇地租低而合法、又有較大自主權的租佃方式，但要犧牲以往地主提供的大多數服務和自己對收獲物的不變的訴求。另一方面，他可以繼續做個分成租佃者，交納不合法的高租（不過地租因產量的不同而不同），同時可以指望得到地主的持續的貸款和援助。[[113]](#_113_53)這些是使農民極度痛苦的選擇，許多人寧愿繼續做個分成租佃者，或者簽訂能維持舊制度的許多安全因素的“折中契約”。此外，農民進行選擇的實際模式，反映了佃戶對生存的關注。那些轉向固定地租租佃的人正是那些受到轉變的威脅最小的人；他們所耕種的地區產量最為穩定；他們所租種的耕地面積較大、收益較高，因而減少了他們對貸款的需求；他們的東家往往已經非常苛刻，很少保障他們的習慣權利；他們很可能有一些外出打工機會作為退路。對于這些佃戶來說，風險減少到了最低限度。與此相反，那些租種寬厚仁慈的地主的小片土地、產量不穩、沒有任何積蓄或可靠的外出打工機會的分成租佃者，在生存安全方面將會失去的最多，因而最不樂意看到這種轉變。正如一位佃戶所說的那樣：“［在分成租佃制度下，］我一輩子都要交納較高的地租，但我至少有東西吃，能活下去。”[[114]](#_114_53)

進行選擇的模式和農民們進行選擇的價值觀，暴露了對生存風險的看法上的堅定的成見。壓倒一切的目標是“安全”和“維持生存的食物與金錢”。[[115]](#_115_53)當固定地租租佃不會帶來任何更大的風險時，它自然頗具吸引力；但當它威脅到分成租佃的現有生存保障時，其潛在的酬報似乎就成了——并且已經是——一種危險的賭博。

在同一省份進行的對耕作者的最新民意調查，提供了某種獨立的證據支持上述解釋。[[116]](#_116_53)調查結果顯示，佃戶們對于“怎樣才算‘好地主’”具有共同的標準概念，而滿足最低限度的福利需要是這一概念的中心內容。當被問及“‘好地主’應具備何種品質”時，回答者都表示，他們期望地主在生產成本方面給予幫助，給些“小額優惠”，并能慷慨地給予貸款。其中生產費用的重要性，明顯地基于典型的佃戶自身對于此項資金投入的無能為力。然而，“小額優惠”的提法不很確切，因為它所指的各種服務非常關鍵。這一范疇包括醫藥和看病的費用、免費住房和宅基地，還有保障生存的食物配給，甚至還有打場之前的水稻補助。最后，分成佃戶在歉收之后需要包含寬大條件的“貸款”。總括地說，小額優惠和貸款體現了這一信念：在任何特定的年份里，分成租佃都應當提供有保障的食物供應，為佃戶的需要和交租能力提供些補助。對生存的關注也反映在對地主和監管人的主要的抱怨上，這就是：他們常常太苛刻了，不管產量多少，不管佃戶的困難多大，都要堅持兌現契約的條款。

那個地區接受調查的佃戶的說法，最清楚不過地表達了對地主的標準的道德期待：“具有地主資歷的人，應該在佃戶困難時期借米給他、幫助他。這是作為地主的職責所在。”[[117]](#_117_53)不履行自己的義務的地主，就成了“壞”地主。只要這種不履行義務的情況屬于孤立的個案，這一判斷就僅僅反映了個別地主的合法性問題。然而，一旦它成為普遍現象，作為一個階級的地主們的集體合法性可能就要受到非議了。“如果分成租佃的安排能夠確保生存安全，那么它就會被視為好制度。因為對分成租佃的主要抱怨不在于它所包涵的依賴性，而在于分成所得不足以滿足生存需要。”[[118]](#_118_53)

在東南亞殖民地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成為農村權力的基礎。根據我們對農民優先考慮的事項和需要的了解，他們有自己的行為標準，據以判斷占有土地的權力和該權力掌握者的合法性。如果地主承擔了保護人的角色，也就是把自己的剩余物用于為被保護人的生存危機保險，那么他就是可以接受的。農民對于經濟權力的合法運用，具有一套具體的職責期待，正如皮特—里弗斯在談到西班牙農民對保護的看法時所指出的：

抱怨主要不是針對實際存在的經濟不平等，而是針對富人不關心較為不幸者的現象，針對富人的不仁慈。主要的不是制度不好，而是富人太壞。……當保護人是好人時，這種保護關系就是好的。但正如保護的基礎——友誼一樣，保護也有其兩面性。它或者確認富人的優越地位，或者讓富人惡劣地盤剝窮人。從根據村莊的道德團結對依從者實行的高尚保護到后來的酋長統治時期的粗暴強制，這一系列的關系都在“保護”這個詞的涵蓋范圍之內。顯然，這一制度只有在確保人們不挨餓、確保沒有不公正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好”的評價。在社區中的大多數人每當有需要時都可以指望保護人予以幫助的地方，此種制度加強了整個村莊的一體性。而在那些只有少數人享受到保護的好處的地方，這些少數人及其保護人就會遭到其余多數人的怨恨。[[119]](#_119_53)

為經濟不平等辯護的惟一理由是，權力的運用是仁慈的、服務于社會的；為了使自己的權力合法化，精英們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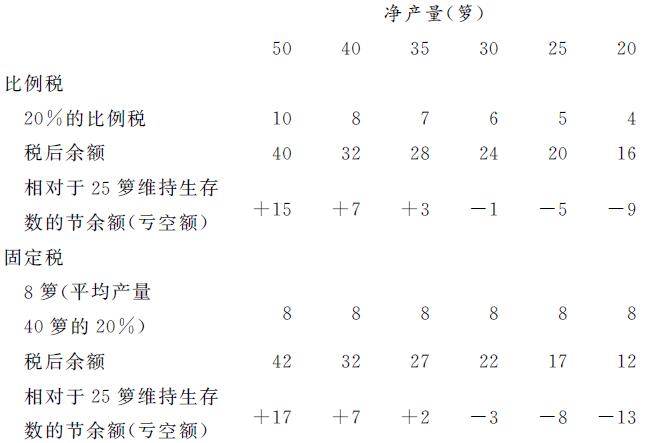
## 風險和政府

按照生存倫理的邏輯，農民至少要向政府提出他向保護人所提出的要求，即要求政府對他的收獲物的索取同他的支付能力相適應。因此，“現實世界”中最好的政府只會對豐年的剩余產品征稅，而且應向農民的保護人那樣，比如通過公共建筑工程的雇傭機會和動用國家糧倉等途徑，幫助農民度過荒年。同土地使用制度中的分成租佃比起來，不太理想的征稅方式是對每年的收獲物收取固定的比例。盡管此種情況下的稅收在某種程度上隨交付能力的不同而不同，但在歉收年份它就可能把農民推到災難線以下。當然，最糟糕的情況類似于地主的固定地租制，即不論年成好壞，農民每年納稅的數額不變。表3所舉的例子，簡明地對比了比例稅和固定稅對農民福利所造成的相應的影響。假定對凈產量征稅20%（這一數額低于英國住區官員在緬甸用以確定稅收的比例），當產量為30或20籮時，這種比例稅收便突然引起了生存危機——要是不交稅，這一產量則足以維持最低需要。然而，固定稅收在豐收年頭確實增加了農民的收益，但在歉收年頭遇到生存危險時，它對農民的壓榨就愈加厲害了。在農民的財力呈下降趨勢時，固定稅收實際上就成了不斷增加的比例稅收。

有一個例子，表現了少見的對殖民地的思考：一個緬甸瑞保的住區官員，名叫威廉斯先生，甚至實地調查了小農主對固定稅收的想法。他們的激烈反應似乎打動了他。

關于一次交清的估計稅額的建議，我同許多耕種者討論了［確定的估計稅額］。當然，由此造成了更加復雜的情況；但在不管年成好壞納稅額都一樣的這一主要問題上，對這一建議的敵意是堅定而普遍的。[[120]](#_120_51)

表3 對農民收入征收比例稅和固定稅的結果比較



在土地使用制度方面，名義上的稅收形式之意義常常沒有實際執行的大。在這方面，東南亞的傳統王國“叫得兇，做得少”。遇到荒年，稅收明顯下滑，對遭受澇災、蟲災或旱災的所有地區，不得不給予賦稅減免。這種仁慈舉措部分地是由于傳統的朝廷與其臣民的福利之間的密切關聯性，但也確實反映了傳統的國家無力可靠地控制多數邊遠地區。可以想像的是，如果可能，中央政府就一定會犧牲農民的利益以穩定自己的收入。然而，在國王的命令所及的朝廷周圍地區以外，征稅問題是嚴重的。被逼急了的農民會從一個地區轉移到森林地帶，或者尋求其他地方首領的保護。由于傳統國家的權力基礎是對居民（剩余物的來源）的控制而不是對土地的控制，地方首領都樂于接受難民并擴大自己的被保護群體。災年之后當地居民對稅收的反抗就一定會增強，從而有助于削弱國家的征稅能力。用米爾達爾的話來說，傳統國家是標準意義上的“軟國家”。

根據吳永隆的計算，阮文紹王朝在成為殖民地之前的實際稅收，在東京占平均產量的3—4%，在交趾支那占3.9—5.5%。[[121]](#_121_51)當然，重要的是年復一年的賦稅如何因耕作者的納稅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在這方面，吳永隆談到了特殊時期的饑荒救濟，似乎還有傳統的法令，規定納稅額的減少比例幾乎要同減產的百分比相等，如果減收70%以上則全部免稅。[[122]](#_122_51)傳統的人頭稅的負擔通過兩種途徑被進一步弱化。第一，為了使稅額盡量減少，每個村莊都故意瞞報人口；第二，由于是對村莊而不是對個人征稅，人們可以指望富裕者的納稅額多于平均份額。因此，在名義上的固定稅額制度下也有某種靈活性，不過它并非人們有意為之。

在泰國，傳統的治國之術的主要困境同樣在于，既要足夠地增加徭役和實物稅以供養朝廷，又不能讓稅賦多到趕走當地種田人的程度。在豐年和產量相當穩定的地方，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但在困難時期，若要征稅，只能進行壓榨，這就有失去王國未來的大部分稅收基礎的風險。貴族階層和政府對平民榨取程度的自然界限，是由土地的充裕程度和政府的基本強制能力所決定的。“然而，有一種機制可以限制貴族對于平民的服務提出過分要求。當平民不能忍受貴族的過分要求時，他們就會逃往叢林之中。”[[123]](#_123_51)雖然這可能把人們逃離家園說得太過輕松了，但在曼谷時代早期，泰國政權的主要政見就是穩定它所管理的人口，勸告逃亡者返鄉。君主對那些減少了王國人口的貴族壓迫者盡力加以抑制；在臣民身上刺下永久性的辨認記號，也被作為控制臣民的手段；泰國軍隊則重新駐扎在靠近疆土中心的所有被征服的村莊。然而，同許多其他的傳統王國一樣，問題依然存在。王國的賦稅越是難于負擔，它失去的人口就越多，它遭到的反抗就越大，直到取得暫時平衡。國家稅收的多少更大地依存于農民生存需要的滿足情況，而不是依存于國王的大臣們的主觀愿望或形式上的稅收制度的要求。[[124]](#_124_51)

我們所掌握的證據表明，固定稅額比起因耕者的不同財力而變化的稅額，更加難于承受，更容易激起不滿。本書下面對20世紀30年代的反叛活動的考察，將揭示此種不滿可能演變為怎樣的爆炸性局面。因為，如果說傳統的國家阻止不了處于困境中的農民大量逃稅，那么，殖民地國家就有了更加完備的機構，以索要農民的殘存的剩余物。

在這一章里我力圖證明，在生存道德的邏輯和大多數東南亞農民的具體選擇與價值標準之間，存在著一種對應關系。在鄉村互惠、職業偏好和對租佃、稅制的評價層面，似乎有一種明顯的傾向，這就是贊成那些最大限度地減小生存風險的制度和關系，盡管它們可能索取大量的剩余物。這些偏好產生于關注生存的農民的不穩定的生存條件，但他們也把道德因素作為對所在社會的權利要求。殖民地時代的經濟社會變革對這一要求的背離，是本書下面三章所論述的主題。

# 第三章 風險分配與殖民地變革

如果根據生存保障原則考察東南亞農民在殖民統治下的經歷，我們就會注意到過去對殖民主義的分析研究中極少關注的事件和過程。從生存保障的觀點看來，根據統計得出的殖民統治下普通農民的人均收入的政治意義，小于分成佃戶、小農主和農業工人的福利水平的相對不穩定性所具有的政治意義。我認為，正是在這一方面，可以找到殖民地社會轉型期的爆炸性源泉。

根據生存保障原則，殖民主義解決了一些問題，同時又造成了同樣多的問題。一方面，它的確創造了輸送網絡和政治機制，把糧食從富余地區運送到短缺地區，從而緩解了局部災荒的威脅。另一方面，這種輸送和政治機制又能以賦稅形式從各地弄來糧食。一方面，殖民地的政策和資本打破了農業的原有地界，在農民先驅者的努力下，開墾了廣袤的耕地。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新耕地掌握在少數地主手中，他們所擁有的對于激增的農業人口的權力，很容易消除農民本來也許可以實現的生活水平的提高。[[125]](#_125_51)

殖民地的國家政權和農業商品化的發展，至少在五個方面使得農民的生存安全困境更加復雜了。第一，它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面臨新的市場不安全性的威脅，在傳統農業產量波動的風險之外，又加劇了農民收入的變動性。第二，對于大部分農民來說，它破壞了鄉村和家族分擔風險的保護性功能。第三，它減少了、甚至取消了許多傳統的生存“安全閾”，即以往幫助農民家庭度過荒年的許多輔助職業。第四，從前為農業的部分風險承擔責任的地主們，現在不僅能從農民那兒收取更多的地租，而且對佃戶收入收取固定費用，從而使農民面對更大的農作物和市場的風險。最后，國家本身越來越有力量犧牲耕作者的利益以穩定國家稅收。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在這一地區發生的農民動亂，絕大多數都同這種不安全和剝削的新模式有關。從農民家庭預算的微觀方面看，家庭收入更加不可靠了，對家庭收入的外部索取更加固定而不考慮具體情況了，同時當地可獲得的食物和收入資源則越來越少。

這一轉變過程中的關鍵問題，主要不是收入本身的減少，而是舊有社會保險模式的衰落。在這里，例如對以東、中部爪哇為一方、以下緬甸或交趾支那為另一方的從1900年到1940年的農業史進行比較，是富有啟發性的。[[126]](#_126_49)一般說來，爪哇東部和中部的農民收入幾乎肯定遠遠低于下緬甸和交趾支那，但大家都認為這種低收入要穩定得多。由于荷蘭的殖民地政策與鄉村再分配的靈活性，盡管爪哇農民物質水平可能降低了，但他們仍保留了許多生存保障措施。然而，在下緬甸和湄公河三角洲新開發地區的迅猛發展和混亂之中，與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并存的現象是，那里沒有任何可能提供某些傳統經濟保障的減震器。因此，交趾支那和下緬甸的較為混亂的農民政治活動，似乎主要不是由于農民的貧困程度，而是由于他們完全地面對著世界經濟的波動，因而不可能具有穩定的社會模式和生活預期。當然，一旦凄慘的貧困與不安全碰在一塊兒，情況就變得尤其具有剝削性了。

以下對于殖民地變革的論述，很難做到恰如其分地處理該地區的所有事件，只能盡量地勾畫出較為詳盡的實證性研究的主要輪廓。在前面提到的使得農民的生存保障大成問題的五大變革中，我們特別集中論述土地所有者的和國家的索取權（分別在本章和下一章討論），僅僅概括性地談一下市場力量、輔助職業和鄉村的拉平機制問題。如此確定論述重點的理由，是因為地主和國家在政治上的作用特別顯著。當傳統的手工藝職業消失、價格的變化和鄉村慈善事業的弱化減小了農民的安全系數的時候，它們或多或少都是非人力所及的變革過程，很難找出它們的具體代理人。另一方面，地主和官員又是確實存在的，他們對農民的產品提出的直接索取可能會遭到抵抗。[[127]](#_127_49)從地域上說，我主要努力論證越南和緬甸的情況，而不顧及該地區的其他國家。

## 市場取向的不穩定性

在小規模占有土地的生存經濟中，盡管存在嚴重缺陷，但農民家庭知道，如果收成很好，吃飯問題就大致上有了保障。然而，如果農作物上市出售，或者以現行價格來為交租、納稅、付利息的部分農作物作價，那么，就沒有任何食物供應的保障了。收成也許更多，但價格下降將減少其實際價值。市場決定農民收獲物的價值達到什么程度，農民所面對的價格機制的不安全性就達到什么程度。[[128]](#_128_49)今年以現金交付的賦稅、地租和利息可能相當于去年交付的稻谷數量的兩倍，盡管需要交納的現金和實際收獲物的總量未變。

綜合考慮所有因素可知，世界市場的不安全性比傳統的地方市場更大。在小規模的有限的市場內，價格和產量二者往往可以相互補償：當地的收獲量越少，單位收獲物的價格越高，反之亦然，因為供求是由收獲量本身決定的。而在世界性的市場上，地方收成和價格的關系被打破了，世界價格的變化或多或少地獨立于地方的谷物供應量——收成少時的單位價格很可能跟收成多時一樣。在農作物收成的波動之外，價格變化對農民實際收入的影響，可以通過計算價格波動的幅度和市場定價的情況作出判斷。例如，根據查耶諾夫的計算，俄國農民單位耕地的亞麻收成的變化為20.6%，而單位亞麻的價格變化為13%。[[129]](#_129_49)如果產量降低時價格上揚，農民收入就可能保持不變，但價格的變動可能僅僅抵消產量的影響而已。

農業商品化必然意味著購買農具、租用耕畜和雇人插秧收割的現金生產成本顯著地增加了。盡管小農主或佃農努力盡量減少這類費用，它們還是一筆投資成本（潛在的損失），只能通過出售一部分農作物來彌補這筆損失。對1922年下緬甸的土地稅收的研究，注意到了這一發展變化對收入的主要影響：

由于耕作成本的增加，耕作者的收入變動的幅度比以前——例如二十年前——大大增加了。既然耕作成本用去了總產品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那么，農作物產量發生了四分之一的變化，就會對收入造成很大影響。[[130]](#_130_49)

我們還不能忽視這一事實，即：東南亞土地占有的日益集中本身，把農民更為充分地置于市場力量的沖擊之下。每個地區，特別是在商品化程度較高的低洼地區，例如湄公河三角洲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農業雇傭工人和佃農對于小土地所有者的比例顯著地增加了。雇傭工人的雙腳都站在市場經濟中；價格體系既決定了他們的勞動工資，又決定了其工資的購買力。佃農雖然吃掉了一部分自己的種植物，但他們的地租、利息和賦稅負擔，也隨著市場價格的波動而波動。小土地所有者稍微較好地自外于市場力量。但是，他們必須納稅、支付抵押和貸款費用，必須雇人勞動，這一事實使他們不能不受市場的傷害。甚至在泰國這樣占有少量土地的人口被認為最為穩定的地區，也存在幾乎同樣的情況：“當他們知道貸款的優越性和抵押品贖回權被取消的危險時，土地所有者變成了佃農，佃農變成了工人。最好的農業收成也無助于抵御這一災難。”[[131]](#_131_49)

在水稻種植區，市場的影響是不平衡的。比起下緬甸或交趾支那來，爪哇東部和中部地區，馬來亞的東部沿海，泰國中部平原的北部，東京和安南地區以及上緬甸，保留有更多的生存經濟成分。然而，它們也各有不同的中心問題。農民越來越需要的現金資源（例如工資，初級農產品的價格）常有波動，而對其收入的索取（賦稅、地租，以及食鹽、布匹、煤油、火柴等大量的消費必需品）常常維持不變或者穩步增加。農民家庭預算的平衡，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了。[[132]](#_132_49)

## 鄉村保護的弱化

殖民主義統治下的社會變革，沒有破壞地方的再分配規范。事實上，有證據表明，至少在短期內，殖民地國家新的外來經濟要求有助于提高而不是削弱鄉村共擔風險的重要性。在那些殖民地政府向鄉村集體征稅的地區——比如安南和爪哇地區，情況肯定如此。[[133]](#_133_49)在鄉村再分配規范軟弱無力的地區，特別是在交趾支那和下緬甸這樣相對分割一小塊一小塊的邊境地區，這些規范從未為農民提供多少社會保障。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甚至在拉平機制較強的鄉村，至少三個方面的結構性變革，減弱了這種機制對農民生存的貢獻。第一，鄉村再分配的強制做法僅僅對地方掌握的資源有效，因而鄉村的保護能力，正如宗族的保護能力一樣，傳統上僅局限于狹小范圍。[[134]](#_134_47)如果鄉村整體上連續遭遇歉收的打擊，鄉村內部共享資源的能力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殖民地經濟變革的影響，又使得鄉村失去了對越來越多的實際財富的支配權。鄉村耕地的消失，對當地的社會保護組織是個特別沉重的打擊。正如杜馬雷斯特在談到越南時所指出的：“公社不再擁有公地，因而不能再像傳統做法那樣，為確有所需的居民提供幫助。”[[135]](#_135_47)此外，隨著雇用代理人在鄉村照管土地的在外地主數量的增加，隨著在鄉村耕作而住在別處的農業工人和佃戶人數的增加，隨著把村民們同外村人而不是本村人密切聯系起來的借貸組織的出現，由農村的拉平機制重組的資源越來越少了。

第二，農民嫉妒和施壓的對象，雖然很難不受影響，但當地窮人的要求傷害他們的可能性變小了。并不真正離鄉的中等程度的富人們，其社會地位也不再取決于地方的批準和支持了。現在，如果必要的話，法院和警察就會強制地幫助他們實現其對于土地的占有權和對于契約性債務的索取權。這一新的來自外部力量的支持，使他們遭受地方非難的風險變小了。道德規則依然存在，但規則的保護能力已經銳減。由此在鄉村內部造成的最終結果，常常是低等階層的公有主張，再也不能保障最貧窮者的最低限度生存需要了。最后，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在市場價格波動的新沖擊和長遠的人口增長的條件下，鄉村內部再分配的強制做法能否存在下去，是大可懷疑的。

## 輔助生存資源的喪失

傳統經濟中包含許多可以稱之為“退卻方案”的東西，即輔助性活動，它們在饑荒時可以帶來可喜的賺頭。例如在地方集市上出售籃子、陶器和紡織品之類的交易，就是農民家庭在農閑季節的主要活動。一旦莊稼歉收，農民就靠這些交易彌補家庭收入的虧空。在不宜種稻的地方種植其他農作物，以及種菜、飼養雞鴨、捕魚和森林采集活動，都是保障生存安全的資源，可能幫助農民家庭度過大米短缺的困難時期。

在傳統的農民社會中存在的上述選擇方案，使得農民有了某種靈活性——有了至少在短期內承受農作物歉收、應付外部索取的能力。關于這類選擇的一個關鍵事實是，即便在正常時期，它們也是地方活動的確定的組成部分，它們的強化不會對鄉村生活造成多大的干擾。農民家庭仍然從事農業耕作，仍然生活在當地社會中。或許正是這些傳統的避難方案，在艱苦時期和外來壓力之下，賦予農民社會以某種“退卻主義”的特征。

殖民主義的經濟變革，逐漸縮減了上述生存安全閾的范圍。這些選擇方案減少了，農民的家庭經濟就變得愈加脆弱了。這樣一來，一旦水稻歉收，一旦租稅的索要威脅到生存安全，那么，農民除了反抗，除了徹底離開農村，還能有什么辦法呢？災難的標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了更加明確的界定，因而增加了農民政治活動的潛在的爆炸性。

我們可以從總體上把握生存選擇方案縮減的主要特點，盡管每個地區和村莊都經歷了獨特的發展變化。在大部分地區，以往為村民們提供副業機會的地方手藝和貿易市場都遭到了巨大破壞。面對大都市的較大規模的專門化生產或進口商品，地方性的布匹、家用品、農具貿易市場往往萎縮了。[[136]](#_136_47)謝諾描述說，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越南的許多有活力的區域性經濟，作為地方經濟活動被瓦解之后，便集中到了殖民地的較大港口或城市。[[137]](#_137_47)類似的變化過程在其他地方也一定發生過。毫無疑問，殖民地經濟創造的工作機會比它所破壞的多，但這些新的工作機會往往越來越存在于鄉村經濟之外，存在于省一級市場上和較大的港口城市，這些地方具有相當高的人口增長率。[[138]](#_138_47)

在鄉村經濟方面，更大的問題是地方森林資源、村有荒地和公共牧場逐漸消失了。這些資源曾經滿足了農民的一部分重大需要；它們實質上是大自然的贈品，是農民家庭以往借以維持閑居生活的最基本資源。緬甸農民的經歷很有代表性：

在以往為了生存而耕作的日子里，耕者不必花錢就可以從公共荒地上弄來蓋茅草屋的草料、竹子和木材。他們可以到附近的池塘、小河中釣魚，還能自個兒在家中織布。當公共荒地變為耕地之后，當漁場被宣布為政府財產之后，當家庭紡織無利可圖之后，像佃農這樣的小業主們，為了滿足以往能夠自我滿足的需要，越來越不得不去找門路賺錢。[[139]](#_139_47)

正如這份報告所暗示的那樣，發生這些變化的原因有人口變化和自覺的殖民地方針兩個方面。從人口統計上說，人口壓力意味著可耕地達到了迄今為止的最少數量。農民水稻田周圍的閑地，以前可用做自家的牧場或燃料來源地，現在已逐漸被占用殆盡。與此類似，每個村莊周圍的公共土地的范圍日益縮小，直至消失。[[140]](#_140_47)在人口密集的東京地區，這一過程甚至在實施殖民政策之前就已大大地向前推進了。在湄公河和伊洛瓦底三角洲的拓荒區可以看到這種情況，那里的新耕地開墾已經不能夠同人口增長保持同步了。[[141]](#_141_47)然而，新的難處不完全是人口增加問題。殖民地的法律使得地方官員和顯貴人物成功地對公有土地享有占有權，而以前窮人也可以使用這些土地。為了增加稅收，在曾經屬于大伙公有的河流中捕魚的權利，現在拍賣給私人投標者了。[[142]](#_142_47)在那些當地農民有可能從森林中搞到自然產品的地區，殖民地的森林居民和自然資源保護論者，常常盡力限制人們出入森林。

在所有這些變化之中，對森林使用的限制是對農民的一個最大損害；從前一直像空氣一樣免費的、現在仍然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資源，突然間不允許他們沾邊了。林業官員也許是出于好意——盡管看起來他們關心森林收益不亞于關心森林保護——但他們的做法剝奪了農民們的似乎屬于自然權利的東西。[[143]](#_143_47)歐洲農民對于強加給他們的狩獵捕魚法作出了類似的反應：“未經人力干預的自然物如荒地、水源等，任何個人（或政府）均不得侵吞獨占——這一情感深深地植根于人類原始的社會良心之中。”[[144]](#_144_47)我們下面將會看到，在不少東南亞的農民運動中，上述的限制措施是激起農民不滿的主要根源。

生存手段的減少，至少給農民的家庭經濟帶來三大影響。第一，它迫使農民家庭進一步走出自我消費性生產，進一步走進市場經濟。自己不能采集竹子、木材了，只好去買；自己吃的大部分魚、肉也得去買；沒有足夠的牧場養牛了，只好花錢去租。為了應付所有這些必需的支出，就要花費越來越多的錢。錢從哪里來？只有靠賣掉更多的稻谷，或者靠借貸。由于農民的生產和消費要經過市場價格體系來實現，農民也許不會更窮，但他越來越容易受到自己所控制不了的價格波動的傷害。第二，免費的大自然贈品的喪失，加上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業的衰落，使得鄉村窮人維持不愁吃穿日子的可能性大大減少。維持在生存邊緣線的生活也更加困難了。永久性地依賴于雇主，越來越成為農民在鄉村內部求得生存的惟一途徑。對于許多農民來說，一旦生存手段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就意味著同過去的生活有了根本不同。

失去了“退卻”資源的第三個后果，是在其他領域的愈加尖銳的沖突中。從前，佃戶向地主交完地租之后，如果自己在當地的荒地上撿些柴禾或種上一點東西，尚能勉強度日；現在，他發現很難做到這一點了。靠出賣手工藝品交納人頭稅的小土地所有者，也遇到了麻煩。以往的租稅負擔之所以尚可忍受，就是因為有許多輔助性的生存辦法；一旦這些生存辦法不復存在，同樣的租稅負擔就變得難以承受了。從前，即使政府和地主不根據農民的境況調節租稅負擔，不提供一小塊地的幫助，農民至少還可以從自己周圍的公共資源上擠出點東西來。而現在，如果政府和地主沒有某種靈活性，農民在鄉村經濟內部的回旋余地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移居、反抗或者靠出賣勞動力以掙工資為生，就成了僅有的選擇辦法。

## 農村階級關系的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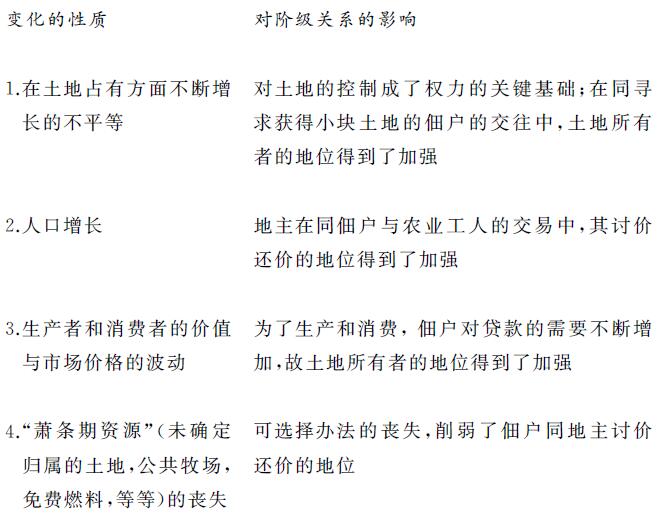
地主、佃農和雇傭工人的狀況，都是東南亞地區與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和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相結合的產物。在這種新的階級結構之下，在地主與他們的佃農或工人之間的關系方面的最顯著變化是，這種關系的保護性的、家長式的許多內容不見了，而變成了不受情感影響的契約性關系。以往在歉收年頭提供生存保障的靈活的網絡關系變得十分明晰而死板了，并且對豐年歉年不加區分。這種關系不再從滿足佃戶的最低需要出發，而是同土地所有者的固定索要權共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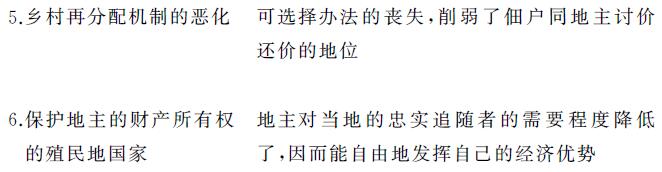
這一轉變實質上是權力問題。如前所述，佃戶一般寧愿由地主承擔農業風險，保護他們抵御災害的襲擊；而地主則希望佃戶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完租。這樣，誰犧牲誰的利益以穩定自己收入的問題，就成了誰能夠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的問題了。[[145]](#_145_45)地主通常能夠把風險轉嫁到佃戶身上，這是地主的相對力量不斷增長的標志。在低洼地區人口大量增長（從1870年到1940年增長了將近三倍）和大部分可耕地已被占領的情況下，同僅僅擁有自身勞動力的人們相比，那些占有土地的人們要強大得多。

然而，地主實現交易力量的剝削潛能的能力，既取決于他們對稀缺的生產要素的占有，同樣也取決于政治權力。他們在打破傳統的租佃條件、霸占拖欠債務者的土地、阻止農民的組織動員等方面的能力，最終依賴于殖民地國家的國民警衛隊與法庭，強制實施那些違背農民道義經濟的契約。

表4總結了我們所論述的主要的結構性變化及其對地主與無地者之關系的影響。

表4 農業商品化與農民的階級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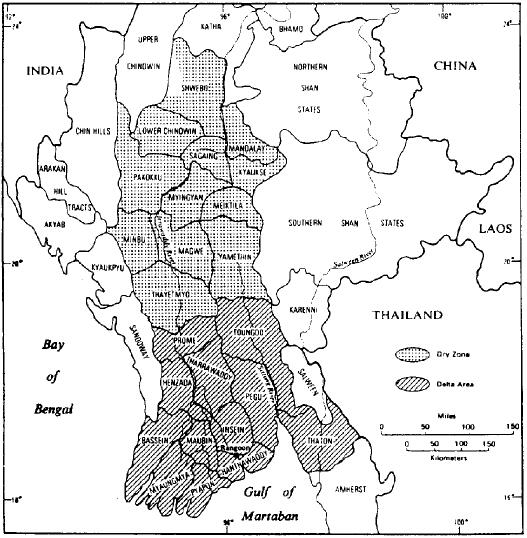


在地主與佃戶的關系方面，有兩個相關的變化，我們將在下面作較為詳細的論述。一是所謂地主與佃戶的“交易平衡”的惡化。這就是說，如果考察一下地主為佃戶提供的貨物與服務以及佃戶為地主提供的貨物與服務，我們就會發現，他們之間的交易發生了不利于佃戶的確鑿無疑的變化。很有代表性的是，地主提供了比以往少得多的服務，卻從佃戶或農業工人那里強行索取了同樣多的甚至更多的東西。在這一意義上說，他們之間的關系，客觀上蘊涵了更大的剝削性。[[146]](#_146_45)

然而，在農民的感覺上，關鍵性的變化主要不是地主可能會拿走更多的收獲物（一般說來，地主總是如此），而是他們之間的關系從整體上失去了既往所具有的保護功能。它從具有某種安全性的依賴關系（即“保護人—委托人”關系），轉變成了一種更加直接的、更加痛苦的現金交易的契約關系，它對貧弱者很少提供或者完全沒有社會安全保障。東南亞農民對這一轉變的反應，同歐洲農民對西方的勞動關系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轉變的反應，具有許多共同特征。

在這個問題上，東南亞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在緬甸南部和交趾支那西部的資本主義邊遠地區，地主的家長式統治從一開始就比較軟弱，所以在使之變成完全契約化關系過程中沒有發生什么“惡化”。在上緬甸爪哇東部和中部地區以及這種傳統的人口密集地區，當地的社會模式對市場化模式的抗拒，在整個殖民時期，維護了封建關系的重要殘余。在占有土地規模、地方性、農作物和種植技術方面的變化，也是明顯的。然而，對于佃農和農業工人來說，境況一般都惡化了。一方面，地主可能拒絕按慣例發放收獲前貸款，另一方面他們又會堅持歉收年頭也得交納全租；同時，即使佃戶生病，他們也不再給予憐憫幫助了；再則，老佃戶們被不需要什么幫助的、能力較強的競爭者所取代，而分成租佃制也讓位于固定地租租佃制了。由于各地區的具體情況不同，變化的跡象可能大有不同，但其方向是相同的。

就資本主義勞動關系的發展而言，任何地方都不如下面將要論述的下緬甸和交趾支那兩地區表現明顯。它們都是東南亞資本主義農業新開辟地區的絕妙典型。緬甸人和越南人的傳統居住中心一直分別是上緬甸和紅河三角洲，雖然早在殖民主義之前，移民便開始南移，取代和（或）同化其他民族（緬甸的孟族和克倫族，越南的高棉人和占人）。然而，在殖民者和當地的資本大量投入排水系統和筑堤工程的刺激下，在日益增長的稻谷出口市場的推動下，到了19世紀晚期，人口南移運動呈現出相當大的規模。剛開始，這兩個地區都具有勞動力短缺、貸款使用普遍、土地被強占以及貨幣經濟等特點。從社會上看，它們在邊遠地區都形成了易變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具有很強的變動性、分散而不牢固的定居模式和較弱的社會凝聚力，其混亂和無序狀態也達到了一定程度。這些邊遠地區資本主義的特點，在緬甸的南方三角洲，在交趾支那的外巴薩（見地圖1）顯得十分突出；而在作為早期居住區的北方，則少有這些特點。開始時，遷往南方的移民常常能搞到土地，成為小土地所有者；但整個地區卻逐漸為大規模占有土地者所控制，他們雇用大量的佃農和日工耕作。這兩個地區都體現了影響東南亞多數低洼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革方面的相當激進的形態，因而成為在農村階級關系中的交易平衡發生痛苦變化的同時實現經濟迅速增長的令人矚目的實例。



地圖1 20世紀緬甸的政治區劃圖

資料來源：M.阿代斯：《緬甸三角洲》（麥迪遜大學出版社，1974年）。

下緬甸

在緬甸，這一轉變非常顯著，從庫珀1924年詳盡的《關于農業佃戶和工人的狀況報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這一點。[[147]](#_147_45)這份報告談到的許多情況到了1930年代，都極大地惡化了。這種情況從表面上的繁榮時期（從1911—1914年到1920—1923年）開始出現，那時稻谷價格已上漲了三分之一。該報告的悲觀主義情緒不言而喻：

［人們］發現，這一地區為非農人員所占耕地的比例和以全租出租的耕地比例，都在不斷增加；以全租出租的耕地（即：對男性親屬等人也不實行優惠地租）的比例不低于38%，有的地區達到50%、60%，甚至70%；佃戶交納的實物地租提高了。……生產成本提高了，而稻谷價格卻沒有相應提高，農業工人的狀況惡化了。……簡而言之，存在著迫切需要采取補救措施的情況。[[148]](#_148_45)

這一涉及農民利益之沖突的較為尖銳的階段，往往同該三角洲各個地區邊界的逐個關閉相重合。“可耕作獲利的土地的日益稀缺和人口數量的日益增長，使得地主的地位比戰前更加強大了。”[[149]](#_149_45)地主可以強行索取地租和服務，但是他們卻缺乏同情和自責，這些都反映了地主力量的強大。

交納固定實物地租的制度在整個三角洲是很普遍的。地租數額以豐收年份的土地產量為基準，盡管從1910年直到1940年的產量普遍下降，使得大多數佃戶的地租負擔占全部收成的比例越來越大。地主所得的稻谷數量不變，而打谷場上剩給佃戶的稻谷數量卻變化極大。例如，在漢達瓦底，1920年末的實物地租被確定為地主所要求的好年成產量的三分之一。然而，據住區官員估計，即便在好年成，地租也占到了收成的五分之二。當然，在歉收年份，地租可能占收成的三分之二。[[150]](#_150_45)于是，25英畝的田地，估產約1000籮稻谷，其中的350籮要用來交租。然而，這樣大的一塊地的稻谷總產量，一般很難超過900籮。

更不要說固定實物地租災荒年頭給佃戶帶來的痛苦了。庫珀報告稱，當地主在無地者不斷增加、邊遠地區的開發結束之際占有很大的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地租水平不斷攀升。19世紀末，地租曾一直維持在占產量的10%到15%；但條件允許時，肥沃耕地的較大規模租佃地租就升到了50%到60%。[[151]](#_151_45)例如，在勃生區考察租佃情況的官員發現，從1914年到1935年，該地區的27塊耕地中有20塊的平均地租提高了，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地租提高的幅度相當大”。[[152]](#_152_43)伊洛瓦底和勃固兩地的地租增加量一直是非常突出的。至少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僅僅由于稻谷市場價格的堅挺，地主所得地租的貨幣價值一直在不斷增加。因而，實物地租的升高，體現了可能由人口壓力所造成的一種剩余利潤。甚至在諸如馬烏賓等對土地的人口壓力小于上三角洲的地區，佃戶于1925年的境況，比1915年的境況也差得多了。

無論對于佃戶來說還是對于小土地所有者來說，稻谷價格的上漲都彌補不了因產量下跌和更高的地租所造成的虧空。從1914年到1924年的十年間，盡管稻谷的單位售價從132盧比上升到176盧比，但同一時期各地的生產工具費用和消費必需品價格均有50%到150%的增長（例如，耕牛57%，犁100%，耙100%，鹽150%，干辣椒80%，芝麻食用油60%，襯衣83%，緬甸男裙120%）。[[153]](#_153_43)這樣大的價格差異，必然要在耕作者的生活水平上反映出來。

在歷史悠久的少數鄉村，地方慣例發揮著抵制傳統地租增加的作用。即便在這些地方，地主也能設法使形勢發生有利于自己的變化。最容易敗露的、卑鄙的對付地方慣例的辦法，就是設計一種多裝谷物的“地主籮”。地主及其代理人設計“地主籮”的詭計可以說層出不窮。有些籮一裝稻谷時便膨脹起來，有些籮的形狀使之放不平從而多裝東西；還有某些倒進谷物的特殊方法也能增加米籮的容量，例如，一邊裝籮一邊使勁地多次搖晃就能多裝不少谷物。佃戶們采取摻雜稻殼的辦法進行報復，但隨著米籮的加大，他們不得不要么多交租，要么不再租佃。在外地主改用大于“鄉村籮”的特殊的“收租籮”的能力，成了他們強行實施個人意志的可恨的象征。

地主米籮的準確容量只有地主自己知道，而佃戶對此常常會夸大其辭。但村民們對米籮的看法可以從他們對它的稱謂中看出來。例如，［緬甸］禮勃坦地主的米籮以“牛車殺手”而聞名：鄉村籮相當于136個奶罐的容量，而“牛車殺手”的容量為150個奶罐！

地主們妄稱擁有隨意加大米籮的權利，佃戶們對此極為憤恨，許多佃戶認為這是他們現有苦難的根源。[[154]](#_154_43)

下緬甸佃戶們的苦難與其說是平均收入問題（無論如何，他們比上緬甸佃戶的平均收入高得多），不如說是不安全問題。看起來確定無疑的是，對佃戶傷害最大的是收入的波動和租地使用權的不穩定，并且缺乏上緬甸的任何為耕者至少提供些保障的社會約束。[[155]](#_155_43)而下緬甸的土地租佃，變得相當死板。下緬甸的土地租約是一種標準的正規文書、嚴格的契約，而上緬甸的土地租約則是一種由習慣法約束的口頭契約。上緬甸的大部分佃戶是對半分成的谷物交租者，與地主住在同一個村莊，并且常常有親戚關系。而下緬甸的大部分佃戶則向在外地主交納固定地租，很可能同地主從不謀面。

伊洛瓦底三角洲農民的主要的不安全感，在于他們對土地的使用權方面。下緬甸的大部分人口已經屬于純粹的雇傭工人范疇，完全受勞動力市場和必需品價格的的支配。[[156]](#_156_43)那些有幸成為佃農的人們，也很難指望能長期租用同一塊耕地。20世紀20年代初庫珀的典型調查的結果，正好說明了土地租佃已經變得多么不穩定了。在丹洛瓦底地區的杰賓高克，106家佃戶中只有4家租用土地期限達到或超過12年；在丹洛瓦底的禮勃坦，130家只有8家如此；在漢達瓦底的吞瓜，99家中只有7家如此；而在永盛的泰克基，僅有一家租佃同一塊地的期限達到了12年。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租佃的不穩定常常是一種健康的標志，說明佃戶們努力地自買耕地而成為小土地所有者。然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它幾乎始終象征著佃戶已經破產而去另尋租佃機會了，或者極可能加入了農業工人的行列之中。在諸如丹洛瓦底這樣的人口密集地區，佃戶向上發展的變動性在1920年前就已經不大可能了。“由勞動者上升為地主的社會地位變化，若干年前曾經是易如反掌之事，而現在則幾乎不可能了。”[[157]](#_157_41)

人們不難弄清為何租佃關系不穩定、佃戶們最終都可能淪為雇傭勞動階級的一員。地租如此之高，以致佃戶只有在豐收年頭才能交得起租而不背上沉重債務。杰賓高克的四位佃農幸運地租用土地達12年之久，他們交納的地租較少；但即便如此，“在歉收年頭除非得到減租優待，他們仍然交不起地租”。[[158]](#_158_41)

對于絕大多數佃戶來說，失去租地權是同這一事實直接相關的：地主在歉收年頭也極少減免地租。

當佃戶因不可控制的原因使得產量遠遠地跌至佃戶與地主雙方簽約時預計的產量之下時，當初確定的公平地租，就顯得不公平了。在此類情況下，地主減租是迄今為止的慣例。但是，既然放債者和其他非農人員擁有的土地如此之多，這一慣例便日益淡化了。[[159]](#_159_41)

由于下緬甸人口變化的不平衡，取消減免地租有個復雜過程。在諸如漢達瓦底這樣的人口較為稠密的地區，在外地主數量激增，因而早在1910年就明顯地停止了減免地租。[[160]](#_160_41)然而在其他地方，直到20世紀20年代，土地制度仍然保留了重要的靈活性措施。甚至在以高地租聞名的丹洛瓦底，住區官員也注意到，1910年，那里的固定地租在歉收之后有所改變。“如果產量低于這一數額［據以計算地租的數額］，實際交租額便常常低于名義上已達成協議的數額。”[[161]](#_161_41)他還注意到，“緬甸人造就了善良仁慈的地主，來年的土地承租提供了地主荒年自愿減租的例證。”[[162]](#_162_41)即使在這個較早階段，慷慨減免地租的做法也有例外情況；而當地主拒絕減免時，佃戶的反應便可以想見了。

據說，［毛淡棉區馬達班山區的］這位地主不搞任何荒年減租；而且只有當清算了歷年欠租后，才可能把佃戶完全有權得到的東西付給他們。我僅僅聽到佃戶們講述這種情況，但不能說他們對這位地主的憎惡是完全沒有道理的。[[163]](#_163_41)

然而，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減免地租越來越成為例外而不是規則了。正如阿代斯所指出的：“在發生變革的幾十年間，不管佃戶的境況多么危急，許多地主都不會減租。”[[164]](#_164_41)在1936—1937年和1937—1938年的收獲季節，盡管勃生地區的莊稼歉收，也只有極少數的佃戶獲準減租，而且同莊稼歉收的幅度相比而言，減租數額微不足道。[[165]](#_165_41)曾經帶有事實上的極大靈活性的固定實物地租制度，變成了嚴格認真的純粹的固定地租制度。當生存風險轉移到耕者身上時，出現了不滿的跡象。1928年，馬烏賓地區的住區官員指出：

對于可靠的租用土地，佃戶的抱怨一般在于，地主索要的全部地租幾乎恒定不變，不會因產量降低而予以減免；即使地租有所減少，同產量不足也毫無關系。但是，由于同意以規定的租額租佃土地的人很多，地主認為不需要減少地租。地主僅僅把土地視為財源，而對土地的耕作毫無貢獻。[[166]](#_166_40)

隨著新開辟地區的關閉和勞動力后備軍的日益增長，地主有可能通過犧牲承租人的利益以穩定自己的收入。

典型的情況是，地主選擇那些自己擁有耕畜、有交租能力者做佃戶。這就使得稻谷收獲前對地主的貸款要求大大減小了，使得地主能以優厚租額出租更多的土地。在歉收年份，這樣的佃戶也能千方百計地攢錢完租，哪怕是到外邊借錢或是變賣耕畜，因為“佃戶最害怕的是續簽租約遭到拒絕”。[[167]](#_167_40)當佃戶的財源被榨干取盡之后，地主就會找較有希望的新佃戶取而代之。從總體上而言，在農村階級關系的結構中，出現了一種齒輪效應般的下降勢頭。正如破產的小農主淪為佃農那樣，還不起債、交不起租的佃農淪落為雇傭工人階級。19世紀90年代尚能攀登階梯上升的耕者，此時開始走下坡路了。同佃戶們失去了減免地租的好處類似，無地者的勞動條件也在惡化。早在1910年，庫珀就已經注意到，“隨著人口的增加，工人可以掙得的工資額開始下滑了。”[[168]](#_168_40)自1912年到1922年，不但莊稼漢的絕對貨幣工資額幾乎下降了20%，而且，如果考慮到該階層的日用品價格的標志——稻谷成本的上漲，他們的實際工資大概下降了35%之多。[[169]](#_169_40)生存保障問題或許更為重要，很少有工人現在是按季受雇的，多數是按天或按農活受雇；其結果是，“以往患病時所享有的自由被取消了；工人一旦生病而上不了工，就更可能被裁減掉。”[[170]](#_170_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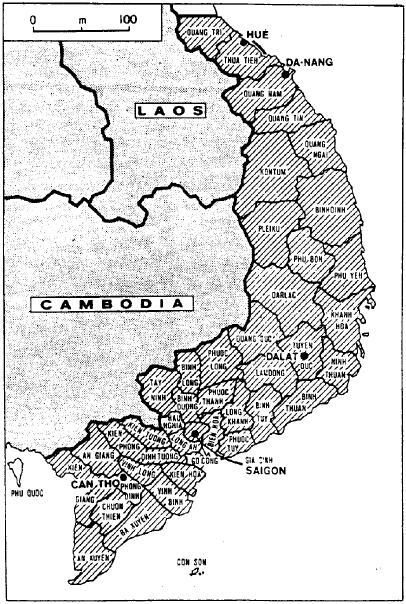
保護和雙向互惠的契約義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上緬甸的“地主—佃戶”關系的特征，而在下緬甸則已被徹底打破了。除了收取固定不變的高額地租和不斷增加的貸款，在這個三角洲的地主和耕者之間，很難找到其他方面的聯系了。其他所有服務統統消失了：土地所有者的個人援助和經紀人事務，地主對于鄉村福利的貢獻，他們在耕作技術方面的幫助，特別是曾經為佃戶提供某些生存保障的地主在索取方面的靈活性。所有這些服務的消失，意味著土地所有者可能擁有的相應的合法要求也消除了。

到20世紀20年代，“地主—佃戶”關系中不斷增長的敵意十分明顯。從未成為一種偉大的個人忠誠的關系，現在不能經常地滿足佃戶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了。只要有可能，佃戶們就要違反他們的租佃條件。他們早早地收割一些莊稼，偷偷地賣給小商販，卻對地主說是付給收割者和打場人了。如果眼看收成不好，那些得到貸款的佃農就常常攜款出逃，并且盡量多地帶走糧食。然而，農民所采取的最具特色的手段，似乎是在年成不好時，基于自己的生存權利而拒付地租。

在1922年和1932年，本報告中的13個地區的地主，分別提出了918起和797起關于佃戶交租問題的訴訟案件；如果根據我在永盛和勃生檔案室所查到的資料進行推斷，這些訴訟案件中的大部分之所以不得不提出來，就是因為佃戶認為自己在農作物歉收時沒有得到公平待遇，因而拒絕足額交租。[[171]](#_171_40)

佃戶被帶上法庭之后，實際上總要被責令交足租契中規定的全部地租。然而，佃戶的此類反抗，準確地表達了他的道義經濟觀。佃戶顯然認為，地主的索取不可能合理地延伸至自己的生存資源。在好年頭，佃戶的生存權和地主對剩余物的索要權都能得到滿足；但在壞年頭，地主只有侵犯佃戶所認為的自己對收獲物的重要的道義權利才可能收到地租。

這個三角洲的地主對于暴力的日益依賴，反映了對他們的索要的日益增長的反抗。對地方規范的每一次背離，都意味著對強制力的更大的依賴。例如，庫珀曾描述這樣一位地主，他違背了優先雇用本村人的規范，因此，由于他“從遠方雇用佃戶……因而不敢在黃昏時分去察看自己的田地，以免被人打破頭”。[[172]](#_172_40)漸漸地，甚至法院也不足以強制實施地主對地租的索要權了。于是，地主不得不在收獲期臨近時雇用更多的看守人，雇用更多的打手保護自己，以防備已被解雇的佃戶滋事。隨著農村的安全越來越成為問題，多數地主移居本省城鎮中了，因為在那里既安全又有社會聲望。“對于土匪搶劫和偷盜的恐懼，也把許多有點錢的人趕進了大城鎮和大村莊。毫無疑問，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愿意住在自己的出生地；但近些年來，他們對于生命財產的不安全感，迫使他們到人口更為密集的地區尋求保護。”[[173]](#_173_40)



地圖2 越南南方

地主的私人武裝的壯大同佃戶的騷動組織的成長同步進行，后者旨在尋求減免地租和租地使用權的保障。作為大蕭條的結果，這種不斷增長的組織上的對抗將會加深并采取更為集體化的形式，最終引發了從1930年到1932年間席卷下緬甸的沙耶山起義。不過，起義的構成要素在十年前就已經出現了。

越南的交趾支那

在交趾支那的湄公河三角洲，“地主—佃戶”關系的發展過程也遵循了下緬甸的模式。這里也存在著市場力量不必同現存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進行競爭的新開辟地區。隨著人口的增長和新區的開發殆盡，這里的租佃條件變得強硬了。[[174]](#_174_40)地主利用其不斷增長的討價還價能力，提高地租并廢除以往所提供的服務；最重要的是，地主還把風險轉嫁給佃戶，以確保自己有穩定的收入。

在這里，主要問題也不是貧窮本身，而是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和社會保護組織的匱乏。正如下緬甸的耕者平均說來比上緬甸的吃得好、勞動強度小，交趾支那的佃農比北部安南和東京的人口更為稠密的傳統地區的佃農吃得好、勞動強度小。因此，差別不在于佃戶的平均收入方面，而在于土地制度使得佃戶承受氣候和市場風險的程度上的不同。在這一意義上說，越南南方佃農的較高收入并不能阻止農村階級關系的爆炸性程度的發展。

甚至早在法國人到來之前，交趾支那就一直是大土地所有者和無地農民共居的地域。湄公河三角洲永隆省的財政官1840年致明命皇帝的報告指出，極少數人家占有了大多數土地，而70%到80%的人口沒有土地。[[175]](#_175_40)法國人實行的政策進一步推動了這些新開辟地區的發展趨勢，其中包括慷慨地賦予法國公民和越南合作者以土地特許權，并且無視大量的強占土地和頒布所有權中的腐敗現象。此外，再加上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負債而不斷地失去土地，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一政策造成了如表5所示的極端不平等情況。

表5 1930年交趾支那土地占有的不平等[[176]](#_176_40)



這些統計數字在各省之間大有不同。在諸如交趾支那頂端的薄寮等新開發地區，土地占有制受到更大的扭曲，而在諸如交趾支那中部的美裻等老區，則相應地有較多的小土地所有者。盡管存在這樣的不同，無法掩蓋的事實是：交趾支那的社會結構呈現兩極分化狀態——大量的無地者面對著大約8000多戶組成的強大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團。而在東京，此類大戶不足500家，在安南則不到100家。[[177]](#_177_40)

家長制從來不是這個三角洲地區地主的特質。但是，當勞動力仍然短缺、邊遠地區仍然開放的時候，家長制因素是存在的。在這一時期，對階級關系的描述歸結為由大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半封建權威”，那時他們常常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為自己的從屬人員提供“保護”。[[178]](#_178_40)“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聚集起許多佃戶家庭，佃戶們租種的田地少則5公頃，多則20公頃。以大地主為放債者的佃農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形成了大地主的真正的被保護人隊伍。”[[179]](#_179_38)我們發現，年老的地主們懷念舊時的日子，那時候，作為對佃戶服從的報答，他們幫助佃戶應付生老病死等大事，佃戶如有需要他們便提供貸款。[[180]](#_180_38)但我們不能夸大地主的慷慨，他們一開始無疑是投機者。也許布羅謝諾的結論是準確的：“像治病救人的醫生有時免費分發藥品一樣，由于歉收而減租的地主、收養佃戶子女的地主也不乏其人。”[[181]](#_181_38)當然，說仁慈的地主“不乏其人”，也意味著仁慈并非地主的典型特征。

前已論及，佃戶對土地制度的主要的檢驗標準，就是看收成不好時會發生什么情況。盡管租佃契約本身沒有賦予佃戶在此種情況下的任何減租權利，但有證據表明，直到20年代甚至更晚些時候，地主認為滿足佃戶的最低限度需要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地主們的普遍做法是，從佃戶們那里拿走了他們滿足家庭生存需要之后所剩下的全部東西。”[[182]](#_182_38)把滿足生存需要之外的全部剩余物都轉移到地主手中的制度，其剝削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佃戶的基本需要至少構成了對收獲物的首要的要求權。地主的這種習慣做法的形成，很可能主要是由于新開辟地區勞動力缺乏所致，盡管可以認為儒家的義務傳統也可能發揮了推動作用。

從1920年到1940年間，小土地所有者、佃戶和農業工人的境況明顯吃緊。小土地所有者在生產費用、納稅和消費方面的現金需求，使之陷入負債狀況，并且常常要變賣土地。當地的大地主成了其占有少量土地的被保護的債權人，被保護者以其僅有的土地作抵押，此之謂“有條件的變賣”。如果小土地所有者不能如期償還債務，所抵押的田地就轉歸債權人所有了，自己就成了佃戶。正如Y.亨利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土地占有的］集中在每次歉收之后表現得特別突出。”[[183]](#_183_38)

到1920年，占三角洲人口大多數的佃農，目睹了地租的穩步攀升，因所租土地的大小和肥沃程度以及承租人之間競爭程度的不同，地租額從占全部收獲物的40%升到了60%、70%之多。[[184]](#_184_38)地主所攫取的剩余價值達到了以規定的租額放債獲利的程度。由于大多數佃戶缺乏生產和消費資金，他們被迫在稻谷價格昂貴的播種季節貸款，而在收獲季節——稻谷價格奇低時——償付與貸款等值的稻谷。其結果，地主的實際利率接近200%。

由于力量平衡的改變，大多數租佃契約皆以好年頭的土地產量為基準，書面規定固定額實物地租。[[185]](#_185_36)當然，同在緬甸一樣，所謂“好年頭”的概念，不過是專門設計出來使地租最大化的越來越空想化的數字。在西貢附近，一個有固定地租收入的龐大的地主階級，常常堅持索要貨幣地租，以省去上市出售稻谷的花費，使自己免受稻谷市場波動的影響。[[186]](#_186_34)

當放債的大土地所有者受地方城鎮或西貢的吸引，開始實施代理人辦法時，“寬恕”的做法——逢歉收必減租——越來越少見了。實際上，大多數地主堅持要把土地出租給那些自己有生產資金和耕畜的付得起租的佃戶，以便減少“寬恕”的需要，從而避免拒絕“寬恕”可能激起的憤慨。[[187]](#_187_34)

最后，當解雇破產佃戶從而有利于較有能力完租的人們時，土地使用權的保障便衰落了。到了20世紀20年代，被解雇的佃戶除非遷居城市，就沒有什么機會再成為小土地所有者了，因為此時新開辟地區可買來耕種的土地在迅速減少。相反，他們要么同別人競爭租佃的機會，要么就淪落為農業雇傭工人階級的成員。類似的喪失保障問題也給雇傭工人隊伍帶來打擊。越來越多的工人按天或按周受雇，而不是按季或按年受雇，其勞動工資常常以現金支付而不是以實物支付。

損害交趾支那農民的交易地位的一些經濟力量，在東京和安南也起著同樣的作用。亨利對1930年之前的東京所作的研究指出：“這些地區容易遭受旱澇等災害從而造成農業嚴重減產，因而這里的地主更愿意采取［固定地租的］租佃形式出租土地。從前，這種土地出租形式是十分少見的。隨著城市居住者——其中一些人希望擁有農村地產——的增加，這種形式慢慢發展起來了。”[[188]](#_188_34)這些地方變革的方向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東京和安南傳統的地方社會結構，對于變革具有強大得多的抵抗力。東京和安南仍然是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的大本營，而無地者中的多數人都是分成租佃者，他們租種村內地主而不是別的村地主的田地，其租地使用權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分成租佃的規范承認耕者生存要求權的優先性，“遇到歉收年成，地主將全部收獲物都留給佃戶”。[[189]](#_189_34)

在東京和安南，確實也有土地占有與農村權力相結合的現象，但不像交趾支那那么嚴重，也沒有帶來如此嚴重的經濟不安全因素。例如，在興安省（東京），在20年代的連續六次糧食歉收之后，大批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土地都轉到了放債者手中。然而，“這些得到了大量地產的人們，一般都把土地的原主人收為自己的分成佃戶，有時還保護他們免受佃戶在農作物收成方面的風險。”[[190]](#_190_34)就農業工人而言，其數量沒有交趾支那的農業工人那么多，他們得到的保護卻好一些。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按年受雇的，“當［東京的］年度工人因工傷病時，雇主必須負責他的食物和其他需要，必須給付工資。”[[191]](#_191_34)東京之所以很少有人移居到交趾支那，上述社會保障機制實際上發揮了明顯的重要作用。盡管南方的平均收入高得多，但在20世紀20年代，很少有人愿意放棄自己的較為安全的貧困生活而選擇南方新開辟地區的冒險生活。[[192]](#_192_34)在那些果真到南方冒險的人們之中，大部分都是被大農場主的代理人在地方當局的協助下強逼去服勞役的。

交趾支那的大部分地主同佃戶的關系是清楚的：地主們只不過是收租人和高利貸者，他們決然談不上保護佃戶，而是要佃戶們承擔糧食歉收的全部后果。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安南和東京的地主同其分成佃戶的關系是不明確的：它依然既有保護又有剝削的因素。亨利對東京中等地主和大地主的描述抓住了這種兩重性。

這些中等地主一般都是社會名流或者是擔任某種公職的人，并常常濫用職權。他們知道如何保持自己在民眾中的良好形象，例如在節假日表現得慷慨大方些，或者向全村或宗教團體贈送禮物。［大業主中的］許多人很聰明，知道如何樹立自己的公正形象：一方面故意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慷慨舉動，另一方面又有力地鎮壓那些桀驁不馴的債務人（以收殺雞儆猴之效）。[[193]](#_193_34)

東京的地主們并不是熱心公益的一類人，但有約束作用的社會背景使他們不得不如此。地方當局和通行的社會規范是強有力的。這里的地主沒有南方地主那樣多的大片土地，殖民政權日常顯示的力量也不像南方那樣無所不在。地主們最多是雇用些游民打手，供給他們大煙和酒。但證據表明，地主們仍然認為，自己至少應當維持溫和程度的地方關系。

如果說在安南和東京，農村的階級關系組織很難是誠實的；那么，在交趾支那，租佃期內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情況，則激發了早期的沖突和戰爭。“佃戶的逃跑現象和對于收獲物分配的爭執都表明，［土地］契約是強加于佃戶的，是佃戶們不得不忍受的東西，而不是他們自愿接受的東西。”[[194]](#_194_32)

像《忠告》［1928年5月11日］所報道的下述特殊事實，在逃亡者的動機問題上，比心理學解釋教給了我們更多的東西：四位佃戶襲擊了金甌的地主陽和萊先生，搶走了價值20000皮阿斯特的60張欠條和2000皮阿斯特現金。此前一天，他們還運走了32000公斤稻谷。[[195]](#_195_32)

在佃戶們進行反抗的同時，地主們也有相應的組織動員。為了保衛成熟期的稻谷，他們雇用更多的看守人員；還有，例如在緬甸，地主越來越厲害地使用作了手腳的量具來增加自己所得收獲物的份額。[[196]](#_196_32)到1922年，據說，為了防范土匪盜竊，交趾支那的地主都在自家的窗戶上安裝了鐵護欄。[[197]](#_197_32)用于更加明確的控制措施的投資也增加了：1919年的治安預算為770萬法郎，到了1929年，增加到了2070萬法郎以上。[[198]](#_198_32)當然，這些僅是一些顯著措施，但足以表明農村階級關系的質的變化。

特別是在交趾支那和下緬甸地區，保護耕者免受最壞結局打擊的租佃制度的衰落是最為明顯的。雖然如此，在東南亞低洼地區的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發展趨勢。[[199]](#_199_32)然而，這種趨勢的發展程度如何，取決于地方社會結構的抗拒性和殖民政權在本地區的侵入程度。在諸如上緬甸、東京、安南和爪哇之類古老王國的傳統核心地區，資本主義的土地占有方式被扭曲了，但并未徹底打破古老形式的社會保護和庇護。然而，邊遠地區允許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使得地主得以充分利用權力的競爭優勢——對土地的競爭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使得他們掌握了權力。

## 土地所有制的變革與世界經濟

從較為靈活分散的“地主—佃戶”契約轉變為直截了當的現金交易關系的歷史，同時也是東南亞地區與世界經濟相融合的歷史。在這種融合最為徹底的地方，比如下緬甸和交趾支那，對依然存在的一些傳統聯系的破除也就最為徹底。

如果佃戶認為被騙去了慣例上的租佃曾經提供的相對的安全保障，我們就必須認識到地主也陷入了對他提出要求的更大的經濟網絡。地主可能曾經給予佃戶的社會保障成了非常昂貴的奢侈品。從1870年到1925年，土地價格莫名奇妙地飛漲，對于每公頃土地的同樣多的利潤來說，投資所得的利潤大大減少了。[[200]](#_200_32)如果土地的產量無法提高，人們就要出售土地獲利，把收入投資到別處去。[[201]](#_201_32)實際上，要使土地的產出更多，就是要佃戶生產得更多。由于糧食價格上漲，為佃戶提供的無息稻種貸款，使地主的貨幣損失更大——這些錢用到其他地方會有更大的好處。順便指出，正是由于這一原因，放高利貸成了交趾支那和下緬甸的地主最有利可圖的事情。“是佃戶就要遭受剝削，而對種稻者的剝削必有波動。”[[202]](#_202_32)一旦勞動力供應充足，地主雇用完全的季節工就沒有任何經濟意義，因為此時他們可以雇用日工或計件工，從而不必承擔雇工的任何福利責任。總之，慣例上的租佃和雇傭安排的機會成本大大增加了，地主們相應地廢除了這種安排，或者在市場條件下收回這方面的成本。地主沿著這一方向究竟行進多遠，不但取決于他自己同渴求土地的農民討價還價的力量，而且取決于國家對于背離傳統規范所激起的憤怒反應的壓制能力。

至此為止的論述可能給人們留下了這一印象：對于佃農和工人說來，生存保障的喪失，是一個漸進緩和的變革過程。但與其相反的說法可能更為正確：這種變革的傳播是在絕大部分同世界市場相聯系的一系列強烈沖擊中實現的。

歉收時安全保障安排的可靠性和價值只有在危機中才能得到充分檢驗，這具有農民所努力創造的安全保障的性質。在20世紀初的大部分年代，緬甸和越南的耕者一定明白，其保護人所提供的社會保障日益脆弱無力，但除非他需要堅持提出某種要求，他不知道這種脆弱無力究竟達到何種程度。只要新開辟地區保持開放，只要勞動力不足，就有許多生活出路，這意味著即便地主不履行保護義務，荒年也不至于造成多么大的災難。甚至當人口變化使得地主處于控制性地位時，保持強勢的經濟也能掩蓋和抑制農民失去保護所帶來的全部社會影響。20年代的情況基本上就是如此。生存保障在遭受侵蝕，但稻谷的高價、由此產生的農業勞動所得，以及不斷擴張的貿易、工業部門，有助于補償失去保護的損害。只是在大蕭條時期，由于所有這些機會都喪失殆盡，地主的剝削角色才非常突出。

1907年，發生了一次可以稱之為小規模預演的事件。那一年，起源于美國的信貸危機把緬甸和交趾支那的小業主卷了進去；由于先前的土地暴漲，這些人當時已經深深地陷入了債務之中。由于切蒂亞爾（來自印度南部的一個放債種姓）取消其貸款的抵押品贖回權，許多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成了佃農。這場預演也影響到了反抗的形式。“有人對我說，在［下緬甸］搶劫中興起的市場，其源頭可以追溯到1905—1910年，那時土地暴漲引起的崩潰使得許多人離開了自己的土地。”[[203]](#_203_32)在下緬甸從1900年到1920年期間所喪失的土地中，大多數是在這短短幾年間失去的。1908年越南發生的大規模農民抗稅事件，也是由這次信貸危機所造成的現金短缺激發起來的。

1907年的沖擊，給一些人帶來了巨大損害，也為1930年的動蕩作了些準備。每20公斤稻谷1929年曾經賣到1.40皮阿斯特，到了1931年僅賣得0.72皮阿斯特，1934年則賣得0.30皮阿斯特。這些稻谷價格上的變化，造成了土地占有凈收益的巨大損失。農業的現金成本和債務負擔越大，則損失越大。在交趾支那中部的古老省份，土地凈收益從1929年的每公頃34.30皮阿斯特跌落至1934年的4.60皮阿斯特。然而，在大量吸收貸款的外巴薩地區，凈收益從1929年的每公頃33.70皮阿斯特一直跌至1934年的1.80皮阿斯特。[[204]](#_204_32)

危機的沖擊波及社會結構的各個階層，每一個受害者都要盡可能地把損失轉移給比自己軟弱的團體或個人。由于20世紀20年代的持續繁榮而成為債權人的大地主，實際上一夜之間突然失去了大量財產，以致自殺事件在這個階級中并不鮮見。[[205]](#_205_32)在交趾支那和下緬甸的較大的受損害者中，自然包括負債的小土地所有者。[[206]](#_206_32)由于稻谷價格像從前一樣低，他們滿足不了自己的債權人的要求；而在其債權人方面，他們在經濟邊緣地帶活動，也不能滿足來自信貸金字塔上一層人對他們的要求。在交趾支那同在下緬甸幾乎同等重要的切蒂亞爾放債人，取消了抵押品贖回權，而成為本來并不想占有的土地的所有者。1930年，他們控制了伊洛瓦底三角洲6%的土地，而非農人員總共占有19%；1937年，他們擁有三角洲的25%的土地，而非農人員總共控制了足足50%。[[207]](#_207_32)在交趾支那，土地減少的比例幾乎與此相似。對于大部分占有少量土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從較為安全的生存狀態被迫淪落為佃農階級成員或者雇傭工人。得到殖民地政府支持的緊急信貸和議定的財產授予措施援救了許多大地主，但小土地所有者卻從未得到這種信貸。[[208]](#_208_32)

佃戶們也忍受著痛苦。大多數佃戶的農作物貸款都要以等值現金償付，而當稻谷價格暴跌時他們便償還不起了。雖然他們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土地，但是，當地主或債權人盡力壓榨時，他們就很可能失去其全部收獲物連同其存款和耕畜。“從1930年到1931年，格外眾多的佃戶失去了已經租種的土地”，加入到無地工人的行列；他們在伊洛瓦底三角洲四處徘徊，渴望找到活干。[[209]](#_209_32)甚至那些依然呆在同一塊地上的人，也難以指望得到任何信貸或生存資金，去爭取下一季作物的豐收。佃戶們只能依靠自己。他們的地主和債權人，遠遠談不上幫助他們，而是進一步迫使他們為了勉強生存而不顧一切地努力奮斗。

農業工人遭受的打擊最為沉重。由于經濟收縮，工人人數增加了，而供其競爭的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他們曾經在稻谷價格看好的市場的激勵下，一直耕種著勉強維持生存的土地；現在，他們的耕種工作消失了，農業部門以外的工作也消失了。一份關于20世紀30年代初期漢達瓦底的情況報告指出：“這個階級的人們受苦最大，正過著勉強糊口的不安定生活。”[[210]](#_210_32)根據R.桑瑟姆的統計，在交趾支那，雇工的五口之家的平均大米消費，從1929年的800公斤下降到1938年的267公斤。此類悲慘的統計數字足以說明問題。[[211]](#_211_30)

最為明顯的證據或許是出口數字，可以用來說明地主和債權人把沉重的負擔轉嫁給佃戶和工人的權力。在下緬甸和交趾支那兩地，蕭條時期的大米出口量實際上增長了。盡管每個地區的種稻面積減少了，但地主們為了彌補自己的損失，在國家的幫助之下，能夠從農村榨取更多的稻谷。結果是人均大米消費急劇下降。至于緬甸的情況，賓斯總結說，“在20世紀30年代，全體居民的人均大米消費低于20世紀20年代，但其間不存在任何社會的或職業的變化，可以使得人均大米消費的降低成為自然的和自愿的現象。”[[212]](#_212_30)他的關于全緬甸的統計數字表明，平均大米消費的降低幅度超過了10%，而下緬甸的降低幅度更為嚴重。越南的情況也是如此，大部分統計數字表明，那里的大米消費的惡化程度是交趾支那最為嚴重的。[[213]](#_213_30)

至少在交趾支那和下緬甸，事實上的饑餓情況是不多見的。通過盡量縮減開支，比如由吃米飯改為吃不太喜歡的食物，通過拒付地租以及盡量多拿些收獲物，大多數人活了下來。事實上，從動物所需的卡路里攝入量方面說來，下緬甸和交趾支那的耕者或許比上緬甸、安南和東京的同胞們要好得多。然而，在湄公河和伊洛瓦底三角洲，佃戶和地主之間的交換平衡已經變得明顯地有利于地主；特別嚴重的是，由于20年的結構變革而遭到削弱的對佃戶的基本需要的滿足——通過減免地租或者提供自由的信貸，現在又受到致命的打擊。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安南的農民所遇到的生存問題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生命，但那里的問題主要是稅收問題，而不是農村階級關系的大規模惡化問題。

對于這種在生存安全方面的沖擊，農民們盡其所能地進行了反抗。在交趾支那，他們拒絕支付對于自己的已被縮減了的資源的任何索要。“拒絕支付的真實精神席卷整個交趾支那鄉村。因為處于危機時期，人們不再還債、納稅了。”[[214]](#_214_30)佃戶們只支付自己愿意支付的東西或者什么都不予支付。有時候，他們拒絕支付的理由是正在危機階段，同時基于這一事實，即土地在某種程度上是被人通過合法的騙局、殖民地補助金或者拖欠貸款等手段，從他們那里偷走的。至于償付某些東西的人們，他們常常是在留下了維持家庭成員和牲畜的生存所需、付清下一季農作物的成本開銷之后，將剩余收獲物的一半交給地主。[[215]](#_215_30)“生存需要優先于對收獲物的其他任何勒索”，這一普遍信念在這里得到了再清楚不過的表達。

20世紀30年代初期，人們目睹了早先的土地制度所提供的經濟保障的少量殘余如何被剝奪殆盡。古老的土地制度決不是一種空想，并且必然地提供了較大的安全感。“只要年老的地主們還活著，他們就要保持父輩的傳統，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死去。他們的子孫后代不再遵循其古老的家族制習俗了；他們行使自己的權利，但忽視了自己的義務。”[[216]](#_216_30)在蕭條期爾虞我詐的金融界，地主們抓住一切機會，撈回在出租土地中所蒙受的損失。“他們對佃戶施加的壓力達到了最大程度。”“他們的行為否定了自己所宣稱的同佃戶的團結一致，否定了切實可行的雙方利益的互補。”[[217]](#_217_30)這里的重要問題在于，土地制度已經失去了對待佃戶的靈活性，因而失去了道義基礎。地主要求佃戶服從的脆弱主張一直依賴于對社會公正的最低要求的滿足，即為佃戶提供生存保護。一旦這種保護消失了，那么，自愿服從的最后殘余也就不見了。收租、收稅或者解雇不順從的佃戶，都需要具有不斷增長的強制手段。老佃戶同新雇來取而代之的新佃戶相互爭斗。當地主廢除租佃關系時，佃戶和勞工除了舉行正式的訴苦和抗議集會，還采取行動強占土地，拒絕離開。正如第五章將要談到的那樣，在不到一年之內，這種反抗便演變成了地區性暴動。

至于伊洛瓦底三角洲的緬甸農民的反應，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它的激烈程度更甚。當佃戶們強烈要求給予減租和其他讓步時，地主則雇用更多的農村流氓無產者專事收租。大量土地從緬甸的破產地主手里轉移到了他們的切蒂亞爾債權人手里，緬甸勞工和印度勞工之間對于日漸減少的工作機會的競爭十分激烈，這些事實為那里的暴力反抗提供了強烈的共同心理基礎。[[218]](#_218_28)緬甸的地主如果能取消欠切蒂亞爾的債務，他們就會得到好處；緬甸的水稻田經紀人如果能取代印度的經紀人，他們就會得到好處；緬甸的佃戶和勞工如果無須同印度對手競爭租佃機會或米廠、碼頭的工作機會，他們也會得到好處。暴力事件則在那些經濟混亂最為嚴重、同印度人的競爭最為激烈的地方——也就是在三角洲的東部和中部地區爆發。

反抗形式始終包括從偷盜、搶劫到頗有周密計劃的旨在革命的艱苦努力。在緬甸，競爭者和債權人常常是印度人這一事實，似乎為緬甸人的階級合作提供了起碼基礎——除此之外，這里所存在的問題同交趾支那的問題實質上是完全一樣的，諸如租地使用權的保障問題、危機時期的地租、債務和賦稅的減免問題，以及保障生存的貸款問題。

如果說交趾支那和下緬甸兩地區的農民實質上可以相提并論，這恰恰是因為早在30年代之前，這兩個地區同世界市場的結合，就在其社會歷史上產生了趨同現象。它們成了流向倫敦和巴黎銀行的金融動脈網絡上的毛細血管。作為毛細血管，它們的發展得到來自宗主國的大量流動資本的推動，而哺育其成長的金融中心的衰退，又最容易使它們受到嚴重危害。在這一意義上說，湄公河和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土地制度史，成了世界經濟史的地方性變體。[[219]](#_219_28)當然，它們仍然保留著自己的特色，但改變其居民生活的主要經濟事件發端于其他地方。與此相對照的是，在上緬甸、安南和東京這些傳統的心臟地區，雖然很難避免世界經濟的影響，但由于相對地獨立于世界經濟，所以仍保留著各自的某種自主性和內在動力。

市場一體化對農民生存保障的影響主要是，它把卷入市場之中的人們的經濟生活聯合起來、融為一體，并且第一次使社會保障有可能遭遇到比以前更大規模的損害。與此相對照的是，19世紀東南亞的保護人與委托人之間的關系因地區的不同而不同，并主要取決于地方性因素。因此，農民福利和交易地位的惡化，一般被歸因于諸如勞動力供給量、農作物虧損和戰爭等局部條件。然而，世界經濟的侵入穩步地消除了零散的生存經濟的地方特質。土地租佃條件在這家地主和那家地主之間越來越趨于一致，并且創造了一套新的共同經驗。

從根本上說，蕭條同莊稼歉收不是一回事了；農作物種植大約同以往一樣，但租佃或農業勞動方面存在的保障被取消了，對收獲物的索要更加殘酷無情了。社會精英不再履行農民的道義經濟要求于他們的義務了。如果不是處在市場經濟條件之中，此種階級契約的大規模崩潰是難以想像的事。

# 第四章 作為勒索者的政府

就殖民地制度而言，似乎沒有任何東西比賦稅更能激怒農民。在許多有農民參加的示威、請愿或起義中，很難發現不以賦稅負擔之重為突出申訴內容的。在1848年紅河三角洲洪災和糧食歉收之后以及在1908年一次世界信貸危機之后，對賦稅和勞役的大規模的抗議，震撼了印度支那的許多地方。[[220]](#_220_28)在1930—1931年間的數次暴動和1931年以義安蘇維埃與河靜蘇維埃知名的農村起義之前發生的大多數抗議活動，矛頭多半直接指向國家的賦稅征收。

在西班牙人和美國人統治下的菲律賓，從19世紀后期的科洛拉姆教派直至20世紀30年代薩克達爾起義領袖B.拉莫斯，一系列農民領袖利用了農民對建立一個沒有政府的農村世界的始終不渝的幻想——所謂沒有政府，即沒有賦稅。[[221]](#_221_28)在時運不濟的薩克達爾起義中被俘的許多農民和農村勞工，過于貧窮以致無從交納人頭稅。那次起義中的一位女英雄的丈夫，就是因為未能交納人頭稅而被投入監獄的。雖然這些領袖意在獨立，但是對民眾而言，獨立的主要意義就是終結賦稅。正如一位起義者所說：“獨立以后，我就不用納稅了。人頭稅見鬼去吧。”另一位起義者隨聲附和：“他們跟我講，獨立是個好東西，獨立后就不用交人頭稅了，或者交一個比塞塔就夠一份人頭稅了。”[[222]](#_222_28)這種幻想，是他們與東南亞殖民地中其他地方的農民所共有的。再往前推50年，在爪哇的茉莉芬行政區，農民也由于實質上相同的原因揭竿而起，這次起義被稱為普隆事件。一位起義者說道：“小民甚至穿不起褲子，因為他們的錢都被用于交稅了。”另一位起義者則說道：“我們要殺死荷蘭人，因為他們將賦稅強加于我們。”[[223]](#_223_28)這當然不是荷蘭人被迫對付抗稅起義的惟一情景。在如薩敏派的民間無政府主義、萬丹伊斯蘭兄弟會領袖許諾的宗教烏托邦以及20世紀20年代左翼的拉克賈特聯盟的農民追隨者想像的世俗天國等多種多樣的農民起義背景中，廢除賦稅都是一個中心目標。[[224]](#_224_28)

稅收和地租共同或分別構成傳統上積蓄農民怒火的孿生問題。它們過去是現在依然常常是對農民福利的主要的制度性威脅。在邊界市場和日益增長的出口市場協同改造農村階級關系的地方（如在中呂宋、下緬甸和交趾支那），農民運動往往膠著于地租、“豁免”和信貸一類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問題，而稅收日益成為一個次要問題。在約定俗成的互利互惠較為成功地經受市場力量進攻的地方（如在東京、安南和爪哇），稅收往往成為農民騷動的主要原因。稅制愈嚴苛，愈僵化，愈倒退，它所引發的潛在社會危險就愈大。

賦稅竟會周期性地激怒農民這一事實，幾乎不會令人吃驚。在離開農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興起之前，賦稅是取得農村勞動創造財富的主要途徑。由敵對者領導的抗稅起義的威脅或臣民邁開雙腳大規模移民的威脅，常常是殖民地時期之前東南亞君主們主要關注的事情。

然而，依照幾乎所有標準來看，賦稅作為一個普遍存在的農民問題，在殖民體制之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表明，殖民地政府的財政政策日益違反了以生存準則為特征的道義經濟學。

無疑，殖民地政府加在農民身上的平均負擔，大于先前本土政府加在農民身上的平均負擔。就農民的生存需要而言，殖民地政府不斷增加的人均賦稅定額，在表面上并沒有表現為咄咄逼人的征稅特征。殖民地賦稅的特色，與其說在于數額較高這一事實，毋寧說在于那些賦稅的性質，以及在其強加于民時令人不解的嚴酷。

最重要的是，極為沉重地壓在農民身上的賦稅都是些固定費用，與他們的支付能力或生存需要無關。越南所謂的人頭稅或緬甸所謂的人口稅，是囊括在倒退性財政措施中的終極稅種。它無論年景好壞，一律不加區別地落在窮人和富人的頭上，結果它對納稅家庭造成的實際負擔，在不同的季節猛烈波動。至于政府本身，卻可指望隨著人口增加獲得穩定收益。由于土地稅數額是依據每公頃土地年均產量估算的，因而幾乎是倒退性的。這樣，擁有100公頃土地的富有的地主盡管納稅絕對數多，但卻與僅有1公頃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一樣，按照同樣的平均比例交納其收成。稅率是固定的，不管某一季節土地的實際產出是多少，該筆都必須征收賦稅。如果莊稼減產一半，土地稅的負擔實際上就比豐收季節翻了一番。殖民地政權還制訂或“改進”了對諸如食鹽、酒精、木制品、船只、運銷以及出賣水牛等類項目的消費稅，形形色色，內容寬泛。即使這些產品或活動屬于維持日常生計的正常范圍，這樣的稅種也屬于對農民變化不定的收入的固定收費。

殖民地管理賦稅的方式，至少與這些賦稅的形式同樣重要。許多殖民地時代之前的賦稅，在原則上也是固定的；主要的區別在于，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沒有采取將其意志強加于民的辦法，而國王頒布的圣旨在其大臣傳布之時總要相當走樣。臣民逃亡，黑市規避國家壟斷，村莊編造虛假記錄并聲稱自己貧困；一個王國在強加其賦稅時愈是有力，其稅基流失就愈多。[[225]](#_225_28)

對于殖民地政權而言，命令走樣的程度則是愈來愈低。由于殖民地政權壟斷著現代武器和軍紀較為嚴明的常設軍隊，它擴展了自己的權力范圍并最終使邊緣地區感覺到了它的存在。與大多數傳統的統治者不同，它不必常常同以往可能蔑視傳統統治者的地區酋長達成妥協。

然而，殖民地統治機器的決定性優勢，既在于其長槍，也在于其文牘。想要追蹤殖民地政權發展的歷程，就要追蹤土地清冊、住區土地收益報告、人口普查、土地契約和證書的發放、身份證、納稅名冊和稅收款項等事物冷漠無情的發展歷程，以及一堆不斷擴充的規則和程序。征收稅款是此類活動主要目的。官方愈益纖細的網絡，將每一個居民、每一片土地、每一筆交易、每一項可以征稅的活動的情況，全都囊括進來并記錄在案。雖然這有可能夸大已經立足的殖民地政權官方觸角的范圍，但幾乎毫無疑問，它們與自己所取代的王國相比，庶幾沒有遺漏任何可供納稅人躲避的藏身之地。

殖民統治在鄉村的權力，精確地表現在以犧牲村民利益確保其收益的能力。至少到1930年為止，殖民地官僚體制和支撐這一體制的稅收，都表現出了一種或多或少穩步上升的趨勢。收成和農民收入的可變性大，政府對他們征斂的可變性小，而且前者幾乎總是遠遠大于后者。對個人稅務和地租的豁免比較罕見，而且即使豁免，其數額也往往僅占莊稼歉收或收入損失的一個很小的百分比。[[226]](#_226_28)甚至在1930年，當殖民地官僚最終被迫削減費用和勒緊褲帶之時，國家收入的緊縮與納稅公眾收入的緊縮相比也算不了什么。[[227]](#_227_28)在農民發現自己已經瀕臨絕境的時代和地區，任何賦稅都被看做是完全不正當的，更不要說重稅了。

最終，利維坦式的殖民地政體，似乎常常以其非常廣泛的賦稅激起某種歇斯底里。村民們發現，他們自古以來對森林及其產品的權利，突然莫名其妙地遭到了限制。他們享受自己對當地河流里的魚和森林里的獵物的權利，也需要納稅和獲得許可證。在有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越南，他們用自己的稻谷釀酒給自用的權利被收回，這就產生了國家壟斷。登記費、印花稅、沉重的食鹽稅、交易費和船只稅，使得殖民地政府的影響比傳統政府前所未有地深入到農民個人的生活之中。就森林與河流而言，殖民地政府似乎在向大自然的免費禮物征稅。它在什么地方才會適可而止呢？如果殖民地政府可以就木材和魚征稅，那么它為什么不能對房前屋后的香蕉樹、農民的衣服或他們呼吸的空氣征稅呢？1907年，越南東京自由學校的民主主義者之間流行的一首《亞洲民謠》，就捕捉到了當時的這種普遍存在的氣氛。這首民謠控訴了

牛稅，“哼豬”稅，食鹽稅，稻田稅，渡船稅，自行車稅或交通稅，謡醬稅或檳榔果稅，茶稅與藥稅，商業執照稅，水稅，燈稅，住房稅，寺廟稅，竹木稅，小販船只稅，油脂稅，油漆稅，大米蔬菜稅，棉花絲綢稅，鐵稅，魚稅，鳥稅，還有銅稅。[[228]](#_228_28)

似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免于征稅，而對于日后可能出現的稅種的歇斯底里，在地方起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爪哇的薩敏派在新的森林法規制約下深感痛苦，在他們中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埋葬死者，放水牛到河里沐浴，上路旅行，對這些事情，都要增征新稅了”[[229]](#_229_28)。一份在鎮壓緬甸沙耶山起義中奪得的預言性質的文獻，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不同形式的賦稅被強加到所有的土地上，事態幾乎發展到向家中花盆強行征稅的程度，直至緬甸無能為力。沒有一片土地不被征稅，甚至連森林也不放過。”[[230]](#_230_28)另一份起義中產生的文件宣告：“雖然有12種木材再加上一些珍貴的礦物從來就為緬甸人所用，他們現在卻被禁止拾取哪怕最小的木片，甚至連拾取牙簽或耳環那樣大小的木片也不行，對竹子和木材要強征特許使用費，而異教徒們對于這些事情處理得非常不公。”[[231]](#_231_28)雖然這些宣言有論戰的考慮，但它們觸動了農民的心弦并引起回應，卻是十分清楚的。面對已經顯得十分驚人的大量賦稅，農民很容易陷入恐慌。[[232]](#_232_28)

東南亞農民對殖民地政府財政慣例的體驗，在許多方面都可以與17和18世紀歐洲農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感覺類比。正如查爾斯·蒂利所說：“在16至19世紀歐洲國家立國期間，賦稅是引發大規模起義的惟一至為突出的問題。”[[233]](#_233_28)在每一種情況下，不斷增長著的中央權威，日益憑借行政和財政方面的種種要求，侵入到臣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從而產生了類似的結果。其中一個即使不是最重要也是最明顯的結果是，殖民政府財政稅收的擴展比率，超過了經濟增長率或人口增長率。迅速增長的公共工資總額，需要日益增大并且穩定的稅收來源，而在農業經濟背景之下，這意味著要從農業生產部門榨取所需要的一切。這種不斷增加的索取，有其自身的內在動力，對于農村是豐收還是饑荒不予考慮，并且多少有些漠不關心。如果廣泛歉收，使已經受到殘酷壓榨的農民的納稅能力削減80%，那么它肯定不可能以相似的數字削減中央政府人員及其預算。在這樣的情況下，理性的行政就難以想像。相反，即使政府的稅收重負及其對農村生活的后果，可能由于農村經濟的健康狀況而遽然波動，它在不能擴大自己對社會的稅收之時，則力圖穩定其數額。當然，這一訣竅的魔法在于，國家機器的規模，要恰如其分到精確的程度，使之能夠在犧牲臣民利益的情況下與其年度預算相符。當然，做到這一點不會沒有困難。

此外，新政府是一種官僚政府。這就是說，它愈益通過可由自己的代理人全面推行的規則、條例和法律而運作。創立中央政府就意味著，將支離破碎的地方風俗和程序統一起來，形成一個更為同質的整體。羅蘭·穆尼耶在解釋17世紀法國農村起義時認為，違反獨立公正的地方傳統，是一個主要的促成因素。“通過王室征稅，人們得以最為直接地認識到現代國家，它將一切集中起來，并使一切歸于平等劃一。”[[234]](#_234_28)統一行政的邏輯，在17世紀的法國，就如同在殖民地時期的東南亞一樣，意味著收稅官在強制推行土地稅收制時往往無視地方莊稼歉收的事實。這就意味著，在推行一種全國性的土地管理使用模式時，許多約定俗成的有關土地和森林使用的權利被一掃而光。這就意味著，為了創立一種統一的土地分類方法，土壤肥瘦和種植模式的微小但重要的差異被忽視了，而這樣做對于達到評估目的卻較為簡單。

新政府不僅更為龐大，而且更為官僚化，同時它還是中央集權的。在一種較為封建的制度下，地方酋長雖然可能極為變化無常，但卻有意關注人們的意見，并將賦稅調整到適應臣民支付能力的程度。只要他們的地方政權還依賴自己在沖突發生時召集必要人力的能力，他們就會認為，避免過度征稅，不使自己的國土成為潛在對手的募兵基地，才算深謀遠慮。然而，殖民地中央政府的新的代理人，卻根本無意維系當地民心。他們的沉浮，取決于他們取悅上級官僚的本領，而不是他們保護當地民眾的能力。特別是在稅收問題上，中央政府對其代理人的滿意程度，往往直接因他們提交的款項多寡而異；取悅中央，意味著壓榨地方民眾，只要不激起民變就行。

在17世紀的法國就如同在殖民地時期的東南亞一樣，中央政府的新的財政要求和施政方法，導致了大量的農民反抗和起義。在谷物產量特別容易受到變幻無常的天氣影響的地區，反抗最為頑強。正是在這樣的地區，政府毫不通融的財政聚斂逼得農民走投無路。已經發生的農民運動，就是“對政府的反抗”。[[235]](#_235_28)在諾曼底發生的讓·尼皮埃德起義中，起義者號召取消食鹽稅以及其他新的稅種并恢復亨利四世時的較為寬松的財政制度。[[236]](#_236_28)起義的直接目標是新秩序的寵兒——稅務壟斷者、政府官員及其地方合作者，而且他們幾乎總是能夠焚毀賦稅名冊和記錄，他們當然知道，這些東西是新秩序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歐洲和東南亞的新政府，都盡可能快地從實物賦稅和勞役賦稅轉向現金賦稅。在一個大體上依然屬于自給經濟范疇的國家，對現金的要求給人們強加了新的苦難；它迫使農民種植經濟作物或走向勞務市場。經濟學家們和人類學家們所謂的第三世界的“現金饑餓”，多半來源于殖民地時期的財政政策。阿爾當聲稱，歐洲的賦稅起義，通常興起于那些未能足量銷售物產以完成其賦稅義務的社區。[[237]](#_237_28)由于“農民沒有能力找到錢納稅交租從而陷入困境”，印度尼西亞的一些抗稅運動發展起來。[[238]](#_238_28)例如，1924年在雅加達附近文登地區發生的賦稅抗議活動中，人們“普遍不滿的是，錢難掙，手里錢少。”[[239]](#_239_28)當然，殖民地政權接受現金而非實物或勞役是極為明智的，但在自給生產地區，在市場低迷或作物歉收之后，現金短缺會極大地加重農民的稅務負擔。

如果從上層看，這樣的農民抗稅起義隱約有一種陳舊的風氣。歸根結底，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現代政府的財政大廈。他們所憧憬的，基本上是一個地方自治政府和一個沒有賦稅的世界。然而，如果從下層看，新的賦稅，幾乎或根本沒有注意到地方情勢以及這些賦稅年復一年所體現的不斷上下波動的實際負擔，農民起義表現了對這些賦稅要求的自然而然的抵抗。簡而言之，這些起義，體現了對農民及其小社區希冀過一種穩定生活的愿望的辯護，以及對新政府力圖從其臣民榨取可靠并且日漸增多的收益的不滿。

農民與近代政府的對抗，如果說在不同的地方有所區別的話，那么它在東南亞造成的創傷比在西歐更令人難忘。在歐洲，將政府強加給農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在東南亞，大多數人口眾多的低地是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歸屬殖民地政府的統治之下的。由于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屏障而與當地民眾隔開的殖民地官員，在對待地方風土人情方面，甚至要比法國封建王朝時期的省長還要無動于衷。他們強加的賦稅和采取的行政形式，盡管是從宗主國（至于英國人，則是從印度）搬來的，但對于他們統治的民眾來說，卻不那么容易接受。

就緬甸與越南的情況而言，殖民地賦稅制度對農民經濟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將在下面予以論述。由于這一制度潛在的爆炸性直至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蕭條期間才被認識到，所以有必要以一節簡短的文字對那一時期予以說明。

## 緬甸

人頭稅

人頭稅幾乎說不上是殖民地政府的財政發明。以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出現的這一稅種，也是前殖民地時期的諸多王國的一項傳統發明，新穎的是其應用方式及其徹底性。在尚未實行土地稅收制的上緬甸，每個村莊都被征收一種戶頭稅。首先評估一片村莊地段上非農業收入的數額，然后以這片地段上的家庭數目除以這一數字，以求出一個標準稅額。這樣，盡管平均稅額是8盧比或9盧比，但每個家庭的稅額卻因村而異（2—12盧比）。雖然難以完全肯定，但這一數額對耕者造成的負擔，很可能大于他們在殖民地時期之前的賦稅負擔。[[240]](#_240_28)在殖民地統治初期，鑒于上緬甸經濟具有封閉自給的特性，獲得必需的現金特別困難。從理論上講，允許一個村莊依照自己的方式征收到期的款項并對赤貧戶網開一面的規定，使這一制度多少有些靈活性。然而，在實踐中，檢查其運行情況的政府委員會發現，該稅征收既有徹底的一面，也有倒退的一面。[[241]](#_241_28)

下緬甸的人口稅更為直截了當。這是一種固定的以盧比交納的個人稅。由于它并不因人而異，因村而異，因而尤其具有倒退性。在年景極佳時，它對現金來源不多且不牢靠的佃農和勞工構成特別嚴重的壓力。在作物歉收之后，或在工資或就業率下降之后，它可能對消費需要構成直接威脅。

人頭稅造成的平均負擔——人頭稅體現了平均凈收入的百分比——盡管可能一直都是沉重的，但卻不能解釋它何以竟會激起強烈的民怨和暴力。它所引發的仇恨，與它對殖民地歲入的相對重要性相比是不相稱的。例如，作為一種財政手段，它所產生的效益不足土地稅數額的三分之一，而在1925至1926年度，它的全部所得僅相當于殖民地收入總額的5%。[[242]](#_242_28)然而，從1915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反人頭稅一直是大眾民族主義騷動的中心問題。取消這些稅種，是沙耶山的迦盧荼黨在1930年起義中第一位的而且似乎最得民心的要求。“許多證言表明，沙耶山及其副官在致力于鼓動鄉村公開起義時，煞費苦心地利用了對賦稅的普遍不滿，特別是對人頭稅和戶頭稅的不滿。”[[243]](#_243_28)這一問題大約不是由沙耶山無中生有造出來的；他可能在赴佛教協會總理事會的旅程中發現，人頭稅受到了農民們的極度憎惡。

我認為，人頭稅激起農民狂怒的原因在于，征稅時的嚴酷及其“對窮人造成的壓力重于富人”這一事實。[[244]](#_244_28)而且，在執行過程中，極度無視農業豐歉波動周期，以致人頭稅造成的凈負荷比原先的設想重得多。收稅在4月至10月之間進行，也就是在主要收成之前，而且往往恰巧在農民缺乏現金和稻米的時期。足有三分之二的納稅人被迫向私人借貸現金，然后在收獲之后的某一日期以同等價值的稻谷償還貸款，而在收獲之后，米價相對較低。實際上，貸款之值約合5籮稻谷（1923年前后）。由于一籮稻谷（9—10加侖）足夠一個四口農家生活21天，這筆貸款的實際代價對于這戶農家來說就相當于三個月有余的主食供應總量。[[245]](#_245_28)這種向農民索取固定賦稅的時間安排，在對農民的常規生活構成最大威脅的同時，對于激起民憤也干系極大。

如果將這些賦稅帶來的收入與作物收益的巨大波動相比，那么就可能對這些賦稅給農民生存造成的沖擊有所領悟。根據一些不完全的數據，人頭稅收入在1930年之前似乎一直隨著人口的增加而穩定擴展，而且在嚴重歉收之后也很少有回落超過2—3%的時候。[[246]](#_246_28)另一方面，收益差額變化很大，范圍從下緬甸的至少10—20%直至上緬甸干旱地帶的高得多的數字。此外，這樣的平均數字，往往在至少兩個方面不能充分說明人頭稅給農民造成的負擔。首先，平均20%的作物收益波動，掩蓋了個體農民或某些地區收入的巨大波動。為了便于實施，人頭稅并不在意支付能力的這種差異。其次，一定要想到，對于瀕臨極限的農民，20%的收益損失可能嚴重威脅到他們的土地租賃和他們的生存。在這種情況下，賦稅就不僅僅是又增加了20%的負擔，而是嚴重威脅到維系家庭生計的關鍵所在。

這里牽涉到的實質上是數量與質量的差異，換言之，就是個臨界問題。正如盧卡奇在另一個背景之下所說的：“以其計算目標的數量決定因素形式出現在資本家（或政府）面前的剝削數量差異，在工人（農民）面前一定呈現為對其整個肉體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存在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數量范疇。”[[247]](#_247_28)如果從殖民地首府預算處的角度看，賦稅從5盧比增加到6盧比就相當于將納稅人的義務增加了20%。然而，如果照納稅人的觀點看，一年交納5盧比，還可以讓一個家庭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但在一個家庭業已經歷一個兇年之后，再向其多收一個盧比就等于奪去其5盧比，那你就可能將這個家庭從社會懸崖上推下，令其萬劫不復。

另外一種對人頭稅造成的壓力的衡量辦法，就是將這些人頭稅與佃農和勞工的實際現金資源進行比較。雖然沒有直接的數字，但是在1911至1914年與1923至1926年之間，魚醬、咸魚、牛奶和食糖一類主要消費品的人均消費實際下降這一事實說明，可支配現金資源在減少。[[248]](#_248_28)如果情況確實如此，并且符合弗尼瓦爾及其他人關于農民日趨貧困的說法，這就表明，遠在1930年之前，人頭稅造成的實際負擔就一直在增加之中。

對于殖民地政府而言，人口稅具有一種簡單易行的迷人魅力。評估是自動進行的，不需要管理。這當然意味著，一定量的腐敗，即試圖賦予地方官員自行斟酌實行累進所得稅的權力之后無可避免地出現的腐敗，得以避免。人口稅還有進一步的優點，即收入是穩定的，而且按照與人口的直接比例增長。人口稅的效果和意圖，在于使官僚主義的中央免受農村經濟波動的影響。然而，就生存保障而言，這是可以想像出來的最為苛重的征稅形式。在作物歉收、物價疲軟和就業衰退之后，農民反抗人頭稅的性質，可以從征收該稅所需施加的壓力水平不斷增加這一點判斷出來，也可以從該稅為農民所深惡痛絕這一點判斷出來。

土地歲入

緬甸的土地稅收制度，就如同人口稅一樣，為政府提供了穩定的財政收入優勢。當農民被要求為政府的財政保險承擔責任之時，他們自己的經濟風險被再次增大。

當住區官員緩慢穿行緬甸之時，他們根據土地的質量、對平均產量的估計以及估產之前作物的平均價格，將固定年度土地稅率確定下來。評估每隔15至20年進行一次。其結果就是，緬甸境內每一英畝耕地都有自己固定的稅額——一種歲入收益遠比作物產量可靠的稅種。

固定數額最顯著的受害者，自然是伊洛瓦底三角洲北部和上緬甸的小土地所有者。如果農民在歉收或物價低落之后二至三年間不履行納稅義務，負責地區稅收的官員就會剝奪并拍賣他們的土地。由于大地主能夠不斷將新增的稅額大部分轉嫁給自己的佃戶和勞工，所以這種賦稅造成的沖擊并不限于小土地所有者。事實上，隨著每次土地稅率的向上修正而來的補償性地租增加，似乎是正常的。然而，沒有土地的佃農和勞工，盡管可能在事實上交納土地稅，但他們卻是通過地主納稅的，于是地主自然成為他們的怒火的最直接目標。這可以說明土地稅收問題從未像人頭稅那樣引發幾乎同樣程度的怒火的原因；人頭稅雖然僅構成殖民地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對所有的貧苦農民造成的打擊幾乎是同樣的。

土地稅是對農民的實質性收費。住區官員一般推算，土地稅率約占農民總收入的10%，或他們的凈收入（總收入減去生產成本，后者包括家庭勞動的估算價值在內）的25%乃至40%。這樣的平均數字，通常使人產生誤解，因為實際收稅數字因住區乃至地塊都大不相同。此類不平等現象，是政府為了便于行政而只確立少數土地類別所造成的合乎邏輯的結果，而每一類土地的地力其實還存在重大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出現重要變化。由于土地稅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據當時的米價確定的，它們所造成的實際負擔，會在估產日期之后根據價格趨勢發生變化。

從理論上講，土地稅與人頭稅相比，較少具有倒退性。因為它是一種依據土地單位而非人口征收的稅種，擁有十英畝土地的人所納之稅，是僅擁有一英畝土地的人所納之稅的十倍。然而，只要大土地所有者將土地分租給小佃農，并能夠從他們身上獲得土地稅補償，土地稅的所謂累進就是虛構的。

土地稅在三個方面威脅著邊際小土地所有者。首先，假定產量是穩定的，20%這樣比例的稅收對他們的生計的威脅，遠遠大于對大土地所有者的威脅。至于只有小塊土地和（或）龐大家庭的農民，土地稅可能意味著繼續做一個獨立的耕者還是墮入佃農或勞工階層之間的差異。然而，雖然土地稅以英畝為單位，土地稅是固定的這一事實卻極為重要。除了少數例外，土地稅的管理是盲目的，對于全國各地年度產量的巨大差異視而不見。這種差異對于大土地所有者可能不是一場災難，但一個幾乎絕產的小土地所有者，可能就沒有任何利潤用以支付地租。于是，在實踐中，土地稅往往逐年遞減，“當農民的收入減少時，他們的收入中被用以交納地租的比例卻要增加”。[[249]](#_249_28)雖然從政府的觀點看，土地稅的負擔可能是固定的，但它對農民的影響卻不太一致。

從理論上講，在普遍歉收之后，豁免一部分土地稅乃是醫治這些不平等現象的一劑良藥。在實踐中，豁免稅務卻不能給需要最切的人帶來多少慰藉。小農不懂申請程序，而且行動遲緩，因而獲準豁免稅務的機緣極為稀少。[[250]](#_250_28)一位可能不像當地農民那樣由于自身與稅務官之間的社會距離而舉步維艱的英國人抱怨道，申請稅務豁免耗費的時間和金錢，比他在自己的申請被最終批準之后的獲益還要多。[[251]](#_251_28)事實上，有證據表明，下緬甸的稅務官，一直未能在一塊估定土地完全絕產的季節里執行有關全部豁免土地稅的規定。[[252]](#_252_28)除了咄咄逼人的行政障礙之外，即使得到批準，豁免數額也往往低于作物的實際損失。在1937—1938年這一個遭災年度，由于后期無雨，下緬甸的作物損失接近40%，而土地稅的豁免數額僅相當于11%。[[253]](#_253_28)如果有一個關注農民生存需要的賦稅制度，它就會逆轉申請豁免土地稅的有關程序；就會批準一個遠遠高于作物損失比例的豁免數額，以補償耕者急劇降低的支付能力。

最后，稅率給小土地所有者造成的實際負擔，會隨著稻谷價格和信貸的多寡及其代價的變化而變化，就如同它會隨著作物實際產量的變化而變化那樣。稻谷的價格降得愈低，收獲中不得不被賣掉以交納年度稅款的部分就愈大。一位前住區官員早在1922年就簡潔地解釋道：“物價總水平的波動，近年來已進一步成為一個突然推翻住區基礎數據的因素。”[[254]](#_254_28)許多最為熟悉農民問題的官員建議轉向年度所得稅，這樣才能單純依據他們的實際收獲的真實價值來對他們做出評估。

這樣做（轉向所得稅）的必要性，約產生于33年之前（1911年前后），但物價的穩步上升掩蓋了困難的威脅。這種制度在稅率低至每英畝2盧比時運行極為良好；但現在許多地區的稅率是7盧比或8盧比。土地稅帶來了穩定增長的歲入，在兇年也并不嚴重下滑，因而無疑受到高度評價。然而，時代現在已經大變。物價現在即使在同一個季節也可發生猛烈波動。[[255]](#_255_28)

上面這一評價，清楚地表明了轉向所得稅的動議在整個殖民地時期受到抵制的原因。轉向所得稅就需要殖民地政府承受經濟波動造成的負擔，保證它的索取不至于使農民的生存無以為繼。然而，政府偏要倒行逆施，以使自己能夠隨心所欲。

這一政策的后果，極大地促成了緬甸小土地所有者階層的破產。1908年，在世界信貸危機之后，許多小土地所有者拖欠稅款和債務，失去了自己的土地。20世紀30年代初，悲劇以極其巨大的規模再現，甚至大金融家也不能支付落入他們手中的土地應交的稅款。成千上萬的耕者在世界經濟危機時代的悲慘毀滅表明，殖民地財政政策已經全面地破壞了邊際小土地所有者業已脆弱的地位。它在小土地所有者家庭預算支出欄中生產成本和家庭消費需要之外，添加了固定的人頭稅數額和土地稅額。[[256]](#_256_28)僅僅為了持平，農民需要更多地種植。他們本來可以勉強度過的情況較糟的年頭，現在倒很可能讓他們失去自己的土地。在干旱、洪水、蟲害和植物病這些業已嚴重的風險之外，殖民地經濟又添加了物價波動和信貸危機。按照托尼的精當的隱喻，仿佛殖民地政府已經發現小農水深及頸，隨后首先以其賦稅政策進而將水平線恰巧提高至他們的鼻下，然后又通過將他們與現金經濟結為一體，使波浪洶涌而起直至將他們淹死。

人頭稅和固定的土地評估數額造成的不平等狀況盡管已經得到人們廣泛的認識，但卻繼續得到推行。盡管執行這些稅種需要增加警力和強制，它們卻有利于殖民地政府的預算，但它們對于農民則是毀滅性的。在作物歉收之后，特別是在上緬甸，即使名義土地稅也難于征收。在人口稅到期之前，輕微犯罪和抗議日益成為家常便飯，拖欠稅款的現象倍增。只要米價保持上漲，工作機會眾多，這些困難就不會對殖民地秩序構成嚴重威脅。然而，我們在后面會看到，從1930年起，殖民政府的預算與農戶預算之間的沖突變得不可調和。

## 越南

在一個早已以抗稅起義和抗議活動的悠久傳統為榮的國家，[[257]](#_257_28)法國財政制度的強制推行造成了全新的負擔，引起了相應的反抗。其基本模式與緬甸模式非常相似。一個擁有遠比其所取代的傳統政權發達的行政能力和官僚勢力范圍的殖民地政權，為了一個不斷增長的行政系統的財政需要而向農業經濟榨取稅款。要說有什么區別的話，殖民地政府給越南農民造成的后果，甚至比給緬甸農民造成的后果更為惡劣。法國人可能并不比英國人更多地奪取農民收入的份額，但他們卻掠奪比上緬甸的農民更接近饑荒線的大量農民，特別是安南和東京地區的農民。此外，越南的稅務管理似乎比緬甸更加腐敗和變化無常。[[258]](#_258_28)豁免土地稅和人頭稅的情況則更為罕見。最終，出現了許多消費稅和壟斷經營，這也許是由于比起自由的英格蘭來，法蘭西具有較強的中央集權的財政傳統，這就給農民消費者強加了額外的負擔。最終結果是，使殖民地賦稅成為越南農民的一個比緬甸農民更加異乎尋常的重要問題。

毫無疑問，殖民地政權的財政要求，遠高于過去越南宮廷的財政要求。吳永隆對殖民地時期之前和殖民地時期賦稅的細致對比表明，19世紀嘉隆和明命統治之下的人頭稅和土地稅，為人均每公頃稻谷產量的3%至5.5%，而1937年的殖民地政府則征收16%至18%。[[259]](#_259_28)在1888—1896年這八年間，殖民地政權提高賦稅情況如下：在冊村民的人頭稅從14生丁增加到40生丁；對于非在冊者的人頭稅從零增加到40生丁；稻田稅增加了50%；間接稅翻了一番。[[260]](#_260_28)奧斯本在歸納了交趾支那的證據之后斷言：“所有的評論家一致認為，法國人代替越南人之后，使農村人口的稅務負擔增加了。”[[261]](#_261_28)

增長中的稅務負擔的精確幅度是難于確定的。知道它們大量增加，知道它們的增長并沒有得到農民納稅能力的提高這樣的補償，對于達到我們的目的就足夠了。事實上，絕大部分證據表明的情況恰恰相反：人均大米消費從1913年起，特別是在東京和安南，一直趨于下降。[[262]](#_262_28)這樣，農民就陷于普遍上升的賦稅要求和不斷下降的支付能力的鉗制之中。

然而，就像在緬甸一樣，關注平均數往往會迷失越南農民賦稅的主要特點。首先，可惜農民得不到平均收入以交納自己的年度稅款。因此，判斷一個稅種多么令人難以容忍，并不是一個抽象問題，而是無可避免地與它在一個特定年份迫使農民作出的犧牲有關。下面這首越南流行歌曲有力地說明了這種聯系。

洪水過后，田野無生機，

滿目荒涼，令人心恐懼。

甘蔗全枯萎了。

畝產不過兩小籮米，

可是政府對此全不顧及。

稅率愈來愈高了，

稅負愈來愈重了。[[263]](#_263_28)

要問固定土地稅對農民的壓力有多么沉重，等于問他們的飯食供應有多大變化——這是個每年都要提出來的問題。東京農民和安南農民的生活瀕于困境但卻必須交納大筆賦稅這一事實，為我們所謂的沖突趨勢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實際的沖突，大體上是由作物產量、價格以及信貸多寡的波動這一類因素引起的，這就使政府的賦稅（或地主的地租）要求與農民的家庭生計形成對照。

人頭稅

對于越南三個地區中的每一個地區來說，人頭稅的數量略有不同，而且在每一個地區都與時提高。[[264]](#_264_28)在東京地區，從村莊名冊看，成年男子的稅額從0.5皮阿斯特上升到2.5皮阿斯特，而以前未被征稅的人則須交納0.4皮阿斯特。到1920年時，除了殖民政府的雇員之外，所有男性公民每年均為2.5皮阿斯特。到1928年時，安南的該項稅收也是所有成年男子均為2.5皮阿斯特。1937年，在一次稅務修訂之后，東京地區的稅額似乎略高于4皮阿斯特，在安南為3.95皮阿斯特，而在交趾支那則為4.50皮阿斯特。至于在緬甸，稅款則在某一固定日期之前以現金交納。

除非與實際收入聯系起來，否則上面這些現金數字自然不能告訴我們許多有關人頭稅的信息。吳永隆依據1937年稻谷價格數字、平均租佃規模和平均產量，估計該稅至少收去東京地區和安南的收益分成佃農以及小土地所有者的凈收入的20%，收去交趾支那發現的較大佃戶租后收入的10%。[[265]](#_265_28)這一負擔顯然很重，但這些數字作為平均數似乎言過其實。[[266]](#_266_28)然而，重要的是，“平均負擔”這一概念同樣只能告訴我們比較少的東西。再比方說，人頭稅相當于一座固定的經濟沙洲，家庭經濟之舟不得不繞它而行；如果水位由于高物價和好收成而高漲，它構不成大的障礙；然而，如果水位低，它就可能完全阻斷航道。在低水位年代，當這座沙洲可能突出于水面之時，正在耗散的政治利益就會與它遭遇。從這種意義上講，水位變化幅度比任何平均數字都更加重要。

與人頭稅幅度一樣重要的是，它以前所未有的廣泛性強加于人。傳統制度中的靈活性，主要在于村莊隱瞞人口從而減少賦稅義務的能力。當法國人接管安南和東京之時，大多數村莊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子沒有被列入賦稅名冊之中。[[267]](#_267_28)近代殖民地政府、人口普查和村莊代理人的引入，逐漸將這一行政自由削減到微不足道的地步。[[268]](#_268_28)這在許多情況下意味著，相當比例的農村窮人首次被政府有效征稅。法國人在各種場合要求人們將人頭稅收據作為一種個人身份證明拿出，遂使村民逃稅日益困難。

村級殖民地政權不僅確保了對人頭稅的征收，而且確保了超收。在殖民地國家機器的支持下，地方顯貴頻繁超額收稅，并以差額中飽私囊。地方官員的貪婪一直是一種行政弊病——“我們掌握的所有情報始終都在強調他們（顯貴和高官）的殘酷與腐敗”[[269]](#_269_28)，濫用職權成為常態。匯寄稅款截止日期的前一周，有時就是一個赤裸裸的恐怖時期。個人物品被搶走并被當場拍賣，抗拒者遭到毆打，而其他人則被投入監獄，直至其家人前來納稅。[[270]](#_270_28)高官顯貴沒有任何道理的盤剝，在大眾文化中留下了大量痛苦的情緒，下面的民歌表明了這一點。

住房里，廚房里，

他們到處洗劫，

他們拿走所有大大小小的籮筐，

他們倒空所有或巨或微的壇罐……

對于既沒有水牛也沒有黃牛的人，

他們甚至連鐮刀和鈍廚刀也都奪走。[[271]](#_271_28)

高官本身與其說被看成是政府代理人，毋寧說被看成是搶劫者。

我親愛的孩子們呀，記住這一格言吧：

黑夜巧取是強盜，

白天豪奪乃官家。[[272]](#_272_28)

要想猜測出過度征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但過度征稅這一做法傳播廣泛，其負擔沉重地壓在質樸的村民身上，他們鳴冤叫屈也往往不會被高層聽到。

雖然絕對地說來人頭稅對于交趾支那農民稍微高些，但它對于東京或安南的貧苦農民來說就遠不止是生存威脅，對于他們來說，甚至一筆小稅款也能夠激發一場家庭金融危機。在安南，這一問題更為嚴重。總的來說，安南人不僅是越南最貧窮的農民，而且由于他們更多地依賴降雨，他們的產量是全國最為變化不定的。因此，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每當安南或東京歉收（后者發生此種情況略少）使納稅的人力成本提高到令人痛苦的水平之時，危機幾乎是可以預言的。

土地稅

越南的土地稅形式同緬甸類似。這就是說，它是一種固定稅，每年都根據土壤分類評估每公頃土地的稅額，同時它也造成了同樣的不平等狀況，它在兇年征斂更多，而且從邊際小土地所有者榨取的比例與大土地所有者一樣高。同在緬甸一樣，該稅的征收手段日益嚴酷。隨著為編制土地清冊而進行的測量工作的迅速推進，各處的小片土地被遺漏的可能性愈來愈小。最后，在緬甸本不充分的稅務豁免，在越南就更加罕見。即使農作物完全絕產，似乎也要毫不寬容地征收土地稅。[[273]](#_273_28)

吳永隆按照平均產量數字推算，估計在越南全國，土地稅約相當于每公頃產量的10%。[[274]](#_274_27)因此，該稅極大地減少了多數土地遠遠不夠一公頃的東京或安南小土地所有者的生存資金，情況比該稅對交趾支那擁有3—5公頃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們的收入造成的侵害嚴重得多。在安南災年頻繁，而在災年，許多村民似乎被迫放棄自己的小塊村地，以交納積欠稅款并在附近的種植園尋找差事。[[275]](#_275_27)越南小說家黃島描述了這一過程：

于是，在歉收的歲月，小土地所有者——他們構成有地人口的大多數——被迫以很低的價格賣掉自己的土地。結果是，以高利放債的富人，逐漸將村莊里的所有土地都據為己有。[[276]](#_276_27)

酒和食鹽的專賣權

米酒在越南農民消費模式中的地位，可與啤酒在英國工人階級生活中的作用相提并論。米酒是一種主要消費品，而大多數家庭或是用自己的一部分收成自釀米酒，或是向鄰近專門釀制米酒的村民購買相當數量的米酒，后一種情況更為可能。除了社交和營養意義外，米酒也是許多禮儀性慶祝場合的主要用品。

因此，法國人在越南對酒的專營和稅收，就成了對一種地方主要消費品的固定收費。由于實行生產許可證制，許多越南釀酒者被迫歇業，于是大部分釀酒者成了法國人和華人。1900年之后不久，由于殖民地當局以固定價格向擁有許可證的釀酒者收購產品（通過華人零售商）并將其賣給公眾，米酒銷售權被集中起來，價格上升幅度巨大。[[277]](#_277_27)在被征服時期，一升米酒的價格約為5至6生丁，而到1906年時就成了29生丁。然而，用財政術語說，價格飚升并沒有使歲入出現同比增長。可以肯定，這一矛盾現象是由活躍的黑市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消費有任何減少，黑市攫取了新產生的利潤。殖民地官員決心增加呆滯的銷售款項，于是強化了對非法酒廠的搜查并向地方告密者頒發巨額獎賞。與此同時，他們想出強制銷售這一巧妙的招數，要求每個地方按照官員設想的標準消費模式購買相應數量的米酒。這樣，從酒類專賣所得的稅收就得到保證，并且能夠隨著價格上漲或人口增加而擴大。

對酒類專賣權的違抗廣泛蔓延，并且似乎獲得“民眾普遍的配合”。[[278]](#_278_27)這種違抗的根源，不僅在于壟斷價格造成的重負，而且在于這種對傳統權利的侵害激起的民怨。如同賓夕法尼亞農場主在被褫奪用自產玉米釀酒的權利之后發動“威士忌酒反抗運動”一樣，越南人對于不得不為一種在他們看來質量低于他們能夠在當地自釀的酒類產品交納強加的價款而義憤填膺。[[279]](#_279_27)阻擋政府壟斷和從傳統供應商手中購物，是普遍的傳統做法。酒類專賣令小土地所有者尤為不快，因為這在實際上等于在土地稅之外又對他們生產的稻谷二次征稅。這對于釀制米酒的富裕的手藝人階層而言，自然是更為沉重的打擊，因為這或者使他們喪失生計來源，或者使他們面臨罰款和監禁。

實行不受歡迎的米酒專賣本身與其原則一樣令人憤怒。財政檢察員和告密者走遍鄉村，屢屢成功地搜索到非法釀酒者。在村民看來完全沒有越權的違法者，被投入監獄或被迫交納足以令其破產的罰款。吳永隆引證了東京清化的一個小村的案例，該村居民在無法籌措因當地釀酒而強加的罰款時，全部稻田都被沒收和賣掉。[[280]](#_280_27)由于違反專賣權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對該權利的行使往往反復無常或根據地方官員的動機而具有選擇性。訴訟每每似乎直指村內的宗派敵人，而與占統治地位的上層人士勾結的人物則根本不受觸動。[[281]](#_281_27)對于農民來說，米酒專賣既是一種新的和固定的經濟負擔，又是對自己天賦權利的限制，同時也是地方官員手中的一種無所顧忌的工具。

如同在緬甸一樣，許可證制和壟斷價格，也推及食鹽的生產和銷售。鑒于食鹽在東南亞飲食中的重要地位，價格增加意味著一種新的沉重負擔。在那種極其炎熱的氣候條件下，食鹽不僅對于補充每天的正常耗損是必要的，而且還是干魚保藏和發酵辛辣調味品（越南謂之nuoc-mam，緬甸謂之ngapi）的一個要素，它們構成了當地日常飲食中的主要成分。

在許多地區，強加專賣權意味著切斷了當地人在住區附近的非常廉價的貨物來源。他們發現，食鹽價格在1892年至1907年期間幾乎增加了5倍。雖然存在如同米酒一樣的食鹽黑市，但這僅能為主要稻產區的農民提供有限而零星的接濟。可以肯定的是，用于食鹽方面的花費在村民中激起了極大怨恨，如同與之相應的法國聲名狼藉的食鹽稅數世紀之前在法國農民中激起強烈怨恨那樣。

就對農民家庭費用的影響而言，食鹽稅實際上是另一種人頭稅。[[282]](#_282_27)這就是說，由于家庭一年的食鹽消費量比其米酒消費量更加缺少彈性，因此即使價錢提高了，消費量也不會明顯縮減；于是食鹽稅成了一筆針對農民起伏不定的收入的固定收費。[[283]](#_283_27)

征兆

遠在1930年真正的革命爆發之前，無論以傳統的向高官請愿的形式還是以襲擊稅務官員的形式進行的賦稅抗議活動，都似乎已成為處于農業社會的越南的一個持久不變的特征。[[284]](#_284_27)在歉收之后，或在官員特別貪婪的村莊，都可以預料會出現這一類抗議活動。因此，隨1907年信貸危機和越南現金短缺而來的1930年之前的最大爆發，一點也不令人吃驚。[[285]](#_285_27)這次爆發是以或多或少算是平和的方式在越南中部（安南）開始的，農民針對過度的勞役和已被強加的人頭稅增額陳述苦情。300余人聚集在費佛（土倫附近），要求減輕人頭稅和減少勞役。另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春收前聚集在廣義、安南和順化附近，發出類似的抱怨。盡管持民族主義的高官努力給這些運動指點大方向，它們卻保持了地方主義的性質。此伏彼起的農民暴動，清楚地表明了農民憤怒的指向。在平定，收稅官和與他們合作的顯貴受到襲擊。在別的地方，繼高官及其文書之后，稅務官員也成為主要襲擊目標。隨后的鎮壓消弭了大規模的反抗，到了1930年，一場經濟危機再次使得這幾種看似微薄的稅種變得令人難以承受。

# 第五章 經濟蕭條導致的起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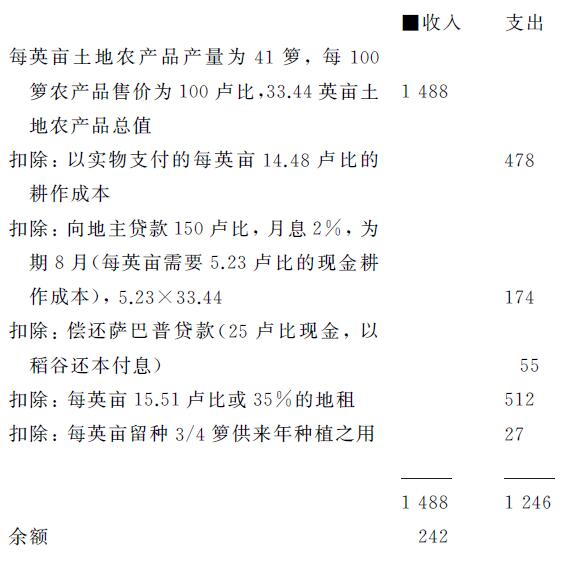
經濟蕭條給予遠在1930年之前即已被結構變化削弱的農民階層以致命一擊。此前，動亂的跡象已不罕見。殖民地官員認識到，人均稻谷產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在下跌，土地租賃條件在變得刻板僵化，小土地所有者和佃農的債務在增加，在歉收年景賦稅給農民造成沉重負擔。雖然他們對農村中無地者比例的持續上升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卻存在著普遍的擔心，而在歉收之后抗稅抗租事件是常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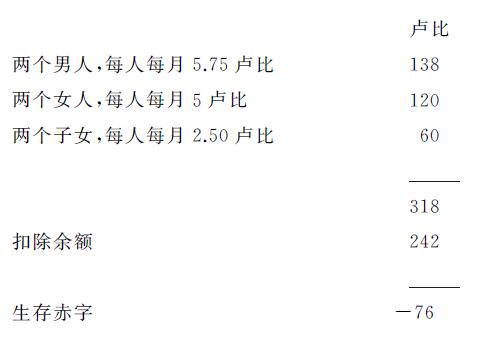
然而，20世紀20年代的出口激增，卻蒙蔽了農民以及殖民地政府，使之未能充分看到新的結構對生存保障造成威脅的后果。只要米價攀升，以稻米支付固定稅款和債務的代價就會多少有所減輕。這意味著，作為一種短期策略，還能得到信貸。最后，它還意味著，在農業、商業和工業中以及在種植園中，創造了各種就業機會，以致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安全閾的缺失。

隨著經濟蕭條的侵襲，所有這些緩沖器都消失了，對農民生存常規的威脅增大了。一個正確評價過去發生的事情的方法是，考察經濟蕭條對現金收入流入和流出家庭預算的效應。[[286]](#_286_27)現金收入的回流，主要來自部分收成的銷售（其形式通常為以實物償還的農業貸款），或來自村內或村外經濟領域中賺取工資的勞工。這一現金收入的源流，由于取決于勞工數量和主要商品市場，因而可能很不穩定。例如，在經濟蕭條期間，來自大米銷售的現金流入減少為其原先規模的一半或四分之一——換言之，需要以從前二至四倍的大米才能換得同樣數量的現金。至于非消費性出口農作物，縮減則更為引人注目。來自雇傭勞工的收入回流，也受到類似的影響。工資率下跌過半，就業機會總量減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從而使一大部分農村和城市雇傭勞工被迫退而依靠農村菲薄的生存資源。

從家庭流出的現金數量，變化大但也較為穩定。一方面，是要購買布匹、煤油或木材（如果當地沒有）、食鹽、魚，偶爾還有蔬菜等維持生存的商品。除了食鹽這一重要例外，這些貨物的價格往往隨米價下跌而成比例地遞減。另一方面，還存在對人頭稅、土地稅、債務以及地租的無情大追討，而它們或是保持不變，或是僅略有下降。[[287]](#_287_27)

從下面引自《1930年下緬甸永盛住區報告》的關于一戶家庭預算的典型實例可以看出，經濟蕭條對佃農收入的毀滅性影響是異常明顯的。[[288]](#_288_27)鑒于米價1934年進一步大幅下跌，可以說這一報告未能充分陳述農民的困難。佃農的收入和支出的數字，出自一項33.44英畝的大規模土地租賃，在涉及107戶佃農的抽樣調查所取得的結果中是典型的。對于大的農耕家庭，甚至沒有留出生存之需。住區官員將這些需要計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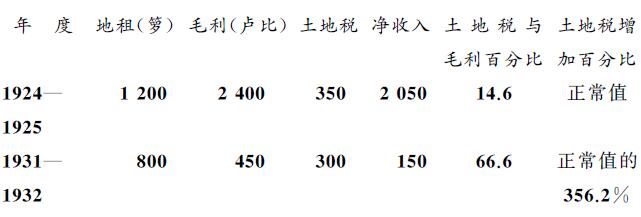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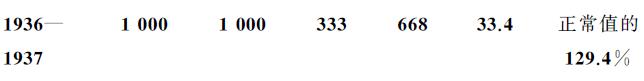


這里僅計算了最低生存支出。如果我們加上服裝、房屋修葺、工具、禮儀和宗教費用以及現金消費品（辣椒、火柴、煤油、發酵辛辣調味品）這些方面的支出，赤字就大得多。不過，這足以說明，土地租賃制度不再能夠滿足農村人口的生存需要。

商品市場和勞工市場的崩潰，影響了家庭賬戶上的收入一欄。這是一種與個人無關的事件，很難找到對此負有罪責的一方。[[289]](#_289_27)與此相對，盯著這一已經減少的收入的外部索款者，則幾乎全是與個人有關的；他們是村外的放債人、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官員。[[290]](#_290_27)他們的要求，盡管從絕對方面看沒有變化，但卻沉重地壓在了實際上已經沒有資財的農民身上。他們向農民——處于絕境的農民——榨取欠他們的一切，以致他們反而由于被迫讓步而失去自己的些許追索權，并冒著激起農民為捍衛其生存權利而反抗的危險。

表6 1924—1937年盈利、凈收入和土地稅負變化情勢





農民收入的“剪刀差危機”，非常詳盡地反映在下緬甸住區官員報告之中。表6反映的是一個擁有100英畝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情況：他在1924—1925年度以每英畝12籮稻谷的地租出租自己的土地，在1931—1932年度以每英畝8籮稻谷的地租出租自己的土地，在1936—1937年度以每英畝10籮稻谷的地租出租自己的土地。[[291]](#_291_27)人們可以從這位地主的困難輕而易舉地推斷出佃農和小土地所有者兩者的處境。對小土地所有者而言，土地稅務負擔的實際增加是巨大的，使他們簡直無利可圖。對佃農而言，從1924年到1931年，如果我們假定他們收成穩定，由于米價下跌造成的現金總收入的減少，則與地主現金總收入減少情況相似——即減少81%。[[292]](#_292_27)僅有一小部分佃農得到一定數量的豁免，而與米價下跌相比，那些豁免實在微不足道。[[293]](#_293_27)

然而，政府首先關注自己的需要。在同一時期，漢達瓦底地區住區官員建議實行新的稅率，將歲入收益減少19.5%，從而稍微減輕新的不平等。他的建議遭到拒絕，而別人增加土地稅率的建議卻得到青睞。正如官員們所說，這是為了“盡可能減少農業收成貶值所造成的無可避免的歲入暴跌”。[[294]](#_294_27)殖民地政府優先考慮什么昭然若揭。

越南的普遍情況也大體如此。例如，用坐標將稅收情況與稻谷價格下跌情況對比標出，就可以大體判定交趾支那1919年至1934年期間相應的人身稅與土地稅率孰輕孰重（參看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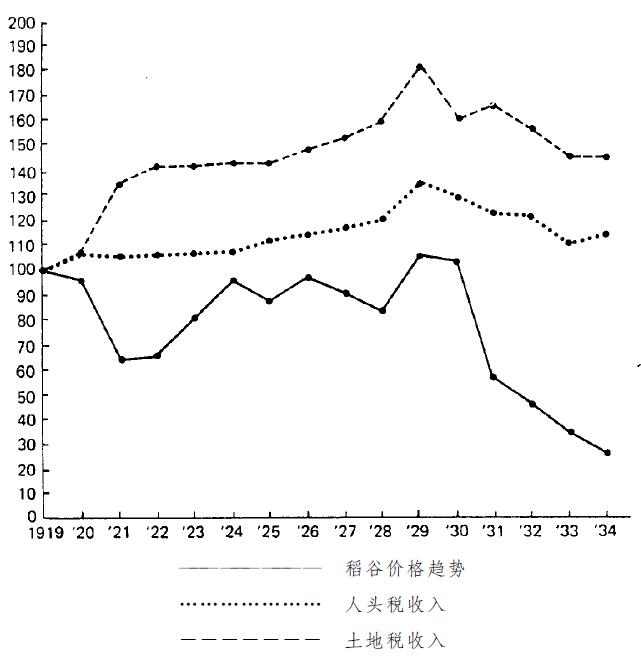


圖3 1919—1934年間交趾支那稻谷價格、人頭稅與土地稅歲入狀況

（1919年為基準年）

資料來源：圖3數據系依據下列資料來源計算而得：稻谷價格來自《1941—1943年印度支那統計年鑒》，第305頁；稅收資料來自J.布瓦耶的《印度支那的直接稅》一文，參見《印度支那司法與經濟評論》，1939年第7期，第497、492頁。人頭稅數字僅包括劃歸印度支那總預算的那一部分；約三倍于此的人頭稅款屬于地方和省預算。

我們以1919年為基準年，以100為該年基數，并以此為據計算稅收和物價動向。稻谷市場的衰敗情況，大體可以被看成佃農現金收入情況的指針，因此，稻米價格與稅款收入之間的差距，表明了官員對農民收入的索取實際上升的幅度。綜合起來看，圖3中的曲線表明了政府稅收在與農村經濟狀況相比之下顯現出來的相對穩定性，也表現了在經濟蕭條時期收入與財政要求之間引人注目的對比。甚至可以說，這一對比并沒有充分說明耕者的諸多困難，他們在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其他所有獲得現金的機會——無論是以小經濟作物還是以偶然的雇傭勞動賺錢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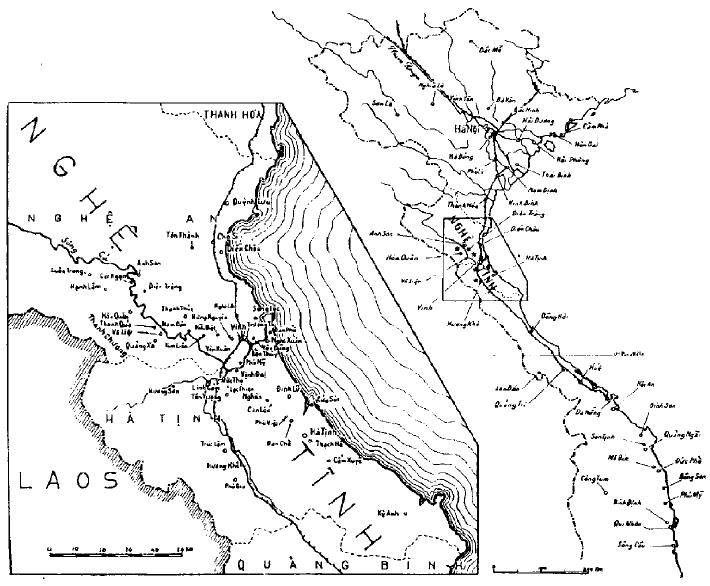
盡管農民的處境如此艱難，地主和政府依然起碼出于兩個原因而向其橫征暴斂。首先，索款者們自己處于困境。地主與放債人（往往是一回事）一般均負有債務，除非他們能夠從自己的佃戶和債務人（也往往是一回事）收回款項，否則就是自取滅亡。至于政府，它已經失去了大量源于消費稅和關稅的歲入，因此冒著不得不遣散自己的一大部分人員并取消許多在30年間發展起來的公共機構的風險。于是，在政府及地主—放債者階級與農民之間展開的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生存斗爭。其次，殖民地政府擁有制度性與強制性手段，以其來收取稅款，并維護債權人和土地所有者的契約權利。

農民生存壓力的確切結構因地而異。在東京、安南和上緬甸，收益分成租佃制很常見，人數不多的農村工人階級往往得到實物工資，因此現金經濟的崩潰所造成的災難就不太大。佃農或勞工依然獲得同樣比例的收成或同樣數量的大米。在這些民生貧困的地區，賦稅問題絕然是一個主要問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下緬甸和交趾支那稍微富裕也較為商業化的地區，債務和固定地租（乃至現金地租）則較為常見，土地所有者—債權人階層（尤其是在他們也身為外國人之時）的追索激起的民怨，幾乎與稅務負擔引發的民怨一樣深重。總而言之，賦稅問題處于支配地位。人頭稅往往是在同一時間向所有人收取的，而地租和債務卻因地而異，因人而異。

## 交趾支那：“紅色恐怖”[[295]](#_295_27)

米價下跌與農民反抗之間的時間順序聯系是引人注目的。1930年4月，米價開始暴跌，到5月初，殖民地政府在交趾支那和安南就遭遇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抗議和暴力行動。[[296]](#_296_27)

經濟蕭條意味著來自間接稅特別是關稅的歲入無可避免的損失，而關稅構成了交趾支那年度稅收的一大部分。于是，稅款總額從1929年的2250萬皮阿斯特下跌至1930年的2140萬皮阿斯特，然后又下跌至1931年的1730萬皮阿斯特。[[297]](#_297_27)為了將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殖民地官員們嚴重依靠不易受經濟活動水平影響的人頭稅收入（每個成年男子約7個皮阿斯特）。盡管失業增加，工資偏低，信貸消失，外巴塞地區洪水泛濫，殖民地政府實際上還是勉強斂齊了1931年的人頭稅款，比上年多收了70000皮阿斯特。于是，殖民地財政制度的冷酷邏輯，恰在最貧窮的納稅人最沒有能力用錢納稅的時候，日漸增加了對這一最具倒退性稅收形式的依賴。



地圖3 1930—1931年間義安省與河靜省的蘇維埃。資料來源：改編自陳宜寥的《1930—1931年間越南義安—河靜的蘇維埃》（河內外國語文出版社，1960）。資料使用已獲許可。

殖民地官員們并不是沒有意識到，固定的土地稅和固定的人頭稅兩者在兇年會給貧窮的耕者造成巨大的苦難。然而，與在緬甸的英國同道一樣，他們也認識到，盡管固定稅收非常不近人情，它們卻是最穩定也最恒常的殖民地歲入形式。1932年，一項只向較為富裕的階層征稅并取消人頭稅的提議，遭到一位金融顧問的明確批駁。他正確地指出，如果這樣做，就意味著政府歲入的大量損失，因為窮人比富人多得多。[[298]](#_298_27)將土地稅率與稻谷價格以至小農納稅能力聯系起來考慮問題的意愿，也由于同樣的原因而遭到否決。如同一位金融顧問所言，“（交趾支那）地方政府害怕這樣一種稅項的收入不穩定”。[[299]](#_299_27)假若讓殖民地政權在確保其收入與確保其臣民人口數量方面做出抉擇，它自然認為還是前者更為可取。

在稅收時節，強制拍賣農民所有物與家畜的現象較為常見，因為地方顯貴和高官力圖完成由他們負責征收的稅款金額。很多農民下獄或遭到毆打，直至他們交出規定的數額。也正是在此時，許多邊際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被迫賣掉自己的稻田或園地，淪為佃農或下降到勞工階層。[[300]](#_300_28)一些執政者攫取佃農或小土地所有者的部分收成，以替代人頭稅。[[301]](#_301_27)新的高壓統治水平難以用數字衡量，這主要是因為，許多濫用權力的現象從未得到正式記錄。然而，從報紙報道和大量農民行動來判斷，農村的稅收愈來愈成為一件充斥威脅和暴力的事情。[[302]](#_302_27)

然而，無須掩蓋這一事實：jiacu這些稅收是由于各省省長及其民兵們的直接行動才得以成功的。他們掌握的強制手段，清楚地說明了他們取得許多自己滿意的成果的原因，但卻千萬不能由所收稅款得出這一結論：人民能夠輕而易舉地承受稅務重負。[[303]](#_303_27)

企圖從手頭比素常更為拮據的農村人口征收人頭稅并維持與往昔同樣的數量，所要支付的成本就是直接訴諸暴力。

交趾支那政府的稅收要求，暗示著農民與地主以至政府的關系。在殖民者新近穩定的許多省份，大地主一直習慣于為自己的佃戶墊付生產成本以及用于交納人頭稅的現金。然而，米價的下跌引發地主凈收入的銳減，而且他們也要面對焦急不安的債權人和當時日漸增多的土地稅。結果，他們猝然中止提供這些預付金。從這一意義上講，對稅款的橫征暴斂不僅使耕者與政府對立，而且也促成本來就一直在深化的地主與佃農關系危機的爆發。一些地主至少拒絕了提供勞動資本或貸款；“另外一些人則顯示出一種不妥協的態度；他們在自身陷于困境之后，對自己的佃戶施加壓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他們的行為是對自己所宣稱的與耕者休戚相關乃至在生產中配合等理念的否定。”[[304]](#_304_27)于是，農民受到賦稅和不顧一切的地主的夾攻，從而在兩條戰線上展開一場類似于保衛戰的戰爭。

在可能的時候，農民總要逃避納稅。民眾的態度似乎反映了這樣的生存道義觀念——即使出于實際需要，對資財的索要，也只有在地方生存需要得到滿足之后，才能是合法的。可能正是出于這一原因，“一項真實的拒不納稅的秘密傳聞”席卷農村，越南人則“由于危機”而拒絕交納賦稅或償還債務。[[305]](#_305_27)對于有些人來說，這一簡單的藥方無疑是成功的，因為交納人頭稅的人數實際上下降了20%。[[306]](#_306_27)然而，令人驚訝的并不是殖民地政府聽任其20%的國民漏網，而是它千方百計向其余的80%的國民收稅。

至于無從逃稅或遭受匱乏之苦的大多數人，他們的反應往往較為積極。首先，在我們所謂的前政治層面，存在大量的屬于法律范圍之外的自助。佃農和勞工往往在收割前先獲取大部分莊稼，或攻打地方土地所有者的糧倉。對他們予以阻遏的企圖遭到頑強的抵抗——以致許多土地所有者每夜都離家到附近城鎮，在殖民地民兵的保護下睡眠。這在1945年之后成為一種生活方式。[[307]](#_307_27)交趾支那邊疆史上固有的匪盜之患，日益成為家常便飯。在同樣遭受了莊稼歉收之苦的朔壯地區的一些地方，50至100人組成的一群群農民襲擊正在將他們所在地區的大米運走的糧船，然后將其瓜分。[[308]](#_308_27)這許許多多的實例，似乎確實應當被稱為社會性打劫活動。換言之，由于是將富人的糧食取來并將其重新分配給窮人，這樣的行動受到了民眾的歡迎，它們也與地方物產必須首先養活地方人口這一觀念相應。

明顯的政治行動，無論是正式的抗議還是暴力行動，也日益普遍。警方記錄羅列了發生在1930年5月至1931年6月之間的54次大多發生在農村的群眾示威活動、游行或襲擊事件。官方記述往往模糊地提到“暴動者集會”，更多的地方則只是提到“600名本地民眾集會”。[[309]](#_309_26)這些事件的兩個特點是分明的。第一，它們是真正的群眾行動，卷入人數很少有不足200人的時候，有時人數則多達1000至2000。第二，最重要的是，被報告的大多數這樣的行動，不是抗議殖民地政府稅制，就是直接向這一稅制發起進攻。發生在最初月份的示威活動，往往采取群眾直接向當局陳述納稅苦情的形式。這些集會的形式和內容都是傳統的，并在表面上顯得平和。例如：

1930年5月2日——200名居民在新市地區（屬龍川省）公署集會，要求緩期納稅。示威者在得到將把他們的請求轉報上級當局的許諾之后散去。[[310]](#_310_27)

在龍川省的其他地方，在沙瀝，在芹苴，以及在堤岸，農民聚集在地區政府總部，要求減少賦稅或延緩收稅。[[311]](#_311_27)至少有幾次，緩期納稅的請愿似乎當場得到批準，于是鼓舞了鄰近地區的農民提出獲得類似寬限的要求。不久，抗議者開始要求減少人頭稅或將其廢除。也可以聽到關于分配大地主把持的庫存稻谷、終結市場稅、返還被騙走的土地以及強行控制米價等方面的要求。然而，人頭稅卻是將民眾結為一體的中心問題。在這一階段，群眾通常是平和的，在官方聽取他們的申述之后，一般都會散去。

由于農民的經濟處境惡化，由于減稅似乎遙不可及，他們轉而訴諸直接的暴力行動。他們的行動和目標，雖然在地域上遍及數省，在時間上將近一年，但卻極其相似。如果民兵無從阻擋，憤怒的農民就會直接向村莊或地區公署進發，他們將公署及其所有記錄一同摧毀。警方記錄中最常見的登錄內容為：“毀壞檔案”，“劫掠公共建筑”，“洗劫公共建筑”，“焚燒檔案”。農民缺乏襲擊殖民地政權警方和民兵的武器，所以僅向其行政機構發起進攻。村莊里的行政機構所在之處，通常是公共建筑，有關人頭稅、土地稅和勞役的記錄，就保存在那里。農民希望通過銷毀那些記錄來摧毀殖民地政府；他們希望通過摧毀殖民地政府來根除賦稅。于是，交趾支那的騷動，從符合儒家傳統的溫和的請愿轉變成為無政府主義的暴動。

在騷亂的初始階段，在組織許多規模較大的農民示威活動方面，初出茅廬的共產黨的領導起了推動作用，不過摧毀土地和賦稅記錄實際上是殖民地時期越南農民的一個傳統。……

然而，后來，在消息靈通的法國警察圍捕許多共產黨的骨干之后，暴動愈益具備了自發的特點。缺乏協調的政治領導，或許是導致交趾支那騷亂具有零散和地方主義性質的原因，同時也說明了它何以就被輕而易舉地粉碎了。然而，對于我們的目的至關重要的是，即使在共產黨的干部能夠發揮推動作用組織群眾行動時，他們也被迫圍繞鄉村耕者的具體苦楚組織行動。結束賦稅和奪取并瓜分地主糧倉中的大米的要求，就直接源于那些苦楚。[[312]](#_312_27)在共產黨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協調最初的抗議活動之時，它幾乎不需要向農民指明他們發泄怒火的目標。

在法國當局的鎮壓行動之后，農村恢復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平靜。這種平靜是靠不住的，因為在政治行動似乎再次可行的1936年，在法國布魯姆政府上臺之后，新的騷亂隨即爆發了。在抗議行動的第二階段，土地租佃條件受到直接抨擊。農民拒絕交納地租，在被地主驅逐之時拒絕離開，而如果他們認為自己開辟的土地已經被以非法手段奪取，他們就重新將其占領。抗議形式是有啟迪意義的，因為它揭示了農民關于公平的租佃契約應當包括什么的構想。

另外一些人只同意，在扣除來年養活自己和家人所必不可少的份額、下一播種季節的稻種、家族成員和受供養人的衣服和贍養費用以及耕畜飼料之后，將所剩稻谷的一半交給地主。[[313]](#_313_27)

于是就出現了一場如同埃里克·呂德所描繪的資本主義時代之前的糧食暴亂一樣的運動，它展現了一種精細而又明晰的公平感和權利感。[[314]](#_314_27)盡管殖民地官員一再做出一定的努力，試圖通過租佃立法并向大地主發出改正錯誤的警告，但同樣的農村土地關系依然維持不變，并對越南南方戰后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 義安與河靜的蘇維埃

安南北部的義安與河靜兩省的事件，幾乎完全是在同一時間開始的，并像在交趾支那的事態那樣，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逐步升級。主要區別是，義安與河靜的起義者實際上成功地奪取了政權。截至9月底，他們已經奪取了義安人口最多的地方與河靜的毗鄰地區。他們建立了與鄉村自治共和政體類似的政權，并堅持對抗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壓力達九月之久，直至被最終擊潰。在起義過程中，約有2000名越南人被殺；其中大多數在大規模示威過程中，死于殖民地軍隊的轟炸和槍擊而倒下。然而，在一段很短暫的時期，義安與河靜的起義者實際上勉強創建了一種反映自己的價值觀念的農村秩序。這一悲劇性經歷，生動地說明了農民對殖民地秩序中的什么東西最為憎恨，以及他們希望恢復什么樣的社會。[[315]](#_315_27)

安南北方的脆弱性與爆炸性

在許多方面，與交趾支那的農民相比，安南北部的農民甚至更沒有做好度過經濟蕭條造成的金融困境而生存下來的準備。安南人居住在殖民地的山海之間狹窄低地上最為貧瘠的地區，總是處于略高于生存水平線之上的困境之中。他們的日常飲食的卡路里值，是全國最低的。[[316]](#_316_27)即使在豐年，安南也不出口糧食，而在兇年，人們就得依靠交趾支那或東京地區的余糧供養。

造成饑荒的因素還有，在安南，義安與河靜的降雨最不可靠，因而其收成也最不可靠，兩省為此飽受其苦。[[317]](#_317_27)正是聊以糊口的生存農業與易受生態災難襲擊這兩者的結合，使得義安—河靜地區成為這樣一個波動不安的地區。饑餓是省內生活中的家常便飯，因為平均六次收成中就有三次部分歉收或完全絕產。當歉收接踵而來之時，饑餓就逐漸演變成為饑荒。一位農業服務部主任回憶道，“在1906年和1907年，我在路上看到由于饑餓而垂死的人們，也看到村與村在為挖掘土豆而互相爭斗。”[[318]](#_318_27)在這次饑荒期間，由持不同政見的文人領導的未遂起義，事實上就是1930—1931年起義的先河。在不久之前的1925年，連續兩次歉收在河靜引發了另外一場饑荒。“五年之前的苦難極其嚴重，我發現河靜省餓殍載道。”[[319]](#_319_27)在義安—河靜地區，生活不僅是艱難的，而且是兇險的。任何30歲以上的人，都能夠回想起至少兩次肉體生存本身瀕于危險的時候。

在歷史上，在法國人控制之前悠遠的歲月中，義安—河靜地區就一直有叛逆和造反的名聲。這一地區崎嶇不平的地貌使之成為天然的反叛之鄉，而地方文人和王位覬覦者的高度集中，又準備了現成的領袖。1874年，就在這同一地區，一場反法國人的著名的文人士紳起義爆發。這場起義中的兩個領袖，事實上是義安清忠地區人氏，這一地區在1930年起義中起了主要作用。[[320]](#_320_27)這一區域叛逆精英的集中，或許是達官貴人家庭希望利用義安這一科考地點因而定居于斯的悠久傳統的結果。

從法國人的觀點看，義安—河靜地區的叛逆不僅是一個精英傳統，而且也是一種大眾習俗。殖民地官員寧愿將反叛精神視為傳承下來的地區天性中的一個特點。“義安、河靜與廣義的民眾，一直總是對已經確立的權威表現得特別具有敵意。”[[321]](#_321_27)他們的“熱衷陰謀”，就如同他們的“驕傲與桀驁不馴的天性”一樣馳名。[[322]](#_322_27)一位前公共工程官員，在東京度過20年，在安南度過12年。他在比較當地居民的行為與較為馴服的東京人的行為時說：“他們倔強、傲慢而又狡猾。你只要批評一個苦力一句，所有其他人就都會離開工地。”[[323]](#_323_27)

于是，出于種種原因，義安—河靜地區在政治上就具有爆炸性。由于在地理上與大的人口中心隔絕，這一地區總是出現嚴重的政治控制問題。它獨特的文化和文人傳統，提供了能夠抵制外來干涉的本土領導階層。最后，最重要的是，它的貧困和變化無常的氣候造就了狂暴的民眾，他們完全有理由違抗任何加在他們脆弱的生存之上的索求。

余地縮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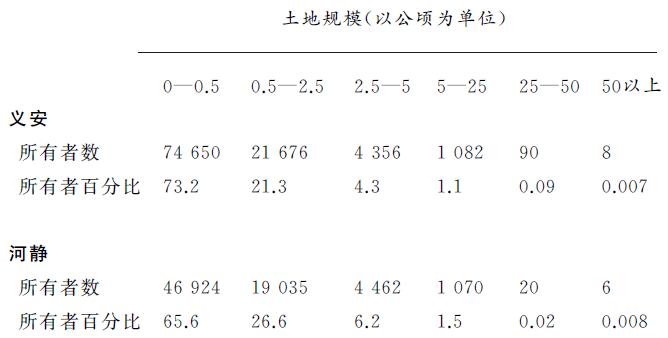
在20世紀初期，盡管義安—河靜地區民生拮據而且經濟不穩，但對農民收入的索取卻往往處于漲勢。無地者的比例增加了，土地租佃條件更苛刻了。截至20世紀20年代，安南北部的許多小規模土地租佃，即使在豐年也已經不再能夠使佃農們維持生存，許多農村人口開始從事諸如砍柴、種植園勞動和小生意一類第二職業，以勉強維持生計。[[324]](#_324_27)曾經舒緩農村窮人困境的公共土地，日益落入地方達官貴人之手。最為沉重的賦稅形式人頭稅逐漸增加，變得愈來愈少的村民，設法將自己的名字從村稅務名冊中抹掉。此外，由于達官貴人及其部屬的敲詐勒索，實際的稅收大大高于法律所要求的數額。由于對農村人口的索取數量增加并且不得通融，沖突的結構可能性增大了。一兩次歉收就足以引發一場危機。

土地所有者與農村窮人

義安、河靜與廣義地區人口對土地的壓力（起義也涉及這一問題），類同于馬爾薩斯經濟學中的一例個案研究。不僅莊稼產量低而不穩，而且人均稻田數量（三省分別為0.144公頃、0.153公頃和0.150公頃）也位于安南16省中最低者之列。[[325]](#_325_27)在義安，近乎四分之三的有地者擁有不足半公頃土地，而他們的平均土地占有量肯定不超過四分之一公頃（或大約半英畝）。這一階層的大多數，不能單靠自己的土地生存，于是被迫與人合作種田以期收益分成，或在他人的土地上勞動賺取工資。在河靜，邊際小土地所有者也占人口的大多數（65%），并且面臨同樣的選擇。

從表7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土地所有者僅構成農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然而，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卻是舉足輕重的。他們雇用絕大多數農村勞工，并且出租許多土地。他們往往由于小土地所有者欠他們的債務而控制著比自己的直接擁有量多出許多的土地。最后，還有某種原因讓人相信，地塊的分散和所有權登記中的舞弊，可能掩蓋了土地占有集中程度高于官方數字的事實。[[326]](#_326_27)

表7 義安與河靜的土地分配[[327]](#_327_27)



盡管安南北部以邊際小土地所有者之鄉著稱，但人口增長的影響，對公共土地的攫取，以及農民負債，造成了一個龐大的無地者階層。在義安的一些瀕臨藍江的區域（南壇、英山和清忠），情況最為明顯，它們成為起義的腹地。例如，在南壇，90%的家庭根本沒有土地。在清忠，無地者的比例達到60%。[[328]](#_328_27)調查委員會著手了解起義情況之前官員們提交的聲明，強調了這一階層不穩定的生存狀況：

土壤是貧瘠的。村民們幾乎沒有公共土地。窮人任憑毫不憐憫地剝削他們的富裕地主的擺布。[[329]](#_329_27)

他們（無地者）向富人出租自己的勞務。他們勉強糊口，而在糧食匱乏時期則死于饑餓。[[330]](#_330_27)

上面所表明的無地者的絕望狀況，并非單純由于他們的貧困，而是由于日益苛刻的土地租佃條件和農業勞動條件。雖然地主與佃戶或勞工之間的聯系，并非全如交趾支那那樣以現金形式相聯系，但卻在明確地朝著那一方向前進。即使僅朝那一方向略為有所發展，也是對安南耕者生計的直接威脅。例如，農場勞工的薪資，變化愈來愈少，不再受米價和其他必需品價格波動的影響。[[331]](#_331_26)毫無疑問，安南的地主在向他們所雇用的工人發放僅勉強夠他們活命的工資時，不通融到了沒有理性的地步。[[332]](#_332_26)就收益分成佃農而言，在歉收之后只偶然可以分得收成的較大份額。“辛勤勞作的農民，必須將自己收成的一半交給富有的地主。這在收成好時還是可以承受的。但在收成不好時，情況就慘了。”[[333]](#_333_26)傳統的土地租佃和勞動形式曾經提供的所有保護性價值，正在快速消失之中。

公共土地由于腐敗的高官和鄉紳的侵吞不斷喪失，從而使另外一種傳統的社會保險形式逐漸消亡。幾十年前曾經擁有多達50%公共土地的村莊，已經使其中大部分落入私人手中。[[334]](#_334_26)由法國派駐安南的高級駐扎官勒福爾，對自己在這種土地掠奪面前的束手無策給予坦率的解釋：

存在著受本地民眾信托的人們侵害其同胞的舞弊現象。毫無疑問，顯貴們為使自身獲得公共財產的大頭而濫用自己的權力。政府并不干涉作為安南社會單位的公社。我們有如下這些選擇：或者讓顯貴們為所欲為，這樣革命領袖就會把應由顯貴們承擔的濫用權力的罪責推到我們身上；或者出面干涉，這樣我們將會招致富裕人口的敵意，而他們是惟一在實際上有意維持秩序的集團。我相信，出于以上原因，對公共稻田的重新分割持不予干涉的態度是可取的。[[335]](#_335_26)

這是對村級殖民地政權面臨的兩難困境及其自覺選擇的絕妙描繪。

賦稅

安南的長期赤字，是殖民地總督們感到頭疼的主要財政問題之一。稅款僅勉強夠應付這一領地內的工資發放，而這一領地本身卻要靠來自交趾支那和法國的贈款和貸款來維持。結果，駐順化的法國駐扎官處于提高地方歲入數量和大力削減支出的持續的壓力之下。

在安南提高稅額，首先意味著提高人口稅率和土地稅率。這兩項措施，不僅極具殖民地財政制度倒退的特點，而且它們還說明了領地稅收是如何獲取最大份額的。有關官員認識到，“在窮人交納的對自己壓力重重的稅款與富人交納的尚能籌措齊備的稅款之間”，已經存在“過于巨大的差異”。[[336]](#_336_26)不過，他們完全有理由擔心，累進人頭稅難以管理，而且可能為地方官員開辟新的大肆貪污的途徑。他們還知道，稅制愈無彈性，稅收愈益可靠。

人頭稅對于窮人是一項沉重負擔。在1928年，按照基本稅率，所有列于納稅名冊的人均須交納2.50皮阿斯特，而赤貧的人免除部分稅款（僅交納0.40皮阿斯特）的優惠被大量取消。此外，2.50皮阿斯特的稅率只是基本稅率，一些附加稅，其數值因地而異，其幅度在0.26至0.88皮阿斯特之間。[[337]](#_337_26)這些附加稅的大多數是強加的，用來資助以富人子女就讀為主的地方政府學校，因此引起較為貧窮的納稅人的強烈怨恨。[[338]](#_338_26)假定平均稅金是3皮阿斯特，那么我們就可以通過將它與日工資相比，來估價它所體現的勞動者所做出的犧牲。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義安與河靜的日工資在大約10至15生丁之間，另加飯食；此項稅款于是至少相當于20天乃至30天的收入。對于收益分成佃農而言，在一次中等收成或歉收之后，稅務負擔絕不會有所減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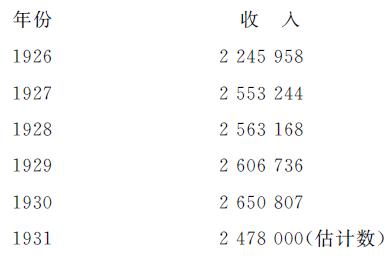
甚至這些數字也不能恰當說明直接稅形成的重負，因為它們系由達官貴人管理。地方官員習慣于添加形形色色的非法收費，以中飽私囊。例如，一個欠2.80皮阿斯特稅款的農民，完全有可能非得交夠4皮阿斯特，才能帶著加蓋印章的稅務收據出頭露面。[[339]](#_339_25)此類腐敗現象極為普遍，其結果是將實際稅額至少提高了50%，而在有些村莊，比這還要高得多。[[340]](#_340_26)

盡管知道人頭稅是其稅制中最遭人憎惡的稅種，領地政府還是將其征收范圍擴展到原本免稅的窮苦人身上，并且竭力使村莊稅務名冊盡可能多地登錄成年男子。從財政的視角看，結果是令人滿意的：1927年，人頭稅產生了1376566皮阿斯特的收益；1931年，產生了2230910皮阿斯特的收益。[[341]](#_341_26)從人性的視角看，結果是災難性的。1931年，安南北部處于其20世紀最嚴重的饑荒之中。這一年的人頭稅，如該詞的字面意義所示，真有殺人取頭之實。

作為地區歲入第二支柱的土地稅，也遵循著同樣的無情邏輯。1923年，對所有種類土地的稅收，均提高了30%。[[342]](#_342_26)1929年，一位來自河靜的傳教士講述了該地區土地稅類似的增加情況，狂暴的村民欲將其廢除，但卻枉然。[[343]](#_343_24)另一個能夠產生新歲入的策略就是，將所有土地重新分類，拔高土壤級別，從而提高稅收檔次。1907年，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事情，在20世紀20年代，同樣的事情再度出現。當然，這樣重新劃分土地級別，與產量變化并無關系，而純粹是財政上的權宜之計。“于是，在榮市（屬義安省）這一范圍，為了滿足某些支出的需要，沙泰爾先生的繼任者將所有稻田類別都提高了一級。”[[344]](#_344_24)土地稅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首先要適應殖民地預算的歲入需要。該稅年度收入款額與莊稼實際收益或米價無關，因而日益與小土地所有者的交納能力不相符合。從1926年至1930年，該稅收入呈適度上升趨勢（見表8）。

再者，這些數字的意義，必須放在1929年后期至1931年上半年出現四次極糟的收成以及經濟蕭條造成信貸危機這樣的背景來看。政府在1930年和1931年的稅款，是向處于絕境的耕種小塊田地的人們征收來的。

表8 安南土地稅收入一覽表[[345]](#_345_24)



食鹽專賣是政府的又一項財政收益，同時也是加在農民家庭預算上的沉重負擔。按照一位見證人的說法，對于一個十口之家來說，食鹽供應在19世紀90年代每年花費不過10生丁，到了20世紀30年代，則每年花費10.80皮阿斯特。[[346]](#_346_24)

這里，殖民地官員們鑒于食鹽專賣的穩定收益，再度故意忽略它的倒退性影響。安南駐扎官勒福爾再次坦率地談到自己優先考慮的事情：“我承認食鹽制度不得人心。然而，從財政的角度看，它提供了巨大的利益。”[[347]](#_347_24)

最后，還有大量瑣細法規和稅收，這些稅收既是倒退性的也是令人惱火的。市場費、舟船稅以及日常管理中的小規模敲詐勒索，對無地者造成特別沉重的壓力，對于他們來說，小買賣往往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副業。然而，在所有這些瑣碎稅收中，強加的嚴格的森林法規卻是最讓人怨恨的。安南的森林，傳統上就是最貧窮的村民的非正式經濟救濟來源，他們在農閑季節燒木炭或砍柴，然后在附近市場銷售。森林執法官利用由他們掌握的復雜瑣細的有關法規和稅項，恣意征收罰款，以中飽私囊。[[348]](#_348_24)他們對素來向農民開放的村地上的木材采集活動的干涉，被解釋成是對傳統生存權利的侵害。“即使他們（農民）同意向國有森林納稅，他們也不理解國家對村莊森林的干涉。”[[349]](#_349_24)雖然涉及的金額可能微不足道，但稅收和罰款卻對最貧困者的一項重要選擇權構成了威脅。

經濟危機與饑荒

僅人口壓力對安南不利的自然環境的影響，就對農民的生存構成了真正而又現實的危險。這種危險，由于土地租佃條件的惡化和殖民地政府對稅收的貪得無厭而加大。安南的農業經濟簡直過于惡劣，過于脆弱，以致年復一年，不能指望它交納強加給它的地租和稅款。

恰巧，在1930年，在世界經濟危機和當地人記憶中最嚴重的饑荒之后，沖突發生了。在政府仍然不顧一切地征稅之時，除了抵抗幾乎沒有別的選擇。結果就是一場這一殖民地以前從未發生過的最大規模的民眾起義。這幾乎不能說是一場懷抱攀升希冀的起義；這實際上是一場絕望的造反。

安南受經濟蕭條的打擊特別嚴重。許多存在于運輸業和小生意中的賺取最低額度現金的機會，被減少或取締了。諸如大麻、煙草、茶葉、芝麻和其他油料植物、糖以及花生一類經濟作物的價格急劇下跌，沿藍江谷地居住的許多小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隨之下降，因而那里的起義最為迅猛。

在安南，經濟危機造成的失業也似乎比印度支那其他地方更為嚴重。[[350]](#_350_24)礦山和種植園裁員，殖民地政府本身也暫停了公路施工。其影響在義安是相當嚴重的，因為義安在很長時間內，曾經是整個安南向交趾支那和老撾提供人力的一個勞工凈輸出地。一位官員宣稱，“所有沒有工作的苦力，全都流回了義安。”[[351]](#_351_24)與此同時，經濟蕭條也給該省弱小但卻極其重要的工業基地以幾乎致命一擊。榮市及其毗鄰港口邊水附近的許多農村人口，一直直接或間接地依靠由這一地區的火柴廠、鋸木廠、機場建設、瓶裝飲料廠、火車頭廠以及發電廠提供的就業機會和收入。[[352]](#_352_24)危機導致這些產業的一系列大規模解聘和減薪，反過來，這又引發了激烈的罷工行動。藍江谷地（南壇、清忠與英山）再次最直接地受到影響，因為這里是榮市地區勞工的天然后方。雖然缺乏精確的數字，但幾乎毫無疑問，貿易衰退也減少了義安許多農村家庭的現金收入，對于它們來說，第二職業是重要的。

與這一困難局面接踵而來的，是一場即使在缺衣少食之鄉也幾乎沒有先例的饑荒。對于許多地方觀察家而言，這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場起義的關鍵。在調查委員會面前作證時，殖民地最富有經驗的農業經濟學家伊夫·亨利聲稱：“造成義安與河靜混亂局勢的主要原因，與歉收有關。土地已經兩年沒有產出，四次收成遭到毀壞。”[[353]](#_353_24)1929年秋季，低降雨量使插秧延期，而在莊稼終于開始在稻田生長之時，洪水卻將它們大部沖毀。由于干旱持續不退，1930年的兩茬莊稼幾乎顆粒無收。1931年的春季莊稼，讓干旱與妨礙水稻揚花的所謂“老撾干風”徹底摧毀。收益分成佃農實際上根本沒有分到稻米；一無所有的一半還是一無所有。地主們停止發放一直用于納稅或購米的貸款，米價朝著饑荒水平攀升。[[354]](#_354_24)1930年初，到第二茬莊稼絕收時，明確無誤的饑荒和抵抗跡象開始出現。

在存米減少時，農民轉向較為廉價的食物，以小米、豆類、玉米、土豆及各種根須作物等供日常食用。饑荒的其他先兆漸次出現。窮人被迫進入森林，挖掘可以食用的野生根菜植物。[[355]](#_355_24)我們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到一種經歷食品生產各個階段的進化意義的退卻。在低地稻絕產時，農民們轉而依靠高地上刀耕火種農業的產品；在這些收成再次供不應求時，他們就訴諸森林采集的原始技術。[[356]](#_356_24)饑餓導致的虛弱跡象，日益在農村人口中廣泛地蔓延。一位越南官員宣稱，南壇（在義安省）每100位村民中就有90位遭受饑餓之苦。[[357]](#_357_24)誠然，饑餓對于安南農村來說絕不陌生；在一次新收成之前的數月間，饑餓是正常事態。但這次饑餓卻不同。農業服務部一位視察員在被問及村民是否在挨餓時回答說，“是的。以前人們說自己很餓，而現在他們說自己要餓死了。”[[358]](#_358_24)

到農村出過診的醫生們，目睹人體營養不良的跡象深感震驚。在義安省安城地區的春原村，一位醫生助手治療了多例皮膚潰瘍、痢疾和貧血病人，注意到有100位村民需要食物，而另外40位村民則面臨馬上餓死的危險。在同一個村子中，窮人業已賣掉所有的一切——水牛、稻田、住房乃至家祠——以弄錢購買食物。[[359]](#_359_24)為村民治過病的醫生們的證言，就足以說明問題。

我發現，這些村莊（安城）都存在饑荒。我注意到，許多人肚子腫脹，而這正是饑荒的標志。[[360]](#_360_24)

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如同（義安的英山與河靜的其安）那樣的景象：成千上萬絕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食用的活骷髏，肋骨在皮下凸現的真正的尸體。[[361]](#_361_24)

調查委員會搜集的文件證明，至少在義安九個地區中的五個地區以及起義中最為積極的河靜地區，存在營養不良和饑荒。幾乎毫無疑問，到1930年5月時，許多義安農民已經瀕臨山窮水盡的絕境。在這一背景下，起義的中心事件——拒納人頭稅和搶奪大米——應當被視為絕望時的直接行動。[[362]](#_362_24)

起義的中心地帶

安南北部的起義，實際上先后波及了整個義安、河靜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廣義的一些地方。然而，起義真正的中心地帶——發動最廣泛、抵抗也最堅決的地區——是人口密集的藍江谷地至榮市的西面和西北面。從省城榮市出發，沿著藍江河道上溯，人們首先經過義安省的南壇，然后是清忠。再往北是英山，也是一個起義據點。由于其激進主義的傳統和作為20世紀兩位最偉大的民族英雄潘佩珠與胡志明的誕生地，南壇在越南歷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南壇與清忠一道，被起義大業完全爭取過來。正如1930年10月初的一份秘密報告所警告的：“清忠和南壇這兩個地區，現在處于一種完全叛逆和真正無政府的狀態。”[[363]](#_363_24)這樣的事態后來持續了將近一年。

調查委員會的成員茫然不知怎樣解釋起義何以以此地為中心。按照區域性標準來看，至少藍江河谷的土壤似乎豐饒而肥沃；人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地區“比較繁榮”。[[364]](#_364_24)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像義安省的瓊琉和河靜省的其安一類較為貧窮的地區，卻沒有完全卷入起義。因此，調查委員會在考慮起義動機時，傾向于輕看經濟困苦的作用，反而將重點放在了共產黨的鼓動上。

由于下述幾個理由，筆者認為，調查委員會隨便摒棄任何從經濟角度作出的解釋，似乎是不妥當的。首先，就土地單位面積平均稻米產量而言，只有英山明顯處于與省內其他地方相比有利的位置。在按照每公頃水稻產量排列的義安省的八個地區名單中，清忠與南壇分別位列第四和第五。[[365]](#_365_24)事實上，當時對地方農業所作的最全面的研究，曾經越出常規去強調南壇土壤的貧瘠和低產量。[[366]](#_366_24)如果說起義中心地帶的稻米產量不是全省最差的，那么，除了英山之外，這一中心地帶也談不上有任何最好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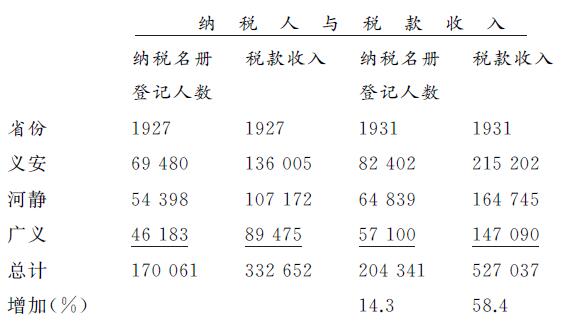
其次，這三個地區中的每一個，都有生態上的特殊性，這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按照土壤類型劃分義安省，我們就會發現，這三個地區全部都是黏土質土壤，而該省其他地方的土壤則多為沙土質的。[[367]](#_367_24)黏土的重要特點是，它對降雨量變化比沙土敏感得多。正如義安農業服務部視察員所解釋的，“在雨水多的時候，黏土更為可取。但其產量在干旱時不如沙土。”[[368]](#_368_24)平均數再次導致錯誤結論。這些地區的黏土在十年期內可能維持中等產量，與沙土產量相比更為有利。但平均數往往會掩蓋黏土特別容易遭受干旱侵襲這一點，以及完全絕收的巨大可能性。當然，安南北部地區正是經歷了這樣一場干旱，而且由這場干旱造成的作物損失，在這些地區比該省內其他地方都更為嚴重。從這一視角看，藍江谷地農村經濟的脆弱性，是安南和義安兩者問題的極端變體。在印度支那范圍內，安南有著生態上最不牢靠的經濟——也就是說，一種最易于發生生存危機的經濟。在安南范圍內，義安的降雨量反而最為變化無常，因而其食品供應來源也最為脆弱。在義安范圍內，南壇、清忠和英山的黏土壤，更加重了已經很大的收成遭災的風險。

這些土壤的質量，不是沿藍江地區特別容易成災的惟一原因。如同它們容易受干旱侵害那樣，它們也容易遭經濟蕭條的襲擊。尤其是在南壇和清忠，相當大面積的土地被用于種植諸如煙草、茶葉和大麻一類非食用性經濟作物。[[369]](#_369_24)這些作物的市場隨著經濟危機爆發而崩潰，能夠收獲的一點東西實際上也賣不到錢。沒有能夠確切說明這一損失的數字，但幾乎毫無疑問，它在維持生存食物的價格攀升之時，嚴重減少了農民的現金收入。這一地區的社會結構進一步加重了困難。由于大部分農村人口沒有土地，他們特別容易受到經濟蕭條對工資、就業和信貸等造成的沖擊。[[370]](#_370_24)最后，在這一背景下，南壇和清忠對榮市提供的城市市場和就業機會的明顯依賴，使它們的經濟更加脆弱。

因此，這些地區盡管確實貧窮，但它們的起義所以執著的原因，倒并不完全在于它們的貧窮，而是在于它們對干旱和大范圍經濟波動的獨特的雙重過敏。設若它們的經濟狀況不良但卻穩定，那么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對它們的毫不通融的勒逼盡管麻煩，卻不大可能成為直接威脅。然而，實際上，一年又一年，天氣和物價的變化無常，使它們陷入一場一場危機，以致稅收和分成地租對生存本身構成嚴重威脅。

分成租佃的安排是苛刻的，但1930年的情況并不比1929年明顯糟糕。高官們的腐敗一如既往，但在1930年并不比1929年嚴重許多。然而，稅收在1930年卻變得比20世紀20年代后期更為沉重。面對隨經濟活動水平而自動變化的間接稅收益的下降，殖民地政權通過逐步增強其不受經濟蕭條影響的稅種尤其是人頭稅的征收，將其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三個造反省份的稅收結果，是令人感到不祥的（見表9）。到1931年時，殖民地財政部已經成功地使納稅名冊所列人數增加了近15%，使征稅收入增長了幾乎60%。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義靜的農民也難以按這一稅單交稅。

表9 1927年與1931年人頭稅征收情況[[371]](#_371_23)



然而，情況不是最好，而是最糟。義安經濟出現了崩潰局面，農作物歉收了。這一地區的傳教士強調，稅收和饑荒的契合是起義的直接原因。

自1930年以來，三次收成蒙受損失，第四次收成，即十月的收成，似乎岌岌可危。稅收是在人民因干旱而絕產之時猝然進行的。為了納稅，居民們已經不得不賣掉自己的所有財產。[[372]](#_372_24)

另一位傳教士講到，村民們被迫以自己所能撈著的隨便什么價格，賣掉自己的財物、自己的水牛乃至公共土地，以便籌集用于納稅的現金。在談到主張抗稅的起義召喚時，他表示理解地說：“人在沒有足夠的食物時，并不愿意納稅。”[[373]](#_373_24)

對農民剩余價值穩定而又不斷增多的索取，與一場農業收入和食物供應危機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是安南農業經濟的生態條件和政府強加的嚴酷財政稅收的一個完全可以預言的結果，它使得起義爆發終不可免。

## 起義過程

農村地區廣泛不滿的最初跡象，在1930年6月、7月和8月以大規模示威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同在交趾支那那樣，這些示威大多限于大規模的減稅請愿。典型的情況是，一群農民聚集在地區辦事處外面，要求減稅或緩稅。他們利用自己通常給數量上處于劣勢的官員構成的潛在威脅，往往強迫高官們親自在請愿書上簽字，然后再將其遞交上司。圍繞人頭稅的爭論最多，但政府強加的其他負擔也沒有被忽視。例如，有1000名請愿者，洗劫了政府的一間米酒倉庫。在瓊琉（屬義安省），600名農民請求降低食鹽價格，并設法迫使一名法國軍官和一名海關官員附簽其名。這些示威規模不斷擴大，英勇程度不斷增加，在9月初達到高潮，“成千上萬人”在地區首府南壇游行，酒稅署被搗毀，一位驚恐失色的高官被迫在一份稅務請愿書上簽字。[[374]](#_374_24)

在起義的前半期，主要是以不同形式對各種稅收特別是人頭稅的反抗。僅在義安就有32次主要示威被列入官方有關起義的記載之中，大量卷入起義的群眾，要求減少、延緩或取消人頭稅，或搶奪并焚毀地方稅務記錄。[[375]](#_375_24)這些群眾聚集的規模是壯觀的。很少有少于200人的時候，而較大規模的集會，聚合的人數多達20000。[[376]](#_376_24)抗稅也以其他形式出現。義安的一位傳教士報告說，他所在地區五六個村莊的農民，“決定不納稅并將他們所有的一切帶入山中。”[[377]](#_377_23)在別的地方，窮人干脆拒絕納稅。

在（河靜省）相當大量的村莊中，特別是人頭稅，不是由列在納稅名冊上的窮人交納；土地所有者或村莊（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就是村莊中的顯貴），被迫履行無地者所沒有履行的義務；這也是發生大規模集會和打斗的的原因。[[378]](#_378_23)

在其他許多村莊中，地方顯貴和村長如若企圖向窮人收稅，就會受到死亡威脅。[[379]](#_379_23)對于窮人而言，政府首先是收稅者，而它也正是作為收稅者，才遭到攻擊的。

到9月中旬，由于暴力節奏加快，殖民地政權逐漸失去對安南北部地區的控制。“9月，高官與顯貴們到各地區的總部避難，使這些地區體現殖民地政府權威的代表蕩然無存。”[[380]](#_380_23)義安與河靜的農民利用這一權力真空，開始拆除殖民地政府大廈。……村莊的檔案、村民名冊、土地記錄和納稅名冊，被耕者銷毀了。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使自己的土地免除所有賦稅。”[[381]](#_381_23)他們的動機與交趾支那農民的動機幾乎相同，但安南殖民政府的相對虛弱卻使得農民的行動得以向縱深發展。大多數行政機關及其納稅名冊被摧毀，郵局和火車站以及學校被燒掉，酒類倉庫被搶劫，與殖民政府合作的本地官員被謀殺，森林崗哨被砸爛，稻米倉庫被奪去，而且至少有一支食鹽護送部隊遭到襲擊。[[382]](#_382_23)很難想像對殖民地政府會有比這更為全面的進攻了。

從現存的證據看，消滅賦稅和收稅者，似乎是民眾參加起義的最初動機。該省的共產黨也認為賦稅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農民業已奪取該省許多地方后倉促制訂的全省綱領中，第一個實質性要點要求“取消殖民地所有賦稅：人頭稅、市場稅、道路通行稅、食鹽稅，等等”[[383]](#_383_23)。要是有更多的有關農民方面意見的直接證據就方便了，然而，就像涉及大多數農民運動時那樣，我們多半只能依據起義參加者的所作所為來推斷他們的所思所想。雖然法國警方在起義被平定之后審問了數以百計的農民，但他們很少勞神問他們參加起義的原因——或許是由于參加者比比皆是，問這個問題好像很愚蠢。然而，在一個少有的機會，當問到這一問題時，賦稅的作用似乎是首位的。“我們聽說，共產黨人是主張減少所有賦稅的，有權自己制鹽、釀酒，而且在他們的各種公私行動中，都享有完全的自由。”[[384]](#_384_23)通過這位被審問的耕者使用“我們”一詞可以看出，他似乎不僅是在談他自己的動機，而且也是在講與他同道的村民們的動機。

伴隨對殖民地稅制的攻擊而來的殺人與搶劫，尤其是在起義的最初數月，是以同樣的情結聯系在一起的。正如焚毀納稅名單表達了應將地方生存要求置于政府要求之前的決心，激起許多謀殺和搶劫事件的直接原因似乎是，農民認為，富人和當權者在荒年有將其資產分與窮人的義務——如果不能如此行事，窮人便有權以武力奪取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許多謀殺事件可以直接追溯到地方官員和（或）顯貴沒有遵守村莊生活中的再分配范式。例如，1931年5月，在榮市附近的一個村莊里，11位顯貴遭到譴責并經情緒激昂的集會村民的批準而被處死。他們被控以賦稅“壓榨”人民和“自私自利”——“你們沒有想過與我們分割你們的財產；你們過去只想在官僚政府中升遷；你們今天非死不可。”[[385]](#_385_23)早些時候，在瓊琉（屬義安省），一位地方官員因為拒絕瓜分公共資產而被謀殺。“我的大堂兄漢剛掌管著公共稻田，不愿意將它們借給與他為敵的村民，結果遇害。”[[386]](#_386_23)許多殺人事件表現出來的大眾性質，常常由人數可觀的村民參加決定和執行而加強。[[387]](#_387_23)

然而，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在起義的后一階段，最常見的集體行動是奪取殷實人家的糧食分配給農民。收益分成佃農在面臨將受到旱災襲擊的收成的一多半交出的前景時，往往將全部收成據為己有。在河靜的五個村莊中，38個分成佃農拒絕交納分成地租并奪取全部收成。其中大多數人是同一個擁有100公頃以上稻田的大地主的佃戶。[[388]](#_388_23)在其他地方，地方顯貴和土地所有者被迫將其倉內糧食廉價賣給村里的窮人。在他們拒不從命之時，他們的糧倉就被搶劫一空——按照農民的觀點，這是對他們的糧食的沒收和再分配。正如一位直言不諱的法國軍官所說：“他們所以搶劫是因為他們在挨餓。”[[389]](#_389_23)由此獲得的稻米的數量有時很大——10噸，30噸，乃至50噸——時間上一直持續到1931年春，以致人們相信，這一地區確有相當數量的富裕的土地所有者。[[390]](#_390_23)當然，搶奪糧食的毋庸置疑的理由是生存權利——這一觀念意味著，有人在他人挨餓之時竟然囤積糧食，實屬不可容忍。這樣的搶劫，尤其是在秋季作物歉收之后，甚至觸及了中等土地所有者，盡管省級共產黨的領導人不無道理地擔憂，這樣做會破壞共產黨所希望建立的廣泛的聯盟。“政策就是沒收富人的稻谷并將其分配給受到饑荒影響的人們，執行這一政策激起了農民的極大的熱情。”[[391]](#_391_23)

這些搶劫的準公眾性質表現在，人們通常將戰利品運送到村莊里的公共建筑，然后將它們分給貧窮的村民。一位政治事務視察員在報告中講到河靜起義的進程時，著重陳述了農民在收集和分配糧食時所表現出來的正直特征。

小隊人馬受命扣押富人以換取贖金……我認為，其方式不能算是搶劫。這不是伴隨暴力的搶劫行動……。他們于是尋找惹得處于困境的民眾眼饞的庫存稻谷，然后以一種有序的方式將其取來并分配。[[392]](#_392_23)

就生存倫理的道德規范而言，農民毫無疑問是不顧“法律”而自行其是的。這種對自己所需事物予以區別對待的見識，對于將“農民暴動”一詞用于義安—河靜起義是一種嘲弄。[[393]](#_393_23)違反這些規范的人們就要冒巨大的風險，下面一個也是發生在河靜的實例說明了這一點。“在自衛小組成員向這一地區的大業主搶奪稻谷后，他們將所得糧食自行瓜分，一點也不分給其他團組的成員。龍的行為使得大家都很憤怒。”[[394]](#_394_23)龍在一次約300名村民參加的會議上受到公開譴責并被處死。

隨著饑荒的加重和軍事鎮壓的繼續，起義開始土崩瓦解。起義的大多數領袖遭到追蹤、逮捕或殺害。高官和得到加強的民兵被再次部署到動亂不安的鄉村地區。一項一般的糧食救濟計劃開始執行，饑餓的村民按照要求須先行領取歸順證明書，然后才有資格領取糧食。到1931年夏季，鎮壓行動差不多完全粉碎了這場起義。殖民地秩序重新建立，然而，正如官方報告本身所指出的：“寧靜將成為恐懼的嘆息，而不是和平的安詳。”[[395]](#_395_23)

幾乎毫無疑問，倘若沒有共產黨的作用，這場起義就不會有那樣大的規模和凝聚力。雖然共產黨的確切作用實質上不會影響我正在展開的論證，但是這一“正式的”革命黨與農民之間的聯系卻是有啟發意義的。

一方面，該黨在安南比在越南其他地方都更為強大，而在安南范圍之內，它在義安及其主要城市榮市尤其強大。法國人的情報表明，在起義開始之時，在義安—河靜地區約有300名活躍的黨員。[[396]](#_396_23)更為有意義的或許是義靜革命知識分子的社會譜系。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出身于這一地區的反法高官的家庭，而且他們之中大批的人曾是榮市高瓊怡小學的學生或教師。[[397]](#_397_23)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地區反殖民主義異議人士悠久傳統的較為世俗的繼承者——即伍德賽德所謂的“高官無產者”。現存大量傳單、標語和會議報告足以證明，這些共產黨員中許多人積極參加了起義。事實上，要是沒有只有共產黨才能提供的來自地區外的領導力量，一些多達20000人參加的較大規模的示威，就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村莊一級，也有證據表明，共產黨對一些地方“蘇維埃”的建立起了策劃的作用。

另一方面，似乎十分清楚的是，起義有其自身的動力和自發性，或對共產黨不予理睬，或將共產黨遠遠地拋在后面。印度支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各蘇維埃成立之前給安南支部發出過一項指示，其中就根本沒有提及這些蘇維埃，后來專門在又一指示中指出了安南共產黨的“冒險主義的”政策。[[398]](#_398_23)只是在十月，當起義處于高潮之時，印度支那共產黨普通事務委員會才意識到，應當將武裝斗爭作為一種奪取政權的手段予以認可。那么，我們是在論述一個地區黨的首創精神嗎？或許是，但“黨”這一個詞，在用來指稱一個當時處于相當混亂狀態的團體——當時兩個宗派剛剛勉強實現和解——時，是一個會使人產生誤解的詞。地區委員會的正式期刊，在遲至1930年10月5日之時還在告誡要慎于使用暴力，原因是黨和群眾均未做好準備！[[399]](#_399_23)連義安的省級黨組織也落在了后面。[[400]](#_400_23)當時，至多僅有一部分地方黨組織在開始時支持過起義，而非共產黨的文人以及其他人也許提供了一些最初的推動力，我們不能忽視這種可能性。似乎最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一些黨員決定參加并支持了一場初期的起義。

很清楚，無論如何，共產黨都采納了農民的綱領，而不是相反。該綱領以在經濟蕭條和饑荒的背景下反對納稅開始。如若沒有這些最初的背景，共產黨的數以千計的積極分子就會勞而無功。在反納稅的斗爭中，共產黨與貧苦農民雙方的利益恰恰相符。但在涉及農民綱領的第二要點，也就是關于平等分配糧食的那一條目時，共產黨將反對富農、中農和小鄉紳的運動斷然斥為“冒險政策”的結果。[[401]](#_401_23)雖然共產黨的領導人在看到各階級的廣泛聯合這一點上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沒收比較富裕的人的糧食，卻是傳統的再分配規范的一個雖然暴烈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點上，貧農在自行其是，而且正如官方報告的結論所說：“領導人似乎已經被他們的下屬搞得不知所措。”[[402]](#_402_23)

## 下緬甸——沙耶山起義

在同一年，英國在下緬甸的殖民政權，竟然也遭遇到以前不曾有過的農民暴動。這并不完全是巧合。1930年12月爆發的沙耶山起義，席卷了伊洛瓦底三角洲北部、中部和中東部的大片地區，并一直蔓延到遠在東北部的撣邦。雖然它的進程在各個地區大不相同，但它一直持續到1931年6月前后。起義的大眾性質是毋庸置疑的；大約9000名起義者被捕或被俘，3000名起義者被殺或受傷，350名起義者被宣判有罪并被處以絞刑。[[403]](#_403_23)官方報告議論了起領導作用的村長和僧人的數目。

與交趾支那和安南的起義相比，沙耶山起義主要鮮明的特點，與其說在于其社會基礎，毋寧說在于其領導階層。沙耶山雖然以實際上與越南同樣的苦情激勵農民，但卻明確地利用歷經千年的民間佛教傳統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宣稱自己既是塞特迦明（緬甸傳奇之中的復仇之王），又是佛陀耶扎（神派遣來的佛教天堂的創造者）。咒語、護身符和許多傳統做法（尤其是紋身）得到廣泛利用，它們被認為是免受現代武器侵害的保證。用意識形態術語來說，與安南的對“迷信和不合時宜的風俗”進行斗爭卻幾乎勞而無功的……領導人相比，沙耶山與其農民追隨者的“小傳統”的聯系無疑更為密切。[[404]](#_404_23)

然而，使沙耶山起義成為一場真正的群眾性反抗運動的，并不僅僅是他與民間傳統的貼近，而且是他所借重的農民的生存危機。歸根結底，緬甸在20世紀的歷史不乏想當塞特迦明的人。這樣的先知似的人物，在1906年、1910年、1912年（當時一位夢想當上千年王國國王的人聚集起20000名農村追隨者）以及1924—1926年，引起了殖民地官員的懷疑。[[405]](#_405_23)然而，這些運動，或輕而易舉就被平息，或自行萎縮，或通過悄然投到地方教派的麾下，打消政府的懷疑。

相形之下，沙耶山可以隨時支配農民。農民的運氣在過去的整個十年中一直每況愈下，但到20年代末期卻顯然變得更為惡劣了。與在越南一樣，稻谷價格的暴跌，實際負擔的人頭稅、土地稅和債務是原先的三倍，從而威脅到人們的正常生存。在大量停工的情況之下，城市部門的就業是不可能的。不履行義務的緬甸佃農沒有信貸來源，并且常常被印度人所取代；其余的小土地所有者面臨著立即失去自己的土地（往往落入切蒂亞爾放債人手中）的局面；而尤其是在1930年12月，沙耶山提醒自己的追隨者說，就要收人口稅了。簡而言之，這場危機對一大部分下緬甸農民構成威脅，可能促使他們跌破社會和經濟的閾限，想再由此復原是不可能的。

米價暴跌和與之相伴隨的信貸崩潰直接導致下緬甸耕者的困苦。他們陷入“剪刀差危機”，與交趾支那的農友面臨的情況頗為相似。由于無力償還債務或更多地借貸，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從來就不十分安逸的”佃農，此時愈發貧苦得厲害，因為“他們迄今為止采用的每年借債還錢的制度，已經隨著米價的下跌而完全破產”[[406]](#_406_23)。不僅地主不再提供貸款，而且地租的不算太多的下降與稻谷價格的下降幅度不可同日而語，以致佃農無從“獲得聊以維持生活的工錢”。[[407]](#_407_23)正在掙扎的地主，繼續“攫取他們所能得到的一切，不管年景好壞”。[[408]](#_408_23)不斷增強的減租呼聲遭到固執的抵制，反過來又引發了廣泛的欺詐和抗租行動。拖欠地租的佃農被驅離自己耕耘的土地。由于工資驟降和就業機會的消失，雇傭勞工受打擊最重。一位住區官員發現，這一不斷擴大的階級“受難最為深重，目前僅能勉強維持生存”[[409]](#_409_23)。

與安南不同，這里的問題并不是一個絕對饑饉問題。更確切地說，這里的問題是，長期以來一直每況愈下的生活和經濟保障水準，呈現出大幅度的而且是整體性的下降。這對許多人來說意味著驟然由小土地所有者或佃農淪為按日計資的勞工。這對佃農來說意味著他們與土地所有者交易條件的顯著惡化，因為地租相對于他們的日漸減少的收入維持不變，而且約定俗成的生產信貸也被取消了。

使緬甸農民聚集在沙耶山麾下的戰斗口號，也就是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反抗經濟危機時的人口稅。誠然，存在著其他有關問題：印度佃農和雇傭勞工受到侵害，森林崗哨被焚燒，信奉基督教的克倫人遭到襲擊，土地記錄被銷毀。但正是人口稅——所有耕者直接面臨的問題——成了起義的導火線。

殖民地官方報告在分析起義原因時，注意到了經濟危機與人口稅之間的關系：

有許多口供表明，沙耶山及其副官在努力鼓動農村公開起義時，煞費苦心地利用了人們對賦稅的普遍厭惡，特別是對人口稅和戶頭稅的厭惡。……毋庸置疑，所有務農階層都遭到了稻谷價格災難性下跌的極其沉重的打擊，這種情況大約在起義首次爆發時即已開始，但只是在數月之后才嚴重惡化；毫無疑問，起義的某些動力來自所有這些因素，而1931年的經濟災難肯定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410]](#_410_23)

而且，該報告得出結論：“從根源上講，這場起義的性質應當被視為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經濟性的。”[[411]](#_411_21)然而，矛盾只是表面上的。作者們意在以“政治性的”一詞來強調，沙耶山在經濟蕭條之前很久就已經在策劃起義，他不僅有意根除賦稅，而且要將英國人掃地出門并自立為王。該報告在這一有限的意義上是正確無誤的；沙耶山的意圖至少像安南共產黨的領袖們的意圖一樣是革命性的。

然而，依該報告中的證據判斷，正是由于經濟危機與固定稅收結合在一起，才使得沙耶山的平民支持者們揭竿而起。作為佛教協會總理事會派遣的一個負責調查“過度征收人口稅和戶頭稅”問題的委員會的前主席，沙耶山甚至在經濟蕭條之前即已經親自目睹了強制征收這些稅種激起的怨恨。[[412]](#_412_21)他發現了一個引起不滿的重要根源，他的新聯盟的兩個首要目的是：

1）抵抗強行征收人口稅和戶頭稅；

2）對壓迫性森林法進行公民抵抗，這個法令剝奪了村民出于家用目的自由采用竹木的權利。[[413]](#_413_21)

鑒于殖民地征稅前所未有的幅度，一份繳獲的與起義有關的文件關于除了花盆一切全都上稅的說法，或許并非全屬笑談。[[414]](#_414_21)

迦盧荼（神話中的一種具有巨大力量的鳥）聯盟最初的目的是，無論如何都要以武力抵抗對人頭稅的征收。它在后來形成領導起義的嚴密的組織網絡。“（一位起義領袖在1930年12月拜訪沙耶山）期間提到已經策劃好的組建迦盧荼黨的事宜，所聲言的目的就是抵抗政府對人口稅的征收。”[[415]](#_415_21)與此同時，沙耶山在興實達地區的一位組織了許多此類聯盟的盟友——一位名叫吳亞欣達的還俗僧人——“力陳不要交納人口稅，并聲言他有能使村民免遭政府官員突襲的靈丹妙藥。我們聯盟的任何已經紋身的成員，全都不必交納人口稅。”[[416]](#_416_21)

此外，一旦稻谷市場行市開始暴跌，沙耶山就敏銳地利用實際稅負增加激起的憤怒情緒。起義與稅賦之間的聯系在他向村民發出呼吁時是十分明確的。1930年12月初，在沙耶瓦底，

沙耶山論述了賦稅問題和稻谷市場的普遍蕭條。他規勸自己的聽眾不要交納人口稅，而要揭竿而起。他建議搶奪村長的槍械，割電報線，破壞鐵路，并積極抵抗政府軍。[[417]](#_417_21)

大約與此同時，在向來自許多地區的追隨者們致辭時，這一聯系被表述得甚至更為尖銳。

沙耶山說，稅收時節那時正在迅速逼近。他回憶了過去在沙耶瓦底地區征收人口稅時軍方對村民的壓迫，并說稻米市場該年十分糟糕，窮人遭遇了巨大的麻煩和苦難，他們應當造反以逃避人口稅及其他稅種。[[418]](#_418_21)

1931年初稻谷市場的進一步疲軟，一定使農民有了更多的抗稅理由，而起義者最初的成功，也讓人產生了些許勝利的希望。

沙耶山許諾的太平盛世的性質是什么呢？首先，它是由它要破除的東西而不是由它要創造的東西所界定的。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信條相同，摧毀現存政府確實就是那場革命的主要的基本行動。第一道下達任務的命令是，將所有政府雇員全部殺掉，從總督直至小村村長都不放過。[[419]](#_419_21)這一計劃一旦實現，新秩序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這是一個沒有賦稅的世界。重新征服緬甸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沙耶山告訴自己的來自沙耶瓦底的追隨者：“他們必須與（殖民）政府戰斗，以便收復國家并免于納稅。”[[420]](#_420_21)后來，在德耶謬，他向村民解釋說：“運動的目標是收復緬甸，并許諾說，如果他成功了，他將成為國王并減稅或免稅。”他在卑謬的主要部屬也以幾乎完全相同的詞語表述對自己領袖的即將到手的王權的理解：“只有當緬甸由緬甸人統治之時，稅收才不會重。緬甸人現在變窮，是由于沉重的賦稅。在我們奪回自己的國家時，欠切蒂亞爾放債人的債務也將不必償還。”這種關于太平盛世的幻想可能是消極的，但在經濟蕭條的背景之下，對于無稅生活的期盼，已經成為構筑烏托邦的材料。再用沙耶山大師的話說：“當我們收復緬甸時，我將宣告自己為王并讓你們免于納稅。那時，你們將能夠安寧地生活。”[[421]](#_421_21)

在興實達，沙耶山的地方指揮官吳亞欣達在對地方民眾訓話時明確指出，組建迦盧荼聯盟的主要訴求，就是反抗人口稅。

在沙耶瓦底有許多反抗英國政府的迦盧荼聯盟盟員。……人口稅只是在緬甸征收。英國政府通過征收其他國家并不存在的人口稅，非法地統治著緬甸。如果人們聯合起來，政府將無能為力。[[422]](#_422_21)

如同在安南北部一樣，沙耶山起義一旦發動起來，就發展成為一系列走上自行獨立道路的地方叛亂。在每一種情況下，事件都有為地方苦情訴求的性質；在一個地方，印度人可能被專門挑出；在另一個地方，地方頭人可能被迫逃亡；在又一個地方，林務建筑可能被焚毀。在勃固地區和德耶謬地區，據報道起義者頻繁猛襲村長們的住宅，奪取“稅票”并將其焚毀，“以使人們不再被迫向政府納稅。”[[423]](#_423_21)在上緬甸的央米丁，

該隊人馬在穿越村莊時大聲喊叫：即使有人強逼，也不要納稅。他們宣稱自己是造反者，因此明確表示，他們的全部目的，就是反抗和嚇倒政府，或與之戰斗，以便緩稅或減稅。[[424]](#_424_21)

沙耶瓦底的另一隊起義軍

“穿越賈加勒村，一面大聲喊叫著別納人口稅，別賣稻谷（可能指賣來納稅的稻谷），一面為起義軍的勝利祈禱。”[[425]](#_425_21)

就其地方訴求和普通參加者的動機而言，1930—1932年間的下緬甸起義，盡管帶有建立太平盛世的理想色彩，但同東南亞的任何起義一樣，與一場抗稅起義相近。結束賦稅，特別是遭人憎恨的人口稅，既是沙耶山組建的迦盧荼聯盟的世俗準則，又是他所許諾的太平盛世的主要法規。這也是他的軍團的言行的主旨。一項對殖民地歲入僅有次要意義的財政措施，竟然成為國家壓迫的特殊象征。這實在是值得人們注意的，也是富有啟發意義的。尤其是人口稅的兩大特點，似乎使之成為這種義憤的目標，成為這種殊死反抗的目標，盡管存在著莫大的困難。首先，這是一個絕妙的將民眾結成一體的問題。無論他們生活在哪里，無論他們是小土地所有者、佃農還是勞工，人口稅都是惟一在一個規定的例行時間沉重地壓在他們所有人身上的實質性負擔。其次，同樣重要的是，作為殖民地歲入制度中最刻板的稅種，人口稅對耕者生計的影響，隨農作物產量和稻谷價格的變化而猛烈波動。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蕭條作為莊稼嚴重歉收在市場上的相應產物，便將一項沉重的負擔轉化成為一種明確而又現實的危險，威脅著農民的業已脆弱的生存安排。

起義波及緬甸的（20個地區中的）12個地區，然后才告終結。它于1930年12月22日開始，當時離開征人口稅差九天，又是沙耶瓦底耕者們的減稅或緩稅請愿書遭到代理總督拒絕的翌日。[[426]](#_426_20)由于信賴自己的護身符和紋身的武裝低劣的起義者，在英屬印度軍隊的劉易斯式機槍面前波浪似的成排倒下，結局根本毋庸置疑。抵抗一直持續到1932年中，花費了一年半時間，動用了兩師外來兵力，才將其平定。3000名起義者在進擊中隕滅，沙耶山本人“拒絕為自己作任何辯護，……高昂著頭走上絞刑臺”[[427]](#_427_20)。

抗稅的主題并不是殖民地農民所獨有的。相反，東南亞的“小傳統”有不少逃避勞役和征糧的證據。因此，實際的問題，與其說是政府的稅收是否合法，毋寧說是它激起的怨恨和憤怒到了什么程度。要追究這一問題就是要問，稅收對農民的經濟和社會安排中的中心要素有什么影響。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一項稅收的實際結果，并不是它從農民家庭獲得的收入份額的線性函數。一項3%的稅收，在豐年可能不會對一個家庭的社會地位、生產模式或消費習慣產生巨大影響，但在兇年則可能對一個家庭的這些方面造成明顯的破壞。用托尼的話說，這是水至脖頸還是水已滅頂之間的區別。

因此，具體說明農民經濟狀況與國家財政制度之間這一最具剝削性因而——在其他情況相同時——也最具爆炸性的結合點是可能的。農民的實際收入愈接近其生存界限，愈變化不定（無論是由于自然原因還是由于價格體系），在經濟上對他們的任何索取，都愈可能是并將被認為是具有剝削性的和威脅性的。稅收愈是一成不變——對收獲時節的豐歉和農民各個階層的貧富這兩方面均不予區分——愈可能或遲或早對常規生存構成直接威脅。

沖突的可能性，于是植根于殖民地政府賦稅制度同其農村臣民經濟的“交通模式”之中。緬甸和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在1930年之前對人頭稅的反抗，是后來起義的先聲。[[428]](#_428_20)然而，在20世紀的前30年間，正面沖突的可能性由于至少兩個原因而大幅度上升。第一，農民當時面對著一個在各方面都更為強大的政府，它擁有堅持征收穩定歲入的必要手段，幾乎對農民的任何困難都不在意。第二，以前可資利用的退卻與保護途徑（例如，村莊再分配，國家邊遠地區，趨于上升的勞工需求），都在縮小或業已封閉。1930年的新情況是最后沖突爆發的猝然性及其范圍，這是一場由世界市場的合力所造成的大規模的沖突。

# 第六章 剝削的分析意義：互惠與生存的公正

對農民一詞的大多數定義都至少包括兩條特征。首先，農民是農業耕作者，其產品主要用于滿足家庭消費需要；這就界定了農民的主要經濟目標。其次，農民是一個對之提出要求的更大社會（包括非農民的精英階層和政府）的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這就界定了他在爭取上述目標過程中的潛在對手（或者叫合作者）。我已經證明，從農民的現存困境——需要生存危機的保障——出發，我們一方面可以推斷出農民對于“公平的地主”、“公平的政府”所具有的許多想法，另一方面可以知道農民對于“剝削性的地主或政府”的看法。東南亞的證據說明，殖民地時期的結構性改變使得精英和政府，在短期利益的驅動下，日益嚴重地侵犯農民的道義經濟，剝削得越來越厲害。我們已經看到，在下緬甸和越南的一些地方，特有的人口結構壓力、市場波動和政府行為是激起實際的農民反叛的爆發點。

邊緣耕作者的生存問題是世界上多數農民的共同命運，我所描述的一些變化過程在東南亞以外地區同樣存在。有鑒于此，我的部分論證也許有助于研究一般的農民政治活動。我的論證會對農民的公正和公平標準——農民認為什么樣的權力運用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提供一些看法。雖然由此形成農民觀念的文化、經濟條件和歷史經驗的多樣性使得此類研究容易出錯，但在社會結構中處于相似地位的耕作者所面對的相似的生存、租稅問題，很可能使他們對公正和剝削培育出共同的感覺。

## 剝削的標準

什么是剝削？當我們說“政府（或地主）剝削農民”時，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農業制度是否比另一些農業制度剝削得更厲害些？倘若如此，我們怎樣去證明這種情況？

剝削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一些個人、集團或階級不公正、不合理地從其他個人、集團或階級的勞動中得到好處，或者從犧牲其他個人、集團或階級的利益中得到好處。”[[429]](#_429_20)這一思想中至少包含了社會主義學派和非社會主義學派都能接受的剝削的兩個特征。首先，剝削被認為是個人、集團或組織機構之間的一種關系；被剝削一方的存在就意味著剝削者的存在。其次，剝削是對勞動和報酬的不公正的分配，于是就需要確立可據以評價現實關系的某種分配公正的標準。不公正的存在說明存在著公正準則。然而，除了這一小點共同認識，就不存在一致意見了。特別是在何為公正的評價標準問題上，可以說有多少社會科學家不顧一切地涉足這個危險概念，就有多少種答案。

一旦確立了據以判別何為公正或平等關系的標準，原則上就有可能通過判斷任何特定的關系與這條標準的差距，來說明這種關系的剝削性如何。當然，問題在于別的人也許不承認這條標準的正確性。例如，對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來說，勞動價值論提供了評價剝削程度的理論基礎。由于一切價值最終都是勞動的結果，光憑對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租金、利潤和利息的形式而強占的剩余價值，就成了衡量剝削的尺度。然而，你幾乎不需要同意勞動價值論就能看出剝削是一種客觀關系，讓我們可以把較輕的剝削同較重的剝削相區別的客觀關系。B.穆爾問道，在拿走三分之一收成的地主和拿走十分之九收成的地主之間，難道沒有區別嗎？[[430]](#_430_20)根據對剝削可能給出的任何定義，有些關系比其他關系具有嚴重得多的不平等性和強制性，因而可以很容易地被斷定為具有客觀的更嚴重的剝削性。由于人的社會地位存在明顯的不同，客觀地研究剝削十分可貴。

然而，通過建立抽象的公正標準推導而來的剝削概念有兩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是公正標準賴以確立的道德原則的可接受程度。勞動價值論畢竟不是惟一的可用于構建剝削本質論的基石。舉個極端的例子來說，放任主義傳統中的邊際主義經濟學家把勞動的標準價值等同于它在市場上可能賣得的價錢——不管碰巧賣得多少價錢。從這種狹隘觀點出發，只有那些以詐騙和赤裸裸的強制——不同于市場力量的強制——為基礎的關系才可能被視為剝削關系。任何先驗的公正概念都預設了規范的（如果說不是分析的）傳統。那些游離于這一傳統之外的人們則運用不同的標準，如果他們還承認剝削這一概念的話。最終說來，此種關于什么是剝削、什么不是剝削的爭論，是以傳統規范為依據的，而不是訴諸經驗的研究。

靠演繹推理得出的剝削概念由于損害了分析的功用，使其第二個難題更加嚴重。這一難題產生于下述事實：此類演繹出的理論在先驗的剝削概念和被剝削者的主觀情感之間，幾乎都不能提供概念上的聯系。如果能夠證明被剝削者的主觀情感同演繹而得的標準在各方面相一致，當然就不存在這一難題了。但在缺乏概念上的橋梁的情況下，由理論所確認的剝削水平與受害者的被剝削感之間的任何相似之處，基本上都是偶然性的。如果不管有關人員的觀點如何，理論的目標僅僅是把一些境況歸類為或多或少的不公正，那么，這種潛在的不一致就不是什么大麻煩。另一方面，如果要在理論尚未揭示的剝削和受害者所感覺到的剝削之間建立起某種關系，麻煩就嚴重得多了。

當兩者出現不一致時，另外確立一個解釋這種不一致的理論，是個拯救理論的辦法。這正是“錯覺”概念的功能。理論指出了工人或農民遭受的剝削，而他們的知覺（假定知覺可以精確地加以測量）同他們的“客觀境況”卻不一致，那么，他們就被說成是處于“錯覺”狀態。一些或全體被剝削者對自己真實境況的誤解，為典型的革命政黨提出了一項關鍵任務：揭露那些妨礙人們認清事物本來面目的社會神話或宗教學說。[[431]](#_431_20)

“錯覺”概念忽略了非常真實的可能性，即行為者的“問題”并不單單是錯誤知覺的問題。它忽略了這一可能性，即行為者可能有自己的評價公正和剝削的固定標準——這一標準引導他對自己的境況作出同應用演繹理論的外部觀察者完全不同的評價。直截了當地說，行為者可能有自己的道義經濟觀。如果這樣的話，他的觀點同理論觀點的不一致，就不是由于他沒有能力清楚地認識事物，而是由于他的價值標準問題。當然，人們也可以把這些價值標準說成是一種錯覺。但是，就它們植根于行為者的實際需要的程度而言，就它們排斥任何“再教育”企圖的程度而言，就它們繼續為行為者解釋境況的程度而言，正是這些價值標準而不是理論可靠地指導著他的情感和行為。

如果一種關于剝削的理論的分析性目標，是要揭示有關被剝削者的知覺問題——他們的剝削感、他們的公正觀念和他們的憤怒——那么，就不應該從抽象的規范標準出發，而應該從實際行為者的價值標準出發。這種方法本質上必須從現象學出發，必須弄清楚工人或農民對境況的判定如何。如果農民認為占收獲量20%的地租是合理的而占40%就是不公正的，那么，他是如何作出這一評價的呢？他使用的公正標準是什么呢？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就有可能構建出有實用價值的底層階級的道義經濟。

在提出我認為反映了農民的生存困境及其道義經濟的剝削標準之前，可以先舉例說明一下推演而來的公正概念的困難。為此，我們僅以地主與佃戶的關系為例來說明。不過，只要進行必要的細節調整，這里談到的情況就同樣適用于農民與政府的關系。我們將解釋并評價佃戶可能會使用的四條潛在的公正標準。

生活水平

可以想見，佃戶對于同地主的交易中的公平的看法可能直接反映了佃戶的生活水平。這樣，能讓農民過上相對的好日子的租佃制度，一般會被看做是較為寬厚溫和的制度；而幾乎不能保障佃戶的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租佃制度，就會被視為剝削制度。這種過分簡單化的表述并非沒有價值。對于緊緊挨著生存邊緣線的人來說，地主拿走他一籮糧食意味著他的巨大犧牲；而對于有些剩余物的人來說，這種犧牲就不是很大了。人們會認為，即便是少量的地租，前者也會怨恨不已、叫苦不迭；而后者則會認為較多的地租或許難以負擔，但不會構成對全家生存的直接威脅。因而，對于一些人來說至少可以忍受的租佃條件，對于另一些人來說則可能無法忍受。在這一意義上說，很難想像有什么剝削標準同農民生活的物質條件無關——同特定的對于佃戶家庭資源的索取權對人性的影響無關。

佃戶的生活水平即使必將改變他對剝削的看法，也不是惟一的指導因素。此外，還有一個同剝削相關的方面必須予以考慮。即便是同樣赤貧的佃戶也可能同地主有明顯不同的關系，而這些也可能影響他們對剝削的評價。例如，當一個佃戶根據自己的生活水平得出的結論不同于另一個佃戶根據自己同地主的交易關系得出的結論時，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此類情況在歷史上并不罕見。假設臨近饑荒時，地主們減少了索取佃戶收成的份額，還向饑餓的佃戶們敞開糧倉。這樣，生活水平方面可能的下降就帶來了佃戶和地主之間交易條件的改善。[[432]](#_432_20)與此相反的情況也是可以想見的：佃戶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或許由于保持繁榮的市場，或許由于新的掙錢機會），但他們同地主的交易關系卻在惡化。[[433]](#_433_20)

單就農民的生活水平而言，它似乎只能是關于剝削的現象學理論的不完備的基礎，因為它忽視了階級聯系中的關系特性。確實，除非我們知道佃戶的生存處于怎樣的不安全境地，我們不能知道他會認為對他的資源的某種索取是否可以容忍。然而，同樣確實的是，一個富裕些的佃戶可能把某些不危害其生存的索取看成剝削，而較窮的佃戶倒可能認為這些索取是可以忍受的。無論如何，一種完備的剝削理論，必須不但考慮到佃戶的生活水平，而且要考慮到連接佃戶與地主雙方的交易的性質。

僅次于最好的選擇

另一個評價地主與佃戶的關系之合理性的方法，就是看“一旦結束這一關系，佃戶將要承受怎樣的損失”。他的“僅次于最好的選擇”如何更為糟糕？這里給出的論證是：佃戶是個現實主義者，他對當前租佃關系下的凈得利益同例如做個薪資農業勞動者的凈得利益進行了比較。他所感受到的不同，是自己幸運的程度，對當前的角色比對“僅次于最好的選擇”更為喜歡的程度，因而表明他很可能認為他作為佃戶的身份是合理的。

然而，如果農民確實運用這一標準檢驗公正與否，那么，對于幾乎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關系，他們都會認為是合理的。因為除了社會最底層的人，大家都有一個比當前的境況更為糟糕的所謂“僅次于最好的選擇”。如果說對于“臨近饑餓”來說，“僅次于最好的選擇”是“完全饑餓”，那么，難道佃戶會認為“臨近饑餓”是可以接受的、合理的嗎？顯然不會。這可能表明，對于至少能使他活下去的關系，他有多么大的依賴性；或者說，為了避免更糟的命運，他多么愿意遵守這種關系的條件。但是，依賴性和被強制的遵從很難說就是合理的。若非如此推理，就會把“什么是公正”等同于現存的一切。對佃戶的勞動和收獲的索取權，怎樣才算合法？人對休息和食物之需要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沒有別的東西的話），這就對此作了普遍性限制。

互惠與平等交換

許多交換理論家主張，同人的任何其他關系一樣，評價“地主與佃戶”關系是否是剝削關系，就看它是否符合互惠準則的要求。[[434]](#_434_20)實質上，這里所蘊涵的道德思想是，一個人應以德報德，因而平等交換界定了何謂公正的關系。按照這一觀點，以均等互惠為特征的“地主—佃戶”關系產生了感激之情及其合理性，而有利于地主一方的不平等交換則會導致道德義憤和不公正。

假定互惠準則是一條普遍的道德標準，那么，如何把它運用于“地主—佃戶”關系呢？主要問題在于如何定義該準則所要求的“平等交換”。這是人們所熟悉的如何比較蘋果和桔子的難題。例如，地主提供多大的保護才能相當于佃戶收成的20%的價值呢？

對于這個難題的一個解決辦法是，以當事人——佃戶——的行為作為其價值標準的指導。他愿意交出多少收成以回報地主所給予的保護呢？佃戶是他自己如何需要并評價地主保護的最好判斷者，因而地主保護的重要性可以由佃戶為得到保護所愿意付出的東西來衡量。正如古爾德納所指出的，服務的價值“隨著對它所帶來的好處的需要程度的不同而不同”[[435]](#_435_20)。這一方法至少有一個長處：避免了抽象的價值標準，而注重具體的社會選擇中所蘊涵的價值標準。

然而，這一方法也有致命的缺點，就是它混淆了境況強加給人們的選擇與人們認可其合理性的選擇。對于忍饑挨餓的佃戶來說，食物的價值極為巨大；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活命，他也許愿意交出下次的全部收成、自己的土地甚至親生骨肉。假定他付出了別人強加的代價，也許有人還要稱之為“平等交換”——他也可以選擇餓死嘛。但是，你很難想像，佃戶除了認為此種交換是十足的敲詐勒索之外，還會是什么！對于饑餓中的佃戶來說，食物的價值是由需要的程度所決定的，而需要本身又是對財富和權力的現存分配所造成的社會結果。除了服從，他別無選擇，但肯定不會感激地認可那些把不人道的選擇強加于他的社會安排是“合理”的。若非如此推理，那就背離了常識，就會認為權力系統可能強加給人們的任何卑劣的選擇都是合理的。

顯而易見，一些人的權力與另一些人的脆弱地位，促成了違反普遍公正標準的交易。如果以平等價值的交換作為公平的檢驗標準，那么，人們被迫達成的實際交易就不能認為是體現了價值，因而也體現不了公平。佃戶對食物的需要可能是他的依賴性的尺度，也是那些控制食物供應的人對佃戶行使的權力的尺度，但決不是這種權力的合理性的尺度。同其他人一樣，佃戶們能毫不困難地分清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他們在強迫之下所必須接受的東西。換句話說，必須認識到，在交換中確有真正規范的價值標準，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得到的實際選擇方案。

公正的價格與合理性

只要價值概念并非來源于由境況強加于交換行為的“現行價格”，那么，以交換中的平等價值概念作為公正的情感基礎也許仍然是可能的。這是P.布勞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表達的觀點，它原則上適用于“地主—佃戶”關系：

但是，如果掌握著服務與服從的權力來自于對人們所需要的利益的供應，那么，這種權力的行使就不會被體驗為壞事。如果從屬者在服務與服從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大于他們從社會公正準則中期待得到的回報，那么，他們就會認為自己的地位是不錯的，對統治集團就會表示贊同，從而使之權力得到加強，使之權威得到合法化。如果從屬者的期待勉強地得到滿足，那么，他們就既不會有被剝削之感，也不會給予掌權集團以堅定的合法化的批準。然而，如果壟斷了重要資源的統治集團所提出的要求遠遠超過了社會規范所確認的公平合理的范圍，那么，從屬者就會有被剝削之感，就要抓住一切機會逃避或者反對統治集團的權力控制，因為他們的境況基本上無異于遭受強制力壓迫的群體的境況。[[436]](#_436_20)

布勞把實際的交換價格與決定公正價值的規范兩者作了區分。兩者之間的差距成為人們借以評價一種關系公正與否的標準。交換中高于公正價值的剩余額，促進人們作出交換合理的反應；而虧空額則激起人們的被剝削感。

在實際的交換費用之外存在著“社會公正準則”，對這一假設的證明似乎有重大意義。涂爾干提醒我們注意，“對社會所使用的各種服務的價值以及對用于交換的物品的價值，一切社會、任何時代都有一種模糊而實在的意識”。[[437]](#_437_20)這種“真正”的價值“極少同實際的價格相符合，但這些［實際價格］不可能在任何方向上超出一定范圍而不顯得反常”[[438]](#_438_20)。每當強迫進行的交易犯下過錯的時候，“公平的價格”即“真正價值”都是暗暗存在著的。為了得到貸款而交出孩子，為了物質上的享受而出賣天賦權利從而付出精神代價，這些都是極端的例子。弱者的需要使得強者能夠進行背離真正價值的強迫交易——這樣的交易顯然是不公正的和敲詐性的。即便是在自由同意的基礎上達成的契約，只要有一方被迫付出某種代價從而背離了雙方共有的公平價值意識，那它也可能被認為是不公平的。正如涂爾干所指出的，有關最低工資的法律，正是產生于這種公平價值觀。制訂這樣的法律，正是為了防止雇主濫用權力、強迫進行“不公平”交易。

關于公正價值概念的證據不僅來自于這種道德情感方面的反映，而且體現于具體的歷史運動。法、英兩國歷史上令人肅然起敬的“大眾稅收”和饑餓暴動的傳統，是這方面的著名事例。什么是面包的公平價值？當時，人們對此持有一種共同的流行看法，當它過高時，就激起了人們的道德義憤，人們還占領了市場。“這一模式的主要行動不是搶劫糧倉、偷竊糧食面粉，而是‘確定價格’。”[[439]](#_439_20)“暴徒們”照自己認為是公平的價格而不是市場價格付錢，這在當時十分普遍。這樣的民眾和農民“暴徒”常常自視為實施流行的共同道德觀的法典制定者（自稱為“管理者”的社會群體）。

在任何特定的農業制度下，佃戶中似乎也有與此相似的道德共識。在佃戶為地主提供的物資和服務同其所得回報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被認為是合理的，而對這一準則的偏向地主的重大背離看起來就是剝削。當然，此類準則因地點的不同而不同，也因時間的不同而不同。盡管有這些可變因素，但也有某些不變因素。第一，階級之間正在處理之中的普遍的惟一的交換關系是土地使用權與地租的交換；第二，只要事關處于生存危機之中的佃戶，他們全體所面臨的福利、安全等共同問題，就會促成對于地主行為的共同的道德期待。

因此，對于剝削的任何有實際意義的分析，至少應包含三個因素。它必須注意到社會關系中的交換特性；它必須找到社會成員期望從這些關系中得到滿足的人的共同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它還必須從實際存在著的普遍流行的“公正價值”概念來著手研究。

## 剝削——一個道德難題

對公正準則的論述使我們直接面對這一事實：我們對剝削的態度迄今為止過于片面地傾向于物質第一主義了。正如照這一態度所做的那樣，對剝削的分析從農民家庭預算的已知情況出發，并從中減少農民的需要和利益——這種分析有陷入一位著作者恰當地稱之為“方法論個人主義”的風險。[[440]](#_440_20)這就是說，它冒險地把農民純粹看成是不道德地搜括周圍環境以成就個人目標的“市場個人主義者”——其個人目標就是使自己的生存安排穩定化。這種觀點把個人同社會相割裂，社會只不過是個人必須活動于其中的環境。

的確，在大多數農民的生活中，保障生存的目標確實是不可減小的當然之事。但如果僅限于此，那就看不到農民行為的關鍵性的社會背景，還會看不到這一主要事實：農民出生于其中的社會和文化，為他提供了既定的道德價值，一套具體的社會關系，一種對于他人行為的期待模式，還使他形成這一切文化因素過去是如何實現類似目標的看法。一個社會中的人的任何目標都有同樣情況。比如說，尋找配偶的需要，也可以視為“當然之事”。但是，婚姻的形式以及這些形式的意義和配偶間的相互期待，實質上是文化的、歷史的創造物。說人們是社會人，并不否認人們有創造新形式、打破舊形式的能力，僅僅是要指出人們不是在空空如也的舞臺上活動，不能夠任意地規劃自己的生活。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切農民行為中的文化的價值和形式。莊稼歉收的農民并非胡亂地作出反應。他清醒地想到那些他可以適當地求助的人們，想到自己有理由從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那里得到些什么。此外，他在采取行動時，希望自己的社會地圖大約是準確的，希望自己關于道德權利結構的概念同他人的道德義務感相吻合。與此相似，在義安和河靜兩省，普遍沒收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和公有土地的糧食的做法，只能出自于在當時情況下人們對于什么是正當之事的普遍共同的觀點。當沙耶山鼓動下緬甸的耕者拒付人頭稅時，他同樣訴諸人們對于造成“政府的人頭稅不可接受”的實際情況的共識。他的呼吁依賴于蕭條期的此項稅收帶給人們新的苦難，依賴于“英國人竟然對緬甸人所認為的大自然的免稅贈品征稅”這一事實。

于是，不論在地方常規活動中還是在起義時的暴力行為中，共同的道德理念結構，即對于何謂公正的共同觀念，都融入了農民行為的組織結構。正是這一份道德遺產，在農民暴動中選擇了這些目標而不是別的目標，選擇了這些形式而不是別的形式。正是這一份道德遺產，使得出于道德義憤的集體行為（雖然很少預先協調過）成為可能。

談論正義的憤怒，同時就是談論公正的標準、道德的價值標準。因此，當我們討論農民的生存道德時，我們就不僅僅是在討論關于農民收入的理論或關于“相對剝奪”的理論。此類理論本身不過是告訴我們農民有難題。農民是怎樣看出這個難題的？如果有人負責的話，他認為誰應當對他的苦境負責呢？他對周圍的人們有何期待？他怎樣反抗？這些問題都超出了集中分析其物質福利水平的范圍。

道德激情顯然是我們所談到的農民暴動的內在因素。那么，我們怎樣才能理解這種道德激情呢？我們怎樣才能理解農民的社會公正感呢？我認為，我們可以從堅實地蘊涵于農民生活的社會模式和禁令中的兩條道德原則——互惠準則和生存權利——著手研究。把互惠準則和生存權利二者視為“小傳統”的真正的道德要素，這是有充分根據的。在人際交往行為中，互惠起著核心道德準則的作用。生存權利實際上界定了在互惠基礎上結成的共同體的所有成員必須得到滿足的最低需要。這兩條原則同農民經濟生活中生命攸關的需要是一致的；二者都體現在許多具體的社會模式中，而這些社會模式將其力量和延續性歸之于農民能夠施加的道德認可的力量。

## 互惠與交換的平衡

互惠這條道德原則滲透于農民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之中。它植根于這一簡單觀念：一個人應當幫助那些幫助過自己的人，或者（按照最低綱領主義的表達）至少不損害他們。[[441]](#_441_20)更具體地說，它意味著被接受下來的禮品或服務為接受者帶來了相應的義務——有朝一日要以相當的價值給以回報。涂爾干認為，這種平等交換的觀念是在一切文化中都能看到的普遍的道德原則。包括馬利諾維斯基和莫斯二位在內的許多人類學家都已經發現，互惠準則是傳統社會中友誼和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礎。[[442]](#_442_20)

在東南亞的鄉村經濟中，互惠原則在大量的活動中都發揮著作用。爪哇的互助合作形式“gotong—rojong”是有組織互惠的著名事例；互助活動通過鄰里會餐的儀式得到加強，這是農家生活的關鍵事件。在泰國鄉村，互惠被看做是支持家庭內部和家庭之間的社會行為的道德基本原則。[[443]](#_443_20)在菲律賓，個人聯盟這種模式的闡釋主要是參考以慚愧之情和義務感作為動力的互惠。這種互惠觀念就是：“被接受了的每項服務，不論是否出于請求，都要給以回報。”[[444]](#_444_20)在插秧和收獲季節，以及在諸如婚慶等典儀義務超過家庭的勞動或實物能力的臨時性慶祝活動中，互惠是典型的勞動交換模式的觀念基礎。在每個類似場合，提供幫助的家庭都明白，它可以期待日后得到類似的回報性服務。在一個村子里，同樣的原則常常促成了食物資源的交換。受到巨大生活壓力的家庭可以指望得到小康家庭的幫助，并且盼望著情況逆轉時予以報答。

顯而易見，在周期性的農業生產和典禮儀式中，內在地大量需要互惠。在鄉村住宅區內部，共同體的社會壓力強化了義務感，因而互惠可以發揮廣泛的作用。雖然這里的例子所涉及的都是相同服務或物資的交換，但并非必然如此。毋寧說，互惠所要求的是類似價值的交換。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關鍵是要懂得互惠義務是一條典型的道德原則，懂得它既適用于地位相同的主體之間的關系，也適用于地位不同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在階層分化尚不太普遍的農業社會里，這些關系一般以“保護人—被保護人”的契約形式出現。關于精英與其保護人之間的此類社會紐帶，大量的人類學文獻都強調互惠即相互的權利與義務的道德觀念，它給人們以社會力量。[[445]](#_445_20)當然，保護人與被保護人之間所交換的物資與服務不可能完全相同，因為這種關系的性質是以雙方的不同需要為基礎的。盡管交換的精確性將充分反映保護人與被保護人雙方當時的需要和資源情況，但作為一條普遍規則，保護人總是被期待著保護被保護人，并保障其物質需要，而被保護人則以其勞動和忠心報答保護人。這種關系的道德風氣常常通過禮儀上的親屬關系的典禮活動或其他象征性紐帶得到強化。

對東南亞農村階級關系的許多詮釋，也許是大多數詮釋都以這種“保護人—被保護人”的交際模式為基礎，這種交際模式用于解釋階級間的追隨者和小集團的普遍性。[[446]](#_446_20)在村莊內部的社會壓力中也許可以看到此類關系的規范的行為模式，它的運作要求相對富裕者支配個人資源的方式有利于共同體中的較窮者。通過對待個人財富的慷慨態度，村民既可以博得好人的名聲，同時周圍又集聚起一批聽話的感恩戴德的追隨者。被保護的追隨者有著強烈的意識，知道他們從這種關系中可以正當地期待得到什么，知道這種關系可能要求他們做些什么。如果期待得到滿足，這種分層的模式就能得到道德的認可。這就是說，地位的差異本身并非不合理；保護者的道德地位取決于其行為同整個社區共同體的道德期待相符合的程度。

如果說權力差異的持久增長開辟了通往我們稱之為“保護”的道路，那么，它也開辟了通往剝削之路。這是因為這種差異使得強勢集團有可能利用弱勢集團的需要而違反等值互惠的準則。只要報答方多少有點平等地位，交換就容易得到平衡和穩定。例如，一個小農主積極地幫助同他地位差不多的小農主鄰居收割莊稼，因為他自己日后將需要同樣的幫助。他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別人，但是，如果他希望繼續得到所需的服務的話，那么，考慮到自己的利益，他也必須樂于助人。然而，一旦有了重大的權力差異的介入，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消失了，剝削就可能到來了。這是因為，社會中的不平等首先意味著對社會上緊缺資源的不平等控制；正是這一差異賦予一些人索取高價的力量即強制力，強迫他人進行不平等交易，即違背廣泛接受的公正價值意識的交易。在社會分層體系中占據了上層地位的人們，常常處于單方面地供應物資和服務的地位，而處于下層的人們為了生存和福利，正極度地渴求這些東西。例如，假如他們控制了所在社區的大量土地和食物資源，他們就能夠把反映了其壟斷權的價錢強加于人。對他們所控制的食物資源的需要是高度剛性的——只要人有營養的需要。這一事實潛在地使得他們要求服從自己的一切強制性價格。

因此，農村階級關系中的關鍵問題在于，在被保護人看來，依賴關系基本上是合作的、合理的關系，還是剝削關系？在這里，屈從和合理的問題分析起來是性質不同的問題。[[447]](#_447_20)假使有互惠原則，我認為，至少可以對平等交換和不平等交換作大致的區分，并且把不平等交換同剝削觀念相聯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設想，在農民和地主（或農民和政府）間的交換平衡上的任何“大轉變”（即在農民提供給精英的物資與服務同其接受的回報物的比例上的轉變）都會在人們所看到的關系的合理性方面帶來變化。應當強調的是，這里的評價標準不是外部觀察者借以判斷是否存在剝削的抽象標準；有充分理由認為，它是農民本身借以實際地評價自己同他人關系的標準。這一論點以B.穆爾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寶貴見解為其先導——穆爾等人均已證明，流行的多種公正觀念中有一個共同的內核。[[448]](#_448_20)正如穆爾所闡釋的那樣：

一個不維持和平、掠走農民的大量財物、霸占婦女——正如19和20世紀在中國的廣大地區所發生的那樣——的封建君主，明顯地是剝削者。在這種情況與客觀的公正之間，存在著他的服務同他拿走的農民剩余物之比例大有爭議的種種等級。此類爭議可能激起哲學家們的興趣。它們不可能分裂社會。這里的論點僅僅主張，那些戰斗者、統治者和祈禱者的貢獻，必須讓農民看個明白，而農民為此付出的報答同他所接受的服務不得嚴重地不成比例。換句話說，民間的公正觀念，確實具有理性的和現實的基礎，凡背離這一基礎的安排就可能需要進行欺騙；背離得厲害，就需要暴力。[[449]](#_449_20)

對于被保護人或從屬人員來說，評價的關鍵因素是他接受的服務同他付出的服務之比例。但被保護人的比例和地主的比例并不必然對等；保護人之所得并不必然地是被保護人之所失。例如，建立一所新學校，使得地主幫助佃戶子女上學的事做起來較為容易了（代價較低了），但并未必然地降低此種服務的價值。于是，地主在交換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佃戶的地位并未變壞。然而，在其他情況下，雙方則可能發生爭執，例如從前收租占總收成50%的地主現在改收75%，其所得是以佃戶的直接損失為代價的。

這里所用的平衡概念不能直接量化。一方面，仍然存在采用多大的交換比率的問題：以多少籮糧食換取多大的保護和生存保險才是公平的呢？另一方面，還有不可分開計算的精英階層的服務問題（諸如主辦公共工程、學校、鄉村節日活動和集體慈善事業等），因為這些服務不能清楚地劃分成個人之間的交換。然而，交易費用的轉移方向和近似數量常常是可以搞清的。一旦服務的種類、次數及數量在收付兩個方向上都確定下來，我們對現行的交換模式就有了粗略的圖示。倘若精英中止了服務而農民的服務卻維持不變，我們就知道平衡變得對農民不太有利了。倘若精英沒有提供更多的服務卻要求得到更多的服務，我們也就知道農民處于不太有利的地位了。[[450]](#_450_20)

在互惠服務的性質和數量之外，特定服務的成本會有改變。在雇傭勞動擴張的年代里，土地所有者要從佃戶那里得到自由人勞動的服務就比從前更難了（機會成本更高了），從而影響到交換的平衡。特定服務的價值的變化使得平衡可能發生類似的改變。于是，在西歐封建時代早期的社會混亂中，人身保護具有特別高的價值；而當入侵活動平息、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其價值就隨之下降了。在此類情況下，服務的成本或價值的改變，會導致交換合理性的改變，雖然交換的內容保持不變。

對交換平衡的任何評估也必須考慮整個互惠模式，就像農民自己必須做的那樣。越是早于資本主義的時代，交換越可能涉及耕種安排和收成分配之外的種種互惠服務。在農民的估價中，地主在緊急關頭的幫助、影響力和保護可能比他多交的收成份額的5%或10%更有價值。此類服務的消失可能給農村精英的社會合理性帶來危害，盡管土地所有者會減少收成量的索取和對農民勞動的要求。

當然，如果我們不僅要知道服務價值改變的方向，而且想知道改變了多少，如果我們想要測定向相對方向推動平衡的變化的凈效果，上述互惠的概念化就遇到了困難。精確的測定是辦不到的，但正如穆爾所指出的，此類模糊轉變不可能引起社會的分裂。然而，我們同經歷了這些轉變的農民一道，可以看出大致差異。在諸如湄公河三角洲和下緬甸等地區，自1910年到1935年期間在交換平衡方面針對農民的明白無誤的轉變，使得精確地測定轉變幾乎成為不必要的事情。

所有這些并不是說在交換平衡中的公平規范不會因文化與時間的不同而不同。它們肯定會有不同。19世紀的中國農民所認為的公平地主，在當代泰國農民看來，似乎壓迫性十足。因此，如果看不到最明顯的差異，僅僅根據精英和農民之間相對的交換平衡，就草率得出關于兩種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下的農村精英的相對合理性的結論，是很危險的。在這方面，隨文化變動的范圍也不是無限的。顯然，索要收成而使得佃戶挨餓并不給任何回報的地主，其剝削本性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十分明顯的。在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在交換平衡方面的任何大轉變很可能對交換關系的合理性帶來相應的影響。

互惠原則把“錯覺”問題和“外部鼓動者”的作用放到了一個新視角上。由于能敏銳地評價自己同農村精英的關系，農民們能毫不困難地認清什么時候自己被要求做到的越來越多而得到的回報卻越來越少。農民們并不那么受關于階級關系的“神秘化”的支配；他們不需要局外人幫助他們認清每天體驗著的不斷增長的剝削情況。這并不意味著局外人無足輕重。相反，他們對農民運動常常起著關鍵作用，這不是因為他們說服農民相信自己是受剝削的，而是因為在剝削條件下，他們提供了幫助農民行動起來的動力、援助和超地方組織。[[451]](#_451_20)因而，正是在集體行動的水平上，而不是在評估階級關系的水平上，典型的小規模社會生活造成了農民的無力。

互惠平衡或交換平衡的思想意味著有一個可能的連續體，其整個范圍從交換平等到完全強制的非互惠關系。就交換關系牽涉到權力不平等的當事人而言，它們可能是不平衡的。然而，正是交換關系如何不平衡的問題，具有重大的分析價值——因為特定的互惠平衡在階級關系的質量和穩定性兩方面都具有重大影響。

有三個“地主—佃戶”關系的實例可以用來說明互惠程度上的重大差異，從而帶來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合理性程度的重大差異。所有這三個實例都是從菲律賓呂宋中部概括出來的。它們的從較低到較高的剝削程度順序，不但反映了我們分析的連續體，而且反映了歷史的連續體。[[452]](#_452_20)

20世紀初，呂宋中部地區創辦許多新水稻農場的人們，確立了一種租佃模式：在階級不平等的基礎上，體現出相當程度的互惠。其典型形式是，采用生產費用和收成全部平分租佃制。地主可能出種子錢、插秧費，有時提供役畜，而打場和灌溉費則雙方均擔。最重要的是，地主在青黃不接時分發大米（無息）；他還分發貸款（有息），如遇歉收則可以不還。在租佃本身的條件之外，佃戶遇有生孩子、宗教洗禮或結婚等大事，或當死亡、疾病襲來時，農場主通常都要作出個人貢獻。最后，在地方上占支配地位的地主，常常要為全社區提供服務，包括組織和贊助地方慈善事業、公共工程和節日活動，排解地方爭端，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同外部權威們打交道。至于佃戶方面，他要負責生產費用的不足部分，提供自己小塊地上的勞動和農場主所要求的附加勞動，以及作為地主的地方政治集團的成員所應盡的各種服務。

到了20世紀20和30年代，此類農場里的交換平衡就被打破了。[[453]](#_453_20)土地所有者的興趣逐步地從地產轉向了地方城鎮的經濟和社會的優勢方面。隨著他們的撤離，他們對貧困佃戶的及時幫助，以及他們曾經扶持的集體服務，都減少了或者取消了。最嚴重的是，每年青黃不接的幾個月里的糧食借貸，也急劇減少了。用任何標準來衡量都可以看出，在互惠平衡方面發生了重大改變——剝削增加了。佃戶們都銘記以前的地主，說他們是好人；談起以前的租佃制度，都認為它比較公平。此外，剝削水平上的這一變化，也反映在佃戶的騷亂和暴力活動的興起上。

最后，如果我們轉而看看成為呂宋中部的部分地區有特色的純粹地租所有制，那么，佃戶同地主的關系就常常成了直截了當的剝削關系。典型情況是，土地所有者除了土地之外什么也不給，而且常常索要很高的固定地租。生產費用他一概不管，把農業生產的風險完全轉移到佃戶身上。事實上，雙方的全部關系被簡化為土地所有者或其代理人每年露面一次來收租的關系——當然，除非他要求佃戶直接送交給他。

上述演進過程并不只是由目光冷酷、薄情寡義的收租人取代寬宏大量、感情豐富的地主；它更反映了地主對于佃戶的交易權力的變化。其中部分變化屬于人口統計學的變化。創建農場時，容易搞到土地；佃戶只要愿意，到別處去也能找到機會。后來，邊境關閉，人口增長，地主便處于一種可以對佃戶多取少予的地位。還有部分變化是政治上的。保障地產權的國家權力的上升，導致日益輕視以創建強大的地方被保護人群體作為爭取權力的手段。實際上，“地主—佃戶”關系中的互惠程度——剝削的水平——是變化中的鄉村權力平衡的功能之一。

在這些相繼出現的“地主—佃戶”制度中，每種制度的剝削程度都高于前者，這一點可以得到合理的證明。只要瞧瞧地主為佃戶做些什么、佃戶為地主做些什么，我們就會明白，每種交換關系對佃戶都越來越不利，而最后一種幾乎完全不能稱之為交換。把早期的莊園制度稱為一種“保護人—委托人”的安排形式，不會是不恰當的。這一術語不過是垂直交換關系的簡略表達，它以實際的互惠程度為特征，對于從屬者的勞動和順從報以經濟與社會方面的保護。在這“譜系”較多的一端，精英的要人身份是人們較為自愿地賦予的，從屬者對精英的態度較為接近于真正的敬重和依從；相反，在這“譜系”較少的一端，精英提供的保護較少，實施的暴力較大，其“要人身份”為權力所取代，從屬者的敬重和依從為屈服所取代。

## 生存——基本的社會權利

如果從農民的角度來看，精英的合法性僅僅是交換平衡的直接線性函數，我們的工作就會簡單多了。然而，人的需要的不連續性，使得此類簡易的公式令人難以置信，并且忽視了農民生活中的物質的和社會的生存條件最低界限的存在，而這正是我們分析的起點。

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除了互惠原則，生存權利也是鄉村小傳統中發揮積極作用的道德原則。我們在第二章討論的農民對使得破產危險最小化的社會安排的偏好，無疑體現了生存權原則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反映在鄉村中的相對富裕者所受到的要求慷慨對待同村的較為不幸者的社會壓力中，這種壓力正是東南亞農村生活的特征。在前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制中，在農村的權力關系允許的范圍內，往往可以看到這些生存權利的存在。在下緬甸和越南，對租佃制度和地主義務的看法，都取決于土地所有者滿足其佃戶最低限度的物質需要的責任。在此，回憶一下前面引述的分成佃農的話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在佃戶的困難時期，財產所有者應該借米給他們和幫助他們。這是作為地主的責任。”

“生存權利”的操作性推定是：在當地資源允許的條件下，社區內的所有成員都可以享有既定的生存權利。這種生存權是以關于人的需要層次性的普遍觀念為道德基礎的，它認為對維持肉體生存資料的需求天然地優先于對于鄉村資源的其他一切要求。在純邏輯的意義上說，倘若生存權不處于優先地位，那就很難想像如何能證明在財富和資源占有上的任何不平等具有其合理性。[[454]](#_454_20)這一權利肯定是個人對其所在社會提出的最低要求；也許正是由于這一理由，它才有如此之大的道德力量。“生活必需品是生存權的基礎。……其特性就是每個社會成員對于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務的要求優先于滿足他人的不太迫切的需要。”[[455]](#_455_20)因而，此種權利不但指的是窮人對于本村資源的要求權，而且指的是他們對于較富村民的財富的要求權。在歐洲的前工業化社會里，生存權似乎也是窮人所依靠的道德原則。

既然人在國家里均占有指定的地位或級別，那么每個人就都有權要求國家為他提供維持生計的手段。任何妨礙這一生存權的交易和契約，不管是如何達成的，都是不公平、無效的。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生存權最終要訴諸社會（相對于經濟）的責任。[[456]](#_456_20)

在同工資相聯系的“公平價格”學說中，在俄國的米爾[[457]](#_457_20)的實踐中，生存權利都采取了某種具體形式。皮特—里弗斯描述了安達盧西亞的情況，說明了許多此類實踐的可操作的假設：“有（東西）的人必須給沒有（東西）的人，這一思想不但是宗教誡律，而且是村莊的道德命令。”[[458]](#_458_20)

對農民生存權利的威脅，不是互惠平衡的直接的線性函數。我們的研究不能單從交換平衡開始，而必須從它對農民家庭生活的影響開始。如果交換平衡惡化了但耕者家庭的物質狀況卻是穩定的，甚至正在改善之中，那么，不滿意可能顯而易見，但不可能激起大規模動亂。只有當惡化的交換平衡威脅到生存常規的決定性要素時，只有當它把現有的生存模式推展至爆破點時，才可能看到憤怒之火的爆發。毫無疑義，這些界限也有文化方面的因素，因為它們取決于達到起碼的文化禮儀的要求（例如，贍養年老父母，舉行重要慶典）所必需的東西。但它們也有客觀方面的因素，例如足以養活全家的耕地，在收成不好或遭遇疾病時的生存援助，對付外來索取者的最低限度的物質保護。因此，剝削不是一張無縫之網；地主或政府多拿走的每一籮稻谷帶給農民的痛苦并不相同。小土地所有者的納稅額最終可能使得他們只有走上反抗之路或者放棄土地。撿拾落穗權和糧食借貸額的縮減最終可能迫使一家人挨餓或者背井離鄉。正是由于這一緣故，根據耕者不同的納稅能力而對其資財提出不同的索要，較之不顧其消費需要的勒索來，讓人覺得剝削程度較低。

還存在這樣一種情況，此時交換平衡事實上維持不變，但人們感受到的壓迫卻可能嚴重得多。例如，在19世紀的中國，當一向為農民提供最低生存安全保障的手工藝職業消失后，農民們發覺他們突然承受不了按慣例交付的地租了。[[459]](#_459_20)地主并未多拿什么，但他們的索要對農民生存的影響現在釀成大災難了。公共牧場的喪失或經濟不景氣一下子取消了農民的副業生產，這也可能使得以往可以忍受的土地租用條件變得難以忍受。正如農民自己肯定要做的那樣，我們必須不但要弄清精英階層從農民那里榨取了多少東西，而且要弄清這種索要對農民生活的組成要素產生了什么影響。

很明顯，在任何歷史條件下，生存權的社會意義以及精英的相應義務都會發生相當大的變化。然而，在這種變化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1）對精英義務的積極與消極的兩種相對的表述；（2）生存要求與謀生方式的關系。

1.精英們對于農民福利的責任可以用最高條件或者最低條件來表述。他們的最為全面的條件主張，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農民一旦面臨生存危境，精英們都有責任提供資助和幫助。這種表述似乎特別適用于人身保護濃重的封建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友誼的信條（例如“密友”關系）是分層話語的明顯的組成部分。直到20世紀初的呂宋中部地區和南美的莊園制度，都是恰當的例子。不太全面的或最低表述惟一堅持的是，精英對產品或勞動的索要不得危害農民的生存權。就農民同政府的歷史關系而言，就農民同土地所有者的關系（同他的私人契約脆弱無力）而言，這種看法也許是最為恰當的。諸如交趾支那、下緬甸等開發地區，看起來適合這一范疇。

2.由于生存權利的道德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生存困境，因而它成了總人口中許多連生存都成問題的人的特征。此外，這一道德要求的實際內容同要求者的生活來源有著直接關系。因此，對于占有少量土地的農民來說，其要求可能包括繼續占有這片土地、困難時期得到那些比他地多的土地所有者的幫助，以及災年免稅。對于佃戶來說，則可能包括可靠的租約、饑荒時得到地主相應的幫助，以及災荒后減免稅租，還有使用公地和公共森林的自由。對于農業工人來說，其特殊要求可能是確有保障的雇用、撿拾田地落穗的權利、穩定的實際工資、需要時獲得貸款或幫助、隨支付能力的不同而不同的稅賦。最后，對于貧窮的城市雇傭工人來說，面包或大米的價格隨其工資水平而定，也許同穩定的職業、救濟的可能性同等重要。盡管保障生存權利是許多社會制度的特征，但其精確內容又必然因具體情況的不同而不同。

## 傳統與穩定交換的打破

且不說生存界限對于階級關系的合理性確有影響，顯而易見的是，我們所稱之為習慣力量的東西也有其自身獨立的影響。例如，從佃戶的觀點看來，在穩定的“地主—佃戶”關系與較為短暫的、無定型的“地主—佃戶”關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假定互惠平衡相似，傳統的交換方式很可能具有較大的道德力量。它的較大的合理性似乎并不只是來自于古代風俗習慣，毋寧說來自于這一事實：它的長期存在表明了它的條件仍將大有可能得到遵守。佃戶或農奴會假定，如果可能的話，地主（或主人）至少會遵照最低限度的互惠傳統辦事，而地方輿論也會幫助他確保傳統條件得到遵守。如果佃戶或被保護人認定傳統的互惠比傳統性不強的安排更為可取，那么，他的選擇是有某種理性基礎的。傳統有助于產生合理性，因為一般說來，它使人們相信可以較高程度地實現預期目標；還因為比起制度化不夠的保障形式來，它有較強的持續性，更為文化所認可。

由此看來，在穩定的土地制度背景下，精英和農民之間的權力關系可能產生具有內在道德力量的特殊的互惠規范——一整套互惠的權利義務標準。由此產生的準則，只要能提供基本的保護和安全，就會得到精心保衛，以防止對準則的破壞威脅到農民的現實利益。[[460]](#_460_20)對這些準則突然進行不利于農民的調整，會被視為對傳統義務的踐踏。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高于一定最小值的任何交換平衡很可能具有合理性；而背離互惠平衡的哪怕是減少農民利益的微小變動，都會產生基于傳統理由的被剝削感。當然，這種被剝削感是否表現為積極的反抗，則取決于許多其他因素，其中包括精英們的強制性權力與農民的社會組織情況。

農民在此種情況下之保衛傳統的互惠，決不是無知魯莽之舉，而是為恐懼感所激勵——他們擔心調整后的平衡不利于自己。1830年代的英國農民起義是個典型的例子，當時農場工人的交易地位受到侵蝕，他們便援引當地關于雇傭活動的傳統習慣反對土地所有者的商業化改革。[[461]](#_461_20)另一方面，如果精英們意識到他們同農民的交易地位已經惡化，比如像19世紀法國的許多農村貴族與商業化農民之間的情況，那么，就會發現是他們而不是農民要援引歷史傳統了。正是因為如此頻繁的農業商業化變革侵犯了貧苦農民的利益，他們才扮演了保衛傳統的權利和義務、要求恢復原狀的角色。

## 社會分層、義務和權利

我們也可以用關于社會權威的一般特性的觀點來觀察互惠和生存原則。每一個社會分層制度總要編造出自己的神話或理論根據，來說明為什么一些人的地位應該高于另一些人。此類神話大概主要是規定性的指示：他是國王，因為他出生神圣，因為他是前國王的長子，如此等等。然而，毫無例外，所有這些證明也有關于行為和服務方面的規定。于是，國王必須負責讓老天下雨，負責確保豐收的首次犁耕典儀，或者負責領導臣民打勝仗。權力要想成為權威——要使自己合法化、合理化，主要看它對所轄集團的福利所作出的貢獻。G.巴蘭迪爾在《政治人類學》一書中把互惠和義務概念看做是一切權威制度的普遍的必然的結果。“更普遍地說，可以認為，權力要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就必須維持集體安全和繁榮的狀態。這是掌權者必須付出的代價——一個永遠付不完的代價。”[[462]](#_462_20)正如巴蘭迪爾所指出的，為了完成集體的社會任務，權威是必要的；在這一機能主義意義上，權威也是自然的。然而，權威的合理性，則依其對負有責任的義務的履行情況而定。

權力的這些普遍義務在社會上具有實際后果：如果莊稼不能成熟，國王可能被殺；我們聽說過，如果天不下雨，俄國牧師就要挨打[[463]](#_463_20)；如果饑荒降臨大地，皇帝就失去了“天授之權”；任何對嚴重的經濟蕭條負責的政府，都由全體選民進行罷黜，這一趨勢，從理論上說，大概是賦予權力以普遍義務的另一種情況。因此，即便是對社會權威的最為寬泛的表述，也暗示了那些要求社會特權的人應盡義務的規范結構。這些義務常常相當具體，又隨之創造出行為標準，可借以評判不平等的正義性。這些義務若得不到履行，就必然會破壞權力的規范基礎。

這里的關鍵之點在于，農村階級關系中除了強制性最大的制度之外，都有某種類型的互惠，某種類型的權利；農民對這些權利的要求，也就是稀有資源控制者的義務。這樣的規范傳統在關于什么是“好”貴族、“公正”的國王和“正派”的地主的大眾觀念中得到了反映。因而，對任何地位、權力之等級制的證明，也意味著創造了具有道德威力的角色義務。在這一意義上，承認地位和財富的差別，總是有條件的，決不是絕對的。對當代英國的農場工人同其雇主之關系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說：“只要農場主［土地所有者］符合工人對‘好農場主’的印象，雇主、雇員的關系似乎就能保持和諧，不管雙方的收入與生活方式有多大的差異。”[[464]](#_464_20)

認為在此類權力關系中存在著規范，并不否認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它們可能是剝削關系。它們常常是剝削關系。然而，堅持強制性條件所存在的權利，同認清強制性條件本身的不公平性并不矛盾。舉例來說，許多工廠的工人認為分配權力和報酬的工業制度是不公正的，而且一有機會，就會支持基本全新的權力結構；但是，這幾乎不妨礙他們在現存制度的框架內捍衛自己的現有權利，要求雇主履行其現有義務。與此相似，20世紀30年代中呂宋農場的農民，曾越來越接受一些團體的主張，要求沒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但與此同時，他們堅決地保護自己認定的在現存農場體制內所享有的對于食品貸款的基本權利。

對于農民的分層制度來說，同任何其他制度一樣，應該有可能確立起通行的互惠和公平回報的標準。其邏輯起點是弄清精英階層和從屬階層各自的需要與資源。在農民社會里，我們一方面要處理財富和權力之間的交換問題，另一方面要處理接近生存線的農民問題，而義務規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層階級的現實需要所確定的。農民生活中的周期性經濟問題是自然生態對于食物供應的不穩定性；因此，那些控制了社會稀缺資源的人們應對其下層從屬人員的基本物質需要負責。在這里，互惠準則和生存權利是緊密結合的。正是生存權利界定了精英階層的主要互惠責任，即他們對于向其索取勞動和糧食的人們所應盡的最低限度義務。

有理由認為，生存權利條件下的經濟依附和不平等關系是大多數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主要特色。非洲的部落權力看來反映了依從和權利的關系。

在需要之時臣民可以向酋長要求食物，……確保他的“孩子們”不挨餓，這是他的責任。在酋長的花園里勞動，是一種對付貧困的保險。如果酋長不送給子民禮品，他們就會認為他是個壞酋長，而且要實施最后的制裁——撤換酋長。[[465]](#_465_20)

事實上，在1538年的法國農民大起義——意指農民起義的“扎克雷”（jacquerie）一詞由此而來——的背后，我們看到了同樣的邏輯。正如希爾頓所說：“J.邦霍姆所經歷的急劇惱怒……簡直不能同他反對貴族的恒久憤怒相提并論。他之所以譴責貴族，總的說來，是因為他們沒有完成傳統和相互義務賦予他們的保護臣民的責任。”[[466]](#_466_20)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的著述中，以幾乎同樣的眼光看待愛爾蘭的地主與佃戶的關系。

土地所有者在他的佃戶農民的眼中還儼然是一種為了全體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氏族首領；農民以租金的形式向他納貢，但認為在困難時也應得到他的幫助。同樣，一切比較富裕的人，也被認為與自己的比較貧苦的鄰居急需時，有責任接濟他們，這種幫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較富有的氏族成員或氏族首領理所當然地應給予比較貧苦的氏族成員的。[[467]](#_467_20)

同樣的邏輯似乎也適用于其依從關系起源于直接的強制行為的社會制度。E.吉諾維斯對北美奴隸制的深刻分析準確地論述了在強制性依賴下從屬階級的權利問題。雖然我們這里不關心奴隸制問題，但吉諾維斯的結論對我們頗有教益，因為它揭示了可以稱之為家長制的階級辯證法的原動力。

奴隸們已經把依賴關系變得對自己有利。他們的家長制依賴觀強調互惠。……他們對真正的善良和物質援助行為決不會無動于衷，但按照他們的觀點，這些行為實際上是他們的應得物——是他們忠心耿耿的服務所得的酬報。……如果說主人有義務為他的仆從提供生計，有義務使自己的行為像個正派人，那么，他的義務就必須轉化為奴隸的權利。在主人想把自我界定的義務轉化為對于仆從的特權——這種絕對荒謬的不合邏輯性，連最為奴態十足的奴隸都能看透——的地方，奴隸們把義務就理解為義務。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主人依賴于自己的勞動，……他們認為是他們自己掙得了主人的保護與關心。[[468]](#_468_20)

從另一個層次上看，按照宗教和文化的要求，奴隸們一直反抗自己的永久性下等地位的社會身份。但在白人統治的條件下，他們也“劃定自己的生活界線，堅持自己的權利，維護自尊”[[469]](#_469_20)。

我們只要看一下西方封建社會晚期的情況，就能看清上述義務結構的歷史原型。正如M.布洛克所指出的，封建契約意味著貴族方面承擔著全方位的全面義務，確保其佃戶和仆從得到保護和關心。[[470]](#_470_20)

貴族的義務就是其佃戶和仆從的權利，這也是貴族應該付出的對其佃戶和仆從的勞動和依附的酬報，必須得到堅定的衛護，使之免受侵犯。在國家權力的增長使得純粹的人身保護成為不太迫切的需要時，精英階層的經濟義務仍然是其精英角色的主要證明。遵守這些交換規范，就意味著要關注下屬農民的個人需要和家庭需要，按照每年具體情況調整對農民的勞動和糧食的索取，還要在饑荒時為他們提供食物。他們對這些義務的背離，一般總要激起憤怒和暴力行為，而恰恰是憤怒和暴力行為加強了這些期待的道德力量。

究其實質，這種前資本主義的規范秩序，是在缺乏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社會條件下，建立在保障最低限度的社會權利的基礎之上的。農民們希望得到精英的慷慨幫助，也就是希望從本村境況較好的村民那里得到這樣的幫助。在這一意義上說，社會權利就是被突出渲染的鄉村道德。[[471]](#_471_20)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階級制度下的規范基礎同19世紀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規范基礎有著顯著的區別。這些區別恰恰反映在以具體的階級分層原則為既定前提的人們所提出的評價問題上。在資本主義觀點看來，關于階級制度的最常見問題是階級之間的遷移率問題。[[472]](#_472_20)與此成為對照的是，在傳統的農村制度下，主觀感受到的重要問題不是階級之間的遷移，而是精英們對自己的幫助、保護義務的履行——他們的義務奠定了附從關系的規范基礎。因此，在群眾抗議出現之前——并非巧合的是，這種抗議總是發生在社會生存權利遭受全面踐踏之時——問題不是“我進入精英階層的機會是什么？”，而是“精英們在履行其義務嗎？”。在傳統社會里，大多數農民不指望、也不希望介入政治；恪守階層分界線的不成文社會共識是，由精英們組成的政治階級將確保不參與政治的社會下層的生存，確保對他們的保護。如果這些保障發生故障，這種排除一部分民眾參與政治的道德結構，也就失去其合法性的關鍵要素了。

在公開宣稱為家長式統治的社會制度下，農民要求于精英的經濟保護常常就是統治階級本身的漂亮言詞所接受的那些義務。事實上，證明否認政治和公民權利是合理的，就在于農民的物質利益需要通過精英階層的“貴族行為理應高尚”意識而得到滿足。排除社會下層的政治參與這一邏輯增強了生存權利的道德力量。因此，封建精英階層的特點在于認識到自己的這一義務：“為酬報農民的勞動和依附，要做好一切必要之事，以確保農民有適當的吃、穿、住條件，得到精神上的開導和健康無害的娛樂。”[[473]](#_473_20)一直到1859年，L.珀西的仆從們還在創作詩歌，憤世嫉俗地認真表達其求助于封建道德的心境。

封建的遺俗遺風啊，

一如既往地從北方吹來。

正是這些社會風俗啊，

把農民和貴族聯結起來。

“自由”啊，不過是無用的大話，

哪里是我們悠閑的期待？

它能夠讓人們驕傲和自豪，

卻不給任何人牛奶和面包。

我們愿在充滿同情的社會里

領受地主們仁慈的交易。[[474]](#_474_20)

L.珀西也許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也許沒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權利的行使及其同政治依附的聯系。前已引述的20世紀的一位越南老地主，在對湄公河三角洲昔日美好時光的追憶中，幾乎完全重復了這首詩歌的主調——有安全的依附、不安全的自由。

過去，地主與佃戶的關系是家長式的關系。地主把他的承租人看做他的大家庭的下等成員。承租人的父親去世了，地主就有義務給他錢舉行葬禮；他的妻子懷孕了，地主要給錢供生孩子開銷；他若遇到經濟災難，地主要給予幫助。因此，佃戶的行為也必須像這個大家庭的一個下等成員。[[475]](#_475_20)

此類描繪善良的地主與貴族的美好圖畫，是關于精英們將如何使之實現的想像，并非事實上必然如此。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無視此類美好描述的力量。它揭示了精英的行為標準——為了證明其統治的合理性，精英們必須付諸實踐的行為標準。而且，被統治者也會正確地認為精英們對這一行為標準負有說明的義務。如果精英基于自己對農民福利的貢獻而要求農民的服從，同時也就提出了對精英進行道德評價的標準。

當互惠條件向不利于農民的方向轉變以致威脅其生計之時，農民們常常憤而行動起來，要求恢復權利。當然，是否會發生暴力或反叛，取決于超出本書研究范圍的許多促進因素或抑制因素，其中并非最小的因素是精英們壓制異見的權力。然而，我們對農民憤怒情緒的解釋，實質上不同于那種用強調挫折和相對被剝奪的對下層動亂的解釋。[[476]](#_476_20)關于侵犯的挫折理論開始于正在受到挫敗的明確的個人目標，而在其他情況相同時，個人的挫折總量被認為是反映了暴力的潛能。這里有一種容易產生誤導的簡單化，因為根據定義，任何反叛實質上都是憤怒的行動。不過，這種憤怒的性質對世界的影響重大。

首先，明顯的事實是，這種著名的相對剝奪理論的變體對于大多數農民反叛（包括我們已經研究過的起義）都是不適用的。根據這種理論，挫折的根源在于把自己所在團體的福利水平同某個生活相對不錯的參照團體進行比較。看起來，當向上變遷的團體受到阻礙而得不到自己認為有權得到的東西時，他們就會產生這種不平之感。人們會發現這種不平之感在某些農民運動或者更可能在農民運動的參與者之中都十分盛行。然而，我所熟知的絕大多數農民起義毫無疑義地主要是防衛性的努力，旨在保護受到威脅的生存資源，或者一旦喪失生存資源便努力予以恢復。農民的反叛遠非希望提高自己在社會分層中的相對地位，不過是為了維持飽受打擊的生存安排而作出的孤注一擲的努力。

我們業已考察過的農民起義的純粹的經濟因素，十分類似于一位研究反叛的理論家稱之為“減縮的剝奪”[[477]](#_477_20)。倘若如此，挫折的根源就在于大致穩定的期待目標伴隨著實現這些價值的能力的衰減。經濟衰退對那些在過去20年內收入肯定沒有增加的農民造成的影響，可以據此加以估量。正如格爾所說：“處于這些境況下的人們之所以憤怒，是由于喪失了自己曾經擁有的或自認為能夠擁有的東西。”[[478]](#_478_20)

然而，這種理論闡釋乃至整個挫折理論的致命缺點在于，由于從某種粗糙的“需要與獲得的比例”出發，它們完全不能公正對待作為大多數農民爆炸性行為之特征的道德義憤和正義的憤怒。這是從個人目標出發或從客觀的福利比較出發來解釋反叛的一切理論所固有的缺陷，因為它們忽略了農民行為的社會背景——忽略了農民對自己的社會權利的期待。P.勒普沙很好地闡明了義憤（它意味著對不公正的憤怒之情）同挫折或剝奪的區別之所在：

除了存在著一些阻力或起阻撓作用的行為主體之外，“遭受挫折”一說沒有假定任何針對其他行為者或習得規范的有關內容。這樣，“義憤”概念能使人當即思考合法性問題和行為的正當性，而“挫折”一說卻同此類規范的比較無關。……在義憤涉及道德的范圍內，它產生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并從這種關系中獲得意義。個人的義憤反應因而取決于習得標準（而且要按照該標準加以解釋），該習得標準存在于個人關于道德的正當行為和價值剝奪與恩惠的根本模式的概念之外。因此，義憤概念同社會的文化哲學基礎直接關聯。由于這一原因，用義憤來解釋暴力似乎特別合適——義憤邏輯地位于心理和倫理的交叉點，正是由此引出公正和合法性觀念。[[479]](#_479_20)

我們的分析顯示，農民的公正思想和合法性觀念來自于互惠準則以及隨之而來的保障——至少不侵犯——農民的生存索取權和生存安排這一精英義務（即農民權利）。因此，農民對于侵犯自身權利所作出的反應的主要特征，是反應的道德性。由于拒絕承認農民的基本社會權利就是自己的義務，精英因此就喪失了自己擁有的對于農民產品的任何權利，也將在實際上消解農民繼續依附的基礎。189[[480]](#_480_20)于是，農民的違抗就成為合乎規范的正當行為了。其生存系于平衡的農民所面對的不僅是個人問題，他還面對著社會弊病。這種對權利和社會弊病的強調是個中心問題。它意味著作為政治行為者，農民不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供應熱量的抽象物、交租納稅的抽象物，不只是個純粹的消費者；相反，從農民的日常食物攝取中也許可以推演出他的政治活動。正如我們認為精英理所當然地是個政治行為者，它把歷史、政治意識和對社會道德結構的感知授予農民。它還意味著正是農民對“公正”的意識，使得他能夠判定誰應對其生存困境負有道德責任，使得他能夠行動起來，不光要恢復生存條件，還要爭取自身的權利。

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如此之多的農民暴力，或者力圖強迫精英階層履行農民所認為的精英義務，或者阻止他們侵犯農民的權利。這種恢復習慣上的階級間關系的努力，可以恰當地表述為“保衛家長式統治的暴力”。同樣由于這一原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關系的商品化和中央集權國家權力的增長，表明了農民暴動在近代的歷史地位。因為最為重要的是，這些巨大的歷史力量剝下了生存習慣和傳統社會關系的覆蓋物，代之以契約、市場和穩定的法律。正如沃爾夫所指出的，其結果是拒絕給予農民“他所習慣的降低風險的社會慣例”，因而加劇了可能導致反叛的緊張關系。[[481]](#_481_20)力圖恢復即將被清除掉的社會經濟安全模式，正是這一點使得許多農民運動具有“向后看”的特征，也使得它們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產生了模棱兩可的壞名聲。

其他階級［小資產階級或農民階級］的觀點是模棱兩可的或缺乏獨創性的，因為他們的存在不是以其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的作用為惟一基礎的，而是同封建社會殘余保持著牢固的聯系。因此，他們的目的不是推動資本主義前進或者超越資本主義，而是要倒轉資本主義方向，或者至少阻止其充分發展。他們的階級興趣集中在發展的征兆上而不在發展本身。[[482]](#_482_20)

舉幾個簡短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在前述的中呂宋農場，由于拒絕按照慣例在青黃不接時節發放借糧，發生了農民的抗議和反抗。佃戶們設法偷竊地主倉庫里的東西；當地主以武力回擊時，他們就以牙還牙，干脆用暴力直搗糧倉，把他們從前按照權利應當占有的東西沒收過來。他們的行動目標，就是要單方面地頒布被突然取消了的至關重要的生存權利。他們的目標不是要取消土地所有者，而是要恢復在現存的社會分層體制下較能承受得起的交換條件。指導這些偷竊行為的道德原則類似于皮特—里弗斯在安達盧西亞所看到的關于“窮人權利”的情感。“在窮人看來，在需要時，偷點富人的財產，或者在地產豐饒的富人的一小塊地上非法地放牧自家的羊群，并不是什么不道德行為。一些人富得流油，而另一些人卻生活貧困，這才是極大的惡。”[[483]](#_483_20)如果精英們不用自己的財產幫助貧困者，他們就喪失了要求別人服從的權利，而“小傳統”就會寬恕為行使權利而取其所需的行為。

正如霍布斯鮑姆和呂德精心描述的那樣，19世紀30年代英國農業工人的“斯溫上校”起義也被最恰當地認為是保衛習慣權利的反抗。[[484]](#_484_20)拿破侖戰爭突然剝奪了工人們以前享有的許多前資本主義的生存保障，之后，他們又遭遇了農業衰退。“失去了家庭、庇護人和風俗習慣的保護，現在是赤裸裸的工資關系把無地者同有地者捆綁在一起。”[[485]](#_485_20)反叛者要求富裕農民給些“禮品”，要求砸爛取代勞動力的打谷機，還要求穩定的職業。他們希望回到從前的雇傭制度下，他們甚至要求減少對土地所有者征收的農產品什一稅和其他稅——據土地所有者聲稱，這些稅收已經使得舊有的雇傭模式行不通了。同大多數農民起義一樣，這次起義也是突然爆發的對新的生存威脅的本能反應。在暴力行為中，“有證據表明，工人們仍然接受那些有關古代穩定的等級制理想的古代信條”[[486]](#_486_20)。他們對自己的道德權利堅信不移，始終認為國王和議會會支持他們。

當年在法國眾所周知的是，“大眾稅收”是一種典型的、完全制度化的類似于大眾權利的法規。[[487]](#_487_20)它的基礎是關于面包、面粉的公平價格理論，這種公平價格讓貧困的勞動者能買得起習慣上的食物定量。當價格超過可接受的水平時，憤怒的群眾就常常占領市場，按照“公平價格”出售主要商品，有時還把售貨所得交還貨主商人。因此，整個行動方案的重大標志，是以對于生存權利的社會責任為基礎的審慎的合理的民眾權利觀念。

上述所有行動都是基于富人和地方權力者為窮人的最低限度福利需要提供保障的假定義務之上的。不尊重這一義務就喪失了相應的對于依從的要求權，這一信念在英國內戰期間占領公地的掘土派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表達：“富人的心腸冷酷無比，我們就是上門討乞，他們也不會施舍。我們要是偷竊，法律會把我們處死；窮苦人中已經有人餓死。眼下尚且活著的我們，就是死于刀劍也勝過等著餓死。”[[488]](#_488_20)

在社會科學家中間流行一種天真的看法，認為真正的饑餓者不會造反，因為他們沒有力氣。[[489]](#_489_20)這一觀點可能來源于第二次大戰期間進行的所謂“明尼蘇達州饑餓研究”，該研究旨在測定人們對故意不給食物的心理反應。在整個饑餓過程中，無疑地確有疲乏無力來臨之際。然而，人們可以看到，早在疲乏無力來臨之前，尚有理智的饑餓者就會盡其所能地尋找食物。在其嚴酷程度遜于集中營的任何情況下，若嚴重饑餓恰巧同土地所有者或政府所掌握的庫存食品同時并存，就無異于行動的召喚了。毫無疑義，確實存在著集體性饑荒耗盡了全社會的食物資源的情況，這時的饑餓問題就同由于較為富裕者的財產而產生的不公正和窮人的生存權利問題沒有關系了。但是，在大多數社會里，不論是安南還是17世紀的英國，饑餓的襲擊引起的不是倦怠無力而是憤怒。1648年，窮人聚集在大路上，阻止把糧食運往市場，“當著糧食所有者的面，一起分了它，說他們不能挨餓了”[[490]](#_490_20)。平等派的一本冊子曾解釋說：“貧窮瓦解了一切法律和政府，饑餓將推倒石墻。”[[491]](#_491_18)掘土派成員溫斯坦萊看管著恢復了的公地，譴責買賣土地和勞動力，體現了同義靜蘇維埃的鄉村創造者一樣的道德假設。他宣稱，“把地上的珍寶財富鎖進箱柜房間……而另外一些人卻在渴求著本來屬于他們的必需品”，這是世間的極惡。[[492]](#_492_18)

農民所預想的主要目標常常是有限的——盡管他們所采用的手段可能是無限的。他們拿起武器的目的，更經常的不是為了打倒精英，而是強迫他們履行其道德義務。在殘存著少許父子般規范結構的地方，農民們經常援引這些規范；在此類復舊不被接受的地方，農民們就經常試圖趕走收稅收租人（或者搬家躲開他們），重建自治的社會共同體。在對生存常規的威脅似乎成為大災變并且不可抗拒的情況下，農民的反應看起來更多的是唱起太平盛世和烏托邦的陪調。不論采取何種具體形式，農民的集體暴力都部分地由道德幻想所構建，由經驗和傳統所派生，由社會各階級的相互義務所促成。爭取權利（指植根于習慣和傳統，在自由的意義上又涉及參與者的生命攸關的利益的權利）的斗爭很可能具有道德固執的特征，而憧憬著創造新的權利和自由的運動不可能鼓勵這種道德固執。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

激進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一直是農民和城鎮小手工業工人。基于這些事實，人們可以得出這一結論：人類自由的源泉不僅存在于馬克思所指出的將要奪取權力的階級的志向中，或許更多地存在于即將被滾滾而來的進步浪濤所吞沒的階級的瀕死慟哭聲中。[[493]](#_493_18)

只有這些階級的道德幻想及其激發的道德義憤，才能開始說明為什么農民要不顧似乎毫無希望的結局而揭竿而起。

# 第七章 反叛、幸存和鎮壓

到現在為止，我們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對剝削性質的討論上，對促成反叛的條件沒有過多涉及。對農民的日益嚴重的剝削很可能是反叛的必要原因，但遠不是充分原因。在說明政府和地主在義安、河靜的蘇維埃與沙耶山起義之前的大規模剝削時，我們并不贊同所謂“發生于其后者必然為其結果”的荒謬決定論，也不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造反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有充分理由認為，由剝削引致反叛的可能性最小。倘若剝削是反叛的必要和充分的條件，那么，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和第三世界肯定都是處于內戰之中的半永久性國家。

在這總結性的一章中，我們只能提出一些主要條件——當這些條件同剝削結合起來時，似乎就增加了農民進行反叛的可能性；我們還要提出這樣的條件，盡管存在剝削，這些條件似乎也能減小發生反叛的可能。為此，造反的結構性背景條件、幸存和不反叛的途徑以及對鎮壓的分析，就成了值得注意的中心問題。

對第一個問題即反叛的潛在可能性的分析，從反叛本身的難以簡化還原的特性開始。許多同時出于憤怒而行動起來的農民卷入造反，這一事實說明了哪些形式的剝削最為嚴重。我們至少可以期望，類似涉及許多農民的、突然發生的、威脅到現有生存安排的剝削的加重將是特別容易多變的。這一期望同我們對農民生存困境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的分析強調剝削的性質和時機以及剝削的平均水平。正如B.穆爾所指出的那樣：

農民生活中發生變化的時機選擇，包括受到影響的人數的多少，本身都是關鍵因素。我懷疑它們比衣、食、住方面的物質變化（十分突然而巨大的變化除外）更加重要。……使農民（不僅僅是農民）震怒的是突然新增的賦稅或索要，它們同時打擊了許多人，也打破了公認的規則和慣例。[[494]](#_494_18)

對農民生活沖擊的規模和突發性由于三個明顯的理由而顯得重要。只有大規模沖擊才能使大量農民集體行動起來。如果沖擊又是突發的，要遵循常規或漸進地適應它就更加困難了，也更可能在道德上嚴重背離現存的互惠規范。農民反叛的大量的潛在可能性，必須從農民在此類沖擊面前極易受到傷害這方面加以理解。因此，本章對反叛條件的論述，既總結了前面對東南亞的結構性變革所做的探討，又把它置于更為普遍的條件下進行分析。我還要說明，這一分析僅限于反叛問題。這就是說，當反叛同其他力量協同作用，確實成功地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的政治制度時，我就不關心更為廣泛的農民革命問題。此種廣泛的分析需要考察其他階級和國際上的國家制度，但我不能冒充可以恰當地做好這一工作。被排除在外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即農民反叛所采取的形式（例如，世俗的與太平盛世的）問題，它要求詳盡地討論文化變革和地方的社會結構。

反叛問題提出的第二個爭論點遠遠超出了我們上文分析的范圍。它所涉及的是在受剝削和痛苦的條件下之所以沒有反叛的原因。一連串的有關解釋包括了許多適應策略或生存策略，這些策略至少暫時地避開了對生存的直接威脅。其中有些策略是個體性的并且常常是暫時的（如短期遷居），有些則是集體性的（如社會盜匪），還有極少數涉及精英們為了減少造反的威脅而創造的邊際機會（如短期雇傭、食物救濟）。我認為，從這些作為權宜之計的選擇方案中，可以看出一些主要的決定性因素，并且有可能測定何時它們將會最大限度地發揮消弭反叛的作用。這里的論述是純理論的思辯，目的在于找出值得研究的問題，而不是作出肯定性的結論。

第三個問題專注于這一事實：制止反叛的主要因素常常不是農民可以得到哪些生存選擇辦法，而是反叛本身的風險。這些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同國家的強制性權力（當然，還有國家運用這種權力的意愿）是成比例的；國家的權力越是占壓倒性優勢，“除了不確定的生存狀態，惟一的選擇就是死亡”的可能性越大。[[495]](#_495_18)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根據經驗，可以把那些僅僅因為沒有任何選擇辦法而屈服的農民同那些即使有所選擇大概也不會造反的農民區別開來。

## 反叛的結構性背景

20世紀初東南亞土地制度的主要發展，縮小了農民的生存空間，使得農民作為一個階級，越來越容易受到生存威脅的傷害。新的傷害表現為兩種形式。首先，至少對于緬甸、爪哇、越南、菲律賓的大部分農民來說，水位——借用托尼的比喻——絕對地上升了。新的生存問題在食品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兩方面都常常采取可以看得見的形式。這種不斷縮小的生存空間的影響，嚴重地加劇了在產量或收入方面的任何銳減所造成的后果。[[496]](#_496_18)甚至在平均水位確實下降的罕見情況下（如在泰國、柬埔寨和馬來西亞），呈波浪幅度的上升也常常增加了農民被淹死的風險。由于政府和占有土地的精英階層使自己從農村的榨取所得保持穩定，而鄉村援助又遭到削弱，農民面臨著對收入具有更大傷害性的轉變。

具有爆炸性的脆弱的土地制度的結構主要是三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人口的變化、市場的商品生產和政府權力的增長。人口統計的趨勢——人口的增長使得可耕地全部被人占有——逐漸損害了農民同土地所有者討價還價的能力。為市場進行的商品生產，帶有一定的風險，又使得擁有資本的人們占有優勢；因此，它意味著給小土地所有者和佃農帶來了新的不安全因素，也意味著完全依賴于市場力量以謀生的農村薪資勞動者階級的擴大。至于政府，它既是農民收入的另一個索要者，又是土地制度的保障者。[[497]](#_497_18)作為索要者，政府對農民強制性地提出了許多嚴厲要求。作為價格體系以及由此滋生的權力懸殊的保障者，其作用更為關鍵。[[498]](#_498_18)政府的強制作用——通過法律機構保障契約的履行，以及粉碎農民抵抗的權力——使得地主和放債人可以從較大的討價還價能力中充分地獲取好處。[[499]](#_499_17)人口變化和市場商品生產的潛在剝削性，只有借助于獨斷的強制力才可能完全實現。

集體沖擊性

雖然農民之易于受到生存危機的傷害一般源自于殖民地變革，但自然有些農民比別人更容易受到傷害。這種變化部分地是個人的和偶發的因素造成的。非勞動力人口多而土地少的大家庭，在滿足其生存需要方面，受到特別大的壓力，因而處于特別危險的境地。然而，比起影響到許多農民的集體不安全模式來，家庭的不安全模式對于農民反叛的關系不大。為了說明許多耕者為什么走上反叛之路，我們必須從個人風險問題轉向“公共健康”這個大問題上來。導致某些團體、地區或階級易受傷害的條件是什么呢？這種傷害使其整體上易于破產因而為其共同認識和反應奠定基礎。盡管地區性的和社會壓力點的生態學因社會和時間的不同而異，我們仍然可以確認幾條風險分布狀態的一般原則。

毫不奇怪，易受傷害的一般標準是實際收入的易變性。比較平均實際收入相同的兩個村子后會發現，收入波動最大的村子自然要經受較為頻繁的生存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講一下收入易變性的主要來源并考察其影響和范圍。據我所知的東南亞資料，似乎有三大重要來源值得特別強調：（1）自然產量的波動；（2）世界市場的波動；（3）單一作物價格的波動。這些當然不是易變性的全部來源，但可以作為方便的起點，借以確認外部索取最可能對其造成直接生存威脅的地區和部門。

生態的脆弱性。某些地區的自然環境使得當地居民所遭受的產量波動幅度如此之大，以致即便精英階層不索取什么，他們的生存條件也很脆弱。此外，如果收入普遍很低，莊稼歉收之后精英們的固定不變的索取，就很可能對農民生活造成巨大影響。此類地區具有長期的反叛和抵抗國家權威的歷史記錄，便不足為奇了。在安南北部地區和泰國東北部的呵叻高原農村，降雨量很不可靠，因而兩地都因“抵抗和反叛”而聲名遠播。義安——越南反叛的典型搖籃——的“不平則鳴”精神備受關注[[500]](#_500_17)，而泰國東北部一直是反對曼谷政權的中心地區。在各自的國家體制內，安南北部地區和泰國東北部在地理上多少處于孤立狀態，這一事實也許可以為它們的傳統提供另外一種解釋。[[501]](#_501_17)在殖民主義之前的東南亞，偉大的王國一般都建立在這樣的地區，那里灌溉稻田的穩定產量為稅收制度提供了較好的經濟基礎，這決不是歷史的巧合。沒有幾個傳統的東南亞國家能有必需的力量，正常地從特別貧弱的農村地區搜刮到供養朝廷的財源。此類地區在地理上處于國家邊緣地帶這一事實，主要歸因于那里的沒有希望的自然生態——這一因素也有助于說明這些地區的反叛傳統。[[502]](#_502_17)西爪哇的班特恩和上緬甸的干旱地帶，也屬于這一范疇。產量不穩和政治動亂的結合，在其他地區也是普遍現象：例如，巴西的東北部和西班牙的黎凡特地區，似乎都處于各自民族的類似的生態和政治作用之中。夸張一點說，根據雨量變化，有可能推斷出一個地區對精英們的索取進行抵抗的許多情況。[[503]](#_503_17)

當然，降雨量僅僅是食物供應方面年年有所不同的一個原因。在可灌溉地區，也有例如下緬甸的漢達瓦底這樣的地方，農作物損毀（這里是由于洪水）的經常性危險，孕育了一種歉收之后最為明顯的反叛傳統。至于其他地區，難以預見的農作物病蟲害或者耕畜的傷亡，都可能造成類似的問題，但它們似乎不會導致昭示本地區的永久性生存問題的抵抗習慣。重要的問題完全在于，農民收獲物產量的可變性極大，因而固定不變的外部索取所造成的后果特別嚴重。因此，那些產量不穩的地區，經常成為農民抵抗的焦點地區。

價格體系的脆弱性。然而，對于越來越多的殖民地經濟中的農民來說，滿足外部索要者需要的能力，既是收成多少問題，也是市場的健康狀況問題。卷入世界市場的交趾支那和下緬甸的后果，本書前面已經作了論述；這里我只想重申這種卷入市場可能造成潛在的集體性沖擊。市場化的程度確定了沖擊的戰場：在這些地區，收入的變化常常是市場價格和信貸供應的函數。這里，統一的原則不是流域的區分或雨量的分布，而是共同的價格體系。

于是，東南亞的高度商品化地區形成了價格和福利水平相互依賴的競爭場所。雖然平均收入可能高于依靠傳統經濟生存的地區，但它們的繁榮的共同基礎，同時也是它們共同面對風險的基礎。地租和賦稅的壓迫程度和職業的獲得，主要不取決于產量波動，而取決于價格波動。因而，高度商品化地區易于發生周期性的“人造”饑荒；此類地區潛在反叛的關鍵是，市場沖擊的模式突然使得外部索要者的固定索取成為難以承受的負擔。1930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程度次之的1907年的危機就是著名的例子，說明了市場衰退如何加劇了現存索取的剝削后果。

僅僅注意到價格波動，會低估農民的貨幣經濟導致生存危機的脆弱性。在其發展過程中，商品經濟往往既取消了作為早先社會特征的傳統保護機制，又制造了完全依賴于現金交易關系的流動勞動力大軍。只要米價上升，勞動力市場保持高價，對傳統安全保障的侵害就不會引發多么大的驚恐。完全可以想見，在商品化的勞動關系中，社會下層階級因發現它有時有利于自己便成了它的自覺自愿的同謀者。但一旦危機降臨，這一群體就無路可退了。

而且，困難時期從此類地區可以榨取到的剩余物，多于從非商品化地區可以榨取到的。地主和政府可能都要確定自己對于相對繁榮時期的剩余物的索取權，而在市場蕭條時又完全不想減少這種索取。這不單是習慣問題，也不是欲望問題。商業發展時期培植了占有土地并從事貿易的富裕的精英階層，其勢力同其規模和財富大體上成比例。它發展到怎樣的健全程度，在歉收年頭它就能推行自己的意志（直接地或者通過政府）到怎樣的程度。政府的情況多少與此相似。在緬甸和越南，殖民地政權的財政基礎主要系于伊洛瓦底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這兩個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政府從這些地方攫取了較大份額的稅收。正是依靠20世紀20年代從這些攫取的大量掠奪物，在始自1930年起的困難時期里，政府才能抵御主要財政命脈的收入下降。

最后，我們務必記住，在生產專供銷售的農作物的地區，精英們自身也被市場纏繞得很緊。價格下跌和信貸危機首先打擊的是他們。當他們索取來的農作物的價值及其擁有的土地的資本價值暴跌時，當他們的貸方停止貸款時，他們也面臨著破產。他們同市場的一體化驅使他們千方百計地榨取自己的佃戶和工人，以維持自己優裕的經濟地位。因此，當市場把佃農和工人逼進赤貧境地時，地主在巨大的誘惑之下，壓榨得更加厲害，取消了一切殘存的家長式統治下的保護佃農和工人的措施。對于那些處于土地制度結構底層的人們來說，市場的壓力和精英階層的壓力很可能是重合的。

由此看來，商品化的農村多方面地展現了經濟的沖擊領域。不僅整個地區的福利取決于世界市場的力量；而且，盡管從短期看來下層階級的境況可能很好，但他們向精英和政府交付的剩余價值量很可能利好時上調，而當市場蕭條威脅到過分投入市場的統治集團時卻不會下調。

單一農作物的脆弱性。在較大的商品化地區，常常有這樣的小區域，它們所受到的不同的市場存貨的影響是不同的。交易模式的轉換或者相關農產品價格的變化，很可能給這一區域造成困苦，而給另一區域帶來機遇。在這種情況下，農作物區域都有自己的沖擊領域定義：它既取決于一般的市場條件，也取決于對它的主要產品的需要程度。在描述17世紀法國和中國的農民反叛的生態條件時，R.穆斯尼爾強調了農作物區域的影響和勾劃產生不滿之界限的地區特殊性。[[504]](#_504_17)例如，絲綢交易的崩潰可能使整個相關的農產品區域陷入經濟混亂，而不會嚴重地影響其他地區。與此類似，1830年代的“斯溫上校”起義，鮮明地局限于英格蘭南部和西部的谷類種植區域，這些區域受到谷類交易價格暴跌的威脅最為嚴重。[[505]](#_505_17)其他因素同反叛的局部強度也有關系，但沖擊場是根據谷類種植劃定的，而畜牧經濟則相對地未受損害。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農業專業化的發展，農作物門類的發展，在特定的市場力量面前確立了不同的脆弱性。對于任何市場沖擊，人們都可以為任何農業門類建立起恰當的反應模式。當然，在大部分東南亞地區，占絕對優勢的水稻種植使得農作物區域的概念幾乎等同于農民經濟。然而，對于那些大農場和小農主的諸如橡膠、煙草或蔗糖等銷售農作物構成生活主要來源的地區，這一特性是有好處的。由于這些農作物主要是為了出口而不是本地消費，種植者對于劇烈的價格波動特別敏感。價格的突然暴跌（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橡膠價格的暴跌）很可能引起整個部門的生存危機，并且把大批農村工人趕回生存經濟之中。那么，在商品化經濟之中，剝削的影響程度主要取決于外來沖擊，而這些沖擊常常又是針對特定的農業門類的，因而需要具體分析。

農作物歉收或市場危機都會突然使得精英的現行索取變得更加沉重，并且（或者）確實地增加索取（或減少服務）。集體憤怒的方法并不必然地指向某個具體的“罪犯”。對“罪犯”的識別，憤怒所對準的社會指向，在各種情況下都取決于特定的同時產生的各種壓力。在安南的蕭條時期，持續地征收固定賦稅造成了最直接的生存威脅，榮市的罷工提供了行動的機會。對于大量的農村薪資工人來說，直接的威脅也許來自大幅度削減工資或解雇工人的現象。對于小農主來說，貸款方的持續不斷的要求也許促成了危機的生成。經濟危機的襲擊使得人們關注對農民資財的現有索要模式——它可能體現了一種直接威脅，關注現有的經濟保障形式（例如，生存貸款、長期租佃等）。由市場或農作物歉收所造成的對生存慣例的壓力，轉化成了同壓力的社會發散形式相一致的憤怒和抵抗的模式。

## 反叛與農民的社會結構

這里提出了關于承受上述沖擊的農民群體的社會結構這一重大問題。有可能證明他們的社會構成使得一些農民群體具有比其他人更強的內在反叛性嗎？對此眾說紛紜，而且不容輕易地得出普遍性結論。

如果把具有強烈的公有傳統、沒有什么尖銳的內部階級差別的農民群體（安南、東京、上緬甸以及爪哇的東、中部）同公有傳統微弱、階級差別較為尖銳的農民群體（交趾支那和下緬甸）相區別，我們就可能認為，前者更具有反叛的爆發性。這一論點建立在兩種推理方式的基礎之上。[[506]](#_506_17)首先，越是無差別的農民群體面對經濟沖擊的行為方式就越是一致，因為從結構上說這一群體的成員大約是坐在同一條船上。因此，人頭稅在義安的鄉村就激起了幾乎全體一致的不滿，在那里，相對均等的收入分配使得這一負擔對絕大多數村民都有類似的不可接受性。而在交趾支那，由于有十分多樣化的階級結構，對同一項措施的反響可能不那么一致。它也許會激起不滿，但不滿的程度卻因其給薪資工人、佃農和小地主帶來的負擔不同而各不相同。

第二種推理方式是，公有社會的結構不僅使得接受沖擊的方式非常一致，而且由于其傳統的穩定性，因而具有更大的能力采取集體行動。對于此類鄉村，情況似乎是，僅僅因為它們具有完整地保留下來的地方合作的現存結構這一力量源泉，就大大減小了行動的組織障礙；它們的“小傳統”就是現成的行動推進器。而在交趾支那和下緬甸的拓荒者鄉村里，結構或社會劃分程度較高，沒有現成的公共權威結構（或是相當軟弱）可資利用。因此，這種推理認為，鄉村結構越是公有化，鄉村集體捍衛自身利益就越容易。

這一推理盡管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至少忽略了可能導致不同結論的兩個因素。一方面，沖擊的降臨，似乎同沖擊被接受的一致性有著相反的聯系。恰恰是差異性大、各自獨立的鄉村最容易受到市場混亂的傷害，因為在商業力量已經強大的地方，最為常見的是這樣的鄉村。它們對市場混亂的反應可能很成問題，但它們面對的巨大沖擊也許會使它們有較大的爆發性。第二點復雜性在于，有充分理由認為，公有化程度較高的結構常常能夠進行“痛苦的再分配”，從而避免或延緩生存危機的到來。爪哇鄉村比較典型，至少直到20世紀60年代，那里還保留著足夠的公有結構的適應性，為其絕大多數成員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通過調整勞動權和租佃權，它緩和了直接的生存威脅。差異性較強的鄉村，例如交趾支那和緬甸南方的鄉村，便缺乏這樣的經濟適應性。這里的互惠和再分配的鄉村模式，為保護受到許多經濟混亂的毀滅性影響的處于生存邊緣的佃農和薪資工人所做的太少。因此，對于此類鄉村的得到最少保護的較低階層來說，稅收或地租的一定程度的增加，更加會造成更為直接的生存威脅。

由于上述相互矛盾的傾向，把農民的社會結構同潛在的反叛相聯系的任何普遍性陳述，都是可質疑的。公有社會的鄉村具有比較共同的階級觀念，并且容易形成共同行動的組織；而社會分化較強的鄉村既更容易受到市場力量的傷害，又缺乏內在地緩和市場力量對較貧困者的影響的能力。這兩種社會結構的區別，至少在我看來，似乎主要不在于各自的反叛爆發性本身，而在于一旦反叛爆發時爆發的性質不同——這不是我們關注的主要問題。[[507]](#_507_17)

## 不反叛，自助，或潰散

討論反叛問題，就要集中關注農民運用暴力試圖恢復或重建其社會生活的那些非常時刻。于是，就會忘記下述兩點：這些非常時刻如何罕見，它們導向成功的革命的情況在歷史上又是多么罕見。還會忘記，比起暴力的發動者，農民更加經常地成為暴力的孤苦無助的犧牲品。最重要的是還會忘記，在這些“瘋狂的時刻”[[508]](#_508_17)之外（甚至在它們之中！），農民實際生活中的大多數活動是：全家努力，確保全家有充足的食物供應。作為一個有一系列必不可少的迫切需要的耕者而不是具有長遠眼光的理論家，農民不可避免地要抓住能夠得到的一切機會——盡管有許多機會是不如意的。對于我所想到的生存策略來說，“機會”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詞匯。可選擇的機會可能包括：讓全家都有工作，取消以前受到重視的禮儀義務，遷居他處，共擔貧困，尋求仁慈的幫助，或者參加反對自己的村民伙伴的地主幫派。正如這一清單所顯示的，它們通常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要對這些多方面拼湊起來的混雜的解決辦法作出清晰的理論說明，是不容易的；它們中的大多數具有兩大共同特征。它們是對經濟和社會環境中那些能夠穩定生存條件的兼職機會和往來關系的徹底搜索。在農民群體所開拓的這一進程中，人們并不堅定地執著于鄉村的土地財產。此類地方的社會結構和團結的模式所帶來的重大后果，也許使之成為創造“后農民社會”[[509]](#_509_17)的關鍵要素。這種混雜的地方經濟的另一特征是它對潛在反叛的影響。農民可以得到的邊際機會事實上緩和了短期的生存需要；在這一范圍內，這些機會往往減少了采取較為直接的暴力手段的可能性。

從農民們可以實施的一系列適應性變革或策略中，人們可以大致地分辨出四種典型模式，它們在農民們所開發的資源中及其所創造的社會聯系中有著很大的不同。簡而言之，這四種模式是：（1）對地方自助形式的依賴；（2）對經濟中的非農業部門的依賴；（3）對政府資助的保護和援助形式的依賴；以及（4）對宗教的或反對派的保護和援助機構的依賴。它們的重要性可能因時而異，而個體農民則很可能同時利用所有這四種模式。然而，每種模式對農民政治活動和潛在反叛的性質都有不同的重要意義。在不同的條件下，每種模式都是可行的，都代表了“發展”的不同方案。在對“后農民社會”尚缺乏研究的情況下，以下的分項討論只能是純理論的闡述，旨在提出若干也許對此類分析有用的方法。

地方自助形式

對大多數農村人口來說，缺乏可供選擇的途徑和存在造反的困難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悲劇性地促成了大量的被動適應。整個農村可能逐漸地從種植水稻轉變為種植玉米，然后再轉向種植含淀粉的塊根植物，其目的就在于常常以營養缺乏、體能不足為代價而增加熱量供應。在土地特別稀缺的地方，被動的適應性變化可能包括“農業衰退”的技術特征——為了取得即刻回報而向更多的勞動密集型技術轉變，但單位耕地的產量有極為重要的增加。[[510]](#_510_17)許多適應性變化是農民經濟的全部內容的為人所知部分，一旦它們已經成為鄉村窮人或者收獲季節前的饑餓時期的惟一特征，它們就可能成為持久的生活事實。由此產生的模式在一定時期內可以容納膨脹的人口，但它等于建立在勞動的“自我剝削”基礎上的“踩水”。從長遠來看，如果人口增長而農業技術（即生產的功能）保持不變，退化就成了一種生態困境，它從社會結構中強要捐稅，最終又迫使人們遷居或餓死。東、中部爪哇和現代緬甸是這一模式在這一地區的最為顯著的例子。爪哇人的平均熱量攝入已經從1960年的1946大卡（比聯合國推薦的最低熱量少200大卡）跌至1967年的1730大卡；與此同時，蛋白質的消費也降到了危險的水平。[[511]](#_511_17)關于緬甸的情況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但確定無疑的是，自緬甸獨立以來，其農村人口的消費標準下降了。[[512]](#_512_17)

在有些情況下，在難以產出足夠農作物以養家糊口的小片土地上艱難謀生，可能要從種植食用農作物轉變為種植專供銷售的農作物，特別是種植勞動密集型的銷售農作物。正如查耶諾夫所說，受到很大壓力的俄國小地主經常從種植食用農作物改種亞麻，如果這是勉強為生的惟一辦法的話。[[513]](#_513_17)與此相似，在馬來西亞的吉蘭丹，收入僅夠支出的水稻田所有者最近已經由種水稻改為種煙草，這是他們避免去當收割工人的惟一途徑。[[514]](#_514_17)在農民們看來，種植此類作物的壞處在于，它們是高度的勞動密集型作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使農民直接面對著新的市場風險（煙草種植還使農民面對著更高的生產成本）。把專供銷售的農作物作為生存農作物的補充是一件好事；但完全種植專供銷售的農作物要冒風險，只有當在鄉村經濟的背景下實際上已沒有任何其他出路時，收入僅夠支出的小農主和佃農才去冒險。

除了向自然條件榨取它能夠生產出的東西之外，對生存問題的局部的適應性變化，還要由多種形式的互助來進行補充。地方殯葬協會、社會福利團體和流動貸款協會的發展，以及為盡可能廣泛地分布工作和食物資源所進行的努力，都是此種互助在公有程度較高的東南亞地區的典型例證。[[515]](#_515_17)

地方自助和互助往往是對生存問題的最初反應措施，也是當其他辦法失效時的持續有效的選擇辦法。窮人中的勞動強化和互惠的結合，雖然可以滿足短期的迫切需要，但從長期看來，在孤立的生存組織的范圍之外，是靠不住的。它是一種“退卻主義”策略，因為它僅僅是利用現有資源設法對付困難，不涉及政府和地主以稅、租的形式強征的剩余物問題。但全社區的土地及其產品的大部分，現在畢竟掌握在外部索要者的手里。雇傭、教育和援助的大部分機會不再由村民們掌握，甚至要努力減少外部對于稅收和地租的索取，也直接或間接地要求同外部世界建立起關系。共擔貧困和自我剝削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們對本地的生存困境和經濟保障提供不了任何長期的解決辦法。

雖然社會底層階級的公有理想本身是難以實行的策略，但即便是循此路線的錯誤開端終以失敗告終，也可能具有其他方面的重大意義。它們可能有助于建立和加強農民之間的橫向契約。它們體現了來自社會下層的組織地方慈善事業和典儀的首創精神，而此類活動以往經常是由社會精英階層所組織的。在這一意義上，在外地主所有制的發展也許特別重要，因為地主離開本土之后，鄉村結構便掌握在小土地所有者、佃農和工人的手里了。即便是地方積極性的殘余，也可能形成今后階段的階級領導和組織的潛在中心。[[516]](#_516_17)

更寬泛的經濟：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腐朽？

由于當地資源已用到極限，村民們越來越被迫地尋求從外部資源中獲取自己總收入的全部或部分。同內部自助一樣，暫時或永久的遷居，是一種或多或少的私人創新；但同自助不同的是，遷居的目標對準的是外部資源。

綠色革命？這種適應性變化的一個變體，是可以稱之為農民發展的資本主義路線的快速形式。它魔術般地喚來了18和19世紀英國發展模式的根本特征。簡單地說，這一模式的特征至少有三個。第一，作為階級的占有少量土地的農民，主要被廢除了古老的農村社會的經濟基礎的圈地運動消滅了。這一過程所造成的經濟的艱難和社會的混亂，觸發了大量的農民抵抗和暴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農民抵抗和暴力幫助資產階級取得了支配地位。然而，沒有徹底的農民革命，按照穆爾的觀點，可以歸因于英國發展模式的另外兩個特征：[[517]](#_517_17)一是商業化的有地產階級的成長，這一階級生產的發展使其有可能從靜態的農民社會中榨取越來越多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商業和工業的發展速度，這一發展吸收了由于農業革命而產生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起關鍵作用的一部分。對于我們的討論目的來說，值得注意的是，當現代經濟部門對勞動力的吸納和地方教區的救濟常常減少了變革過程中的暴力行為的同時，大量的強制和流血卻伴隨著英國農民階級的解體。

在有利的條件之下，類似的變革在當今的不發達國家并不是不可接受的。正如F.弗蘭克爾所描述的那樣，在印度旁遮普省的盧迪亞納地區，改種小麥高產品種似乎是個恰當的例子。[[518]](#_518_17)在那里，早先存在的對土地的集中占有，小麥高產品種的種植，以及肥料和機械的昂貴的資金投入，共同導致了產量的大幅度增加，也產生了新的強大的農村資產階級。[[519]](#_519_17)同在英國一樣，這一變革也不是平靜的。至少有20%的勞動人口比從前境況更糟，土地所有者和工人兩大派別的公開沖突普遍存在。分成租佃的份額比例發生了有利于土地所有者的變化，從50:50變為70:30；雖然佃農實際得到的小麥數量有所增加，但幾乎所有的新增利潤都被控制著土地和資本的人拿走了。然而，同在英國一樣，發展的結構始終是要降低新制度下的剝削程度。被迫離開土地的佃農和小地主中的一部分人成了農業勞動工人，另一部分人則加入了由農業繁榮所創造的加工、運輸和市場銷售等第二產業，重要的是還有一部分人投身到該地區正在發展中的工業部門。至少迄今為止，看起來旁遮普省已成功地轉變為高效率的資本主義農業。這一“成功”廢除了許多傳統的對農村窮人的生存保障，特別是損害了身處社會結構最底層的人們，但它也提供了足夠多的可以吸納多數農民的經濟安全閾。

東南亞地區的類似變革可能達到了怎樣的程度？這是個重要而復雜的問題，這里難以細述；不過，只要概述一下下述觀點的理由也就夠了：希望通過綠色革命而取得農業發展，不太可能為農業發展提供一條相對和平的道路，這一點很少發生例外。[[520]](#_520_17)

第一項考慮是綠色革命本身的限制。水稻、谷物的高產品種對供水的變化和時間的要求十分嚴格，因而局限于灌溉設施供水有保障的地區。在印度，大約20%的耕地符合這一要求[[521]](#_521_17)，而東南亞的比例不可能高于20%。這就是說，從自然生態看來，綠色革命僅僅適用于該地區的少數農民。

中心問題是，由此種農業現代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混亂能否通過農業部門內外出現的新機會而得以大規模地消除掉？總的說來，這牽涉到兩個問題：這一變革可能引發怎樣的分裂局面？有多少安全閾來承受這一混亂？

在新技術是簡單的、可分的、使用勞動力而不是節省勞動力的地方，在土地占有模式沒有被高度扭曲的地方，以及在小地主和佃農都能在平等條件下得到貸款和投入資金的地方，廣泛地接受高產品種的可能性最大。[[522]](#_522_17)不幸的是，這些條件不符合新技術的特性，也不是東南亞主要水稻產區的特性。

新條件所帶來分裂性后果，主要根源于它們對雇傭行為的影響，根源于農村階級關系的進一步商品化。由綠色革命所創造的新增收入的大部分，顯然被稀缺生產要素——土地和資本——的所有者拿去了。生產投入（例如，管井、水泵、勞動力費用以及肥料）十分“綜合性”地提出了土地占有和貸款機會的界限，低于這一界限就不會有什么革新。[[523]](#_523_17)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度問題，因為貸款的發放總是非常210有利于那些其財產使貸方有信任感的所有者。同勉強夠格的小地主和佃農相比，中、上等的所有者得到了相當多的累積性的有利條件。這一有利條件也同效率無關，正如戈奇所說：“為了獲得附加財產而儲蓄的可得性，是大戶農民的絕對剩余物的功能，不是他們的相對地位的功能。”[[524]](#_524_17)土地的集中化有可能實現，所種土地低于一定限度的小農在這一過程中就被擠了出去。此外，較多土地的所有者受到很大的誘惑，他們要取消租佃契約，在雇工和（或）機器的幫助下，重新親自（或者通過代理人）耕種。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菲律賓中呂宋的省份（比如新怡詩省）就發生了這種情況，廢除了許多對最好耕地的租佃。[[525]](#_525_17)

由此可以推知，在那些占有少量土地和租佃土地的階級占農村人口大多數的地區，例如東南亞的大多數水稻區，綠色革命的社會后果將會帶來很大的痛苦。首先是階級結構的重組所造成的不安全感。許多佃農和小地主可能要突然地跌入雇傭勞動者的隊伍中。這就引起了“從［相對］安全的貧困到伴隨著貧困的日益增長的不安全的令人極度痛苦的變革”。[[526]](#_526_17)還有證據表明，薪資勞動者階級本身的安全在這一變革過程中也逐漸受到損害。業主往往由實物付酬改為現金付酬，并且在用工高峰期常從外部雇人，從而部分地打破了當地傳統的付酬模式。

似乎自相矛盾的是，他們的平等地分享新技術的好處的主要希望，是要維持對大量的農業勞作付給相應的實物報酬的傳統制度。而在土地所有者看來，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在于把報酬全部貨幣化；故而他們斥責傳統制度的剝削性，開始在一切農業勞動中實行貨幣工資制度。[[527]](#_527_17)

在搶收季節，以及在新品種可能帶來的兩熟、三熟的情況下，用工高峰期給付日工資的比例可能確實提高了。但是，這是一種短期雇傭，而且這支勞動隊伍越來越成為真正的農業無產階級，他們沒有以前可能擁有的任何生存邊際保障。

雇傭情況本身如何呢？據推測，如果被雇傭勞動者總數能大幅度增加，由階級結構的變革所造成的不安全就會有一定程度的減少。而這方面的局部證據也是令人沮喪的。在中呂宋的部分地區和泰國中部平原，地主所得的新利潤以及便捷的貸款，使得引進拖拉機和打谷機成為可能，這就在實際上減少了對勞動力的總需求。

甚至在中爪哇土地占有極為分散的的情況下，雖然機械化的范圍相應地較為狹小，但新品種給勞動力帶來的后果也是災難性的。對已適應了新品系種植的村莊所進行的周密調查的資料，尤其能說明問題。科利爾、索恩托羅、岡納萬、沃拉迪和馬卡利描述了繼綠色革命之后如何引進新的收割制度的情況。[[528]](#_528_17)看起來，新品種比傳統品種更容易落穗掉粒，又不宜于使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鐮刀收割法。從前，每逢收獲季節，一塊0.2公頃地的所有者，大概能看到150名收割者和拾穗人集合在田邊地頭，行使他們的權利——收割者自己收獲固定份額莊稼的權利和拾穗人撿拾田地遺留物的權利。在這種傳統制度下，加上新品種容易掉穗，地主比從前要少得許多稻谷。地主不是眼看著自己失去收益，而是越來越求助于所謂的“收割經紀人”。這就是把地里的莊稼賣給通常來自其他村莊的中間人，中間人帶來自己的收割者（一般是同村人）用鐮刀收割，在田地里脫粒。其結果，經紀人、地主和幸運的收割者獲利較多，所需勞動力有了大幅度的減少（約20%—50%），當然收割成本也大幅度地降低了。同時，經紀人的勞動力隊伍，作為武裝團伙，履行著雙重責任：既保護經紀人又保護地主，使其躲開了那些本來打算成為收割者和拾穗人的人們因失去了又一項僅存的生存權利而作出的憤怒反應。新制度培植了享有特權的少數勞動者，同時切斷了大多數無地的爪哇人的主要的食物來源。這樣，階級的兩極分化和沖突的潛在性就十分明顯了。

看起來，通過高產品種進行相對平靜的農業變革的前景十分暗淡。在經濟安全和就業兩方面，至少對于農民群體中的較貧困階層來說，證據表明它會帶來嚴重的生存威脅問題。在東南亞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城市高失業率和創造城市就業機會的低效率的特定背景下，剩余勞動力幾乎不可能順利地為城市所吸納。在罕見的情況下，比如在馬來西亞，全面的經濟增長、邊遠地區的土地資源和出口價格的較高走勢，有可能在別處創造足夠的經濟補償機會從而緩和緊張局面。然而，對于大多數地區來說，綠色革命極可能加重階級沖突，而不能開辟一條平靜的發展道路。這雖然不一定釀成反叛，但確實意味著綠色革命的社會經濟后果，決不是緩和農村階級緊張關系，而是有可能激起更厲害的強制和鎮壓。

侵入現金經濟。假定國家的強制權力預防了上述壓力表現為造反的形式，這對鄉村社會意味著什么呢？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半永久性模式的短期遷移，即可以被稱為“侵入現金經濟”的模式。

這一模式的顯著特征是農民對于超鄉村經濟的邊際的或加以利用的可能性之日益增長的依賴性。它不是徹底的遷移和完全融入現代社會生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彌補當地生存資源不足的個人努力。這一遷移過程的基本因素有時在某些地區已經存在。由泰國東北部來到曼谷做三輪車夫或進入經濟學家所謂的“第三部門”的其他邊緣崗位的穩定的季節性民工潮，就是恰當的例子。[[529]](#_529_17)在雅加達遠郊的許多鄉村，像三輪車夫或小買賣之類的短期工作，也起著同樣的作用。[[530]](#_530_17)有論者描述了中爪哇的這一模式，稱之為“代換補償”。[[531]](#_531_17)類似的遷移網絡把東南亞的大多數地方城鎮和港口城市同周圍的鄉村連接了起來。人口壓力和農業結構性變革，可能使得這種模式不僅僅成為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前奏，而且是鄉村解決生存問題的相當長遠的特點。

據我所知，對于東南亞鄉村社會和政治的這種主要調整的影響，實際上還沒有展開田野工作；但我們可以從例如對意大利南部、愛爾蘭西部和墨西哥北部的研究中得到啟示——在這些地方，此種遷移改變了農村社會。[[532]](#_532_17)有些相當明顯的后果值得一提。顯然，流動勞動力日益增長不利于鄉村的經濟和政治合作。在財政方面，最為重要的聯系現在是外向型的了，因而必然會削弱以往使得以生存為宗旨的村莊結為一體的社會壓力和經濟責任的地方綜合因素。由此導致的社會組織的瓦解，可能要取消具有退化特征的相互親密關系和共擔貧困的慣例，代之而起的是相互間的敵意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模式。班菲爾德所說的“非道德的家庭主義”和另一些人所說的“貧困文化”，或許是已經處于經濟邊緣的鄉村經濟的社會殘余物。[[533]](#_533_17)

從人口構成上看，青年男子這支中堅力量撤出鄉村后，可能使鄉村極大地流失了社會底層的潛在的領導力量。再從文化上看，遷移模式往往要沖淡鄉村“小傳統”的特性和自主性。伴隨著所有這些方面的每一種變革，“農民”概念的社會和經濟內容被逐漸地剝光了，因而農村生活乃至農村政治越來越不成其為特殊的范疇了。

從另一角度來看，在農民政治失去自身特性的同時，它越來越被融入全國的政治活動之中。使鄉村同城市一體化的社會經濟紐帶必然催生出政治紐帶來。這些聯系在組織上和思想上促進了農村政治發展為全國政治模式中的有地方特色的農村政治，而不再是嚴格的自我規定的領域。就泰國東北部而言，從曼谷遷進遷出的傳統，幫助塑造了政治身份的地區意識，并且使地區性的不滿融入更大的左翼反對派之中。[[534]](#_534_17)這種農村政治與城市政治的均質化作用，當然既可能沿著保守路線也可能沿著激進路線進行，正如意大利南部農村的基督教民主主義者所表現的那樣。事實上，當外部的政治結盟反映了農民們努力開拓的同外部世界在就業、互助和友誼方面的廣泛聯系時，鄉村內部的宗派主義很可能變得更加普遍。

“臨時遷移”把鄉村的經濟財富和政治地位同城市經濟捆在一起。此類鄉村的境況或許可以同越來越多的地中海國家的境況相比，這些國家為工業化歐洲輸送大量的勞動力。由于輸出勞動力，國內的失業狀況得到了緩解，國外工人的匯款成為地方財政收入和對外交流的重要部分。在同一意義上，東南亞的“輸出勞動力”的鄉村，通過派出工人而緩解了土地和（或）勞動力競爭的壓力，又由于外出人員寄回或帶回錢財而增加了收入。由于同一原因，這樣的鄉村（或民族）特別容易受到城市經濟衰退的損害，從而大幅度減少其收入，并迫使其剩余勞動力回流。因此，此類鄉村的整體經濟震動的主要根源，不是農業收成或農產品的價格，而是商品經濟的雇傭工人狀況。同城市窮人一樣，現在鄉村也依賴于勞動力市場上的面包屑；而且，鄉村的季節工人典型地從事邊緣性工作，首先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所以鄉村的這種依賴性特別顯著。在這一意義上，談論農民的政治活動似乎不合情理了，因為此類鄉村的政治經濟生活同無產者的，特別是游民無產者的政治經濟生活，比起同農民的政治經濟生活來，有更多的共同之處。

在這里，重要的不是思考有大量臨時遷移人口的鄉村的政治活動，而是思考這一范疇本身的重要意義。有充分理由認為，在人口壓力和不可能迅速工業化的條件下，這種對現代剩余財富的脆弱的寄生性依賴模式，必將更加普遍。由此形成的鄉村不能理解為簡單的半鄉半城或半農半工，而必須作為具有其獨特性的“雜交品種”來研究。

對政府資助型的保護與援助的依賴

公共部門本身，特別是在它成為獨立部門之后，已經開始成為許多農民的生存資源的第二大源泉。在這里，我并不是指諸如土地再分配、最高限度的租佃稅率或者為占有少量土地者與佃農所提供的低息貸款，這些都可能提供持久的補償。此類努力一直很少而有限，幾乎無例外地不起任何作用。相反，我所說的是可以增加農民收入或有助于穩定其收入的全部公共部門的活動。此類邊緣性的、通常為短期的援助可以表現為公共工程中的雇傭形式，表現為公共部門的筑路及種種卑下的工作。得到資助的重新安居和部隊服役提供了較為復雜（如果說更危險的話）的經濟機會。更為零散的方式，例如食品補貼、饑荒救濟或兒童營養計劃，對于接近生存邊緣的農民，可能意味著大量的生存保障。[[535]](#_535_17)這一系列的福利和雇傭項目，即便在結構性變革的大背景下，當然也會有其合法地位。但孤立地看，它們十分接近于保守政權既要避免對土地或財富的再分配，又要預防農村暴動的任何可能性的慣用手段。

由政府發起的邊緣性機會的結構實際上有助于為多數農民家庭提供簡樸（如果說有風險的話）的生存條件。在這一范圍內，其實際效果很可能是消除農民動亂的潛在的爆炸性。它對潛在爆炸性的消除，既是經濟的又是社會的。在經濟上，它可能對生存需求提供短期的解決辦法，因而使得許多農民放棄了作為大多數農民起義之特征的絕望行動。在社會上，這些機會同遷移一樣，代表了個人的而不是集體的安全保護路線。此外，這些利益中的大多數，并不是任意分配的，而是借助于同政治家、政府官員和地方的權力代理人的聯系而實現的，而地方的權力代理人則利用自己的地位擴充地方的追隨者隊伍。此種聯系紐帶，可能是新式的，但同時又常常是傳統的“保護人—委托人”之間服從關系的同類型復制品。當服從性契約關系受到腐蝕后，這些由政府資金扶持的新關系就會成為農村的政權擁護者的基礎。農民可能以正常的懷疑態度看待這些關系，但它們對于其家庭生存的重要功能，將會抑制農民的行為。

在財政狀況允許的情況下，政府資助的保護水平在東南亞殖民地往往有所提高。我認為，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較早形態的經濟保險正受到侵蝕，或者幾乎消失殆盡，使得農民群體對最低經濟安全的需要異常突出。在大多數國家，由于缺乏可以接納許多邊際農民的工業擴張，這種需要有了進一步的加深。然而，在這一背景下，在存在選舉競爭的時候，對于擴展公共保護的最大刺激一直是選舉競爭的壓力。在緬甸奈溫長期軍人政權之前，執政黨內分裂的派系通過在鄉村分發貸款、津貼和現金來爭奪農民的選票。[[536]](#_536_17)馬來西亞執政的聯盟黨的龐大的筑路工程所創造的農村就業機會，也產生了類似的選舉意義。1960年前印度尼西亞的多黨競爭激發了類似的農村保護。[[537]](#_537_17)在選舉壓力之下，菲律賓的政治家把這種公共保護制度提高到了技術上十分完善的水平，甚至連美國的城市機構都很少能與之匹敵。在這里提到的每一種情況下，一方面，存在著大量處于邊緣的農民，對于他們，一點點的恩惠和庇護都有巨大價值；另一方面，存在著需要選票以維持權力的政治家，這兩方面為農村核心集團的政治活動提供了自然程式。

一般說來，此種農村保護體現了結構性變革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結構性變革的補充。菲律賓農村的本地人黨派的特性，就是政府保護如何常常使得剛剛出現的階級要求歸于無效的鮮明例證。[[538]](#_538_17)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成千上萬的菲律賓本地農民的需要和不滿，刺激了政治家職業的發展；大多數政治家分別通過提供工作、貸款和做其他合法事情來幫助農民，從而建立和維持自己的追隨者隊伍，同時吸收他們參加現有的政黨系統。政黨體制的職能，正是要在生存問題上幫助那些允許菲律賓本地精英勉強地避開革命情勢的農民——當然，也要動用警察對付那些轉而更直接地反叛的人們。[[539]](#_539_17)20世紀50年代，菲律賓麥格賽賽總統對待暴動農民的政策，大致遵循了這一模式。[[540]](#_540_17)盡管他早先熱心于土地改革，但他避開了這個結構性變革的關鍵問題，而是強調直接的物質利益——土地改革問題將會使他同牢固占有土地者的利益相對立。從前的反叛者為提供貸款和新開墾土地的承諾所誘惑；村民們得到了提供道路、工作和學校的許諾。雖然這一政策滿足了農民少許的緊迫需要，但忽視了土地所有制和租佃條件之類更基本的問題。到了1970年，這些問題再也不容忽視了。

從更為寬泛的方面來看，這種對農民生存問題的保守的穩定作用有哪些先決條件呢？如果說由政府創造的收入和職業變動的機會得力于國家的財政手段的話，那么我們就要關注所謂的國家“承載能力”。正如商業部門提供就業機會取決于經濟走勢，提供國家保護則取決于國家的財政狀況。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期間初級出口的猛增帶動了國家稅收的迅速增長。此時出現了國家保護和選舉政治的全盛期，這決不是巧合。同樣，20世紀50年代后期，出口所得的銳減使得財政鋪張代價更加高昂，并逐漸損害了精英階層通過保護措施滿足這些需要的能力，這也不是巧合。

由此可見，政府應付農民經濟的潛在爆炸性的此種權宜手段的可能性，取決于財政實力。保守的精英們只是在他們具有財力通過保護措施滿足廣泛的直接需要的范圍內，才能避免面對基本的結構性變革或鎮壓的問題。[[541]](#_541_17)然而，這一策略的財政負擔，很可能比政府使之實現所需要的財源增長得更快。只要結構問題得不到解決，只要人口增長帶來新的壓力，只要城市的經濟部門只能吸收農村中轉移出的勞動力的一小部分，那么，大量的生存問題可能就要超過國家的財政承受力。東南亞的保守政權所面臨的財政問題，比J.奧康納所描述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財政危機”更為嚴重。[[542]](#_542_17)一方面，不進行結構性變革使得福利問題更為突出，增加了對社會開支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明顯的原因，為此類福利項目提供資金的國稅，只能來自于保守的精英們不愿意再加重征稅的經濟部門。比如阻礙增加出口或開采石油，就可能導致福利需要的水平與滿足需要的國稅之間日益增長的不平衡。只有在罕見的情況下，比如在馬來西亞，由于那里的人口壓力不太大，那里的現代經濟部門和政府稅收的基礎都較為牢固，這種度過危機的保守通道也許是行得通的。但在東南亞其他地區，即便得到美國和日本政府的援助，其前景也很不光明。在菲律賓的近期歷史上，農民的不滿和國家財源之間的沖突明顯地是個令人痛苦的過程。在戰后的每次選舉之前，由于執政黨力圖通過利用公共資金實施保護來撈取農村選票——但通常不能取得成功，政府財政總要出現特殊的赤字。[[543]](#_543_17)然而，更為嚴重的是這一事實：每次選舉造成的赤字越來越大，而選舉之后的經濟恢復則越來越小。這表明面對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和福利需求，為了把越來越不可靠的選舉制度的運作變為資本，需要在公共開支方面進行更加卓越的努力。到1970年，由于政府歲入的下降，通過保護措施來控制沖突的財政負擔肯定到了極限。這很難說是馬科斯總統之所以宣布實施軍事管制法的惟一原因，但看起來十分明顯的是，菲律賓本地人的傳統的選舉資助制度確實已經破產了。這時已經不可能回避土地改革或者鎮壓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呂宋和南方的穆斯林地區——來自其他島嶼的農民在這些地方新開拓居住地便遭到了暴力抵抗。看起來，政府為了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而需要付出的政治代價，使得鎮壓（甚至在選舉期間都十分明顯）成為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簡而言之，對政府保護的依賴可以穩定地、長期地適應農民生存危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在需求方面，人口的增長，對結構性變革的忽視，甚至綠色革命，都穩定不變地增大了這一策略的成本。而在供應方面，政府稅收的增長率及其穩定性，都不能確保國家承受得了這些成本。還有在政治上，曾經有力地激勵實行此種策略、避免大規模沖突的選舉形式已經大量地被拋棄了。保守性的保護措施可能在短期內有效，但它不大會比地方自助或短期遷移更能成為農民安定的可靠途徑。

然而，在大多數東南亞地區，政府保護的結果大概將繼續使一部分農民返回農村。鑒于農民的流動對政治和結構性變革可能產生的意義，這肯定是一種災難。但從農民本身的生存需要的角度看，我們還是在對此予以譴責的同時予以理解為好。正如R.C.科布在談到法國的拿破侖一世時期被遣回農村的農民時所說：

鮮有歷史學家經歷過挨餓的痛苦，因而他們無權責備窮人哪怕是充滿感激地接受資產階級的施舍。指責過去的饑餓者為救濟金所收買而脫離歷史學家所認定的“向前看”運動，這是不合適的。[[544]](#_544_17)

保護和援助的宗教形式或反對派組織

最后一種面對生存危機（而不反叛）的矛盾性適應模式依賴于保護和援助的宗教形式或反對派組織。在此類模式之中，有南越的和好教與高臺教，菲律賓的基督會，甚至還可能包括1965年之前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然而，這一范疇的涵義不太明確。此類教派和政黨常常是作為其替換物的反叛活動的前奏和推動因素。因此，菲律賓的科洛魯姆派可能交替地或是向國家發起全力以赴的攻擊，或是返回地方經濟與清靜無為狀態。同樣地，20世紀30年代后期呂宋的薩克達爾黨會從常見的政治改革方案突然轉為武裝反叛。然而，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發端于表達農民階級不滿的此類運動可以或多或少地變為別的形式或轉移其目標。當這些運動能夠提供物質安全、就業機會和物質幫助以滿足農民的最為迫切的需要時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就會成為地方組織的永久組成部分——力圖保持自己（或者加入）同地區性或全國的保守力量的結盟。當然，西方農民中基督教宗派的歷史，提供了許多此類實例。鑒于農民所具有的典型的地方主義觀念，毫不奇怪的是，一旦為解決他們的眼前問題找到了某種辦法，他們就要極力加以維護，而不愿再冒險發展。[[545]](#_545_17)他們的觀念和地方組織，正如爪哇人的薩敏派那樣，仍然同更大的外部社會存在著尖銳的不一致，但這不會形成直接威脅。

簡單介紹一下高臺教和基督會教派，有助于說明這種適應模式。[[546]](#_546_17)高臺教于20世紀初創立于越南南方，在各地共有教徒30—50萬人，在靠近柬埔寨邊境的西寧省，其力量特別強大。其學說明顯地主張信仰調和論，維克多·雨果、耶穌基督和孔子都在其崇奉的圣人之列。在其信眾之中，雖然包括許多農民、工人，但其領導人員比例不等地來自越南中層階級——小官吏、譯員、私人商行職員、教師、學生、小商人和小地主。

對于我們的目的而言，該教的地方組織和資金來源具有特殊意義。高臺教慈善團幫助其貧窮的成員，并且同許多其他教派一樣，“在對付疾病、納稅和完成徭役負擔方面組織相互援助，幫助調停鄉間爭端，興辦各種商業企業”。[[547]](#_547_17)在它所控制的商業利益（木材、輕工業和少數小種植園，更不用說其領導人所干預的鴉片與皮阿司特的交易了）的基礎上，它能夠為許多信徒提供物質的和精神的保障。它的地方部隊幫助其確保行政壟斷權，地主和法國人也都在財政上幫助這種運動。

在農民方面，地方自助、商業冒險事業和高臺教所控制的外部補助金，共同提供了保障物質和身體安全的有效的社會組織。它滿足了信徒們的許多最為緊迫的、實在的需要。此外，它從一開始就是反叛之外的選擇方案。只要教派領袖們控制著把當地追隨者凝聚起來的做好保護工作的資源，他們就能自由地得到地主、法國人和后來的吳庭艷以自認為合適的對待。[[548]](#_548_17)除了參加革命運動的薄寮省教派領袖這一例外，其余生存下來的高臺教教派都成了同現存制度密切聯系的新的地方保護組織。[[549]](#_549_17)正如人們常常評論的那樣，在道德上團結一致的背景下，高臺教（與和好教以及該國其他地方的天主教管區）在滿足農民的短期需要方面所取得的一定程度的成功，形成了防御這些地區共產主義擴張的屏障。

呂宋的基督教教派——基督會，特別注意在貧苦的佃農、工人和城市游民無產者當中發展信徒。一位論者認為，它最近的發展也許部分地由于在此之前薩克達爾黨及其后新人民軍的較為世俗的革命企圖都失敗了。在這一意義上，當反叛失敗或者根本不可能發生時，我們也許不認為它替代了提供象征性的物質庇護的反叛活動。它在地方上產生的力量，主要來自于恢復生存安全的傳統道義經濟的方法。有所需要的成員，在貸款、殯葬開銷、醫療費用和其他形式的救濟方面都得到幫助。而且，對于其成員來說，該教派也起著一種就業代理機構的作用。同高臺教一樣，基督會組織了簡樸而有效的經濟安全結構來團結信眾。由于在選舉時的團結一致，又同高臺教一樣，這一教派成了一支需要認真對待的政治力量。它所贊同的候選人，如果成功，就成為它的教派利益在全省和全國范圍內的代理人。基督會沒有簡單地變成又一種“保護人—委托人”組織，因為其全體成員、其教義及其平等主義仍然反映了在其發展背后所存在的階級問題。然而，它作為一個教派的相對成功，開辟了組織的和思想觀念的岔路。通過地方自助和政治團體，它可以滿足信徒的經濟需要；在這一范圍內，它很可能成為平穩的、非激進的宗教運動。

激進黨派、農民協會以及宗教派別，都容易受到這一包裝過程的影響。它們在迎合農民的福利需要方面的局部成功，可能逐漸損害其成立時的更為激進的指導目標。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冒險變成類似于保護的組織而不是成為階級運動。大約從1951到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歷史，說明了這一過程的若干主要特征。該黨“同農民的接近，似乎一向主要是通過保護、親屬關系和傳統的服從關系等途徑得以實現的”。[[550]](#_550_17)該黨領袖認識到了這一問題——雖然他們大量地擴充了黨的隊伍，從1951年大約5000名骨干發展到1955年100多萬——并經常譴責對家長式統治的背離。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傳統政黨并不完全不同，它也為農民提供具體服務，常常把當地的有影響人物及其追隨者一起吸收進自己的組織。黨的領導人努力地工作，把定居占地權合法化，為水火災害的受害者提供救濟，幫助實現政體形式，提供法律咨詢，等等。由于對公共資金的處置有一定權力，印尼共產黨能夠分配大量的全日制的全職或兼職工作，能夠在1955年至1957年的選舉中投入大量資金。對于許多爪哇農民來說，該黨的這些活動是他們在別無選擇時取得幫助和影響力的重要渠道。[[551]](#_551_17)

印尼共產黨內的個人依賴關系的地方意義，在地方領導的組成中表現得特別明顯。農村的該黨官員的大部分是中等地主和（在爪哇）大地主，阿班甘（即堅決地遵守爪哇人的禮儀和文化的名義上的穆斯林）商人和店主，傳統的行醫者和款待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保持著體現其社會地位之特點的對貧苦農民的態度”。[[552]](#_552_17)正如R.杰伊所指出的：

作為農村的左翼政治領導人，這些富有的、令人尊敬的、尊重傳統的阿班甘的選擇，在塔曼薩里并不是惟一的。我發現它是作為傳統農業社會之組成部分的、由左翼力量所統治的鄉村的一貫模式，以前的大農場工人的村莊才有例外。……這些人物是鄉村的其余人員與城市社會之間的正常的，甚至是傳統的中間環節。他們本身一般都是富裕村民，受到城市的關系和模式的強烈吸引，有時候同城鎮的低級官員階層又有（或者曾經有過）親屬關系。[[553]](#_553_17)

到1955年，當農民在印尼共產黨全體成員中居于多數時，黨的領導人實際上已抱怨地方的富裕分子在阻礙黨的決策。[[554]](#_554_17)該黨依仗著蘇加諾的保護和民眾選舉基礎的重大影響，在許多方面為農村的個人依賴性提供了傳統的保護模式。多數農民不是同黨的階級活動或思想觀念有多大聯系，而是同地方領導人有密切的個人聯系。1965年印尼共產黨的瓦解不僅是軍隊和某個宗教組織中的勇敢分子反對的結果，而且是其自身組織妨礙了階級戰斗精神的結果。[[555]](#_555_17)

這里所作的區別是好的，但不能走得太遠。期待激進政黨部分地回應地方的甚至個人的具體需要從而在農民中站穩腳跟，這是正常想法。印尼共產黨的領袖艾地告誡說：“我們的農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支援他們爭取滿足日常需要的斗爭，實現他們的部分要求。”[[556]](#_556_17)大概只有當這種支援既是成功的、又是按照個人保護的方法組織起來的時候，它才是冒目的而非手段的風險。[[557]](#_557_17)如果貧苦農民的直接的生存需要——它是農民激進主義的階級基礎——因此得到實質上的緩和，那么，其結果很可能就是遣散農民而不是把農民組織動員起來。

潛在的激進農民運動的組織是否形成，似乎主要取決于它可以得到的資源能否確實緩解其成員的最迫切的需要，取決于政府或外部精英對其寬容甚至幫助的程度。在這兩個因素當中，后者似乎最為重要。沒有外部幫助，一個地方教派或政黨或多或少就會被迫處于我們所說的“內部自助”之中。作為保護的基礎，內部自助不會有充分的物質條件。例如，基督會和印尼共產黨是在選舉制度下活動的（或者，1958年至1965年的印尼共產黨，是在總統的允準下活動的），這就為當地信徒和擁護者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盡管面對同吳庭艷的軍事對峙，高臺教與和好教的許多教派也能夠同殖民者的西貢政權達成有利的契約。此類契約使得它們的地方基礎保持完整，還充實了它們的金庫。顯然，選舉的政權和弱勢政權如果具有同獨立的權力中心達成協議的強大動力，就都會促成潛在的異議者運動采取和平的甚至保守的形式。如果這一分析正確的話，那就說明，當此類有利條件發生逆轉時，潛在的異議者運動就可能轉向抗議，甚至反叛。

## 不反叛：鎮壓和“錯覺”問題

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條件下，上述的適應性變化才能為剝削和人口壓力所造成的生存問題提供解決辦法。這種通向后農業社會的保守的、相對和平的路線似乎需要具有某種經濟增長率、一定的財力和一定形式的政府——所有這些因素由于在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都很欠缺因而顯得特別突出。

如果我們僅僅根據農村情況來討論問題，那么，促成反叛的經濟條件很可能依然存在，并且在一些地區有所加劇。要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人口與土地比例的不斷惡化和國家力量加強了收租人和收稅人的霸權。社會地位最不安全的農村無地者的比率不斷提高。稀缺生產要素——土地和資本——所有者的利潤增加了，而充足生產要素——勞動力——的利潤則降低了。正是這些條件，特別是當它們變得十分嚴重之時，引發了戰后緬甸、菲律賓和越南主要的農民反叛運動（以及爪哇1948年的茉莉芬起義）。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國家力量的軟弱，促成了上述每一次反叛運動，這一點很有啟發意義。同樣有啟發意義的是，除了越南的例外情況，上述每一次反叛都被鎮壓下去了，盡管它們比戰前的反叛規模更大，組織得更好。[[558]](#_558_17)隨后在中呂宋和爪哇經常突然發生的反叛前導事件——侵占土地、攻擊地主或官員、佃農和工人的罷工，毫無例外地被對權力日益充滿信心的國家政權所制止。[[559]](#_559_17)

在這種情況下，不斷加深的剝削和經濟不安全感激起了農民的憤怒和道德義憤，但并不必然地導致反叛。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可能性：東南亞農民反叛的主要阻滯因素不是受剝削程度不夠，而是政府與農村精英可能強加于未來反叛者的致命危險。正如J.鄧恩概括指出的那樣：

面對每個現代國家建立起來的現代武裝，即便是最正當的反叛也只能是絕望的冒險。一般平民不會為了鬧著玩而造反。特別是在可能發生大規模反叛的國家里，大多數人對未來的較好制度缺乏理性的把握和信心，因而在高度壓制之下投身于爭取生存的斗爭；他們的反叛是顯示其痛苦的最后姿態，而不是對未來的樂觀主義表達。[[560]](#_560_17)

在早期殖民地時代，從未見過現代武器和軍隊的反叛者很容易對危險前景作出錯誤判斷而貿然罷工。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沙耶山及其追隨者，明知殖民者擁有現代武器和軍隊仍然舉行罷工，他們相信自己的魔術般的宗教力量能戰勝敵人。義安的農民在榮市的局部成功的基礎上會發起反叛，因為他們從特殊的地方形勢出發對全局的力量對比作出了錯誤判斷。然而，農民生活的世界使他們越來越不可能作出此類致命的錯誤判斷。他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軍隊（常常還有警察）的勢力，即使不占支配性地位，也占有主要地位。此外，他們還具有從以往的反叛和違抗行為中得到的令人清醒的經驗證據。

對鎮壓有著切膚之痛的記憶，這對于有意進行最微小反抗的農民，一定會產生令人心悸的影響。一代農民對失敗的體驗很可能排除了新一輪反叛的可能性，直到新一代農民產生為止。中呂宋的菲律賓本地佃農和工人，對30年代和50年代有著膽戰心驚的記憶。那些勇敢或絕望的人們，參加了佃農協會，更不用說把自己同新人民軍等同起來；因而他們很可能要失去租佃資格，還要被當地地主列入黑名單。除了經濟報復，還要受到在法院、軍隊、警察和農場主的私人衛隊控制下的坐牢、鞭打和謀殺之類的肉體報復。[[561]](#_561_17)對許多爪哇農民來說，1965年末和1966年初的記憶更是一帖清醒劑。一個人只要同印尼共產黨發生聯系，通常就足以使自己成為恐怖行為的受害者——由某個宗教團體及其軍事同盟所實施的此類恐怖行為，可能光是在爪哇就奪去了30萬人之多的生命。這一恐怖統治的后果，一直消蝕著貧苦農民在近期的威脅其生存安全的耕作變革面前組織任何反抗的能力。[[562]](#_562_17)當然，一旦瀕臨毀滅，不論多么危險，農民確實會不顧一切地反抗。但在除此之外的任何情況下，對鎮壓的記憶很可能是未發生反抗和造反的主要緣由。

這一假設提出了重要的理論問題。在不存在反叛的現實可能性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估量反叛的潛在性呢？例如，讓我們假定，雖然沒有反叛，但我們可以證實一個特定的農民群體正在遭受越來越大的剝削（在我們所界定的剝削的意義上）并因此而面臨生存危機；我們再進一步假定政府具有粉碎任何可能發生的反叛的強制力。對于這種情況，至少會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方面，人們可能認為，由于農民的宗教觀念或社會意識，他們承認這種剝削是社會制度的正常的、甚至是合理的組成部分。這種對于未發生反抗——對于農民的忍耐和服從——的解釋假設了一種對于社會制度的宿命論的認可。另一方面，人們還可能聲稱，對忍耐和服從的解釋不存在于農民的價值觀念之中，而應從農村的各種力量的關系中尋找。

人們大概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沒有任何人會認為，單憑沒有反抗這一點，就足以證明農村的階級關系是和諧的。甚至殖民地官員們在評價20世紀30年代下緬甸地主的索要權時，也承認農民的和平可能是鎮壓之下的和平，而不是得到滿足的和平：

我們不會同意時常聽到的這種說法：地主和佃戶的關系總體上是和諧的。我們懷疑這無非是說難以對付的事件不常發生而已。我們傾向于認為，表面上令人滿意的關系只不過意味著佃戶完全處于地主的控制之下，無法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堅持自己的權利。[[563]](#_563_17)

這兩種解釋所提出的問題是分析農民政治活動的中心。神秘化被當做農民順從的理由，特別是在像印度這樣的社會里——在那里，古老的嚴格的等級制度由于宗教的支持而得以強化。在印度教的等級制度下，低級種姓被告誡說要認命。[[564]](#_564_17)同樣的解釋也被用來說明爪哇的情況，那里農民的服從傳統被看做是對反抗的認識障礙。對這個難題有沒有實際上的解決辦法？有沒有一種方法在任何特殊情況下都能判定用以阻止造反的價值標準的重要性，都能判定記憶中的實在的和潛在的鎮壓的重要性？我認為可采取多種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但不能低估由此涉及的其他問題。

首先，有一些接近于實驗的情勢提供了檢驗這些不同解釋的東西。如果鎮壓的威脅而非神秘化的東西是反叛的主要障礙，我們就會邏輯地認為，大幅度地減小國家的強制壓力，也許就會自然地激發反叛。如果我們孤立地考察緊隨減輕鎮壓之后（并且此前的價值觀變化看起來微不足道）而發生的反叛和抵抗的實例，那么，把鎮壓情況作為主要障礙的看法就會得到強有力的所謂“發生于其后者必然為其結果”邏輯的支持。此類實例的出現，確實是由于鎮壓能力的變化比價值標準的變化更快。

發生在印度的一個實例很能說明我的觀點。[[565]](#_565_17)1969年前在西孟加拉的納薩爾巴里地區，雖然一直有農民協會在積極活動，也存在著長期積壓下來的不滿情緒，但實際上沒有發生反對當地地主精英的任何突發事件。后來，一場大規模反叛令人矚目地打破了這一相對的沉寂期。這場反叛發生于左翼聯合陣線在1969年的全國選舉中取得勝利之后不久。當時的情況似乎是，選舉戰促使農民相信，對他們有利的聯盟已經獲得了權力。聯合陣線公開討論剝奪地主的問題，并且任命了聯盟中最激進派別的一位共產主義者為土地和稅務部部長。于是不僅在納薩爾巴里地區，而且在西孟加拉的其他地區，農民們都自發地占領土地；他們認為，警察和行政當局在他們的記憶中第一次站在了他們一邊，并且會支持他們對土地的要求。在幾次農民們得勝的對抗之后，反叛的大爆發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致排除了農民組織者需要同時使得農村窮人非神秘化的可能性。似乎合理而明顯的是，發生變化的不是農民的價值觀念而是農民的行動能力。一旦農民清楚地看到他們可以比較安全地采取行動，看到風險已經減小，反叛實際上就自動發生了。在諸如此類的情況下，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導致早先的服從狀態的是鎮壓而不是神秘化。在同樣的情況下，若是不發生反抗，就可成為反對鎮壓論的證據。[[566]](#_566_17)

因此，農民反叛的背景和進展常常可以為鎮壓論提供“發生于其后者必然為其結果”的證據。政權的更迭，政府在軍事失敗之后的軟弱無力，反對黨取得的地區性勝利，都是表明力量平衡可能發生變化的征兆，并常常是激發農民反叛的事件。基于這一觀點，我們也可以理解農民起義如何在初步勝利的基礎上會滾雪球般地迅速壯大起來。一個警察局被掃平了，一個地主逃之夭夭了，一個谷倉被成功地占領了——這些都會對仍在戒備之中的農民發出信號：現在可以采取行動了。并非如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此類大爆發只是顯示了農民們集體發狂的傾向；它表明，如果國家或精英對剩余物的索取權主要靠強制力來實現的話，那么，其力量軟弱的實實在在的證據會有何等的爆炸性！而國家力量的展示不用說具有相反的結果。如果抗議的農民被打并被送進監獄，如果強占谷倉的企圖遭到決定性的打擊，就會給農民們一個冷酷的信號：反抗的危險極大，而成功的機會極小。[[567]](#_567_17)

在有些情況下，我們通過觀察解除強制力之后的事態發展，可以對強制力的恫嚇效果作出評估。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代表性力量的崩潰為我們提供檢驗實例，為農民提供攻擊的機會，這時怎么辦呢？當農民的相對弱小使之有必要進行偽裝時，如何區別虛假的服從與真正的服從呢？如何區別暴力之下的服從和神秘主義與宿命論的服從呢？關于這些問題，根據經驗的觀察是十分粗略的，而證據又因具體情況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們可以從三方面找到證據。首先，政府和擁有土地的精英肯定注意到了農村不斷加劇的剝削所造成的潛在后果，而且我們可以從他們對強制權力的不斷強化中感受到他們的憂慮。例如，我們可以考察一下用于農村治安工作的軍事治安預算的增長情況。如果這一預算的均衡增長比其他方面對國家財政的需求更快，那么，這件小事就會反映出大動向了。舉例來說，越南在兩次戰爭之間不成比例的治安預算的增長，就極好地說明了對農村法律制度的不斷增長的憂慮[[568]](#_568_17)，雖然我們還需要更多地了解擴張預算和實際部署治安力量的理論闡釋。用不太正規的術語來說，由地主及其代理人、地方官員和收稅人所調集的非正規部隊的壯大，可能正好說明，他們對剩余物的索取已經越來越不是服從問題而是權力問題了。當農民的財力資源極度衰竭之時，每逢征收租稅時節，每逢收割莊稼前夕，日益增長的強制作用就特別顯著，當然其表現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地主只有帶上隨從才敢小心翼翼地察看自己的田地，如果收稅人開始帶著一幫警察露面，如果大土地所有者在宅院周圍筑起圍墻并雇人守夜，這方面的證據便積累起來了。[[569]](#_569_17)這些變化可能發生于農民少有反抗行為之時，但卻正是顯示階級關系大氣壓的靈敏的氣壓表。

階級關系變化的第二個“氣壓表”包括了農民用以暗中改善同地主交易的條件同時避免公開對抗的手段。佃戶可能在正式分配收獲物之前秘密地收割并出售一部分農作物。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從土地擁有者的谷倉或其私人農田里偷竊糧食。他們還會帶上地主的耕畜和盡可能多的收獲物逃之夭夭。地主可能會發現自己的米籮里原來被摻入了大量稻殼。所有這些詭計統統違反了租佃和勞動契約。這些詭計的使用表明，工人或佃戶認為強加給他們的條件是不公平的，因而他們要盡其所能地加以改變。這種證據不可能得到確證，因為某些常用的騙術也許是正常的“小傳統”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此類騙術大肆流行，像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在下緬甸和交趾支那發生的情況那樣，我們就有充分理由認為，交易條件已經極大地失去了合理性。此時，可能也會聽到地主對于佃戶階層忘恩負義、不服從和偽裝手段的抱怨之聲。為了避免此類行為造成的利潤損失，地主在抱怨的同時，很可能要不斷加大在雇用看守人和監工方面的投資。這就是說，農民小規模違抗行為的增加，必然促使地主加強監視和強制力量，這標志著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失去了規范權力。

最后，如果農民們覺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勒索，我們在他們具有某種控制力的生活領域以及他們的文化中就可以找到強烈的征兆。我認為，在那些遭受剝削又看不到反叛前途的人們的文化中，有可能發現不斷增長的象征性隱退的明顯證據。在這一意義上，被壓迫團體的價值觀念是其象征性結盟的最明確的檢驗標準，是他們反對精英階層的價值觀念和訓誡的最明確的檢驗標準。

事實上，神秘化或“錯覺”的論證，取決于精英價值標準和農民價值標準的象征性結盟，取決于這一假設，即：農民們接受了精英階層關于社會秩序的見解。倘若不是對于為剝削辯護的社會意識的群體信仰，神秘化又意味著什么呢？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神秘化的終極根源，要到統治階級對于生產資料——也包括文化的生產資料——的控制中去尋找。在心理學家看來，錯覺的形成過程，可能要到被認為是“認同壓迫者”的觀念中去尋找；由于“認同壓迫者”，受害者企圖通過同有權勢者的聯合，擺脫受壓迫的痛苦。[[570]](#_570_17)從雙方認識不同的觀點看來，受害者使自己的價值標準同自己必須采取的行為方式一致，以避免自己的價值標準與行為之間的沖突。再從宏觀角度看來，被壓迫者的服從，是軟弱無力的人們借以感化、影響其上級壓迫者的惟一手段。[[571]](#_571_15)

然而，我們要分外小心，不要從被壓迫者的行為中推斷其價值標準。實際發生的許多服從行為都不過是“儀式化、習慣性”的行為，甚至是行為者的自我打算：“大量的服從行為可以理解為行為者在逼迫之下不得不為之的事情，否則將受到制裁。”[[572]](#_572_15)事實上，這種被強制的行為同一旦解除了強制將會做出的行為之間存在著巨大懸殊，其懸殊程度說明了農民的服從行為所包含的虛假性。正是這種服從行為，可能包含了某種嘲諷：

行為者可能會通過展示自己并不具有的東西，感到自己保存了一種內在的自主性；行為者通過維護禮儀制度的行為，使之得以延續。當然，在嚴格認真地奉行合乎規矩的形式時，通過小心翼翼地改變自己的語音、語調、步態等等，他會發現自己可以自由地慢慢表現出各種漠視規矩的行為。[[573]](#_573_15)

因此，單從對尊敬形式的奉行服從上，我們難以了解其真誠性如何。

如果說神秘化是農民屈從和服從的主要理由，那么，我們就有可能借助農民的信仰和文化加以證明。然而，如果說神秘化不是這個問題，那么從考察農民文化中也會明顯地看出來。由于任何社會群體的文化都會包含許多種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潮，證據很難是現成的陳套。在從屬群體的不協調的亞文化群及其同精英階層的主流價值觀的關系中，可以找到這些方面的證據。W.F.沃特海姆指出了進行這種分析的重要意義：

沒有任何社會是個完全整合的實體。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著反對通行的等級制結構的隱蔽的或公開的抗議。一般地說，或多或少占支配地位的共同價值觀是可以歸納出來的。……但在這種主導價值觀之下，始終存在著不同類型的價值標準。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不同類型的價值標準在某些社會群體中得到貫徹，并作為社會主旋律的一種配合旋律發揮其社會作用。[[574]](#_574_15)

此類異常的價值標準可以表現為神話、笑話、歌曲、語言的使用或宗教等形式。沃特海姆特別提到了在許多文化中都有的傳說（the Tyl Uylenspiegel），其主題是歌頌那些嘲弄社會等級制、擯棄公認的價值觀或把它顛倒過來的惡作劇者。[[575]](#_575_15)這些配合旋律可以成為象征性抗議的無害的制度化形式，好像王室的小丑，起著加強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作用。它們還可以成為帶有潛在的造反性質的宗教或政治運動的規范中心。[[576]](#_576_15)值得注意的不是它們的存在本身，因為這幾乎是普遍現象；而是它們所采取的形式、所表達的價值標準以及激起人們信奉的程度。

盡管有需要分析的問題，但可以認為，對農民文化的認真考察能告訴我們它同精英文化是否有某種程度的和諧一致，以及它所改變著的方面，還有兩者的分歧大概有多大。下面的一些簡短的舉例說明將揭示這方面的相關證據。

在中呂宋，分成租佃制用他加祿語來表達是所謂“kasama”，其涵義接近于“伙伴”、“匹敵者”或“共同分享”。從語言學上說，它含有促進友誼和平等主義的意義。然而，由于現在“kasama”制度的剝削程度加大了，這一術語同它實際體現的關系已經越來越不一致了。[[577]](#_577_15)為了應付這一社會現實，當農民對地主或其他權勢人物講話時，他們更多地使用這一傳統術語。而在農民內部，他們給這一術語加上了含有憤世嫉俗意味的后綴以取消其字面意義，并清楚地表明他們很難認為租佃關系是一種公平、平等的關系。在實踐中，農民們對分享收成的觀點是非神秘化的，揭示了對“kasama”一詞的本來主張的公然蔑視和嘲弄。這很難證明一有機會農民就要造反，但確實證明他們認為租佃制度是一種不平等交易。對農村階級關系的探討不妨從這里開始，弄清農民實際上是如何描述他們同地主之間的安排、同官員們的關系的——弄清這些農民描述語言的涵義。我們由此也許可以看出有關精英和農民之間的象征性結盟或對抗的若干具體情況。[[578]](#_578_15)

民歌是農民文化的一個方面，從中也可以看出不斷擴大的有象征意義的鴻溝。例如，18世紀初期英格蘭農村民歌的主題就常常充滿對農村生活的贊美以及對農村勞動的歌頌。[[579]](#_579_15)

泥瓦工啊，敬崗愛業的人們，

要是沒有他們，我們早就凍死。

裁縫工啊，他們讓舊衣變新，

就像終日勞作的農民。[[580]](#_580_15)

但是，“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出現了大批民歌民謠，描述孤注一擲的犯罪和攔路搶劫；走私者、偷獵者結成的社會團體，同鄉村聯合起來，如果需要的話，隨時準備同權貴們血戰。”[[581]](#_581_15)最重要的是，農業工人同紳士之間的新關系從中得到了令人心酸的表達。

身穿皮大衣，頭戴教友派禮帽，

胳臂里夾著鞭子，滿田野里亂跑，

大呼小叫地

找尋他們的農場。

他們會跑到幾十里開外

誰也不認識的地方。

從那里雇下收割工，

帶回自己的農場。

準備一堆爛菜葉，

像喂豬一樣對待你；

他們卻品嘗著香茶吐司，

乘坐著小舟蕩漾在鄉村小河里。

女主人總要聽到叫聲“太太”，

你必須把帽子舉到她跟前；

你要想獲準進大門，

先要道聲“父親”尊稱男主人。

每當收獲季節來臨，

他們舍不得讓你休息。

他們也會允許你禮拜，

但最喜歡你出力氣。

他們最煩惱的吃飯時，

一定要來招呼我們：

“快來歇息吧，我的小伙子，

就躺在這泥地里。”[[582]](#_582_15)

這首民謠嘲諷了對“太太”和“父親”的服從和舉帽討要小費的情態，標志著我們不能單看外表服從的表面價值。紳士們的香茶吐司和工人們的爛菜葉之間的反差，加上對雇主連一頓飯的短暫休息都舍不得給雇工的描述，如此鮮明地、如我們所想地揭示了地主已成為剝削者的事實。當然，單憑民歌本身，證明不了任何東西；但是，如果民間文化的總趨勢朝著同一方向，我們就有了可靠的證據，說明農民們是如何看待社會制度的。

從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越南農民民歌，揭示了類似的痛苦狀況，控訴了那些剝削人民的貪得無厭的權貴們，控訴了可恨的貧富懸殊。

他們成天干的，就是去百姓家掠取財產。

傍晚時分，一邊享受著美餐，

一邊分配著白天搜刮來的財產；

權貴們面前，擺著豪華奢侈的餐桌，

佳肴美酒，倒進一張張咧著的大嘴。

我們這些大老粗們，一個個嚇得發愣，

盯著強壯的權勢者們，邊吃邊笑談。

政府的全部賦稅，他們逼迫窮人們承擔。[[583]](#_583_15)

天大的不幸啊，襲擊著窮人，

穿著破衣爛衫，

渾身直打顫——

是那催命的鄉鼓聲，

報告著收稅開始的不幸時辰。[[584]](#_584_15)

老天哪，你為何如此地不公？

一些人家財萬貫，一些人饑寒交迫。[[585]](#_585_15)

同時，古老神話的象征性倒轉即“扭轉乾坤”在流行文化中也得到了共鳴。有首歌宣告把森林動物的自然秩序顛倒過來的時刻已經來到，而另一首歌則公開贊揚“最后變第一”：

國王的兒子，還要當國王，

寺廟看門人的兒子，只懂得把庭院清掃。

人民站起來了，廢黜了國王，

且看那國王的兒子，將要去把寶塔清掃。[[586]](#_586_15)

農民的宗教信仰和習俗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又一個豐富資源。民間宗教可能在經歷一番改造之后，同精英階層的宗教和社會教義處于尖銳對立的地位。反叛之前，或者說沒發生反叛的時候，被統治階級的宗教可能顯示了壓迫的征兆，正如下述的非洲實例中所表明的那樣。在人口占優勢的圖西族牧民中的胡圖族農奴對瑞安奧姆貝（Ryangombe）的崇拜，說明他們完全拒絕那些支持宗族封建剝削制度的價值觀和神話傳說。[[587]](#_587_15)在圖西族公開贊揚放牧之神圣性的地方，胡圖族神話中的主要人物是牛群的殺手，他遵照儀式把手浸入牛血之中。在圖西族公開贊揚等級制度和封建從屬關系的正義性的地方，胡圖族崇拜拒絕一切等級制，其英雄宣稱：“我不跟隨任何君王，也沒有任何奴仆跟隨我。”[[588]](#_588_15)早在造反機會到來之前，對反叛的認識結構已經明確地出現了。

在歷史上同圖西族文化無關，崇拜瑞安奧姆貝的典型的盧旺達形式是流行的多層面異化的產物。瑞安奧姆貝為整個等級制度提供神秘的規避——通過所有權直接進入力量、自由、狩獵和終生悠閑的王國，一個父子般密切結合而證實了平等權利的、沒有等級制的王國，一個沒有特權階級或受壓迫者、沒有母系血緣關系或聯姻的王國。[[589]](#_589_15)

但是，這一崇拜對象不應僅僅被理解為“神秘的規避”；它還提供了對現存制度的批判和另一個具有極大的潛在爆炸性的象征性世界，因而圖西族的精英階層禁止瑞安奧姆貝的實踐。這一崇拜對象一方面起著現實的安慰作用，同時在被壓迫者中間培育起面向未來的社會聯系和文化異端。

這些改革可能發生在全新的宗教背景下，或者它們本身就代表著主流宗教的異端。例如，在上世紀和本世紀之交，爪哇南望地區的薩敏派就是抵制伊斯蘭教、政府和社會等級制本身的教派。[[590]](#_590_15)他們拒絕邀請穆斯林人員為婚禮、葬禮舉行宗教儀式并收取費用；他們拒絕納稅（雖然他們會饋贈“禮品”）；他們擯棄象征身份地位的演講用語，而堅持使用低等人的爪哇語，彼此以“兄弟”相稱。[[591]](#_591_15)薩敏派在同入侵的殖民政權的沖突過程中，把現存的民間文化因素塑造為有凝聚力的、有社會組織系統的宗教，借以自覺地反對精英價值觀及其對農民群體的索取。

在菲律賓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宗教的異端與反叛活動總是相伴發生的，這或許是因為天主教會在殖民政權的機構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592]](#_592_15)反對派一般采取作為天主教旁系的獨立教派形式，但被官方教會宣布為異端。正如薩敏派所表明的那樣，此類教派訴求的基礎，常常是對農民的不平等待遇、政府和國教牧師的財政要求的譴責。對殖民主義本身的反對，在新教徒所崇拜的、著名的民族主義英雄J.黎薩[[593]](#_593_15)那里得到了明確的表達——他斥責母教已經背叛了自己的價值觀。[[594]](#_594_15)甚至當此類教派未轉向公開反叛時，其教義和實踐同精英階層對社會制度的看法就已經形成了尖銳的對照。

改變宗教信仰的過程，也可以視為農民所采取的手段，通過脫離主流的宗教與社會價值觀，意在賦予個人處境以社會象征意義。因此，那些從社會制度及其道德理論基礎受益最少的人，最有可能為新教義所吸引——新教義為他們提供了有尊嚴的地位和富有競爭力的大傳統。[[595]](#_595_15)這樣，在印度教等級制的較低種姓和東南亞的少數民族中，在這些被統治集團認為不太開化的人們中，基督教傳教團得到了較為同情的響應。據報告，在當代爪哇，在1965年末的鎮壓中受破壞最嚴重地區的農民中，佛教得到了廣泛傳播。現在對于這種改宗尚知之不多，但許多農民似乎已經決定完全脫離伊斯蘭教，使自己正式成為自覺的穆斯林社會的反對派。緊隨政治災難之后，公開打出退教和分裂的旗幟，其意義怎么評價也不為過。此類改宗的影響不僅是象征性的。它們不但促進信奉新教義者的社會團結，而且使他們更加堅定地從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共同體中分離出來。正如英國工人階級的衛斯理公會教堂有助于為工聯主義的生長提供社會土壤，農民中異端教派的社會組織同樣可以在時機成熟時為他們的政治組織提供基礎。

綜上可見，通過考察農民文化，應該可以確定農民們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接受或拒絕社會秩序。諺語、民歌、口頭歷史、傳奇文學、笑話、語言、典儀和宗教，都能幫助我們測定精英與農民之間存在的符號距離。符號對立并不局限于內容，也可能表現在文體的、審美的形式上。由于農民們闡述和解釋自己文化的自由幾乎始終大于改造社會的能力，我們必須深入探究他們的文化，才能弄清他們的道德世界同精英階層的道德世界之間存在多大分歧。

民間文化中自然會有一些因素同這個問題的關系更加密切。對于任何一種土地制度，人們都能找到一套關鍵的價值標準來證明精英對于服從、土地和賦稅的索取權的正當性。在從屬階級的亞文化中，這套標準是得到支持還是遭到反對，這主要是個經驗事實問題。如果我們發現土匪被說成民間英雄，被鎮壓的反叛者受到崇敬，偷獵者得到贊美，這就足以證明，違反精英階層的規范，在農民中博得了由衷的共鳴和贊揚。如果對精英服從和尊敬的表面形式在私下受到嘲弄，這至少證明了農民很難安于生來注定的社會秩序的奴役。如果農民教派公開贊揚對財富的平等分配和一切人對于土地及其社會產品的權利（現實社會的情況卻與此完全不同），這至少證明了農民的社會公正概念同現存的資源分配模式相互沖突。

對“錯覺”問題的答案也可以在文化研究中找到，但答案可能不那么簡單。例如，我們可能發現，一個農民群體接受土地所有制的原則，但反對一批這樣的地主，他們違背了農民所認為的土地所有制的責任。此種信念可能至少同原則上拒絕土地所有制具有同樣的爆炸性，雖然其含義不具有權威意義上的革命性。俄國的農民反叛者常常是既忠于沙皇又厭惡其臣屬的貪得無厭。[[596]](#_596_15)“抵制精英價值觀”很難說是個全面的命題。只有縝密地研究民間文化，才能界定精英價值觀和農民價值觀之間主要的沖突點和相同點。此外，民諺、民歌或民間傳說可能具有啟發意義，但難以具有說服力。重要的是農民文化在整體上的主要趨向。[[597]](#_597_15)最后，顯而易見，任何階級制度，不管它多么合理，總要引起某種文化上的分化。在這一意義上說，關鍵問題不是文化的差異，而是這一事實：這些差異集中于社會制度的主要價值標準上，而且在發展和強化之中。

因此，農民是否由于神秘化或無路可走而甘于忍受剝削的問題，就并非不能加以分析解決了。如果追問一下“堅持執行土地制度需要多大的強制力？力量均勢若有變化會發生什么情況？”，便可解決這一問題了。如果追問一下“農民們怎樣經常地、巧妙地輕微違反租佃或勞動規則而不至于反叛”，也可解決這一問題。最重要的是，通過直接追問農民文化中所體現的價值標準，事實上同關于社會制度的主流神話是否一致，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在精英們創造的社會制度之下，遭受挫折或威脅的農民群體，特別是在文化層面上，可以培育自己頑強的與精英創造的社會秩序不同的道德觀念。這一象征性的文化庇護，不單單是農民苦難生活中的一種安慰劑，也不單單是一種逃避。它代表了萌生中的另一個道德世界——一種持有異議的亞文化，一種基于生存經驗真實的公正道德，它幫助其成員團結起來，結成社會團體和價值共同體。在這一意義上，它是開端，也是結果。

# 譯后感言

光陰荏苒。轉瞬間，案頭擺上來自大洋彼岸的本書英文版的復印件，快滿十個月光景了。此時此刻的心情，大概如同懷胎十月的待產婦期待嬰兒啼哭般的興奮與急切。老實說，完成這部譯稿后盼望其早日付梓面世的心情，比以往同類情境下的同樣心情要迫切得多。大半年來艱辛忙碌的結果，確證了譯者初見原著時的直覺——為了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和中國社會科學的真正繁榮，中國學術界不能不了解該書作者詹姆斯·C. 斯科特其人其書。

扼要說來，斯科特是活躍在西方社會科學界很有影響的學者，現執教于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他在東南亞問題和農民政治的研究領域卓有建樹，其學術成就受到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學者的廣泛關注。斯科特不是純粹的理論家，也很少援引他人的純粹理論，其研究工作主要建立于個案分析的基礎之上。從東南亞的村莊，到都鐸王朝的英格蘭，到社會主義的中國，都是斯科特研究案例的發生地。他的研究案例雖然不少取自別人的第一手材料，但相當多的案例來自于親身的實地考察；其豐富性、多樣性和地域的廣闊性，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幾乎無出其右。正是通過對大量個案的精辟分析和獨到把握，他對當代社會科學中的若干關鍵問題作出了創造性的理論貢獻。

1976年出版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是體現斯科特的個案分析和實證研究特色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這本書中，他從東南亞農民的反叛與起義問題入手，探究了市場資本主義的興起對傳統農業社會的沖擊。在他看來，貧困本身不是農民反叛的原因；只有當農民的生存道德和社會公正感受到侵犯時，他們才會奮起反抗，甚至鋌而走險。而農民的社會公正感及其對剝削的認知和感受，植根于他們具體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權的維護密切相關。因此，如果不去仔細考察各種地方性的傳統和文化特質，不去探尋那些看似瑣碎的農民日常行為的豐富涵義，人們對農民問題的認識便會誤入歧途，就可能將農民隱蔽的抵抗與積極的合作混為一談，從而作出錯誤的政治、經濟決策，誘發社會動亂。

需要指出的是，該書出版后不久便引發了一場頗有影響的“斯科特—波普金爭論”。P.波普金和斯科特二人對于伴隨殖民擴張而興起的市場經濟制度持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其重要分歧是：資本主義市場究竟給農民以及其他貧困人口帶來了機會以使其得以逃出封建藩籬，還是不道德地瓦解了傳統社會，使富貴強權者得以進一步強化對貧窮弱勢者的盤剝？“在今天全球性的擁抱市場的潮流中，人們很容易接受波普金的觀點而拒絕斯科特對傳統社會‘過于浪漫’的描繪。但是，在徹底擯棄斯科特之前，我們也許仍然需要仔細地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在市場不斷產生勝者與敗者的‘游戲’中，為什么那些舊體制中的強勢者往往又會在市場的新體制中成為贏家？在當代經濟體制中，有許多人雖然渴望但卻無力在市場中成功。摧毀曾為貧窮者提供生存庇護的舊體制也許的確促進了經濟效率，但也會使那些失去了生活保障的人們相信，他們為此承受了極度的不公。”[[598]](#_598_15)

且不論“斯科特—波普金爭論”的是非曲折，單就激發起人們對“這樣一個問題”的認真思索而言，斯科特對“東南亞農民的反叛與生存”的精致研究，對于當前正處在市場經濟變革過程中的廣大中國讀者來說，對于始終強調“農村、農業、農民問題”之重要性的中國社會決策者來說，對于強烈關注“社會公正”和“經濟倫理”問題的中國理論界來說，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展示這一啟發意義，是我們樂于從事此項繁難譯事的重要考慮之一。另外一項重要考慮，就是書中體現的學術品格對學者們可能產生的激勵意義。讓我們掩卷而思：像斯科特及其引證的眾多國外學者那樣，走出“象牙之塔”，深入民間生活，擯絕空虛玄妙、華而不實之學風，關注社會底層之道德訴求——這種學術品格，對于當代中國的志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多么難能可貴啊！

鑒于作者獨特的國際學術地位和富有競爭力的深入民間的調查研究精神，有人預言，這本譯著的出版，或許“是一個跡象，表明中國學界對當代西方學術的引介已不再限于反復言說幾位名家大師，而進入到了一個更為廣闊和細致的層面。”[[599]](#_599_15)但愿預言成真，不辜負“人文與社會譯叢”主編和譯林出版社為發展中國社會科學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有機緣同出版社簽約主持本書翻譯，端賴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問題專家、留美學者劉建的推薦，稱程某人系“留英哲學博士”，“長期致力于倫理學和社會公正研究，近年來又從事企業文化、經濟倫理的教學與研究”，“實為翻譯‘道義經濟學’的適當人選”云云。我只能說“或許如此”，但究竟“適當”與否，還得由讀者諸君來檢驗與評判。我還要感激地說，簽約之后，若非劉君加盟相助，親自譯出了同其學術專長最為切近的兩章，并且為解決越南、孟加拉等多語種的不少生僻地名、人名和術語的翻譯難點提供了“個體圖書館”式的貢獻，我們斷難履約如期按質地交稿。順便提一下，這是我們二人將近二十年來的第二次合作翻譯。倫理學界的朋友們或許記得，我和劉君等人80年代初第一次合作翻譯的美國大學教科書《倫理學理論與實踐》（J.P.蒂諾著），曾經對“文革”后我國倫理學的重建產生了較大影響。這一次的合作成果，我希望并且相信，至少可以為倫理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道義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在我國的建立與發展，多少起點推動作用。這種對社會效益的預期，加上已經品嘗到的集體合作的愉悅，使我因傾心此項翻譯而延誤了個人專著的遺憾得到了足夠的補償。同時，我也不禁為國內學術界流行甚廣的“翻譯吃虧”論而嘆息。此論根據之一，是由于不少高校在作為晉職晉級之重要依據的文科科研統計中不包括翻譯成果。其實，翻譯的艱辛與價值，豈是東拼西湊、廢話連篇的所謂“學術論著”所可比擬？故社會上輕視翻譯價值之舉，早已為有識之士所詬病。對待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恐怕也得進行相關的“道義經濟學”的分析研究。

感言至此，應當循例交代一下本書合作翻譯者的具體責任了：劉建譯第四、第五兩章，駱穎浩、錢躍飛分別譯第二、第六章的部分內容和“索引”，其余部分皆由程立顯翻譯；全書的統校工作由成力負責。

作為本書翻譯工作的主持人，我要向為此悉心合作的朋友們致以誠摯的謝意；還要特別感謝彭剛博士，感謝他在本書翻譯的全過程中給予譯者的積極配合與熱心指導。

我們期待著讀者諸君對譯著錯謬之處的教正。

程立顯

2000年4月23日，北京大學

# 注釋

#### 導論

[[1]](#_1_178) R.H.托尼：《中國的土地與勞動力》（波士頓，1966），第77頁。

[[2]](#_2_173) 上緬甸，緬甸本部地區北半部的俗稱。1852年第二次緬英戰爭時，英軍侵占緬甸本部地區勃固、卑謬和伊洛瓦底三角洲南部大片領土。同年12月，英國派阿蘭為首的劃界小組，自美太英軍駐地的旗桿以北10公里處的德貢茂村為起點，向東至東吁城北；向西互第悅茂至若開北端單方面自行劃界立樁。該線以北緬王政府管轄區稱作“上緬甸”，以南英國占領區稱作“下緬甸”，沿用至今。——責任編委注

[[3]](#_3_168) 東京，即北圻，越南舊行政區之一，包括從今中越邊界至清化省（不含該省）地區。法國侵占越南后，改稱東京保護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后，改稱北部，亦稱北越。——責任編委注

[[4]](#_4_166) 引自《緬甸政府關于1896—1897年緬甸大饑荒的報告》，見M.阿代斯：《下緬甸的農村發展與多元社會》（麥迪遜，1974），第45頁。

[[5]](#_5_158) 對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冬季的描述，參見N.V.蘭翻譯的T.V.梅的文章：《誰之罪？》，收入吳永隆：《革命之前：法國人統治下的越南農民》（劍橋，1973）。許多農民經歷了這一時期的“越明”組織，它協助組織了對官府糧倉或日本人運米船的攻擊，從三角洲周圍弄來糧食。對這一時期越南人的政治活動的簡要論述，參見黃金慶：《越南的八月革命新解》，載于《亞洲研究雜志》，第30卷第4期（1971年8月），第761—781頁。

[[6]](#_6_152) E.J.霍布斯鮑姆：《歷史中的階級意識》，見I.梅扎洛斯編：《歷史和階級覺悟散論》（倫敦，1971），第11—12頁。

[[7]](#_7_150) T.尚寧：《作為政治因素的農民》，載于《社會學評論》，第14卷第1期（1966），第5頁。

[[8]](#_8_150) 分別見《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波士頓，1966）和《20世紀的農民戰爭》（紐約，1969）。

[[9]](#_9_144) M.利普頓：《樂觀地對待農民的理論》，載于《發展研究雜志》，第4期（1969），第341頁；轉引自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第279頁。

[[10]](#_10_142) K.波拉尼：《偉大的轉變》（波士頓，1957），第163—164頁。甚至在并非隨意的意義上的“創新”一次詞，用來贊揚該書也太不夠了。他對前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分析，促成了我自己的著作。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11]](#_11_138) 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第279頁。

[[12]](#_12_136) 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第497—498頁。我認為，在大多數農民社會里，人們最看重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分享土地產品的權利。因此，我在括號中加上“資源”一詞。

[[13]](#_13_132) 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第276頁。

[[14]](#_14_128) 《資本論》，第1卷（紐約，1966），第715頁。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頁。

[[15]](#_15_128) 參看波拉尼、R.穆斯尼爾：《17世紀法國、俄國和中國的農民起義》（B.皮斯譯，紐約，1970）；E.P.湯普森：《18世紀英國民眾的道義經濟》，載于《過去和現在》，第50期（1971年2月），等等。

[[16]](#_16_128) R.C.科布：《警察和人民：法國的大眾抗議運動，1789—1820年》（倫敦，1970），第xviii頁。

[[17]](#_17_122) 我感謝V.烏姆斯提出的這一概念。

[[18]](#_18_120) 這一規則的可能例外是荷屬印度，特別是爪哇，那里的殖民地政策在盡可能多地保護農村社會（不是使之僵化不變）的同時榨取市場剩余額。

[[19]](#_19_121) 見W.費希爾：《工業化初始階段的社會張力》，載于《社會歷史比較研究》，第9期（1966—1967），第64—83頁。

[[20]](#_20_119) 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第498頁。

#### 第一章 生存倫理的經濟學與社會學

[[21]](#_21_120) A.V.查耶諾夫：《農民經濟論》，D.索納、B.克布萊和R. E. F. 史密斯編（1966；原版本，1926）。

[[22]](#_22_120) C.格爾茨：《農業的衰退》（伯克利，1963）。

[[23]](#_23_120) 比較E.博斯魯普：《農業增長的條件：在人口壓力下的農村變革的經濟學》（芝加哥，1965）。該書提出的農村變革理論認為，人口壓力是基本的獨立的變量。

[[24]](#_24_118) 參見例如P.古魯：《東京三角洲的農民》，第2卷，譯自《人情關系地區檔案》（紐黑文，1955），第503—515頁；A.杜威：《爪哇的農民市場》（1962）。

[[25]](#_25_116) 查耶諾夫：《農民經濟論》，第171頁。

[[26]](#_26_116) 同上書，第10、28頁。當然，此類農民中的大多數不能另外買地，因為他們缺乏資金，盡管他們愿意付出已經上漲了的地價。

[[27]](#_27_112) 我要感謝V.烏姆斯和R.赫林教給我微觀經濟理論對于農民行為的適用性。

[[28]](#_28_112) 這是借用J.羅馬塞特的術語，下面將要提到的“綠色革命”的例子也是如此。見《農民農業技術的風險與選擇：菲律賓的安全第一與水稻生產》，載于威斯康星大學社會體制研究所：《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第7118期（1971年8月）。

[[29]](#_29_110) C.R.沃爾頓：《生存的經濟含義》，載于《馬來亞經濟評論》，第8卷第2期（1963年10月），第46—58頁。

[[30]](#_30_108) 這是假定了食物偏好類型的生存水準，因而其本身是由文化所決定的。營養學家常常建議食用可以保證必要的營養但口味較差的更便宜的食物，不過只有那些境況很差的人才愿意不管口味地吃便宜食物。見沃爾頓：《生存的經濟含義》，載于《馬來亞經濟評論》，第8卷第2期（1963年10月），第51頁；G.奧韋爾：《通向威根碼頭之路》（紐約，1958年），第85—100頁。

[[31]](#_31_104) “災難水準”的意義明顯地取決于普遍的經濟機會的結構。如果可選擇的工作好找、安全又有較高的報酬，那么，年成不好的代價就比沒有什么外部工作機會的情況要小得多。在殖民地時代的東南亞，中等水平的經濟機會的可選擇性，特別是其不安全性，加大了莊稼歉收的嚴重風險。

[[32]](#_32_102) 馬來人有同英語的“勉強糊口”極其相近的說法描述這種境遇：Kaispagi，makan pagi； kais petang，makan petang。意思是：“上午艱難地搞到的東西，上午吃掉；下午艱難地搞到的東西，下午吃掉。”

[[33]](#_33_102) 關于這一原則的精確闡述，以及它在菲律賓采用或不采用“綠色革命”的各種技術方面的具體應用，我得益于J.羅馬塞特的《農民農業技術的風險與選擇》一文。謹此向原作者致以謝意。

[[34]](#_34_100) 在這種預測性模式的應用中，有許多操作上的難題。農民認為什么是不可接受的風險呢？羅馬塞特把它定為0.025，即四十分之一的歉收概率。我認為，總的說來，他定得稍微高了點。農民們甘愿冒多大的風險去換取未來收益中的多大增值呢？對自己毫無經驗的技術，農民們如何判斷它的風險呢？有人認為，農民們對某種技術風險的夸大，是同他們對該技術的特性的無知成比例的。所有這些問題，只有在了解農民的具體情況以及針對這種特殊類型的農民時，才能給出定量的回答。對于我們的研究目的而言，只要知道面對生存安全和利潤的選擇，處于生存邊緣的農民會相當程度地偏向于選擇安全，這就足夠了。如果安全和利潤二者一致，那就更好了——這是專家治國論者的夢想——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二者很可能是方向岔開的。

[[35]](#_35_98) J.R.貝爾曼：《物資供應和農民的農業現代化：對泰國的主要年生作物的研究》，見小沃爾頓編：《生存農業和經濟發展》（芝加哥，1969），第236頁。

[[36]](#_36_98) J.W.梅勒：《傳統經濟中的生存農民》，見上注小沃爾頓書，第214頁。

[[37]](#_37_98) H.邁因特：《當代發展中地區的農民經濟》，見上注小沃爾頓書，第103頁。

[[38]](#_38_95) J.L.喬伊：《調查分析、預測和策略的制定》，見上注小沃爾頓書，第377—378頁。喬伊參考了確認這一假設的旁遮普的資料。另見I.阿德爾曼：《微觀層次上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一個嘗試性假設》，見于E.B.阿亞爾編：《發展的微觀方面》（紐約，1973），第1章，第3—12頁。

[[39]](#_39_91) 查耶諾夫：《農民經濟論》，第134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40]](#_40_89) 除了所包含的風險之外，如此之高的投入成本，完全排除了較窮農民種植新品種的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存款，也得不到貸款。

[[41]](#_41_89) C.M.埃利奧特：《非洲的農業和經濟發展：理論與經驗，1880—1914年》，見E.L.瓊斯、S.J.伍爾夫編：《農業變革與經濟發展：歷史性難題》（倫敦，1974），第123—150頁。

[[42]](#_42_83) 同上書，第147頁。E.沃爾夫甚至把減少市場風險的愿望加進“農民”一詞的定義中。他說：“農民常常避免同市場親近，因為無限制地卷入市場威脅到他對生活資源的掌握。……此外，只有在確保了生存產品的前提下，他才贊成為了銷售而生產。”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第xiv頁。

[[43]](#_43_83) P.古魯：《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巴黎，1940），第240頁。除另有說明者外，引文均為筆者所譯。

[[44]](#_44_81) J.B.亨德里：《慶后的小世界》（芝加哥，1964），第54頁。

[[45]](#_45_81) L.漢克斯：《稻谷與佃戶：東南亞的農業生態》（紐約，1972），第48頁。

[[46]](#_46_79) 例如，參見M.G.斯威夫特：《馬來亞哲勒布的農民社會》，倫敦經濟學院社會人類學專輯（倫敦，1965），第3章；K.O.揚萊卡：《泰國中部稻鄉經濟研究》（曼谷，1960），第43和173頁；以及J.H.伯克：《荷屬印度的經濟結構》（紐約，1942），第30—31頁。近期對馬來西亞吉蘭丹州引進煙草種植的分析表明，那些擁有可靠的水稻田的人們認為，煙草種植的風險太大。參見G.W.凡·利本斯坦、B.岡納萬：《吉蘭丹州的貧困：對巴佐地區的最新調查》，收入M.A.賈斯潘編：《東南亞的貧困社會學》（即出，1976）。

[[47]](#_47_77) M.莫爾曼：《一個泰國村莊的農業變革與農民選擇》（伯克利，1968）。

[[48]](#_48_75) 同上書，第68頁。

[[49]](#_49_75) 同上書，第69頁。

[[50]](#_50_75) 參見S.明茨：《海地人的私人經濟關系》，見J.M.波特等編：《農民社會讀本》（波士頓，1967），第98—110頁；特別是M.C.B.薩恩托：《生存權：菲律賓低地城鎮維持生存的市場交易》（賓夕法尼亞，1972年）。

[[51]](#_51_75) S.格林菲爾德：《股票、債券與巴巴多斯農民的甘蔗》，見G.K.佐爾斯尚、W.赫希編：《關于社會變革的考察》（波士頓，1964）。

[[52]](#_52_75) W.J.鮑莫爾：《企業行為：價值與增長》（紐約，1967），修訂版。

[[53]](#_53_73) J-M.鮑薩德、M.珀蒂：《在前景未卜壓力下的農民行為的表現》，載于《農場經濟雜志》，第49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869—880頁。我再次感謝R.赫林和V.烏姆斯使我注意到了關于這一理論的最新著作。

[[54]](#_54_73) H.西蒙：《人的模式：社會人與理性人》（紐約，1957）。

[[55]](#_55_73) 我應該補充說，安全第一的行為并不排除一切革新，而是排除那些高風險革新。可以想見的是，利潤率可能高到足以完全抵消風險的程度，但這是罕見的情況。此外，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或者在確保一切社會成員擁有最低限度收入的任何國家里，伴隨革新而來的風險由社會作了擔保，雖然官僚主義的危害可能大于這一好處。

[[56]](#_56_73) 不顧破產的威脅而進行冒險的一個實例是：20世紀60年代初，湄公河三角洲引進了電動水泵。當時，干旱威脅著小農主和佃戶的全部莊稼；除非這樣做，否則，收獲期過后，許多人除了債務將一無所有。他們借錢租水泵或者買水泵只能挽回損失，而沒有什么東西還會失去。比較R.L.桑瑟姆：《湄公河三角洲的暴動經濟學》（劍橋，馬薩諸塞，1970），第7、8章。

[[57]](#_57_71) 這似乎同E.沃爾夫寫下面的話時所想到的相似：“也許正是當農民不能夠再依托自己所習慣了的制度背景去減少風險，但可供選擇的新制度又不是太混亂無序就是約束性太強，因而不能對新方法作出可行性承諾之時，心理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緊張關系共同推動了農民的反叛。”見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第xv頁。

[[58]](#_58_72) 撿木柴、燒木炭和做小買賣，一直是東南亞農民在農閑時或災荒后艱難度日的傳統辦法。

[[59]](#_59_71) 就親屬關系中，特別是雙方血緣關系中的互惠而言，明顯地因關系較遠而義務較少；在親屬關系網的外圍，互惠行為的可靠性也許還不如沒有親戚關系的相鄰村民的幫助。

[[60]](#_60_71) “保護人—被保護人”紐帶的可靠性有很大的不同。對這一問題的論述，見J.C.斯科特：《東南亞的“保護人—被保護人”的政治生活與政治變革》，載于《美國政治科學評論》，第66卷第1期（1972年3月），第91—113頁。

[[61]](#_61_68) 在東南亞國家傳統的規范秩序下，統治者有責任在臣民窮困時保障其生計。統治者不僅在某種宇宙論的和巫術的意義上對國家繁榮負有責任，而且應該通過慈善活動和減稅等措施為臣民提供多方面的物質幫助。參見S.莫特諾：《爪哇早期的國家與治國之才》（伊薩卡，1968）。

[[62]](#_62_69) 這里再次指出，由于具有傳統的家長式道德秩序，東南亞國家大概更有可能認識到自己在這方面的責任，但它儲備糧食和把糧食運出首都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不能認為糧食儲備僅僅是為了公共救濟的目的。同時，它也是首都及其官員抵擋篡權者的圍攻和叛亂的一種手段。

[[63]](#_63_69) 同這一情況相關的是盧卡奇對下面二者所作的區分：一是“人們對于自己生命的真正的心理學思考”（階級心理）；二是“如果人們能夠在他們對直接行為和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中評價階級心理和由此產生的利益的話，人們會產生的思想與情感”（即“客觀的經濟總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二者的距離是“錯覺”水平的尺度。G.盧卡奇：《階級意識》，見《歷史與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英譯者R.利文斯通（劍橋，馬薩諸塞，1971），第50—51頁。

[[64]](#_64_69) 當然，如果所說的穩定產量已經處在生存線水平的邊緣，那么任何索要都會招致災難。

[[65]](#_65_69) 這是E.P.湯普森的術語。參見他的優秀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紐約，1966），第203頁。

[[66]](#_66_69) 關于注意到生存權和更為寬泛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對于“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之間的區別并歷史地分別加以探討的論述，見A.門格：《對于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關于工人對于全部工業產品的索要權理論的起源和發展》，英譯者M.E.坦納（紐約，1962；原版本，1899）。

[[67]](#_67_67) 例如，見R.C.科布：《警察與人民》，第3部分（紐約，1970）；R.B.羅斯：《18世紀的價格騷亂與雅各賓最高限價》，載于《社會史國際評論》，第4卷第3期（1959），第432—433頁；《現代歐洲的食物供應與公共秩序》，見C.蒂利編：《西歐國家的建立》（普林斯頓，1974）。

[[68]](#_68_67) 關于英國的情況，參見E.P.湯普森：《18世紀英國民眾的道義經濟》，載于《過去和現在》，第50卷（1971年2月）；K.波拉尼：《偉大的轉變》，隨處可見；E.霍布斯鮑姆、G.魯德：《斯溫上校》（紐約，1968）。

[[69]](#_69_65) 從規范觀點出發，有理由認為，作為一種政治索要的“生存權”，是公正的第一個和基本的標準。依據羅爾斯的正義論，W.G.朗西曼問道：人們在知道自己在社會上的實際地位之前，原則上會同意哪些公正規則或分配標準呢？他推演出的第一條規則是以需要為基礎的觀點——一個人的生存權利壓倒另一個人對于某種剩余物的權利。“生存權的優先性最早可能體現在這一格言中：‘只要社會上有人挨餓，占有多余食物就是罪過。’”“在自然狀態下，我知道我可以及時地發覺自己雖然想去工作，但是肚子餓了，而別人有東西使我活著。我希望不僅確保我的基于需要的索要權得到承認，而且確保我的索要權壓倒別人的基于功績或對共同利益的貢獻的索要權。”見《相對的剝奪與社會公正》（伯克利和洛杉磯，1966），第264頁。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權利在傳統社會里不是沒有實際效果的。例如E.E.埃文斯—普里查德說過：“在努埃爾人村莊沒有人挨餓，除非大家都在挨餓。”見《努埃爾人的親屬關系與婚姻》（牛津，1951），第58頁。

[[70]](#_70_65) 參見M.齊特林：《經濟不安全和古巴工人的政治態度》，載于《美國社會學評論》，第31卷第1期（1966年2月），第35—51頁；J.C.萊格特：《經濟不安全與工人階級的覺悟》，載于《美國社會學評論》，第29卷第2期（1964年4月），第226—234頁；G.里林格：《抗議的合法性：工人歷史的比較研究》，載于《社會歷史比較研究》，第2卷第3期（1960年4月），第329—343頁。

[[71]](#_71_63) 里林格：《抗議的合法性》，隨處可見。

[[72]](#_72_63) J.C.萊格特：《階級、種族和勞動》（紐約，1968），第78頁。我還要補充指出的是，就小店主和農村的小農主而言，經濟上的不安全很容易導致右翼激進主義，正如很容易導致左翼運動一樣。

#### 第二章 農民的選擇和價值標準中的生存保障

[[73]](#_73_63) 莫爾曼：《農業的變革與農民的選擇》，第99頁。

[[74]](#_74_63) 當然，在土地充裕而便宜的地方，土地占有權本身的社會意義就幾乎不存在了。事實上，可以想見的是，在地多人少的情況下，一個佃農或農業工人在收入和安全方面比土地占有者有更大的優越性。占有土地的重要性是以這一假設為基礎的：土地是生產的緊缺要素。在土地不是緊缺要素的地方，正如在許多傳統的國家里那樣，對雇工而不是對土地的控制是權力和收入的安全基礎。

[[75]](#_75_63) 桑瑟姆：《暴動的經濟學》，第199頁。

[[76]](#_76_63) 對這種復歸生存經濟的最好說明，見于C.格爾茨對爪哇經濟的描述。在那里，產糖體系是一種明確的制度化安排，使得傳統經濟擔當起商品化農業中的福利開支。格爾茨：《農業的衰退》。

[[77]](#_77_63) A.塔克哈什：《呂宋中部地區的土地和農民》（火奴魯魯，1969），第37頁。另見J.普賴恩：《呂宋中部地區的土地使用權與生活水平》，載于《菲律賓研究》，第4卷第3期（1956年9月），第393頁。

[[78]](#_78_61) J.H.安德森：《班詩蘭社區的土地與社會的若干方面》，載于《菲律賓社會學評論》，第10卷第1—2期（1966年1—4月），第58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79]](#_79_59) 皮阿斯特，中東某些國家的貨幣單位。——責任編委注

[[80]](#_80_57) P.古魯：《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第404—405頁。

[[81]](#_81_57) 《馬烏賓住區報告，1925—1928年》，住區官員U.T.蓋伊（仰光：緬甸政府，1929），第68頁。另見《關于勃生地區的改建住區報告，1935—1939年》，住區官員M.M.蓋伊（仰光：緬甸政府，1940），第54頁，其中指出：“有些工人之所以變為佃農，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身份，使自己有更大的獨立性，并取得借錢資格。”

[[82]](#_82_57) S.愛潑斯坦：《印度南方農村的生產效率與酬報的慣例制度》，見R.弗思編：《經濟人類學論集》（倫敦，1967），第229—252頁，尤其是第244頁。

[[83]](#_83_57) G.H.V.德·科爾夫：《爪哇邊遠地區水稻種植中的勞動關系的歷史發展：局部調查的初步結果》（報告C，太平洋關系研究所的國際研究系列，荷蘭和荷屬印度次大陸全國委員會主辦，1936年5月2日），第3章。另見H.滕·達姆：《奇波達斯村的合作與社會結構》，見《荷蘭學者的印度尼西亞研究選輯》，第6卷：《印度尼西亞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中的兩重性概念》（海牙，1961）。

[[84]](#_84_57)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我們所談的是在高度強制性的環境中，而不是說在剝削環境中的偏好。這種選擇是社會強制性地形成的，是在可能全無吸引力的選擇方案中的選擇。我決不是說農民必然地承認把此類選擇強加于他的環境的合理性，而僅僅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安全保障比短期的經濟所得較受偏愛。

[[85]](#_85_57) 關于放羊人和長期農業工人的情況，見J.A.皮特—里弗斯對安達盧西亞的杰出研究：《山區人》（芝加哥，1961）。至于家庭傭人，例如可見F.M.L.湯普森：《19世紀英國的有地產社會》（倫敦，1963），第194頁。

[[86]](#_86_57) 依賴關系在殖民地之前的東南亞是普遍的，但主要是基于人身保護的需要，而不是對土地的需要。

[[87]](#_87_56) 我的印象是，多少有點自主權的生存狀態的喪失，常常發生在多種形式的無政府主義狀態之下。將要失去土地的小農，被工廠制度推向生存邊緣的手工匠人，都可能在自己的政治反應方面，探求恢復自己的自由生活和獨立工作的途徑。堅持可行的獨立性的愿望，在爪哇的下述事實中得到了說明：村民們“無論如何也要避免同地主結成分成租佃關系或薪資勞動關系，因為從土地占有權得到的收入和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的收入，在村民中造成了基本身份的分化，在實踐中表現為庇護與依賴的關系”。V.T.金：《北中部爪哇薩敏運動的考察》。金所引用的是R.杰伊的實地調查材料：《爪哇的村民》（劍橋，馬薩諸塞，1969）。

[[88]](#_88_58) 鄉村公地和公共的經濟權利使得鄉村最貧困者得以勉強糊口。在這一農村制度消亡的地方，就可能出現同樣的風險警戒線。見M.布洛克：《法國農村史的基本特征》，J.桑德海默（英譯）（伯克利，1970），第224頁。另見J.L.哈蒙德、B.H.哈蒙德：《鄉村工人，1760—1832年》（紐約，1970）。

[[89]](#_89_57) 交趾支那，越南南部一地區。——責任編委注

[[90]](#_90_57) 例如，見P.古魯：《東京三角洲的農民》，第1卷，第379頁；M.G.斯威夫特：《馬來亞哲勒布的農民社會》（倫敦，1965），第2章；M.納什：《通向現代性的金光大道》（紐約，1965）；R.R.杰伊：《爪哇中部農村地區的宗教與政治》（紐黑文：耶魯大學文化系列報告：“東南亞研究”，1963），第44、52—55頁。

[[91]](#_91_57) 還應當記得，在缺乏對于財富和地位的強大的外部保障的地方，地方精英的聲望最終取決于他們在最后的一決雌雄中所能召集到的追隨者。因而地方當權者有充分理由編織起此種情況下的被保護人關系網。

[[92]](#_92_57) H.K.考夫曼：《邦華德：泰國的社區研究》，亞洲研究協會專題著作，第10卷（紐約，1960年），第36頁。

[[93]](#_93_57) R.弗思：《馬來亞漁民：他們的農民經濟》（倫敦，1966年），第295頁。

[[94]](#_94_57) 格爾茨：《農業的衰退》，第5章。關于此種模式已經達其保護極限的論點，見M.來昂：《爪哇農村沖突的基礎》，研究專題著作，第3卷（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南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1970年12月）；W.F.沃特海姆：《從阿里蘭說到爪哇農村的階級斗爭》，載于《太平洋視點》，第10卷第2期（1969年9月），第1—17頁。

[[95]](#_95_56) 古魯：《東京三角洲的農民》，第2卷，第659頁。

[[96]](#_96_56) 斯威夫特：《馬來亞哲勒布的農民社會》，第153頁。

[[97]](#_97_56) Y.亨利：《印度支那的農業經濟》（河內，1932），第43—44頁。據我的鑒別，關于越南農村的土地占有、土地使用權和生活條件的所有研究結論，實際上都是根據這本巨著所包含的綜合資料得出的。這是一部具有永久價值的著作。

[[98]](#_98_56) 關于這些模式同傳統的法國公社模式的驚人的相似之處，見M.布洛克：《法國農業史》。

[[99]](#_99_56) 在這一圖解中，我主要考慮分配收獲物的規定。分配風險的更為精確的方案還必須包括生產成本的分配。如果地主提供一切設備、種子、耕畜和其他現金費用，他便承擔了這一風險；而如果這些成本轉移到佃戶身上，那么，佃戶承擔的風險就比分享收獲物的安排所預示的風險更大了。

[[100]](#_100_56) 盡管存在這一事實：在豐收年頭，“保護人”可能拿走了超出佃戶的最低限度需要之外的全部剩余物。在剩余價值方面，這一制度的剝削性可能是十分顯著的。

[[101]](#_101_56) 對20世紀初菲律賓新怡詩夏省的這種制度的最好的描述見于B.J.柯克弗里埃特：《菲律賓新人民軍革命前的農民動亂》，載于《亞洲研究》，第9卷（1971年8月），第164—213頁。

[[102]](#_102_56) 安德森：《班詩蘭社區的土地與社會的若干方面》，第50頁。

[[103]](#_103_56) 人們會問，固定地租的佃戶為什么不用豐年的剩余物使自己度過荒年難關呢？首先，除非租佃的頭些年收成不錯，佃戶不會有什么剩余物。第二，不論剩余稻谷儲存時間長短，不可避免地會有損耗。然而，尤為重要的是，在農民社區內，為了幫助較為不幸的親戚鄰居，或者為了履行那些只有在面臨危險時才得以免除的禮節上的義務，人們將耗盡自己的大部分剩余物。最后，當然，農民肯定會通過耕畜、豬以及貴重品儲存下一些財富。但是，他們的積蓄是十分有限的，并且每逢荒年，所有的積蓄都得用來應付危局。

[[104]](#_104_56) 當然，在地主荒年免租的范圍內，名義上的固定地租制度可能接近于谷物分成的租佃制度。

[[105]](#_105_56) 吳永隆：《革命之前》，第1章。至于在傳統的巴厘省的類似制度，見C.格爾茨的文章，收入凱恩特賈拉寧格蘭特編：《印度尼西亞的村莊》（伊薩卡：康奈爾大學現代印度尼西亞研究課題組，1967）。

[[106]](#_106_56) T.庫珀（印度文職人員）：《關于佃農與農業工人的研究報告》（仰光，1924），第23頁。以下該書簡稱為《庫珀報告》。

[[107]](#_107_56) 吳永隆：《革命之前》，第2章。

[[108]](#_108_56) Y.亨利：《印度支那的農業經濟》，第35頁。

[[109]](#_109_56) 伯克：《荷屬印度的經濟結構》，第114頁。至于爪哇的水稻區，見V.德·科爾夫：《爪哇的一個邊遠地區的勞動關系》，第45頁。

[[110]](#_110_52) 例如，見塔克哈什：《呂宋中部地區的土地和農民》，第73頁。

[[111]](#_111_52) 見《菲律賓社會學評論》第20卷第1—2期（1972年1—4月）的文章。

[[112]](#_112_52) B.費根：《地主與法律之間：佃戶的兩難困境》，載于《菲律賓社會學評論》，第20卷第1—2期（1972年1—4月）。

[[113]](#_113_52) 同上，第119頁。地主對這種轉換也十分小心，因為他們擔心在固定地租制度下會失去新的高產品種所帶來的收益。因此，他們常常嚴厲地處罰那些進行這種轉換的人。據以計算固定地租的農作物產量，常常是引起長期訴訟的主題，因而增加了佃戶的困難。最后，改革獲得成功的關鍵在于可以代替地主資金的政府貸款。在佃戶們看來，即使他們最終能夠得到政府貸款，也明顯地太少、太遲，因而危害了新的租佃人的經濟穩定性。

[[114]](#_114_52) 同上，第124頁。

[[115]](#_115_52) R.P.里夫斯、F.林奇：《不情愿的反叛者：新怡詩夏省土地租借的轉換》，載于《菲律賓社會學評論》，第20卷第1—2期（1972年1—4月），第37、46頁。

[[116]](#_116_52) 同上，隨處可見。

[[117]](#_117_52) B.J.柯克弗里埃特：《菲律賓的農民反叛：H.M.B.的起源和發展》（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6年即出），第1章，第12頁。值得注意的是，分成租佃是根據地主的資歷規定他的社會責任的，正如富裕村民的社會責任也是由其資歷和同村人的需要所確定的那樣。

[[118]](#_118_52) D.克里斯坦森：《對IPC/BA經濟研究的反思》，載于《菲律賓社會學評論》，第20卷第1—2期（1972年1—4月），第169頁。

[[119]](#_119_52) 皮特—里弗斯：《山區人》，第204頁。

[[120]](#_120_50) 《緬甸土地稅收制度考察委員會的報告》，第2卷：《證據》（仰光，1922）。以下簡稱為《緬甸土地稅收制度的報告》。

[[121]](#_121_50) 吳永隆：《革命之前》，第3章。實際的百分比在正式出版的版本中顯然漏掉了，不過手稿本第68頁有這些數字。

[[122]](#_122_50) G.格蘭：《越南與通向現代性的資本主義道路：交趾支那農村，1880—1940年》（博士論文，威斯康星大學，1975），第342頁。另見吳永隆：《革命之前》，第33—34頁。

[[123]](#_123_50) A.拉比哈德拉：《曼谷時代早期（1782—1873年）的泰國社會組織》（伊薩卡：康奈爾大學東南亞研究項目，第196號）。

[[124]](#_124_50) 這里應當補充說明的是，國內貨物稅或者對食鹽及其他商品的專營利潤在傳統稅收中占相當大的份額。這里所說的商品，例如食鹽，是人們維持生存的必需品，因而形成了對農民收入的固定的收費項目。然而，即便如此，對于非法的食鹽交易和傳統的黑市，政府卻難以控制，這就在實際上限制了政府通過此類手段增加稅收的能力。

#### 第三章 風險分配與殖民地變革

[[125]](#_125_50) 盡管此種比較的方法相當復雜，但證據表明，東南亞農民的實際人均收入，從1910年到1929年沒有實質性的增長，而從1900年到1940年間倒降低不少。關于越南這方面情況的令人信服的證據，見桑瑟姆：《暴動的經濟學》，第33—39頁；J.謝諾：《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巴黎，1955），第9章；吳永隆：《革命之前》，第122—124頁；特別是H.拉諾：《印度支那的工業化》，載于《社會研究與經濟調查》（1938年11月21日）。關于緬甸的情況，見J.S.弗尼瓦爾：《殖民地的方針與實踐》，第2版（紐約，1956），第103、192—193頁；《人頭稅和調查委員會的報告，1925—1927年》（仰光：緬甸政府，1949），第62—63頁；《庫珀報告》，第2頁或“摘要”，第49—50頁。關于緬甸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最有說服力的證據見于B.O.賓斯的關于戰前緬甸農業的報告：《緬甸的農業經濟》（仰光：緬甸政府，1948）。賓斯的統計指出了水稻生產與人口之間的不平衡，表明了爪哇、印度支那以及暹羅的大米消費的下降情況。至于菲律賓的情況，見G.里韋拉、R.麥克米倫：《菲律賓農村》（馬尼拉，1952），全書。我不太了解印度尼西亞的情況，但主要意見認為，那里的人均收入不是沒有改變，就是有所下降（見C.格爾茨的通信）。例如，參見A.M.P.A.謝爾特馬：《爪哇和馬都拉土著居民的食品消費》，A.H.漢密爾頓的英譯本（紐約，1936），全書。由于統計上的困難，所有這些證據都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否認農民的物質福利水平有所提高的論點，具有十分可靠的事實根據。當然，對于我們的研究目的來說，這些統計資料的重要性遠遠不及經濟安全保障問題。

[[126]](#_126_48) 這并不是說爪哇的情況就是十分平靜的；僅僅是說，比較而言，那里是相對平靜的。見S.卡托德迪奧的優秀論文：《爪哇農民激進主義的背景與發展》，收入C.霍爾特編：《印度尼西亞的文化與政治》（伊薩卡，1971），第2章；及其后來的著作：《爪哇農村的抗議運動：關于19世紀和20世紀初農民動亂的研究》（新加坡，1973）。

[[127]](#_127_48) 關于鄉村互惠的弱化與淡季資源消失的詳盡論述，可參見J.C.斯科特：《“保護人—委托人”契約的消蝕與東南亞農村的社會變革》，載于《亞洲研究雜志》，第32卷第1期（1972年11月），第25—30頁。

[[128]](#_128_48) 這也許涉及農民是否真正出售自己產品的情況。只要地主和放債者按照市場價值計算其佃戶或債務人所償付的大米，在這一范圍內，農民就不能不受價格體系的支配。當然，生產像水稻之類的市場農作物是占有優勢的，因為水稻等作物屬于主要食糧，不同于煙草、橡膠等作物。

[[129]](#_129_48) 查耶諾夫：《關于農民經濟的理論》，第137頁。

[[130]](#_130_48) 《S.N.史密斯的陳述》，印度行政當局駐伊洛瓦底區特派員發表的意見，見《土地和農業委員會的報告》（仰光：緬甸政府，1938），第2卷，第34頁。

[[131]](#_131_48) 漢克斯：《稻谷與佃戶》，第141頁。

[[132]](#_132_48) 伯克：《荷屬印度的經濟結構》，第58頁。

[[133]](#_133_48) 比較格爾茨：《農業的衰退》，第2章。

[[134]](#_134_46) 古魯提到了有關這方面的一個有趣的部分例外：常常位于不同地區的姐妹城市，借助于傳統的安排，保證相互給予幫助。至于這種制度是否普遍或有效，卻沒有任何說明。Y.亨利提到了另一個極端情況：東京有個村莊，實際上沒有一點本村的耕地，其村民全部是鄰村耕地的分成租種的佃農。參見古魯：《東京三角洲的農民》，第1卷，第306頁；亨利：《印度支那的農業經濟》，第113頁。失去其保護力量的宗族必然走向衰落，這一點可由下述常見現象得到證明：一個擴展起來的家族要想接近自己的理想，只有依靠那些相對富裕的家族，這些富裕家族的財產增強了他們保留下來的作為慣例的權力。S.派克在對泰國中部平原地區的卓越研究中證實，一個強有力宗族的成員資格是同對土地的占有密切聯系著的，而非成員則不占有土地。《中部平原地區泰人社會的后農民村落》，未出版手稿，第7頁。

[[135]](#_135_46) A.杜馬雷斯特：《社會階級的形成》（里昂，1935），第206頁。

[[136]](#_136_46) 關于中國這種現象之重要性的簡略而富有啟發意義的論述，見費孝通：《中國的貴族：城鄉關系論集》（芝加哥，1953，英文版），第116—118頁。

[[137]](#_137_46) J.謝諾編：《傳統與越南革命》（巴黎，未注日期），第3章。

[[138]](#_138_46) 例如，見G.T.麥吉：《東南亞的城市：東南亞大主教城市的社會布局》（紐約，1967）。

[[139]](#_139_46) 《土地和農業委員會的報告》（仰光，1938），第2卷，第51頁。

[[140]](#_140_46) 對于這種住區模式的差異的圖示，見古魯：《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第302頁。

[[141]](#_141_46) 結束這種邊界變動所用的時間，各個地區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但可以合理地認為，除了越南西南部的外巴薩克是個例外，作為主要水稻產地的下緬甸、呂宋中部、爪哇和湄公河三角洲，至遲到20世紀20年代就被全部占領了。可參見：《庫珀報告》，第28—29頁。

[[142]](#_142_46) 同上書，第55—56頁。

[[143]](#_143_46) 他們的反應同泰國、菲律賓和緬甸的山地居民大概并無不同，后者發現他們的刀耕火種的傳統模式受到了低地政府的調整。

[[144]](#_144_46) 布洛克：《法國農業史》，第182頁。括號中的內容系引者所加。

[[145]](#_145_44) 然而，存在著這樣的特殊情況：實行共擔風險的制度是為了佃戶的利益，而地主寧愿付給佃戶固定數額的報酬。如果生產技術的進步使得農產量的大幅度增加成為可能，如果獲得這種產量的風險不大，如果新技術的成本較小，那么，佃戶從新產量分成制度下獲得的好處，可能大于最低的固定利潤。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地主可能希望自己付出的勞動力成本不變，從而能最大限度地占有新增的剩余產品。在此類特殊的、相對少見的情況下，正常的偏好模式被顛倒過來了。這種顛倒的原因就在于主要的風險限制解除了，而這是生存道德的基礎。

[[146]](#_146_44) 對于“交易平衡”和剝削這一客觀現象的十分詳盡的論述，見J.斯科特、B.柯克弗里埃特：《傳統的農村保護人是如何失去其合理性的？》，載于《文化與發展》，第5卷第3期，第501—540頁；B.穆爾：《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第453—483頁；S.西爾弗曼：《意大利中部農村的剝削》，載于《社會歷史比較研究》，第12期（1970），第327—339頁。

[[147]](#_147_44) 除另有說明者外，以下段落中的事實材料均采自庫珀的優秀報告。

[[148]](#_148_44) 《庫珀報告》，第2頁。在這一時期，小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的現象迅速蔓延。“在下緬甸，由非農業人口控制的被占土地面積的數量，從1906—1907年的18%上升到1929—1930年的31%。”幾乎所有這些重新確定所有權的土地，均由在外地主們所控制。M.阿代斯：《緬甸三角洲：亞洲邊遠稻谷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麥迪遜，1974），第142頁。

[[149]](#_149_44) 《庫珀報告》，第8頁。另見阿代斯的優秀著作《緬甸三角洲》，尤其是該書的第6、7章。邊遠地區的關閉可以從它的主要征兆——土地價格的上漲中得以驗證。

[[150]](#_150_44) 《緬甸南方漢達瓦底地區第三改建住區，1930—1933年》，住區官員U.T.蓋伊的《會議記錄》（仰光：緬甸政府，1934），第3、35、36頁。

[[151]](#_151_44) 《關于勃生地區的改建住區報告，1935—1939年》，住區官員M.M.蓋伊，第3頁。

[[152]](#_152_42) 《關于馬烏賓地區的改建住區報告，1925—1928年》，住區官員U.T.蓋伊，第4—5頁。

[[153]](#_153_42) 《庫珀報告》，第7頁。

[[154]](#_154_42) 同上書，第16、17頁。

[[155]](#_155_42) 在征收固定的實物地租或貨幣地租的地方，特別是在種植花生之類專供市場銷售的農作物的地方，遇到歉收年景時實行減租，仍然是一種習慣法。見《上緬甸帕科庫地區的第一改建住區，1927—1931年》，住區官員R.皮爾斯（仰光：緬甸政府，1932），特別是第3、43頁。

[[156]](#_156_42) 阿代斯：《緬甸三角洲》，第151—153頁。在下緬甸的許多村莊，無地的農業工人已成為有影響的“主要成分”。

[[157]](#_157_40) 《丹洛瓦底地區的第三住區，1913—1915年》，住區官員J.L.麥卡勒姆（仰光：緬甸政府，1916），第24頁。

[[158]](#_158_40) 《庫珀報告》，第31頁。

[[159]](#_159_40) 同上書，第41頁。

[[160]](#_160_40) 《關于漢達瓦底地區第三改建住區的報告，1907—1910年》，住區官員R.E.V.阿巴思諾特（仰光：緬甸政府，1911），第20頁。

[[161]](#_161_40) 《丹洛瓦底地區的第三住區，1913—1915年》，第4頁。

[[162]](#_162_40) 同上書，第24頁。

[[163]](#_163_40) 《毛淡棉住區報告，1910年》，住區官員T.庫珀，第19頁。

[[164]](#_164_40) 阿代斯：《緬甸三角洲》，第149頁。另見為了得出這一結論所引用的證據。

[[165]](#_165_40) 《勃生住區報告，1935—1939年》，第49頁。

[[166]](#_166_39) 《馬烏賓住區報告，1925—1928年》，第66頁。

[[167]](#_167_39) 《庫珀報告》，第31頁。

[[168]](#_168_39) 《毛淡棉住區報告，1910年》，第11頁。

[[169]](#_169_39) 阿代斯：《緬甸三角洲》，第152頁。

[[170]](#_170_39) 《庫珀報告》，第49頁。

[[171]](#_171_39) 同上書，第41頁。

[[172]](#_172_39) 同上書，第33頁。地主可能更愿意雇用外地人，因為他們對地主沒有什么道德上的權利要求；而本村人則希望地主遵守地方規矩，地主若是拒絕遵守，便會招來道德義憤。

[[173]](#_173_39) 《馬烏賓住區報告，1925—1928年》，第64頁。另見《庫珀報告》第10頁提供的關于1905—1922年期間“不斷增長”的犯罪率的統計資料，。

[[174]](#_174_39) 《西部交趾支那殖民地時期的大地主與佃農》，載于《歷史評論》，第249卷第499期（1971），第71頁。

[[175]](#_175_39) A.伍德賽德：《現代越南的社會與革命》（紐約，1976），第76頁。

[[176]](#_176_39) 古魯：《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第272—274頁。

[[177]](#_177_39) P.伯納德：《印度支那的經濟問題》（巴黎，1934年），第1章。伯納德的統計數字同古魯的許多數字一樣，出自Y.亨利：《印度支那的農業經濟》。

[[178]](#_178_39) 古魯：《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第284頁。

[[179]](#_179_37) 亨利：《農業經濟》，第57頁。另見布羅謝諾：《大地主》，第66頁。他指出，“大土地所有者身邊聚集了大批追隨者，由此加強了自己的本已很廣泛的‘保護人—委托人’的關系網絡。”

[[180]](#_180_37) 桑瑟姆：《暴動的經濟學》，第29頁。

[[181]](#_181_37) P.布羅謝諾：《西部交趾支那殖民地時期的大領主》，見J.謝諾編：《傳統與越南革命》，第151頁。

[[182]](#_182_37) 布羅謝諾：《大領主》，第64頁。

[[183]](#_183_37) 亨利：《農業經濟》，第192頁。

[[184]](#_184_37) 桑瑟姆：《暴動的經濟學》，第30—33頁。

[[185]](#_185_35) 亨利：《農業經濟》，第192頁。

[[186]](#_186_33) 同上書，第193頁。

[[187]](#_187_33) 桑瑟姆：《暴動的經濟學》，第32頁。

[[188]](#_188_33) 亨利：《農業經濟》，第113頁。

[[189]](#_189_33) 同上書，第35頁。

[[190]](#_190_33) 同上書，第122頁。另見第46頁關于安南的論述。

[[191]](#_191_33) 同上書，第30頁。

[[192]](#_192_33) C.羅比奎因：《法屬印度支那的經濟發展》（紐約，1944），第3章。

[[193]](#_193_33) 亨利：《印度支那的農業經濟》，第37頁。

[[194]](#_194_31) 布羅謝諾：《大領主》，第67頁。

[[195]](#_195_31) 同上注。此類形式的事件可能在當時的諸如《反叛與交趾支那農民》、《印度支那人論壇》等報紙上有詳細的連續報道。

[[196]](#_196_31) 同上注。

[[197]](#_197_31) G.格蘭：《越南與通向現代性的資本主義道路》，第218頁。

[[198]](#_198_31) 同上書，第226頁。

[[199]](#_199_31) 至于其他地區的情況，可參見B.J.柯克弗利埃特：《菲律賓新人民軍革命前的農民動亂》，載于《亞洲研究》，第9卷（1971年8月）；安德森：《關于班詩蘭共同體的土地和社會的若干方面》；M.G.斯威夫特：《經濟集中化與馬來人的農民社會》，見M.弗里德曼編：《社會組織：獻給R.弗思的論文》（倫敦，1967）；M.萊昂：《爪哇農村沖突的基礎》（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南亞和東南亞研究中心專題論文集，第3卷，1970年12月）；派克：《中部平原地區泰人社會的后農民村落》。

[[200]](#_200_31) 當然，稻谷價格的上漲也是提高地主利潤的一種補償途徑。然而，20世紀20年代的過度投機所引起的土地價值的增加，遠遠高于稻谷的市場價格。

[[201]](#_201_31) 鑒于其長遠的安全保障，土地的較低利潤也許是可以接受的，但它不能不受比較利潤率的市場邏輯的影響。

[[202]](#_202_31) P.梅林：《交趾支那的土地債務與農業的清算》（巴黎大學，1939），第25頁。梅林在這里引用了殖民地官員的話。

[[203]](#_203_31) 《庫珀報告》，第10頁。

[[204]](#_204_31) 梅林：《交趾支那的土地債務與農業的清算》，第34—40頁。

[[205]](#_205_31) A.伍德賽德的書信。另見阿代斯：《緬甸三角洲》，第188—189頁。

[[206]](#_206_31) 程度不同的同一個過程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就印度尼西亞的情況而言，J.V.德·克雷夫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的金融危機中，“爪哇的成千上萬的農民被迫抵押掉自己的土地，卻幾乎什么都得不到”。見《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農民和土地改革》，載于《東南亞史雜志》，第4卷第1期（1963年3月），第42頁。

[[207]](#_207_31) 阿代斯：《緬甸三角洲》，第188頁。

[[208]](#_208_31) 關于法國人在這方面的成就，見梅林：《交趾支那的土地債務與農業的清算》，第76—82頁；關于英國人的成就，見賓斯：《緬甸的農業經濟》，附錄B，第8頁。

[[209]](#_209_31) 阿代斯：《緬甸三角洲》，第189頁。這里所描述的模式很難說是東南亞所獨有的。在美國，谷物分成佃農協會在1931年得到發展，其主要推動力就在于地主拒絕按照慣例給佃農發放周轉資金和貸款。類似的違反慣例情況甚至延伸至協會參加者的道義經濟中。見一位無畏的協會會員的令人感動的陳述，T.羅森加滕：《上帝的一切危險》（紐約，1974），第287—310頁。

[[210]](#_210_31) 賓斯：《緬甸的農業經濟》，第73頁。

[[211]](#_211_29) 桑瑟姆：《暴動的經濟學》，第41頁。正如桑瑟姆所指出的，這些數字也對佃農的福利水平下降作了粗略估計，因為工人們不利于現有佃農的出價能力會相應地推動地租上揚。

[[212]](#_212_29) 賓斯：《緬甸的農業經濟》，第59頁。賓斯把這種變化歸因于人口因素；而且，事實上有證據表明，早在蕭條期之前，人均大米消費狀況就已經惡化。

[[213]](#_213_29) 桑瑟姆：《暴動的經濟學》，第41頁，以及前文第72頁的注1。

[[214]](#_214_29) 梅林：《交趾支那的土地債務與農業的清算》，第3頁。

[[215]](#_215_29) 布羅謝諾：《大領主》，第69頁。

[[216]](#_216_29) 布羅謝諾：《大領主》，第73頁。

[[217]](#_217_29) 同上書，第71頁。另見P.古魯所敘：“在1930年前后由于稻谷價格的下跌而突發的危機中，安南的土地所有者是最倔強的；他們不懂得有人會用補助金和可靠貸款引誘之而不強占其所想要的土地——占有想要的土地始終是他們貸款的邏輯目標。”《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第277頁。

[[218]](#_218_27) 見阿代斯：《緬甸三角洲》，第10章，對經濟危機的公共影響的杰出分析。

[[219]](#_219_27) 從這種“中心—邊緣”角度對歐洲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所作的分析，可以在I.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紐約，1974）中讀到。

#### 第四章 作為勒索者的政府

[[220]](#_220_27) 對于這些事件的簡要說明，可參見戴維·馬爾：《1885—1925年的越南反殖民運動》（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和洛杉磯校區出版社，1971），第1章和第8章。

[[221]](#_221_27) 參見戴維·R.斯特蒂文特：《后來居上：1840—1940年間菲律賓的太平盛世運動》（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76）。

[[222]](#_222_27) 參見代理總督J.R.海登1935年5月27日寫的《薩克達爾起義報告》（密西根大學圖書館海登藏書），附錄一，第4、6頁。要想更多地了解這次起義和在審訊中講這一番話的起義者普里米蒂沃·阿爾加伯爾及其妹薩盧德，參閱斯特蒂文特前引書。

[[223]](#_223_27) 翁戈加姆：《茉莉芬行政區：19世紀的普里加吉與農民》（博士論文，耶魯大學，1975）。又見卡托迪爾德約：《農民運動》，第2章。

[[224]](#_224_27) 關于薩敏派，參見哈利·J.本達和蘭斯·卡斯爾斯的《薩敏運動》（1969）；關于萬丹起義，參見薩爾托諾·卡托迪爾德約的《1888年萬丹農民起義》（海牙：馬蒂納斯·尼耶霍夫出版社，1966），第63、104和280頁；關于1926—1927年起義，參見哈利·本達和盧思·麥克維伊的《1926—1927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起義》（伊薩卡：康奈爾大學東南亞專業現代印度尼西亞課題，1960），第38、42和47頁。

[[225]](#_225_27) 很難估計傳統的東南亞君主所接受的道德訓喻和形而上學信仰對其財政政策有何制約作用。印度教和佛教關于國王對其臣民福祉應負職責的教義，完全可能促使一些君主在荒年謹慎行事，并將大量國庫歲入投入灌溉工程和民眾賑濟。這在傳統文學中當然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理想的國王總是“樂善好施，衣無衣者……食無食者。”翁戈加姆：《茉莉芬行政區》，第16頁，轉引自Tjan Tjoe Siem的“Hoe Koeroepati Zijn Vruaw Verwief”（博士論文，萊頓，1930）。又見薩默塞德·默爾托諾的《舊爪哇的國家與治國之術》（伊薩卡：康奈爾大學東南亞專業現代印度尼西亞課題，1968）。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如果一個貪婪的東南亞君主對其臣民壓榨過狠，他就會立即付出沉重代價。參見蘇王后對國王納拉提哈帕特的警告：“請考慮一下王國的狀況。你沒有黎民百姓，沒有大量的男女同胞在你身邊……。男女同胞們滯留在外，不愿進入你的王國。他們畏懼你的統治；因為你，雍笈牙王朝的國王呀，乃是一個兇狠的主人。所以，我作為你的奴婢，要給你講述古來的事情；但你就是不愿意聽。唉，不要在國家的肚皮上鑿洞……不要斬斷國家的手足！”引自《玻璃宮緬甸國王編史》，佩貌丁和G.H.盧思譯（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23），第177頁。

[[226]](#_226_27) 《土地稅收制度委員會報告》，第2卷，第4、233頁及后面數頁。

[[227]](#_227_27) 保羅·貝爾納：《印度支那的經濟問題》，第50—55頁。

[[228]](#_228_27) 伍德賽德：《社會與革命》，第153頁。

[[229]](#_229_27) 本達、卡斯爾斯：《薩敏運動》，第222頁。

[[230]](#_230_27) 《1930—1932年緬甸起義的根源》（仰光：緬甸政府，1934），第26頁。

[[231]](#_231_27) 同上書，第33頁。

[[232]](#_232_27) 賦稅的變化無常肯定也激起了民憤。地方當局官員濫用權力，為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朋友牟利，同時詆毀他們的敵人。然而，盡管殖民地政府的財政壓榨可能令人憤怒，但這似乎并非殖民制度的顯著特征，因為傳統稅收同樣殘酷或更加殘酷。

[[233]](#_233_27) 查爾斯·蒂利：《社區有行動嗎？》，載于《社會學調查》，第43卷第3—4期（1973），第221頁。

[[234]](#_234_27) 穆尼耶：《農民起義》，第329頁。

[[235]](#_235_27) 同上書，第348頁。

[[236]](#_236_27) 參見鮑里斯·波爾奇涅夫：《作為階級戰爭的民眾起義——讓·尼皮埃德起義》，第42—51頁。該文收于伊塞爾·沃爾沃奇編的《舊政體下農民的生存狀況與反抗》（紐約：霍爾特—萊茵哈特出版社，1970）。

[[237]](#_237_27) 加布里埃爾·阿爾當：《關于賦稅的社會學理論》，第4卷（巴黎，1965），第751—837頁。

[[238]](#_238_27) 卡托迪爾德約：《爪哇農村的抗議運動》，第43頁。

[[239]](#_239_27) 同上書，第47頁。

[[240]](#_240_27) 《人頭稅和戶頭稅調查委員會報告，1926—1927年》（仰光：緬甸政府，1949），第1—20頁。下文簡縮為《人頭稅調查委員會》。

[[241]](#_241_27) 同上書，第21頁。

[[242]](#_242_27) 同上書，第3頁。

[[243]](#_243_27) 《1930—1932年緬甸起義的根源》，第43頁。

[[244]](#_244_27) 《人頭稅調查委員會》，附錄，第42頁。

[[245]](#_245_27) 《庫珀報告》，第50—54頁。

[[246]](#_246_27) 《人頭稅調查委員會》，第33頁。

[[247]](#_247_27) 喬治·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羅德尼·利文斯頓譯本（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71），第166頁。

[[248]](#_248_27) 《人頭稅調查委員會》，第62—63頁。

[[249]](#_249_27) 賓斯：《緬甸的農業經濟》，第16頁。

[[250]](#_250_27) 《土地稅收制度委員會報告》，第2卷，第3—4頁。

[[251]](#_251_27) 同上書，第54頁。

[[252]](#_252_27) 《馬烏賓住區報告》，第60頁。“似乎只是從1924—1925年度起，稅務官才疏于依照《土地稅收手冊》第122款的規定對完全絕產區作出評估。”

[[253]](#_253_27) 賓斯：《緬甸的農業經濟》，第75頁。

[[254]](#_254_27) 《土地稅收制度委員會報告》，第2卷，第94頁。

[[255]](#_255_27) 賓斯：《緬甸的農業經濟》，附錄B，L.道森的備忘錄摘要，第17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256]](#_256_27) 我還沒有論述可以囊括在這一標題之下的其他財政措施，例如，由于食鹽在制作魚醬中的重要作用，食鹽稅成為一種遞減稅，相當于沉重的人口稅的25%。參見《庫珀報告》，第50頁。

[[257]](#_257_27) 參見馬爾：《越南反殖民運動》，第1—2章。

[[258]](#_258_27) 吳永隆：《八月革命前越南農民在法國人統治之下的生活狀況》，第64—65頁。該文系后來出版的《革命之前》一書的雛形。

[[259]](#_259_27) 同上書，第68頁。如果選擇1928年（當時米價普遍很高）作為對比年份，盡管吳永隆計算的差異不會如此巨大，但考慮到殖民地政權創立的許多附加稅，這種懸殊也就不至于使人過分誤解。

[[260]](#_260_27) 謝諾：《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第145頁。

[[261]](#_261_27) 米爾頓·E.奧斯本：《1859—1905年法國人在交趾支那與柬埔寨的統治及反應》（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69），第84頁。

[[262]](#_262_27) 參見亨利·拉努：《印度支那的工業化》，原載于《社會學與經濟信息公報》，1938年11月21日。謝諾在其《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第9章和第3章注1中詳盡地引證了該文，以作為補充資料。

[[263]](#_263_27) 阮洪甲：《從民歌看殖民地時期（1884—1945年）越南農民的狀況》（三級博士論文，巴黎大學，1971），第47頁。

[[264]](#_264_27) 每一例證中人頭稅的數量，除了另有注解之處，均來自吳永隆的《八月革命之前》之第3章第59—80頁中的資料。

[[265]](#_265_27) 同上書，第61—62頁。

[[266]](#_266_27) 首先，它們僅將稻谷產量算作收入，而在一些地區，特別是在東京，第二職業對于大多數農業人口可能就像種水稻一樣重要。其次，將1937年米價作為計算基礎只能說明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而幾乎不能說明20世紀20年代的情況，因為那時的物價約為30年代的兩倍。因此，根據1927年的物價計算，就會將平均負擔降低到吳永隆所說的水平的一半左右。

[[267]](#_267_27) 吳永隆前引書，第60頁。

[[268]](#_268_27) 對安南南部海岸漁村的一項研究表明，官方掌握的人口數字是實際人口的75%。與吳永隆有關傳統村莊的報告相比，這是一個很小的差距。甚至有某種理由認為，這一與世隔絕的村莊可能能夠逃避官方給予稻米主種植區內村莊的篩查。古斯塔夫·朗蘭：《安南的社會與宗教生活》（里爾，1945）。

[[269]](#_269_27) 謝諾：《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第191頁。

[[270]](#_270_27) 參見阮崇歡、吳達多和黃島諸文，吳永隆譯并附于《八月革命之前》。

[[271]](#_271_27) 阮洪甲：《越南農民狀況》，第116頁。

[[272]](#_272_27) 同上書，第73頁。

[[273]](#_273_27) 格蘭：《越南與資本主義道路》，第7章。

[[274]](#_274_26) 吳永隆：《八月革命之前》，表10，第68頁。

[[275]](#_275_26) Y.亨利：《農業經濟》，第43—44頁。

[[276]](#_276_26) 黃島：《泥與凝滯的水》，轉引自吳永隆：《八月革命之前》，第66—67頁。

[[277]](#_277_26) 吳永隆前引書，第63頁。

[[278]](#_278_26) P.古魯：《東京三角洲的農民》（紐黑文：人際關系領域檔案出版社，1955），第2卷，第526—527頁。

[[279]](#_279_26) 吳永隆：《八月革命之前》，第64頁。

[[280]](#_280_26) 同上書，第65頁。這段說明取自吳達多的一部長篇小說的序文。

[[281]](#_281_26) 格蘭：《越南與資本主義道路》，第388頁。

[[282]](#_282_26) 庫珀估計，在緬甸，普通家庭每年消費3.6磅食鹽，相當于交納1.5盧比的稅款，或大體相當于他們交納的人頭稅款額的三分之一。見《庫珀報告》，第50頁。

[[283]](#_283_26) 我還沒有提到其他許多稅種，它們或是全新或是已提高到新水平，而且它們也意味著一種直接或間接針對生存必需商品的收費。其中有對辛辣調味品本身、木材、手推車、水井、池塘、船只和魚的稅收。

[[284]](#_284_26) 格蘭：《越南與資本主義道路》，第215頁。

[[285]](#_285_26) 細節來自謝諾的《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之第10章和馬爾的《1885—1925年的越南反殖民運動》之第8章。

#### 第五章 經濟蕭條導致的起義

[[286]](#_286_26) 這一觀念得自伯克的《荷屬印度的經濟結構》之第5章。伯克在書中將這一觀念運用于爪哇的鄉村單元。

[[287]](#_287_26) 在1911—1925年間，法國文官數量翻番，殖民地總預算從1914年的4300萬皮阿斯特增加到1927年的8800萬皮阿斯特，翻了一番還多。謝諾：《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第195頁。

[[288]](#_288_26) 《土地與農業委員會報告》，第1部分，第10—11頁。

[[289]](#_289_26) 除非大多人口認為，就維系一個保證人身安全和合乎習慣的生存模式的社會秩序而言，政府負有特殊責任，上層人士負有一般責任。從這一意義上講，經濟危機可能在主觀上體現了殖民地政權“天賦治權”的失誤，盡管它幾乎從不直接承擔責任。應當記得，殖民地時代之前的政府，確實出面干預以控制市場力量并阻止糧食出口——殖民地政權則拒絕采取這些措施。參見阿代斯：《緬甸三角洲》，第23頁；詹姆斯·C.英格拉姆：《泰國的經濟變革》（第2版，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1），第1—3章。

[[290]](#_290_26) 就土地所有者而言，這種情況在上緬甸、東京和安南并不完全如此。在這些地區，許多土地所有者留在村莊之中。

[[291]](#_291_26) 《勃生住區》（修訂本），引自《道森銀行備忘錄》，第11頁。

[[292]](#_292_26) 同上注。

[[293]](#_293_26) 同上書，第49頁。

[[294]](#_294_26) 《漢達瓦底住區》（第三次修訂本），第12頁。

[[295]](#_295_26) 這一術語在過去是用以描述1930—1931年間交趾支那與安南的騷動和起義的。

[[296]](#_296_26) 關于農村騷動的發端，參見印度支那總督府政治事務與公共安全管理處：《法屬印度支那政治運動的歷史貢獻》，第4卷：《印度支那共產黨，1925—1933年》，附錄15：《1930年5月至1931年12月群眾騷動及組織者表現記錄》。

[[297]](#_297_26) 這些數據和以下許多有關交趾支那和安南的資料均出自收藏在巴黎的《海外檔案》（A.O.M.）中的文件，文件紙箱和卷宗號碼均分類為《印度支那：新土地》（Indochine NF）。下面所有此類引證均標注為A.O.M. Indochine NF，后面兩個數字則分別指文件紙箱號和卷宗號。這些預算數字和那些緊隨其后的人頭稅收入數字引自《莫雷蒂1932年5月28日關于交趾支那地方預算中金融狀況的報告》，第10—21頁，A.O.M. Indochine NF：285—2490。

[[298]](#_298_26) 《莫雷蒂1932年2月18日關于制訂東京地區直接稅法令的報告》，第27頁，A.O.M. Indochine NF：285—2490。在同一報告中，人口稅的合理性得到另一位官員的支持。他的依據是，它是體現了對生活在人人受益的“有序社會”中的明顯好處的稅收。出處同上，第23頁。

[[299]](#_299_26) 《莫雷蒂1932年5月28日關于交趾支那地方預算中金融狀況的報告》，第30頁，A.O.M. Indochine NF：285—2490。

[[300]](#_300_27) 吳永隆：《革命之前》，特別是其中所收黃島和阮崇歡的譯文，第179—218頁。

[[301]](#_301_26) 格蘭：《越南與資本主義道路》，第412頁。

[[302]](#_302_26) 參見1930年5月至8月的《印度支那論壇》、《爭鳴》和《交趾支那農民》。

[[303]](#_303_26) 伯納德：《印度支那的經濟問題》，第160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304]](#_304_26) 布羅謝諾：《大領主》，第71頁。

[[305]](#_305_26) 梅林：《土地債務》，第3頁。

[[306]](#_306_26) 格蘭：《越南與資本主義道路》，第412頁。

[[307]](#_307_26) 《法屬印度支那政治運動的歷史貢獻》，第4卷：《印度支那共產黨，1925—1933年》（河內，1924），第32頁。

[[308]](#_308_26) 謝諾：《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第215頁。

[[309]](#_309_25) 《印度支那共產黨，1925—1933年》，附錄15，第124—128頁。

[[310]](#_310_26) 同上書，第124頁。

[[311]](#_311_26) 《1930年5—6月交趾支那騷亂》，《報告》部分，第3—20頁；《事實》部分，第4—5頁，A.O.M. Indochine NF：327—2641。

[[312]](#_312_26) 對于交趾支那農村日益增加的無產階級而言，問題多少有所不同。因此，土龍木省油汀地區臭名昭著的米舍蘭橡膠種植園中的工人們，在發現他們的工資連同他們的大米配給額將由于橡膠價低而一同被削減時舉行示威活動。參見《米舍蘭事件》，1930年2月10日，A.O.M. Indochine NF：225—1839。

[[313]](#_313_26) 布羅謝諾：《大領主》，第69頁。

[[314]](#_314_26) 埃里克·呂德：《歷史上的群眾——1730—1848年間法蘭西與英格蘭民眾騷亂研究》（紐約：威利出版社，1964）。

[[315]](#_315_26) 關于這次起義的大量重要資料由安南北方事件調查委員會搜集，下文以該委員會主席之名稱其為莫舍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報告及其所搜集的所有證據可見于巴黎《海外檔案》中的《印度支那：新土地》卷宗。筆者還發現，陳宜寥的研究著作《1930—1931年間越南義安—河靜的蘇維埃》（河內外國語文出版社，1960）資料十分豐富，不過，在筆者看來，證據似乎表明，共產黨并沒有起了如他所說的那樣大的作用。還可參見一位黨的戰士的記述，即阮維禎的《運動的高潮》，收在《在敵人的網中——革命回憶錄》（河內外國語文出版社，1962），第9—42頁。

[[316]](#_316_26) 亨利：《農業經濟》，第40—48頁。

[[317]](#_317_26) 卡斯塔諾爾：《義安省農業專論》，見《印度支那經濟公報》（1930—B），第823、828頁，A.O.M. Indochine NF：336—3694。又見古魯：《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第77—78頁，第114頁，以及他所報告的降雨量方面的巨大差異。

[[318]](#_318_26) 農業服務部主任吉爾伯特1931年7月18日致莫舍委員會的《吉爾伯特聲明》，A.O.M. Indochine NF：332—2684，《順化卷宗》。

[[319]](#_319_26) 工業家科坦致莫舍委員會的《科坦聲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9。

[[320]](#_320_26) 伍德賽德：《社區與革命》，第231頁。

[[321]](#_321_26) 《北安南事件調查委員會報告》（《莫舍委員會報告》），第54頁，A.O.M. Indochine NF：212—1597。

[[322]](#_322_26) 《莫舍委員會報告》，第54頁。

[[323]](#_323_26) 榮市市政顧問杜爾塞1931年6月27日致莫舍委員會的《杜爾塞聲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24]](#_324_26) “鑒于毗鄰安南山脈，其中許多人認為，在山中有數種資源可供他們在危機時期生存。”參見亨利：《農業經濟》，第46頁。

[[325]](#_325_26) 亨利：《農業經濟》，第23頁。

[[326]](#_326_26) 卡斯塔諾爾：《義安省農業專論》，第838頁注：“就在土地小片化十分明顯之時，還存在著占相當比例的大土地所有者，但他們的土地是由分散的地塊組成的。”

[[327]](#_327_26) 同上書，第123—124頁。

[[328]](#_328_26) 關于南壇，參見南壇省政顧問陳友舍的《陳友舍聲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榮市卷宗》。關于清忠，參見清忠省政顧問丁巴昌的《丁巴昌聲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29]](#_329_26) 退休高官阮文靜提交的《阮文靜聲明》，A.O.M. Indochine NF：334—2689，《榮市卷宗》，附錄。

[[330]](#_330_26) 《阮德黎聲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31]](#_331_25) 同上書，第3頁。“工人的日工資與食用商品的價格不成比例。”

[[332]](#_332_25) 《莫舍委員會報告》，第51頁，A.O.M. Indochine NF：212—1597。

[[333]](#_333_25) 廣義省山靜縣副縣長阮良平提及的《阮良平聲明》，A.O.M. Indochine NF：335—2691，《廣義卷宗》，第2頁。從該地區民歌以及別的地方發生的情況判斷，富人在1930年似乎也不再借錢于人。參見阮洪甲：《農民狀況》，第40頁。

[[334]](#_334_25) 關于地方公共土地的消失，參見A.O.M. Indochine NF：333—2686中的各種聲明，以及出處同上的由義安省人民代表議院議員阮德黎提交的《阮德黎聲明》。

[[335]](#_335_25) 《勒福爾聲明》，1931年6月6日，A.O.M. Indochine NF：332—2684，《順化卷宗》，第16頁。

[[336]](#_336_25) 《莫舍委員會報告》，第74頁。

[[337]](#_337_25) 《財政制度檢查團團長、殖民地監察長德蒙仁報告》及收入其中的《沙特內·德熱里報告》，見《安南預算》，第6—8頁。

[[338]](#_338_25) 《莫舍委員會報告》，第72頁。關于學校稅與教育問題的精彩議論，參見蓋爾·凱利的《殖民地越南的教育政策》（博士論文，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1975）。學校稅以“贊助費”知名，用以贊助一所地區“法語—地方語”學校，到1926年，又增加了一所沿襲同樣辦學方法的地方義務小學校。除了經費之外，地方學校還是對依照中越傳統教學的鄉村儒生的威脅。

[[339]](#_339_24) 《迪爾西聲明》，第5頁。

[[340]](#_340_25) 河靜省出生的榮市前學校主任勒蒂奧提交的《勒蒂奧聲明》，A.O.M. Indochine NF： 335—2693。

[[341]](#_341_25) 《沙特內·德熱里報告》，第10頁。

[[342]](#_342_25) 同上書，第18頁。

[[343]](#_343_23) 在云漢、河靜一帶活動達20年的傳教士R.P.謝里耶提交的《R.P.謝里耶聲明》，A.O.M. Indochine NF： 334—2689。

[[344]](#_344_23) 河靜昆江種植園主費雷提交的《費雷聲明》，A.O.M. Indochine NF： 334—2689。

[[345]](#_345_23) 《沙特內·德熱里報告》，第13頁。這些數字包括少量城市房地產稅。較早的20世紀20年代的數字，無疑會說明1923年土地稅大幅度增加的結果。

[[346]](#_346_23) 《阮德黎聲明》，第4頁。關于印度支那食鹽專賣收入的增長，又見1930年6月23日《印度支那食鹽稅務監督報告》，A.O.M. Indochine NF： 282—2481，第1頁。依據亨利的雇傭勞動資料，10.80皮阿斯特合70至108天雇傭勞動。然而，即使對一個十口之家而言，這也似乎是一個高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

[[347]](#_347_23) 法國駐安南駐扎官勒福爾1931年6月6日提交的《勒福爾聲明》，A.O.M. Indochine NF： 332—2684，第13頁。

[[348]](#_348_23) 參見《莫舍委員會報告》，第75—76頁。民眾對森林執法官的憤怒，可由榮市一位市政顧問的以下議論得到說明：“為了不受森林管理當局的騷擾，與其執法官保持良好關系很有必要。你們知道，利姆樹（一種硬木）只有放在竹筏上才能飄起。森林崗哨對這些竹子征收什一稅。這里存在著腐敗。當地人有時碰上不誠實的森林執法官。他們在看到其中一人開著最新式的轎車時說：‘木料堆成的汽車開過去了。’”《穆頓聲明》，A.O.M. Indochine NF： 333—2686。

[[349]](#_349_23) 《阮文靜聲明》，第2頁。

[[350]](#_350_23) 參見《1933年3月的定期外交文書附錄》中提供的失業數字，該文件收在《印度支那抗法與共產主義宣傳聯盟》中，A.O.M. Indochine NF： 323—2625。雖然東京的失業總數略高些，但其人口數量要大得多。

[[351]](#_351_23) 安南派赴殖民地會議的代表雷諾1931年6月10日提交的《雷諾聲明》，A.O.M. Indochine NF： 332—2684，第4頁。

[[352]](#_352_23) 筆者估計，僅這些企業就雇用了大約2500名工人，至于它們的間接收入和雇工效應就更不必說了。例如，可參見《關于9月12日榮市事件的報告》，1930年12月31日，A.O.M. Indochine NF： 325—2634。其他地方也頻繁提到，這些工廠的許多勞動力主要是從藍江沿岸的村莊招募的。

[[353]](#_353_23) 《伊夫·亨利聲明》，1931年8月11日，Indochine NF： 335—2693，《河內卷宗》，第2頁。

[[354]](#_354_23) 見《阮德黎聲明》，第3頁，至于1930年初的大米市場，可參見東京駐扎官勒內·羅賓提交的《勒內·羅賓的演說》，1931年10月6日，A.O.M. Indochine NF：332—2680。

[[355]](#_355_23) 《穆頓聲明》。

[[356]](#_356_23) 即使在今天，在饑荒期間，同樣的過程還可以在安南觀察到。參見帕特里斯·德比爾的《從越南歸來》一文，載于《世界報》，1974年5月8日，第8版。

[[357]](#_357_23) 《陳友舍聲明》。

[[358]](#_358_23) 農業服務部視察員魯勒提交的《魯勒聲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59]](#_359_23) 《1930年10月1—3日秘密報告節錄：春原村視察報告》，A.O.M. Indochine NF：334—2688。

[[360]](#_360_23) 榮市醫院院長、內科醫生勒穆瓦納提交的《勒穆瓦納醫生的聲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61]](#_361_23) 衛生與醫療服務部視察員、內科醫生蓋德提交的《醫師長蓋德聲明》，A.O.M. Indochine NF：335—2693。

[[362]](#_362_23) 參見本書第6章關于起義與饑餓的論述。

[[363]](#_363_23) 《1930年10月1—3日秘密報告節錄》。

[[364]](#_364_23) 《莫舍委員會報告》，第49頁。

[[365]](#_365_23) 《義安調查》，A.O.M. Indochine NF：334—2688，第10頁。

[[366]](#_366_23) 卡斯塔諾爾：《義安省農業專論》，第833—837頁。

[[367]](#_367_23) 《魯勒聲明》，第2頁。

[[368]](#_368_23) 出處同上。黏土在干旱時板結如石，使得插秧實際上不可能進行。

[[369]](#_369_23) 卡斯塔諾爾：《義安省農業專論》，第828—33頁。

[[370]](#_370_23) 《莫舍委員會報告》，第50頁。

[[371]](#_371_22) 《沙特內·德熱里報告》，第10頁。總數和百分比是依據該報告數據計算的。至少對于義安來說，小比例的增加，可能來自從印度支那其他地方返回故鄉的勞工。然而，增加的主體，卻只能從這一領地財政需要的角度予以解釋。

[[372]](#_372_23) 《R.P.德里伯聲明》。

[[373]](#_373_23) 察多神學院院長R.P.達蘭提交的《R.P.達蘭聲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74]](#_374_23) 《印度支那共產黨，1925—1933年》，附錄15，第130頁。陳宜寥認為，事件發生日期為9月2日，參加者人數為20000。參見陳宜寥：《1930—1931年間越南義安—河靜的蘇維埃》，第24頁。

[[375]](#_375_23) 《1929年11月至1931年6月義安大事記》，A.O.M. Indochine NF：334—2688。

[[376]](#_376_23) 大多數人員傷亡情況，正是發生在這些大規模集會和游行的過程中，其中兩次實際上遭遇到空中轟炸。典型的情況是，一群人包圍一個由少數民兵保衛的行政中心，后者在覺得受到人群（如果有所武裝的話，也僅是些棍棒和菜刀）威脅時便開火射擊。除了少數例外，人群總是丟棄自己倒地的伙伴逃走，而民兵部隊卻不受損傷。由于農民們認識到這種大型集會的后果，這種集會就少見多了。

[[377]](#_377_22) 在義安的博達活動的傳教士R.P.貢內特提交的《R.P.貢內特聲明》，A.O.M. Indochine NF： 333—2686，第2頁。這里涉及的是東南亞的一種傳統模式。當一場起義開始時，農民很可能進山，而社會上層人士則遷入地區和省會城鎮，以尋求政府的保護。仿佛將村級文明社會聯合起來的纖細紐帶崩解了。農民通過遷出其原在地過一種較為原始但卻較為獨立的生活來尋求安全，而主要依靠政府強制力量的上層人士，則逃往中心地區。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昔日建立低地大米王國和殖民地政府的悠久歷史動向發生了逆轉。

[[378]](#_378_22) 《視察員拉格雷塞1931年5月31日提交清化政治事務視察員的周報》，A.O.M. Indochine NF： 335—2690。讓富人在荒年承擔主要稅負份額的努力，明顯地表現在關于重新制訂稅負分配范式的呼吁中。

[[379]](#_379_22) 《莫舍委員會報告》，第2部分：“鎮壓行動”，第29—48頁。

[[380]](#_380_22) 陳宜寥：《義安—河靜的蘇維埃》，第26頁。

[[381]](#_381_22) 安德烈·迪馬雷斯：《安南地區社會階級的形成》（里昂：費雷爾印刷所，1935）。又見謝諾：《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第214頁。

[[382]](#_382_22) 在地方公共建筑遭到攻襲時，往往很難弄清其直接目標是賦稅和行政記錄還是學校。原因很簡單：兩者通常均設在公共建筑中。最常見的情況似乎是，稅收記錄乃主要目標。然而，我們知道，教育附加稅遭到強烈怨恨，設在清忠的地區學校和至少兩所設在南壇的學校被洗劫和焚毀。見印度支那公共教育總長提交的聲明，《河內卷宗》，附件，A.O.M. Indochine NF： 336—2694。

[[383]](#_383_22) 陳宜寥：《義安—河靜的蘇維埃》，第27頁。

[[384]](#_384_22) 印度支那總督府政治事務和公共安全管理處：《法屬印度支那政治運動的歷史貢獻》，第5卷，第215頁。對這一問題還有少數別的回答，但它們多半顯得躲躲閃閃，例如，“因為某某人參加了，所以我也就參加了。”或者，“我窮，我讓他們帶我參加，是想從中撈到一些好處。”見該書，第214頁。

[[385]](#_385_22) 《法屬印度支那政治運動的歷史貢獻》，第5卷，第237頁。

[[386]](#_386_22) 同上書，第283頁。

[[387]](#_387_22) 在1931年春，在一茬莊稼遭災之后，由于圍繞起義地區的軍事壓力增大，暴力的性質發生變化。愈來愈多的暗殺受害者，是被懷疑與敵人合作的村民。對信奉天主教的村莊和天主教堂的襲擊事件發生率提高了。地方好斗分子尋找糧食和奮起保衛自身安全的努力，使其先前的目標退居次要地位。

[[388]](#_388_22) 《視察員拉格雷塞1931年5月31日提交清化政治事務視察員的周報》。

[[389]](#_389_22) 一些關于所搶大米數量的例證，參見《莫舍委員會報告》中的《鎮壓行動》，第25頁。

[[390]](#_390_22) 都良地區代表杜欣上尉發表的《杜欣上尉聲明》，A.O.M. Indochine NF： 333—2686。

[[391]](#_391_22) 陳宜寥：《義安—河靜的蘇維埃》，第29頁。

[[392]](#_392_22) 《視察員拉格雷塞1931年4月20日提交清化政治事務視察員的周報》。

[[393]](#_393_22) 事實上，從法文jacquerie派生的“農民暴動”一詞，與原詞所暗示的不分青紅皂白的狂暴并不十分相符。從社會上層人士的角度看，起義幾乎總是等同于搶劫、犯罪或無謂的暴力，因此jacquerie一詞起著為意識形態目的服務的作用。對于16世紀農民的簡短描述，參見羅德尼·希爾頓的《獲得自由的農奴》（倫敦，1973年）。

[[394]](#_394_22) 《法屬印度支那政治運動的歷史貢獻》，第5卷，第186頁。

[[395]](#_395_22) 《莫舍委員會報告》中的《鎮壓行動》，第50頁。

[[396]](#_396_22) 威廉·J.杜伊克爾：《1900—1941年間越南民族主義的興起》（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76），第222頁注11。

[[397]](#_397_22) 據亞力山大·伍德賽德的書信。

[[398]](#_398_22) 杜伊克爾：《越南民族主義的興起》，第222頁。

[[399]](#_399_22) 同上書，第230頁。

[[400]](#_400_22) 參見上文注98。

[[401]](#_401_22) 陳宜寥：《義安—河靜的蘇維埃》，第43—44頁。在起義最后的幾個階段，也存在對天主教社區的進攻、宗派斗爭以及對受過法國教育的人們的襲擊。這最后的斗爭模式，表現了“小傳統”對外人和異國教育的懷疑，可能進一步削弱了黨的影響。

[[402]](#_402_22) 《莫舍委員會報告》中的《鎮壓行動》，第10頁。

[[403]](#_403_22) E.扎基西安茨：《緬甸革命的佛教背景》（海牙：馬蒂納斯·尼耶霍夫出版社，1965），第157—159頁。

[[404]](#_404_22) 義安省黨組織制訂的七點綱領中的最后一點。見陳宜寥的《義安—河靜的蘇維埃》，第27頁。

[[405]](#_405_22) 在接近19世紀末期時，有許多類似的運動，而在20世紀無疑有許多聲勢較小的塞特迦明，他們從未達到引來官方注意或行動的地步。扎基西安茨：《緬甸革命的佛教背景》，第150—159頁。

[[406]](#_406_22) 《1930—1933年間的漢達瓦底住區》，第38頁。

[[407]](#_407_22) 同上書，第41頁。

[[408]](#_408_22) 同上書，第4頁。

[[409]](#_409_22) 同上書，第25頁。

[[410]](#_410_22) 緬甸政府：《緬甸起義（1930—1932年）的起源和原因》，第43頁。除了另有標注者外，以下有關這次起義的資料均取自這一官方長篇報告。

[[411]](#_411_20) 同上書，第2頁。

[[412]](#_412_20) 同上書，第10頁。該報告也承認存在這種對賦稅的厭惡，并以“沙耶瓦底人在暴力、無法無天和蔑視權威方面的傳統稟性”或“在過去的相當長的年月中一直是沙耶瓦底地區的一個鮮明特點的對納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這樣的字眼來提及這一點。沙耶瓦底似乎是“緬甸的義安”。

[[413]](#_413_20) 同上注。發生于世紀之交的爪哇的薩敏運動，引出了同樣的主題。參見本達、卡斯爾斯的《薩敏運動》和世肖甲的《薩敏運動與薩馬特運動：農民抵抗兩例》兩文，分別載于《東南亞評論》，1967年第2期，第304—310頁，以及1968年第1期，第107—113頁。

[[414]](#_414_20) 緬甸政府：《緬甸起義》，第26頁。

[[415]](#_415_20) 同上書，第23頁。

[[416]](#_416_20) 同上書，第25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417]](#_417_20) 同上書，第4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進行保衛戰以贏得地方自治的呼吁，與義安—河靜地區起義的模式極其相似。

[[418]](#_418_20) 同上書，第5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419]](#_419_20) 這樣的暗殺事件實際上僅發生了寥寥數起。

[[420]](#_420_20) 同上書，第15頁。以下兩處引文分別取自上書第31頁和第34頁。

[[421]](#_421_20) 同上書，第31頁。對個人、村莊乃至地區免稅，以報答其支持，也是東南亞國家君主的傳統做法，特別是不得不自己奪得王位的君主的傳統做法。

[[422]](#_422_20) 同上書，第25頁。紋身的好處之一是，使迦盧荼聯盟成員承諾戰斗到底，因為他們無論如何都會被無可改變地打上叛亂分子的標記。

[[423]](#_423_20) 同上書，第31、38頁。如同在義安與河靜一樣，這種做法可能更為普遍，但這樣的資料，對于該報告的主旨來說是次要的，因此只是被順便提及。

[[424]](#_424_20) 同上書，第30頁。

[[425]](#_425_20) 同上書，第14頁。

[[426]](#_426_19) 巴宇：《我的緬甸：一位總統的自傳》（紐約：塔普林格出版社，1959），第103頁。

[[427]](#_427_19) 同上書，第109—110頁。

[[428]](#_428_19) 澤洛·澤馬丹：《社會結構對爪哇農民經濟的影響》，收于小克利夫頓·R.沃頓編：《生存農業與經濟發展》（芝加哥：阿爾定出版社，1969），第46頁。

#### 第六章 剝削的分析意義：互惠與生存的公正

[[429]](#_429_19) 劉易斯·L.洛溫：《剝削》，載于《社會科學百科》，第6卷（紐約，1931），第16頁。

[[430]](#_430_19) B.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波士頓，1966），第471頁。穆爾的問題假定這兩位地主為佃戶提供的服務或多或少有可比性。

[[431]](#_431_19) 為了邏輯的一貫性起見，“錯覺”一詞也可以運用于這樣的情況：“客觀上”不存在任何剝削，但有關人員卻有著強烈的社會不公正感。人們認為此類情況是罕見的，因為導致“錯覺”的扭曲價值觀是精英統治者思想霸權的結果，因而往往在接受社會秩序的方向上扭曲人們的知覺。例如可參見F.帕金：《階級不平等與政治秩序》（紐約，1971），第3章。

[[432]](#_432_19) 例如，參見愛潑斯坦：《生產效率與酬報的習慣制度》，第229—252頁。

[[433]](#_433_19) 這一情況常被用來解釋法國大革命前農民在商品化過程中的動亂；也常被用來解釋14世紀晚期許多歐洲農民中的動亂，當時在大批農奴死于瘟疫從而導致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上漲的情況下，貴族階層力圖壓低農奴勞動所得的標準。

[[434]](#_434_19) 除了其他有關著作，可參看阿爾文·W.古爾德納：《互惠準則初探》，載于《美國社會學評論》，第25卷第2期（1960年4月）。

[[435]](#_435_19) 同上文，第171頁。

[[436]](#_436_19) P.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紐約，1961），第229頁。

[[437]](#_437_19) E.涂爾干：《職業倫理學與公民道德》（倫敦，1957），第209頁。

[[438]](#_438_19) 同上書，第210頁。

[[439]](#_439_19) 湯普森：《18世紀英國民眾的道義經濟》，第108頁。

[[440]](#_440_19) H.阿拉維：《農民的階層與原始的忠誠》，載于《農民研究雜志》，第1卷第1期（1973年10月），第22—62頁。阿拉維特別批評了對派別集團的社會學分析，但他的觀點在這里同樣適用。我還要指出，他對這一術語的用法同該術語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的用法多少有點不同。

[[441]](#_441_19) 古爾德納：《互惠準則初探》，第171頁。

[[442]](#_442_19) B.馬利諾維斯基：《原始社會的犯罪與習俗》（倫敦，1932年），第30—50頁。另外參見M.莫斯：《禮品：古代社會的交換形式與功能》（格蘭科，1954）。莫斯認為，他對“前身份”及其創造的社會聯系的許多分析同樣適用于非傳統社會。另見C.S.布爾肖：《傳統交換與現代市場》（恩格利伍德—克利夫斯，1965）。

[[443]](#_443_19) 例如參見H.菲利普斯：《泰國農民的人格》（加利福尼亞，1965）；L.漢克斯：《稻谷與佃戶》，第6章。

[[444]](#_444_19) 見F.林奇：《社會的認可》，收入林奇編：《論菲律賓人價值觀的四本讀物》（奎松城，1964），第21頁；M.霍倫斯泰納：《菲律賓低洼地區的互惠主義》，見同書，第22—49頁。

[[445]](#_445_19) 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獻越來越多，要全面地開列參考書目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些典型著述是：G.M.福斯特：《秦宗燦的二分體契約：“保護人—被保護人”之關系》，載于《美國人類學》，第65期（1963），第1280—1294頁；E.沃爾夫：《親情、友誼與“保護人—被保護人”關系》，見M.班通編：《復合社會中的社會人類學》（紐約，1966）；J.坎貝爾：《道義、家族與庇護》（牛津，1964）；A.溫格羅德：《保護人、保護與政黨》，載于《社會歷史比較研究》，第19期（1968年7月），第1142—1158頁；F.巴思：《斯瓦特的帕坦人中的政治領導》，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專題文集，第19卷（倫敦，1965）。欲知詳盡的參考書目，見S.施米特、J.斯科特、C.蘭德和L.瓜斯蒂合編：《朋友、追隨者與派系：政治庇護主義讀本》（加利福尼亞，即出）。

[[446]](#_446_19) C.蘭德首先明確地把“保護—被保護”模式應用于東南亞的政治研究，發現它是解釋為何缺乏以階級為基礎的選舉的必要工具，也是解釋“大人物們”和“小人物們”為何形成同盟的必要工具，二者都是菲律賓黨派的特征。蘭德：《領袖、派系和政黨：菲律賓政治的結構》（紐黑文，耶魯大學東南亞研究專題文集，第6卷，1964）。納什精心研究上緬甸鄉村政治后得出的結論是，一個村民的基本政治決定是要投靠一個富裕的能保護和發展其利益的保護人。M.納什：《通向現代性的金光大道》。馬來亞和泰國的地方政治也被作了類似的闡釋。例如，M.G.斯威夫特：《馬來亞哲勒布的農民社會》；H.菲利普斯：《泰國農民的人格》（加利福尼亞，1965）。甚至在爪哇農村，政黨的標記都表明了思想意識的兩極分化，對此的主要闡釋強調兩極分化的集團性，其中每個黨派都由帶領著家族、鄰居和被保護人的富裕農民領導。R.R.杰伊：《爪哇中部農村的宗教和政治》，文化報告系列（紐黑文，耶魯大學東南亞研究專題論文集，1963），第98—99頁。有關這個論題的材料，還可參看D.欣德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1951—1963年》（加利福尼亞，1966），第14章；R.莫蒂默：《階級、社會分化和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載于《印度尼西亞》，第8期（1969年10月），第1—20頁。

[[447]](#_447_19) 當然，經驗表明，如果沒有機會表達不滿的話，不同意的屈從和同意的屈從很難區別開來。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這個問題。

[[448]](#_448_19) 穆爾：《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第453—483頁。S.F.西爾弗曼極大地推進了他的論點，見西爾弗曼：《意大利中部農村的剝削：分層研究的結構和觀念》，載于《社會歷史比較研究》，第12期（1970），第327—339頁。關于交換理論與階級關系，另見P.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A.斯廷奇庫姆：《農業企業與農村階級關系》，載于《美國社會學雜志》，第67期（1961—1962），第165—176頁。

[[449]](#_449_19) 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第471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同樣的推理也可運用于國家。因此，“比如說，在國家及其統治者提供公正和保護、近代以來還提供像樣的公共服務的地方，稅收就不是剝削。”穆爾：《人類苦難的根源之思考與消除苦難的若干建議》（波士頓，1970），第53頁。

[[450]](#_450_19) 這些模式實際上大致地對應于農村變革的兩個過程。前者以商品化的土地所有者階級為特征，這一階級減少或終止了傳統的貴族統治所提供的大多數服務，同時繼續壓榨農民。后者類似于衰落的農村貴族們的生存努力，他們仍然強求每一項封建特權，卻維持不了、更不要說提高他們對隨從和雇員的服務。

[[451]](#_451_19) “外部人”常通過暫時破壞原先控制農民的精英權力的有害影響這一勝利，鼓勵當地的反抗。

[[452]](#_452_19) 欲知更為廣泛的討論，見B.J.柯克弗里埃特：《菲律賓新人民軍革命前的農民動亂》，載于《亞洲研究》（馬尼拉），第9卷（1971年8月），第164—213頁。

[[453]](#_453_19) 這里談到的具體實例其實是同一個農場發生的事。第一個實例發生在1905—1924年該農場的創立者管理時期；另一個發生在1924—1936年他的兒子管理時期。

[[454]](#_454_19) 在這種情況下可參考朗西曼的論點，見他的《相對剝奪與社會公正》一書，第264頁。

[[455]](#_455_19) 門格：《對于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第9—10頁。

[[456]](#_456_19) A.埃弗里特：《農產品的銷售》，見J.瑟斯克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農民史，1540—1640年》，第4卷（倫敦，1967），第469—470頁。

[[457]](#_457_19) 沙俄時代農村中的一種村社組織，米爾的成員須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使之與家庭規模相適應。——譯注

[[458]](#_458_19) 皮特—里弗斯：《山區人》，第62頁。

[[459]](#_459_19) 費孝通：《中國的貴族：城鄉關系散論》（芝加哥，1953），第116—118頁。

[[460]](#_460_19) 例如參見布洛克：《法國的農業經濟》，第2章。

[[461]](#_461_19) 霍布斯鮑姆、呂德：《斯溫上校》。這一論述很有啟發意義，在許多方面有助于我們理解農民對于過去十年的綠色革命破壞交換的反應。參看F.弗蘭克爾的著作：《印度的綠色革命》（普林斯頓，1971）。

[[462]](#_462_19) G.巴蘭迪爾：《政治人類學》（紐約，1971），第39頁。

[[463]](#_463_19) 穆爾：《人類苦難的根源之思考與消除苦難的若干建議》，第53—54頁。

[[464]](#_464_19) C.貝爾、H.紐比：《農業工人的社會概念之來源》，載于《社會學評論》，第21卷第2期（1973），第244頁。

[[465]](#_465_19) W.沃森：《貨幣經濟中的宗族凝聚性：關于北羅得西亞曼布韋人的研究》（曼徹斯特，1958），第60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中譯文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之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32—133頁腳注。

[[466]](#_466_19) R.希爾頓：《契約的自由：中世紀的農民運動與1381年的英國農民起義》（倫敦，1973），第131頁。

[[467]](#_467_19) 馬克思、恩格斯：《愛爾蘭和愛爾蘭問題》（莫斯科，1971），第341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468]](#_468_19) E.D.吉諾維斯：《奴隸們創造的世界》（紐約，1974），第146—147頁，著重標記為引者所加。

[[469]](#_469_19) 同上書，第147頁。

[[470]](#_470_19) “在法蘭克人時代，大多數自薦者從新主人那里能夠得到的東西都不只是人身保護。由于其強有力的主人同時又是富有者，他們還指望得到他在生活上的幫助。”《封建社會》，L.A.馬尼翁譯，英文版，第1卷，第163頁。

[[471]](#_471_19) “一定的經濟特權（土地占有權、勞動征用權、市場交易權等等）和一定的經濟義務（慷慨幫助的義務）同權力的行使是密切結合的。”巴蘭迪爾：《政治人類學》，第34頁。這再次說明經濟權力總是取決于經濟責任和義務的履行。

[[472]](#_472_19) 大量的關于遷移率問題的社會學文獻很少討論階級關系，這突出地說明了這一點。

[[473]](#_473_19) R.本迪克斯：《建國與公民權：關于變化中的社會制度的研究》（紐約州加登城，1969），第49頁。當然，正如吉諾維斯所指出的，同樣的論點是贊成奴隸制的漂亮言詞的組成部分。“我們的奴隸是我們的莊嚴責任。我們有權使用和指揮他們的勞動，同時我們有義務負責他們的衣、食和人身安全。在任何情況下要都使奴隸得到保護并舒適地活著，在這一條件下，奴隸制度就是奴隸為了主人和奴隸的相互利益而勞動的責任和義務。”見吉諾維斯：《奴隸們創造的世界》，第76頁。

[[474]](#_474_19) F.M.L.湯普森：《19世紀英國的有地產社會》（倫敦，1963），第10章。

[[475]](#_475_19) 桑瑟姆：《暴動的經濟學》，第29頁。達官貴人權勢者的漂亮言詞帶有同樣的家長式腔調。一位官員在談到義靜起義初期的動亂村莊之行時說：“當我們親自來同群眾會商時，我們把他們看做是自家人，我們對待他們就像父親對待子女一樣。”既然這種官場模范行為在安南早已停止了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對農民福利的父親般關懷，大多數學者官員便公然違反其身份地位所賴以確立的原則了。上述引文摘自黎同德（胡得凱）于越南榮市的報告（1930年5月30日）。

[[476]](#_476_19) 關于相對剝奪學派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參見I.K.費爾本德、R.L.費爾本德、B.A.內斯沃爾德：《社會變革與政治暴力》；J.C.戴維斯：《若干大革命及其內在反叛的原因——滿意度升降的J型曲線》；T.格爾：《內亂的比較研究》。諸文均見格雷厄姆、格爾：《美國的暴力：參謀部報告》，第2卷（華盛頓，1969）。

[[477]](#_477_19) T.格爾：《雇工們為何反叛》（普林斯頓，1970），第46—50頁。

[[478]](#_478_19) 同上書，第46頁。

[[479]](#_479_19) P.勒普沙：《政治暴力的詮釋：若干心理學理論與義憤》，載于《政治與社會》，第3期（1971年秋季），第102頁。B.穆爾也表達了對非道德性的相對剝奪理論的不滿。“因此，合法性的衰微——如同M.韋伯的用法——比知識分子因失職而提出的時髦專業術語‘相對剝奪’更好地抓住了這一過程的實質。我覺得相對剝奪概念太狹窄、太功利主義了。”見穆爾：《人類苦難的根源之思考與消除苦難的若干建議》，第171頁。

[[480]](#_480_19) 我認為對村莊本身的規范結構的打破也可以作出類似的解釋。這就是說，只要作為一個機構的村莊在危機時刻真能提供生存保險，它就保留了合法性的核心，從而保留了對于不太富裕村民的行為批準權。然而，如果它不再能提供這種保險，那就動搖了這一社會共同體的道德基礎，而農民也就能夠比較自由地打破村莊的規范了。不言而喻，對牧師同教區農民之間關系，也可作類似的分析。

[[481]](#_481_19) 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第xv頁。

[[482]](#_482_19) 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59頁。

[[483]](#_483_19) 皮特—里弗斯：《山區人》，第178頁。

[[484]](#_484_19) 霍布斯鮑姆、呂德：《斯溫上校》。

[[485]](#_485_19) 同上書，第15頁。

[[486]](#_486_19) 同上書，第18頁。

[[487]](#_487_19) 例如見魯德：《歷史上的老百姓》，第1、3章；相對應的英國著述為湯普森的《18世紀英國民眾的道義經濟》一文。

[[488]](#_488_19) C.希爾：《顛倒了的世界：英國革命時期的激進思想》（倫敦，1971），第100頁。

[[489]](#_489_19) 關于這種馬斯洛式的天真的例子，見M.奧爾森：《快速增長——穩定的破壞因素》，載于《經濟史雜志》，第23期（1963年12月），第529—552頁。

[[490]](#_490_19) 希爾：《顛倒了的世界：英國革命時期的激進思想》，第87頁。

[[491]](#_491_17) 同上注。

[[492]](#_492_17) 同上書，第266頁。

[[493]](#_493_17) 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第505頁。

#### 第七章 反叛、幸存和鎮壓

[[494]](#_494_17) 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第174頁。在這段引文中，我刪去了我有不同看法的下面兩句話：“對于程度緩慢的經濟惡化，受害者可能認為是正常經濟運行的一部分而予以接受。特別是當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出路時，在農民關于公正、正當的標準中，越來越多的剝奪可能逐漸成為可以接受的事。”我要極其嚴格地區分農民所認為的“正常”和農民所認為的“正當”，因為兩者決不是一回事。誠然，緩慢的變化造成的后果相比較而言可以被接受（但并非無限制地如此），因為農民可以有許多辦法（例如強化勞動、短期遷居等）維持生存。同樣確實的是，在提供某種程度的生存危機保障的前提下，較高程度的剝削也是較為可以忍受的。然而，即便是緩慢的經濟惡化，只要其特征表現為交換平衡的更大的剝削性，就會被認定為剝削，盡管事實上它屬于正常情況。正如我后面將要證明的，農民們對此種情況的剝削性的認識，常常可以從他們的象征性方式或語言形式中覺察出來，雖然他們無力加以改變。然而，我還要指出的是，我同穆爾之所以有這一爭論，首先是由于我從他那里深受教益。要不是從他的論述中學到了許多東西，我就完全不可能提出上述質疑。

[[495]](#_495_17) 當然有這樣的情況，即無論如何，要是不反叛就只有死亡。在此種情況下，不管希望多么渺茫，反叛都可能是“有意義”的；一個人最好是為了生存而戰死，也不要平靜地屈服而死。在這一意義上，華沙猶太人居住區的起義就屬于這種毫無希望的反叛；由于明知沒有希望，參加者進行戰斗的目的就是要英勇反抗并名垂青史，而不是期望得以幸存。見E.林格爾布盧姆的動人描述：《華沙猶太人居住區實錄》（紐約，1958）。

[[496]](#_496_17) 對于這些國家來說，有證據表明在福利水平上沒有任何提高，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在失去獨立后的殖民地時代，還有所下降。見D.帕奧：《東南亞的經濟進步》，載于《亞洲研究雜志》，第23卷第1期（1963年11月），第69—91頁。因此，常見的把反叛同農民福利水平得到實質上的提高之后接著發生的倒退相聯系的觀點，似乎不能用來說明東南亞農民的經歷。這并不是說可以完全排除兩者的聯系。正如前已指出的，可以相信，在精英或政府的剝削量增加的同時，農民的福利水平也會有所提高。對于這種逐漸被作為生存規范的新的福利水平的任何威脅，很可能激起反叛。

[[497]](#_497_17) 關于國家的作用，這里沒有什么是合乎慣例的。在殖民化之后的越南北方和緬甸，國家干預對土地的再分配，并且穩定農民的收入和安全性。幾乎所有的殖民地國家都取消了人頭稅這一國庫財源。

[[498]](#_498_17) 在國家力量較弱的地方，這種強制力可能存在于例如軍閥部隊這類機構之中。在前后兩場戰爭之間，軍閥部隊統治了中國的大多數地區。

[[499]](#_499_16) 以爪哇和越南為例，限制流動的勞動力控制制度造成的結果是，回歸大農場主的勞動力遠遠超出了單憑其經濟實力所能容納的數字。

[[500]](#_500_16) 《印度支那共產黨，1925—1933年》，第33頁。

[[501]](#_501_16) 在泰國東北部的實例中，由于呵叻高原的大部分地區屬于老撾文化區——它是泰國傳統的一種地方性變異體，但具有明顯的分離主義傾向，種族的和語言的問題增加了摩擦與不和。見C.F.凱斯：《泰國東北部的地方主義》（康奈爾大學泰國研究課題），中期系列報告，第10號，官方資料文件第65期。

[[502]](#_502_16) 無希望的生態這一因素也許就足以引起大量動亂，但當它同以該地區為基地的異見知識界這一因素結合起來時，就會產生爆炸性更大的局面。廣平省（河靜的南方）決不比義安的境況好，興安省（河內的東方）的境況也不比義安好，那里甚至流傳著這一說法：“十年就有九年旱，五月禾稻便燒焦，全部收成都完了。”但這些省份都不像義安那樣有一部動亂史，其原因就在于義安的造反趨向很容易取得知識界的領導。我感激A.伍德賽德在這一觀點上給我的啟發。

[[503]](#_503_16) 少雨地區的水資源分配問題也可能是政治斗爭的主要焦點。

[[504]](#_504_16) 《17世紀法國、俄國和中國的農民起義》，隨處可見。

[[505]](#_505_16) 霍布斯鮑姆、魯德：《斯溫上校》，第9章。

[[506]](#_506_16) 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第475頁。作者似乎是按照這兩種推理方式來證明的。

[[507]](#_507_16) 有些區別反映在形成對照的下述兩個實例中，即發生在公有化程度較高地區的反叛——義靜蘇維埃，和發生在具有較強差異性的環境下的造反——沙耶山起義反叛。正如人們料想的那樣，地方自治的公有化鄉村似乎更容易發生大眾抗議；而且，由于沒有什么內部敵人，經常傾向于爭取分離、隱退和自主（即更為經常的在保衛意義上的反抗）。鄉村與城市或者鄉村與政府之間的問題，似乎壓倒了較為嚴格定義的階級問題，這也是由于內部的階級劃分是第二位的。在局部的階級差別較為明顯的地方發生的反叛，常常分裂了鄉村；而且，毫不奇怪，較為富裕的農民和地主對此要么不參與，要么積極地加以反對。因為鄉村發生分裂了，所以在動員地方參與方面，外部領導很可能發揮作用。結果，反叛可能是更加外向性的（即：更多的是推翻政府的努力而不是退縮）——哪怕是傳統主義的和相信太平盛世的反叛。然而，這些提要性結論并不是確定不移的。很明顯，即便是公有社會的鄉村，也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即相當溫和的階級差別也有爆炸性的后果（爪哇）；即便在有社會分層的鄉村里，某些沖擊也可能促成意料之外的團結一致。在這里，我們沒有討論可能同反叛癖好及其采取的形式相關聯的社會結構的其他方面。關于把農村經濟組織的性質同政治經濟沖突的性質相聯系的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見A.斯廷奇庫姆：《農業和農村階級關系》，載于《美國社會學雜志》，第67卷（1961—1962），第165—176頁。

[[508]](#_508_16) 這一短語來自A.佐爾伯格的優秀論文：《瘋狂的時刻》，載于《政治與社會》，第2卷第2期（1972年冬季），第183—207頁。

[[509]](#_509_16) 這是A.溫格洛德和E.莫林在《農民之后：當代撒丁島人社會的特征》一文中的用語，該文載于《社會歷史比較研究》，第13期（1971年7月），第301—324頁。有關這一方面，另見C.利斯：《肯尼亞的政治：農民社會的發展》，載于《英國政治學雜志》，第1期（1973），第301—337頁。

[[510]](#_510_16) 格爾茨的《農業的衰退》一書令人信服地敘述了條件及其動力。禮儀花費的削減是另一個常被提起的適應性變化。至于緬甸最近的類似情況，見L.施蒂費爾：《緬甸的社會主義：頭十年的經濟問題》，載于《太平洋事務》，第45卷第1期（1972年春季），第60—74頁。同樣的發展趨勢中有一些在肯尼亞也很明顯，見利斯：《肯尼亞的政治》。

[[511]](#_511_16) R.W.弗蘭克：《爪哇：奇跡的種子和毀滅的夢》，載于《自然歷史》，第83卷第1期（1974年1月），第11頁。

[[512]](#_512_16) 施蒂費爾：《緬甸的社會主義》。

[[513]](#_513_16) 查耶諾夫：《農民經濟論》，第115頁。

[[514]](#_514_16) V.基布恩斯坦、岡納萬：《吉蘭丹的貧困》。

[[515]](#_515_16) 這些安排中的大多數主張的方法是，一次性給予貧困家庭一筆他們本來很難籌集到的資金，用于諸如結婚或葬禮、學費、醫療費等主要開銷，或者作為償還處于困境中的貸方的款項。在整個東南亞，這常常是由流動貸款協會來完成的。在流動貸款協會里，或許十個人中每個人都定期地捐出少量款項作為集合基金，然后通過不同的選擇方法，把十個人的集合基金給予其中某一個人。就這樣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進行下去，從理論上說，直到所有的人都得到一次集合基金為止。當然，臨近末尾，如果某人已經得到過基金了，并且協會的生存開始有問題了，捐款的動力就減弱了。關鍵在于，特別是在有某種公有傳統的地方，生存困難可能造成創立解決日常問題的非正式組織的新動力。

[[516]](#_516_16) 在西方，在似乎非政治性的地方自助與后來的政治創新之間，常常有很大的連續性。對東南亞的農民聯合和激進政黨的地方世系的溯源，也許會揭示出類似的同早先的自助活動之間的連續性。至于英國的實例，見霍布斯鮑姆和呂德關于每年的鄉村節日（以及其他典儀）和農民抗議運動的組織兩者之間關系的論述。《斯溫上校》，第66—68頁。

[[517]](#_517_16) 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起源》，第1章。另見穆爾關于保守的編史工作的附錄，特別是他對明蓋伊的《18世紀英國的有地產社會》的批評。

[[518]](#_518_16) 弗蘭克爾：《印度的綠色革命：經濟收益與政治成本》，第2章。

[[519]](#_519_16) 全部過程得到了政府的幫助：政府資助機械的進口，提供低息貸款，并且維持小麥的國內高價。

[[520]](#_520_16) 有關這方面的論著，見東南亞發展顧問組的報告：《東南亞的農業革命》，第1—2卷（紐約：亞洲學會，1970）；W.科利爾：《收割經紀人、高產品種和農業變革：爪哇的實例》；以及W.尤塔米、J.伊哈勞：《農場規模：它對中爪哇的生產、土地租佃、市場和社會關系的影響》。后兩文是作者于1972年9月提交給國際水稻研究所的水稻種植研究項目組的論文。

[[521]](#_521_16) 同A.索納的談話，1973年12月20日。由于這些數字反映的是特別富裕地區的情況，它們很可能包含了50%的農業人口。

[[522]](#_522_16) C.H.戈奇：《農村地區的技術革新和收入分配》，載于《美國農業經濟雜志》，第54卷第2期（1972年5月），第326—341頁。

[[523]](#_523_16) 當然，肥料的施用可多可少，但施肥收益的增加大有不同。能適量施肥的地主，其每英畝地的收獲量是每英畝地只能施一半肥料的較窮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兩倍多。

[[524]](#_524_16) 戈奇：《農村地區的技術革新和收入分配》，第330頁。

[[525]](#_525_16) B.柯克弗里埃特：《關于菲律賓農民反叛之后果的微觀考察》（油印稿）。關于土地改革的議論也刺激地主辭掉佃戶，以免日后佃戶會要求土地所有權。同樣，有時候人們特意恢復糖類作物的種植，也是因為糖類作物田地可免于土改。

[[526]](#_526_16) P.C.喬希：《一篇評論文章》，載于《研討會刊》（1970年5月），第32頁。引自弗蘭克爾：《印度的綠色革命》，第197頁。

[[527]](#_527_16) 弗蘭克爾：《印度的綠色革命》，第198頁。

[[528]](#_528_16) W.L.科利爾、索恩托羅、岡納萬、沃拉迪、馬卡利：《農業技術和爪哇的制度變革》，載于《食物研究所研究雜志》，第8卷第2期（1974），第169—194頁。另見弗蘭克：《爪哇：奇跡的種子與破碎的夢》。

[[529]](#_529_16) R.特克斯特：《從農民到三輪車夫》（紐黑文，1961）。

[[530]](#_530_16) 見R.克里奇菲爾德：《喂！先生，您去哪兒？》（紐約，原著未注日期）

[[531]](#_531_16) O.D.凡·德·米曾伯格：《中呂宋的平級遷移：特征與背景》（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中心東南亞系系刊，第19期，1973），第151—236、341—414頁。

[[532]](#_532_16) 例如，E.班菲爾德：《一個落后社會的道德基礎》（1958）；S.塔羅：《南意大利的農民共產主義》（紐黑文，1967）；O.劉易斯：《王牌》（紐約，1964）；以及M.巴克斯：《演奏者的懺悔》（牛津大學出版社，即出）。上文引述的米曾伯格關于中呂宋的著作，是我所見到的論及東南亞同一問題的惟一著作。

[[533]](#_533_16) 班菲爾德：《一個落后社會的道德基礎》，第1頁。

[[534]](#_534_16) 這些政治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具體的保護行為建立起來的：來自泰國東北部的議員們特別關照自己的已移居曼谷的許多選舉人的利益；基督教民主主義者運用發展基金，使南方能夠為雇傭活動和契約提供強大保護，而到選舉時這就會獲得報償。

[[535]](#_535_16) 這里的詳細論述還應包括諸如供水、公共衛生、價格的維持、教育和道路等集體利益方面的公共開支，它也許能提高和（或）穩定農民們的收入。

[[536]](#_536_16) 見M.納什：《上緬甸的建黨》，載于《亞洲觀察》，第3卷第4期（1963年4月），第190—202頁。

[[537]](#_537_16) H.費思：《印度尼西亞憲制民主的衰落》（伊薩卡，1962）；《1955年的印度尼西亞選舉》（伊薩卡，1961）。

[[538]](#_538_16) 對菲律賓政黨選舉動力的權威分析，見蘭德的著作：《領袖、宗派和政黨》。

[[539]](#_539_16) 然而，要不是發生了薩克達爾黨的反叛，就不會這樣。在某些方面，可以認為這次反叛是緬甸的沙耶山起義和越南的義安—河靜起義在菲律賓的翻版。

[[540]](#_540_16) 例如，見F.斯塔納：《麥格賽賽和菲律賓農民：農民對菲律賓政治的影響，1953—1956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1）。

[[541]](#_541_16) 同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東南亞的大部分國家歲入來自進出口關稅，所以這一經濟部門的興旺比任何國內經濟部門的興旺都更具決定性意義。

[[542]](#_542_16) J.奧康納：《國家的財政危機》（紐約，1973）。

[[543]](#_543_16) 至于具體數字，見H.A.埃夫里奇、F.H.登頓、J.E.凱勒：《不確定的危機：菲律賓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圣莫尼卡：蘭德公司，1970），第161頁。我要補充說明的是，關于傳統的政黨制度克服危機的可能性問題，這篇報告從總體上說持有過于簡單化的樂觀主義觀點。另見T.諾瓦克、K.斯尼德的優秀論文：《菲律賓的委托人主義政治：一體化或不穩定》，載于《美國政治學評論》，第68卷第3期（1974年9月），第1147—1170頁。

[[544]](#_544_16) 科布：《警察與人民》，第320頁。

[[545]](#_545_16) 特別是當教派對地方經濟需要的看法及其道德正義感使之公然反對政府時——比如像爪哇的薩敏派所做的那樣，拒絕交納將會招致其破產的賦稅，或是堅持其從限制采伐林區獲取燃料的權利，教派就可能喚起反叛。大量的反叛都是在這種“支持”下爆發的。

[[546]](#_546_16) 關于高臺教，可參見F.R.希爾：《南越的太平盛世機構》，載于《社會歷史比較研究》，第13卷（1971年7月），第325—350頁；阮莊歡：《越南宗教史：高臺教》，見J.謝諾：《越南的革命傳統》（巴黎，未注日期），第7章。關于基督會，見H.安多：《對菲律賓的政治宗教派別基督會之研究》，載于《太平洋動態》，第42卷第3期（1969年秋季），第334—345頁。下文引述的資料均出自上述論著。

[[547]](#_547_16) 希爾：《南越的太平盛世機構》，第328頁。

[[548]](#_548_16) 吳庭艷后來破壞了一些教派領導人的軍事部門并收買了許多其他領導人。據希爾估計，他向高臺教以及其他教派的領導人行賄達1200萬美金。同上書，第345頁。

[[549]](#_549_16) 和好教運動雖然更為追求太平盛世和反對殖民主義，但也能以類似的術語進行分析。

[[550]](#_550_16) R.莫蒂默：《階級、社會分裂和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載于《印度尼西亞》，第8期（1969年10月），第6頁。我在這里的論述還依據下述資料：D.欣德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1951—1963年》（伯克利，1966）；R. 杰伊：《中爪哇農村的宗教和政治》（紐黑文：耶魯大學東南亞研究文化系列報告，1963）； W.F.沃特海姆：《爪哇農村的階級斗爭》，載于《太平洋視點》，第10卷第3期（1969年9月），第1—17頁。

[[551]](#_551_16) 當然，該黨在一個地區的農民之間努力地創造了新的橫向聯系。它組織了勞動交換、工作隊、互助信用協會、公共合作工程（學校、水井、修路）和生產合作社。然而，主要由于該黨的迅速發展，它傾向于改造地方原有組織而不是拋棄它們。當這些地方組織為委托人模式時，該黨便呈現為委托人組織；當這些地方組織有較強的階級基礎時，例如像農場工人中的組織那樣，該黨便更多地呈現為階級組織。

[[552]](#_552_16) 欣德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1951—1963年》，第163頁。

[[553]](#_553_16) 杰伊：《中爪哇農村的宗教和政治》，第99頁。

[[554]](#_554_16) 莫蒂默：《階級、社會分裂和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第19頁。

[[555]](#_555_16) 名義上的階級組織發揮著“保護人—委托人”網絡的作用，這一矛盾現象不單單是中等或上層階級領導的結果。在全國解放陣線的領導中以及在（1948年前的）中國共產黨中的中等階級成分所占的“超常代表”地位，并沒有妨礙它們成為革命政黨。關鍵因素不是領導者的社會背景，而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關系的性質。任何特定領導風格都必然是混合型的，而“階級擁護者”和委托人之間則具有基本的區別。階級擁護者往往共享某種政策目標的集體利益，并且依據領導者如何代表這一目標、如何為之實現而有效地工作對他們進行評價。與此不同，委托人則持有個人的、通常為短期的目標，并希望通過同有影響的領導人的私人關系來實現這一目標。有關這方面的有力論證，見C.蘭德：《東南亞的團體和網絡組織》，載于《美國政治學評論》，第67卷（1972），第103—127頁。

[[556]](#_556_16) 轉引自J.V.德·克雷夫：《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農民和土改》，載于《東南亞史雜志》，第4卷第1期（1963年3月），第49頁。

[[557]](#_557_16) 在這方面，印尼共產黨的做法不是共產黨中的特例。意大利共產黨在選舉的壓力之下，由于農民選票的作用至關重要，也傾向于反映、而不是改變意大利南方的委托人組織的特征。見S.塔羅研究意共的優秀成果：《意大利南方的農民共產主義》（紐黑文：1967）。對印尼共和意共兩黨進行比較研究是極有價值的。

[[558]](#_558_16) 柬埔寨和老撾也屬例外。但不同于東南亞主要的低地國家的是，柬埔寨和老撾的反叛并非肇始于租佃和賦稅問題。

[[559]](#_559_16) 在這方面的比較中沒有包括緬甸，因為緬甸20世紀50年代初的土改似乎緩解了——哪怕是短期的——農民的生存問題。土地改革在一定意義上以衰退問題取代了剝削問題。這一改革給緬甸造成的國家財政問題和大米出口的急劇減少突出地說明了農民的結構與國家對剩余物的索要之間的關系。

[[560]](#_560_16) J.鄧恩：《現代革命：政治現象分析之導論》（劍橋大學出版社，1972），第246頁。

[[561]](#_561_16) 越共很清楚這個問題，因而采取了一切預防措施保持那些幫助過越共的農民的法律地位，以使對他們安全的威脅達到最低程度。

[[562]](#_562_16) 例如，見G.休伊澤：《印度尼西亞農民的動員與土地改革》（海牙：社會研究所活頁文選，1972年6月）。

[[563]](#_563_16) 《土地和農業委員會報告（1938）》，第12頁。

[[564]](#_564_16) 正如上文所論證的，我認為這種順從或多或少仍然是自愿的，只要要求這種順從的精英們確實提供了生存保障和保護。在這方面，他們相互負有責任。

[[565]](#_565_16) 這段論述選自R.赫林的關于1969年西孟加拉的納薩爾巴里反叛的優秀畢業論文（威斯康星大學，1972）。

[[566]](#_566_16) 在農民反叛取得了一個地區的勝利而對于抵制反叛的人們來說危險不太大的極少數情況下，參與的證據便不能令人信服地支持先前進行的恫嚇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反對革命的運動（例如，1793年法國旺多的運動）令人信服地證明，對于那些農民來說，服從是自愿的、有價值的。因此，對于“覺悟”（不論是激進的抑或保守的）的最有經驗根據的檢驗之一，是一貫地為了某種價值甘冒生命危險的自愿程度。

[[567]](#_567_16) 我們也許會有這樣的假設：剝削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危機愈嚴重，農民為了反抗剝削而寧愿承受的風險便愈大，因而為了防止反叛所需要的鎮壓也就愈厲害。

[[568]](#_568_16) 格蘭：《越南與通向現代性的資本主義道路》，第226頁。

[[569]](#_569_16) 我的一位熟人曾應邀赴菲律賓的一家大莊園參加郊游活動。當一行人到達郊游現場時，發現四周布置了四位帶有機槍的武裝警衛人員作安全保衛。由此可以認為，雖然不清楚在莊園主的心目中他的佃戶們（即他的政治對手）是否至高無上，但他合乎理性地有所畏懼。

[[570]](#_570_16) 例如，參見A.卡迪納、L.奧維斯：《壓迫的標志》（克利夫蘭，1962）。

[[571]](#_571_14) 例如，參見R.M.埃默森：《權力依賴關系》，載于《美國社會學評論》，第27卷第1期（1962年2月），第39—41頁。

[[572]](#_572_14) H.紐比：《對服從的辯證思考》，載于《社會歷史比較研究》，第17卷第2期（1975年4月），第142頁。

[[573]](#_573_14) E.霍夫曼：《服從與行為的特性》，載于《美國人類學家》，第58期（1956年6月），第478頁。

[[574]](#_574_14) 沃特海姆：《社會——相互沖突的價值觀的混合體》，載于《東西方比較》（芝加哥，1965），第26頁。作者的論點在他的《進化或革命》（倫敦，1973）一書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論證。還可參見M.奧普勒：《文化中的動力要素》，載于《華盛頓科學院院刊》，第36卷第5期（1946），第422—442頁；A.齊吉德爾弗盧德：《笑話及其同社會現實的關系》，載于《社會研究》，第35卷第2期（1968年夏季），第286—311頁。

[[575]](#_575_14) 沃特海姆：《社會——相互沖突的價值觀的混合體》，第30頁。

[[576]](#_576_14) 此類配合旋律也可以成為社會主導價值觀的穩定的、妥協性的并相適應的描述。這在英國工人階級文化中就有例證。例如，見F.帕金：《階級不平等與意味深長的制度》，載帕金：《階級不平等與政治制度》（紐約，1971），第79—102頁；另見R.哈格特：《文字能力的運用》（倫敦，1959）。

[[577]](#_577_14) 《B.J. 柯克弗里埃特的通信》，夏威夷大學。

[[578]](#_578_14) 法國大革命前法國農民的“la gabelle”（鹽稅）一詞的意義是個恰當的例子。

[[579]](#_579_14) 我的這段簡短論述得益于J.賈菲的優秀學期論文：《19世紀的英國農民》（威斯康星大學，1970）。

[[580]](#_580_14) A.L.勞埃德：《歌唱的英國人》（倫敦，1944），第20頁。

[[581]](#_581_14) 賈菲：《19世紀的英國農民》，第7頁。

[[582]](#_582_14) 勞埃德：《英格蘭民歌》（倫敦，1967），第64頁。

[[583]](#_583_14) 阮洪甲：《從民歌看殖民地時期越南農民的狀況》，第115頁。

[[584]](#_584_14) 同上注。

[[585]](#_585_14) 同上書，第141頁。

[[586]](#_586_14) 同上書，第169頁。

[[587]](#_587_14) L.德·厄斯：《神話與封建社會：盧旺達傳統中的崇拜》，載于《宗教人類學檔案》，第18期（1964），第133—146頁。

[[588]](#_588_14) 同上書，第141頁。

[[589]](#_589_14) 同上書，第145頁。

[[590]](#_590_14) 見本德、卡斯爾斯：《薩敏運動》；世肖甲：《爪哇的薩敏和薩馬特運動》。

[[591]](#_591_14) 在后者同早期的教友派及其他異端教派的簡單談話之間所作的比較是引人注目的。

[[592]](#_592_14) D.斯特蒂文特：《最后必成第一》，隨處可見。

[[593]](#_593_14) 1861—1896年，芬蘭的愛國者、小說家、詩人、醫師。——譯注

[[594]](#_594_14) 墨西哥農民革命者在瓜達盧佩的黑人修女旗幟下的戰斗，是個十分相似的例子。

[[595]](#_595_14) 有權勢的保護者也常常如此，特別是就殖民地的基督教徒而言。

[[596]](#_596_14) 參見D.W.特里德戈爾德：《農民與宗教》，見W.S.武西尼奇：《19世紀俄國的農民》（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5），第72—107頁。

[[597]](#_597_14)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發現在農民內部的不同宗教和不同階層之間都存在著有趣的差異。

#### 譯后感言

[[598]](#_598_14) 參見劉擎、麥康勉：《政治腐敗·資本主義沖擊·無權者的抵抗》，載于《讀書》，1999年第6期。

[[599]](#_599_14) 同上注。